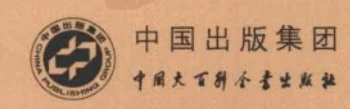


加勒比海地区史

D. H. 菲格雷多、弗兰克·阿尔戈特－弗雷雷 著　王卫东 译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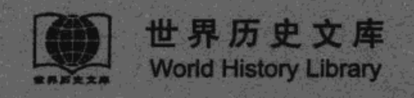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ISBN 978-7-5000-8523-2

9 787500 08523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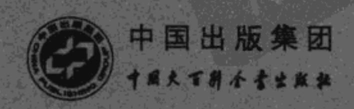
定价：45.00元



加勒比海地区史

D. H. 菲格雷多、弗兰克·阿尔戈特－弗雷雷 著 王卫东 译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图字:01-2011-05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勒比海地区史/(美)阿尔戈特-弗雷雷,(美)菲格雷多著;王卫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00-8523-2

(世界历史文库)

Ⅰ.①加… Ⅱ.①阿… ②菲… ③王… Ⅲ.①西印度群岛—历史 Ⅳ.①K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8571号

责任编辑 陆 源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39千字

印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大街上，你可以发现加勒比地区的风俗习惯。曼哈顿上流社会的酒庄或者波士顿的牙买加平原邻近地区经营的生意，常以萨尔萨舞（salsa）和跛脚舞（merengue）为背景。温热的面包和煮好的浓咖啡，有时配有一块小蛋糕（pastelito）或面饼，成为整个南佛罗里达地区的早点形式。在新泽西联合城（Union City）的博塔尼卡斯，经常有人推销预示着美好生活的巫毒教和萨泰里阿教仪式所需的物品。海地克里奥尔语富于表情的口音回响在布鲁克林区东弗莱什一带或芝加哥北部。波多黎各特有乐器四弦吉他（cuatro）的演奏不仅能在许多岛民的第二故乡纽约欣赏到，而且在遥远的夏威夷或加利福尼亚的圣格布瑞尔山区，也有人于节日时使用这种乐器。牙买加的干鸡肉条、牛肉饼、阿开木果、咸鱼已成为纽约、迈阿密、温莎和安大略的地方风味。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近700万人被认为是来源于加勒比地区的民族。在本书中，作者将他们自己也归入这700万人之中，正是这种天性使得我热情地传播加勒比地区的历史。

这些移民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较大的社区内，会自发寻求了解这些令人震动的包围着我们的历史、习惯与传统，他们有一种了解加勒比社会知识的渴望。《加勒比海地区简史》中心目的是通过非专业术语这种方式来为受过教育的读者提供此类信息，以展现加勒比地区的

复杂性。基于此目的，本书是加勒比地区最近500年历史的相关基本读物。当旅游指南介绍一个辉煌且令人烦心的目的地令人惊异的旅程时，我们就会看到自我。为抓住读者的欲望，我们寻求一切加勒比地区的历史主题，包括征服、各族灭绝、种族建构、奴隶制、殖民主义、移民、经济属地、革命并创建自立的民主。

本书应被看作一种深入学习研究的基本入门读物。本书还介绍了更加广泛的参考书目，以供读者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进一步探讨之用。在书中不时碰到的花絮新闻给主题增加了既严肃又古怪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从证明种族主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到波多黎各可爱而透明的科奎鹧鸪。这些花絮新闻有意去探究部分大众文化中很少被提到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寻求可得到的严肃话题，例如，女海盗会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男人主导的殖民职业中的女性角色问题。同样，这是性别研究重要性增加的一种象征，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使我们对性别角色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差别。近乎完美的"不幸少女"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的重要性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推动美国1895年介入古巴的独立战争，这也是性别研究重要性的另一个证明。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用尽了特别的力量。菲格雷多是一位加勒比文学专家，运用其知识使全书的分析更加丰富。历史为加勒比文学创造了主题，而文学也影响了加勒比历史的发展进程。欧劳达·埃齐亚诺的奴隶故事部分是一个历史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很好例证。埃齐亚诺的奴隶故事是18世纪废奴主义者圈子里的"必读"之作，对反对奴隶制的意识形态与人道主义也是重要的，它实际上有助于奴隶制的终结。另外的例证是早期古巴革命文学和海地作家对20世纪早期美国占领的反映。阿尔戈特—弗雷雷拥有丰富的加勒比历史教学经验，这使得他与这些特殊的听众在精神上使该书得以成形。他的关于奴隶反抗、古巴早期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美国的加勒比移民社区已被学生在教室讨论中研究了多年。大学一年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是该书的理想读者，这一点我想予以强调。关于古巴早期革命，阿尔戈特—弗雷雷在其古巴的独裁

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两卷本的传记中研究得非常出色。

有关本书内容的几点判断如下，该书内容集中于加勒比群岛而非加勒比海盆地区——一个包括部分墨西哥、中美洲、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更大地区。即使内容不增加到这一更大的地区，该项写作任务也足够让人气馁，尽管我们承认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存在着很多争议。我们考察了这些岛屿的地区性倾向，例如，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黑人国家主义的影响，所有岛屿与美国的关系。加勒比岛国为政治、经济主权而斗争是本书的中心议题。独立和建设远离欧洲强权的统一性是18和19世纪的关键目标。独立于美国是20世纪的中心议题，并成为21世纪的热望。一些关键人物以其独特的个性塑造了加勒比地区的文化、政治和遗产，我们对其作重点关注。

北美的，尤其是佛罗里达地区的一些事件，本书对其作了处理，因为它们影响了加勒比地区的事件，或被加勒比地区的事件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了佛罗里达地区的詹金斯耳朵之战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一次冲突中，1740年，西班牙和西班牙—古巴士兵保卫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的圣马科斯城堡，以免遭英国的攻击。在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统治者率领来自西班牙、古巴、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多黎各的士兵在佛罗里达抵抗英国军队。

最后一点，如何使我们热爱的、我们大多数的父母和祖父母出生的地方——加勒比地区安定和谐？马克思主义作家试图套入模型以适应其意识形态，当然他们对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些声称客观性经常是系统的产物、以致倾向偏爱欧洲人与北美人看法的作家，可能会作出精彩的解释。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曾试图研究有关同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也曾试图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解释照顾各方。然而，我们知道，确切地说，我们的加勒比之根古巴，不允许我们以一个非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这一部分。那样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可能会鼓励读者争论我们的结论。如果那样，我们欢迎。

致　谢

首先，最重要的，永远感谢我的家庭——伊冯娜、丹尼尔、加布里耶拉·菲格雷多、卡里达德、阿曼达、阿尔戈特—弗雷雷家族的安德鲁。感谢我们的代理人埃德·克拉芬在整个写作过程的指导；感谢 Facts On File 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克劳蒂娅·沙比，很有耐心并愿意冒险尝试，她是一位有眼光的女士。

尽管本书的实际写作时间仅花费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们早年即开始致力于研究、查寻资料，以及与专家探讨。我们曾访问过数十个图书馆，得到了这些图书馆的数十位工作人员和学者们的帮助，他们是：迈阿密大学古巴遗产收藏馆的勒斯比亚·奥尔塔·巴罗纳、里科特收藏馆的奥托·C.；享特学院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的内利达·佩雷斯；奥斯托斯社会学院的戴西·科科·德·菲利普斯；圣马丁公共图书馆的员工；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费尔南多·阿科斯塔—罗德里格斯；古巴哈瓦那胡安·马里内略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的埃米利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荷属安的列斯政府的考古学家杰伊·B.哈维舍。很多人的集体回忆也在本书中呈现，他们是：纽约大学的卡莫·布雷斯韦特博士，2006 年加拿大国际格里芬诗歌奖的获得者；音乐意识基金会董事长舒杰·莱菲（Shujah Reiph）；安的列斯大学的尼科尔·卡热—弗罗伦蒂尼（Nicole Cage – Florentiny），玛格丽特·劳伦

特（Marguerite Laurent），诗人，海地前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法律顾问；诗人林顿·奎西·约翰逊（Linton Kwesi Johnson），LKJ纪录的创立者；宾厄姆顿大学—SUNY的卡罗尔·F. 科茨（Carrol F. Coates）；佛罗里达中心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阿尔弗雷多·马西普（Alfredo Massip）、路易斯·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Luis Martínez Fernández）；波多黎各代表大会的阿方索·罗曼（Alfonso Roman）。

肯恩大学的研究室和该项目的发起者慨然允诺减少教学时间，使得阿尔戈特-弗雷雷所承担的部分能顺利完成。特别感谢肯恩大学历史系的成员，他们创造了一个精神上激励研究工作的环境，尤其是系主任马克·伦德（Mark Lender）、苏·格罗纳沃尔德（Sue Gronewold）、克里斯托夫·贝利托（Christopher Bellitto）、伯德·科尔尼森（Brid Nicholson）、拉里·齐默（Larry Zimmer）、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杰伊·斯波尔丁（Jay Spaulding）、丹尼斯·克莱因（Dennis Klein）、弗兰克·埃斯波西托（Frank Esposito）、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nit）、爱德华·布卢姆（Edward Blum）、乔·柴可夫斯基（Joe Czachowski），还有使我的研究与写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人们以及玛丽·沃卜内（Mary Woubneh）。特别感谢玛丽亚·佩雷斯（Maria Perez），是她激发了我对肯恩社区的灵感。最后要感谢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赫（Dawood Farahi）鼓励的对话与研讨的氛围。

绪　论

当学生们想起加勒比地区时，他们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除非他们对某个特定的岛屿有偏好，比如牙买加人喜欢牙买加，海地人喜欢伊斯帕尼奥拉。但总的倾向是，在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棕榈树、海滩、欢快的音乐和混合的种族。这样的概括稍显陈词滥调，虽然如此，但足够的地理相似性与共同的历史与政治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被欧洲强权征服，并作为这些强权的奴仆好几个世纪——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将加勒比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书写的机会。当然，从解剖学的角度说，从外观上可以相互区分——从胳膊到鼻子——但是，最终结果仍是一个实体，其中的一个部分影响了其他部分。所以在加勒比地区，19 世纪的独立战争发端于一个地区，然后扩展到别的岛屿，如从古巴到波多黎各。1959 年震动古巴岛的革命激发了其邻居格林纳达和牙买加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政治斗争。

地理

在地理上，这些岛屿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国家共同体。地理即历史，这样说可能要冒过度单纯化的风险，但对理解这一地区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只需迅速扫视一下地图，就可发现加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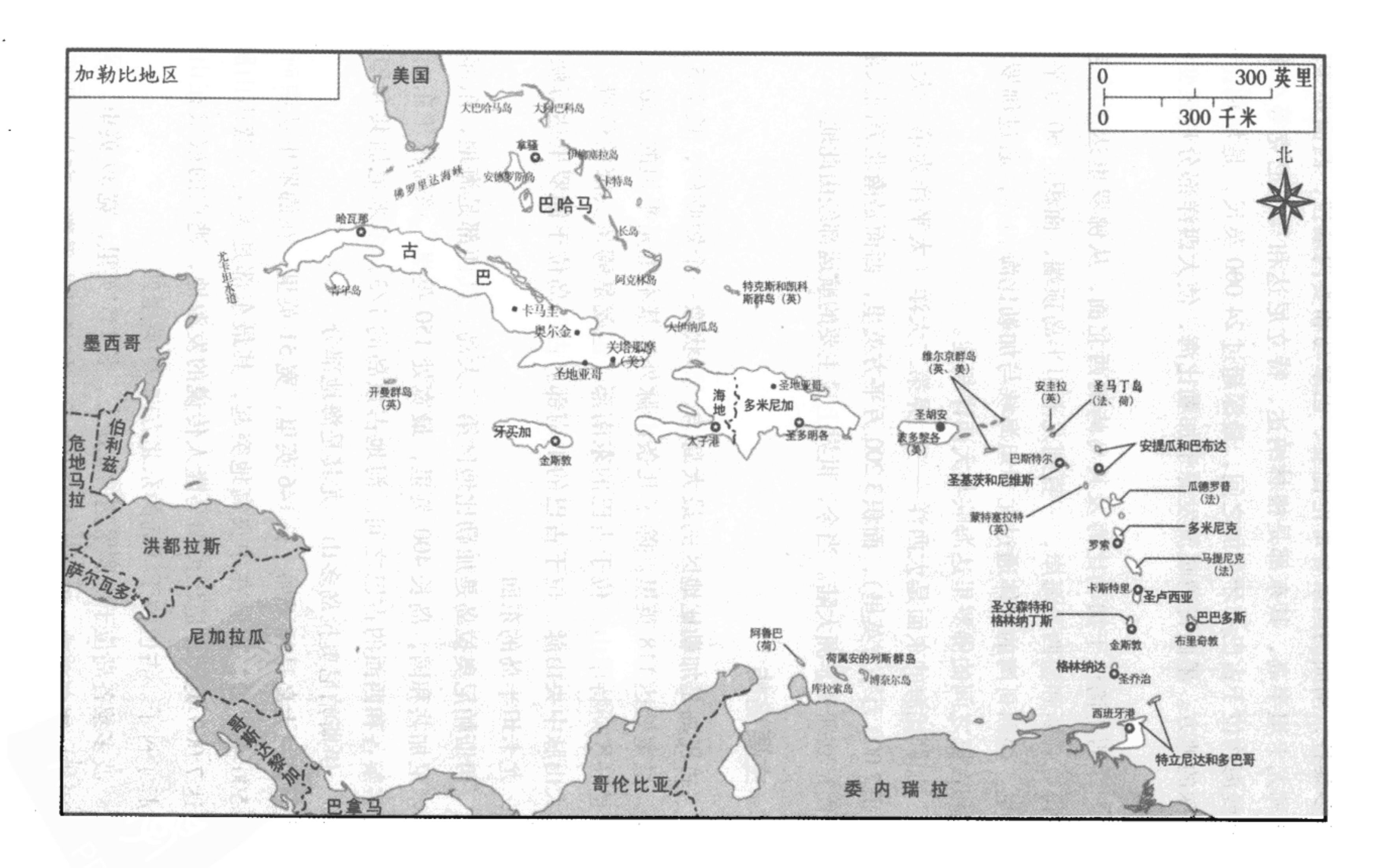
比地区分布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东边，形成一个古怪的“Y”字形，大的岛屿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形成一个手臂，巴哈马群岛形成另一个手臂，小的岛屿小安的列斯群岛形成“Y”字的基部。

这些岛屿的位置与它们相互接近是理解其历史的关键。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岛屿相互接近，使得印第安人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成为可能，而且得以避免大西洋上的强大洋流。在欧洲人到达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岛屿的社会相互贸易、学习，有时也发生战争。西班牙人到来后，这些岛屿成为他们探索南北美大陆的中间跳板。此后不久，这些岛屿成了他们理想的防卫前哨，以保护从墨西哥（著名的西班牙总督区）到西班牙帝国其他部分的黄金和白银贸易。事实上，它们形成了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天然屏障，对美国也起着相同的作用。这些岛屿同样成为21世纪巴拿马运河防护的关键。加勒比地区与美国接近，这些岛国的面积较小，使得它们易于受到剥削和过分受其北方这个强大邻居的影响。岛屿的位置靠近赤道，这成为它们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阳光和海浪都成了重要的商品。

加勒比地区也被称为西印度群岛和安的列斯群岛，绵延2 500英里，由北往南就像一串珍珠分布海面上。加勒比地区的岛屿由火山喷发形成，包括700个岛屿、岩礁和环礁。岛是较大一点的陆地，如古巴，四周被水体包围；屿是较小的岛，如波多黎各的别克斯岛；岩礁是更小的岛屿，由珊瑚和沙子组成，通常是圆形的，但也不总是这样；环礁较小，周围是藻类和珊瑚，中间凹陷。加勒比地区的岛屿是被海水淹没山脉的一部分，这些山脉的最高峰海拔高达10 417英尺（位于伊斯帕尼奥拉），最低的海拔不足100英尺（位于开曼群岛）。在伊斯帕尼奥拉中央山脉的最高峰顶部，气温偶尔会下降到低于冰点，并会形成霜。

水体

这些岛屿在加勒比地区，实际上是大西洋的一部分，面积达100万平方英里。加勒比海北面的岛屿有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和


加勒比地区
0 300 英里
0 300 千米
北
美国
大巴哈马岛
拿骚
安德罗斯岛
卡特岛
巴哈马
长岛
阿克林岛
大伊纳瓜岛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
佛罗里达海峡
哈瓦那
古巴
青年岛
卡马圭
奥尔金
关塔那摩（美）
圣地亚哥
开曼群岛（英）
牙买加
金斯敦
海地
太子港
多米尼加
圣地亚哥
圣多明各
圣胡安
维尔京群岛（英、美）
安圭拉（英）
圣马丁岛（法、荷）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斯特尔
圣基茨和尼维斯
蒙特塞拉特（英）
瓜德罗普（法）
多米尼克
罗索
马提尼克（法）
卡斯特里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金斯敦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格林纳达
圣乔治
西班牙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阿鲁巴（荷）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库拉索岛
博奈尔岛
墨西哥
伯利兹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波多黎各，南面的国家有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西面是中美洲和尤卡坦半岛，其东部是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马提尼克等小岛。开曼海沟位于古巴和牙买加之间，最深超过24 000英尺，是加勒比海最深的地方。墨西哥湾暖流发源于加勒比海，使大西洋部分地区变得温暖。

墨西哥湾位于加勒比海及其岛屿的西北面，从佛罗里达顶端起，经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岸，一直到尤卡坦半岛顶端，面积达60万平方英里。墨西哥湾的水体通过尤卡坦海峡与加勒比海相连，通过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与大西洋相连。

加勒比海的东面是大西洋——世界第二大洋（太平洋为第一大洋，面积7 000万平方英里），面积3 200万平方英里，西面是南北美洲大陆，东面是欧洲和非洲大陆。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航运都经由此地。

主要岛屿

古巴岛是加勒比地区的最大岛屿，形状像一个短吻鳄，长775英里，最宽处达118英里。除了几条山脉外，基本上是平坦的。最大的山是马埃斯特腊山，位于古巴的东南部，也就是鳄鱼头部的位置。第二大山脉中央山脉，位于古巴的中南部。古巴岛位于佛罗里达海峡南面，尤卡坦半岛的东面。

伊斯帕尼奥拉岛是加勒比地区第二大岛，其西部是海地，东部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岛长400英里，最宽处150英里。该岛位于东面的波多黎各和西面的古巴之间。海地占该岛的1/3，多米尼加共和国占2/3。伊斯帕尼奥拉岛多山，尤其是海地部分。

第三大岛是牙买加，长146英里，宽51英里，在佛罗里达南面不到500英里处。山脉在中央高地突起，其最东部是著名的蓝山山脉，高达7 000英尺，是牙买加马隆人传说的发源地，逃亡的奴隶在山中建起了村子。古巴位于该岛的东北方向95英里处。

波多黎各岛位于佛罗里达的东南方，长111英里，宽39英里。尽管岛屿的一侧多海滩，但该岛属多山地形，好像是为平衡，在另一侧形成

了令人胆寒的悬崖。从水平角度看，波多黎各好像从水面直插空中。

以上四个岛屿就是著名的大安的列斯群岛。这一名称与安提利亚（Antilia，又作 Antillia）有关，安提利亚是一个位于靠近西属加那利群岛的大西洋某处的神秘岛屿，被称为幽灵岛，这可能就是阿特兰提斯传说的原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说坚持认为，天主教的主教在 8 世纪曾访问过该岛；在 15 世纪早期，又传说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员曾看到过该岛。

群岛

巴哈马群岛群以巴哈马群岛著称，由巴哈马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组成，形成了从佛罗里达东南到古巴北方的一个链条。这些岛屿实际上是珊瑚礁，有几英里宽的白色或粉红沙滩。巴哈马群岛上没有河流，世界上 5% 的珊瑚生长在这里。珊瑚生成了钙，净化岸边的海水，使近岛海水的能见度深达 200 英尺。

群岛包括美国和英国属地维尔京群岛、巴巴多斯岛、格林纳达岛、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岛、圣马丁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就是著名的小安的列斯群岛。这些岛屿形成一个弧形，从波多黎各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东部和委内瑞拉的北部。有数量众多的小山散布在这些岛屿上，如圣卢西亚岛和圣马丁岛几乎没有成片的土地。

在加勒比地区，风由东吹向西，其中的一些岛屿是背风群岛的一部分，因为它处于下风向而得名。背风群岛的这些岛屿——包括安圭拉岛、安提瓜岛、巴布达岛、多米尼克岛、瓜德罗普岛、蒙特塞拉特岛、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尼维斯岛、圣基茨岛、圣马丁岛和维尔京群岛——是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部分；向风群岛——得名于这些岛屿迎着由东吹向西的风，这样有助借助风力航行的船只的到达——包括格林纳丁斯群岛、格林纳达岛、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岛和圣文森斯特岛。三个小岛——大开曼岛，76 平方英里；小开曼岛，20 平方英里；开曼布拉克岛，22 平方英里——组成开曼群岛，位于古巴的南面或西南面，牙买加的西北面。

地质与地形

在加勒比地区，一个群岛内部的地质与地形可能相似或相近，而另一个群岛则与之不同，这使得该地区的地质与地形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一些海岸可能会有很长的良好沙滩和清澈的海水，而到乡间旅行则可能会面临沼泽和流沙的危险，例如在古巴，或者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库拉索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大片的草地或平坦的谷地并不意味着附近有森林；在波多黎各，从圣胡安出发，半小时的车程则可能将你带到一个雨林的原始世界。

加勒比地区有三种类型的雨林：干旱森林又称为热带落叶林，这些地区一年降水总量为30—50英寸，大约7个月为湿季。此种森林中的树木高度约达30英尺。由于很少有阳光照射到地面，所以这些地带草类稀少。

季雨林以松树、杉树和墨水树为特征，一年的7—9个月可以接受50—80英寸的降水，它还可以有茂盛的草本植物。

热带雨林广为人知且富有活力。热带雨林由高大的树木和浓密的草本植物组成，这些地区一年的降水量为80—250英寸，这些降水可满足植被生长所需。即使不下雨时，积存在树叶上的水也足够这些植物所需。主要的雨林都分布赤道附近，这些地区的气温在64—95华氏度之间。世界上的雨林对发展新药物治疗很重要，因为雨林的很多植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可能有医用价值。一些雨林的植物和动物也将被鉴别和分类加以保护，世界上的雨林已成为近二十年来的一项重要的生态课题。





波多黎各云盖地区繁密的雨林和山地。在这里，浓密的植被形成了天然的遮盖。（D. H. Figueredo 拍摄）



海湾和海滩环抱的圣马丁山（D. H. Figueredo 拍摄）

波多黎各的云盖地区以雨林而闻名加勒比，云盖地区在这个岛屿的首都圣胡安视野所及的范围，每年降水超过 80 英寸。随着山势的升高，气温随之下降，在 120 英尺高处，茂密的树木挤在一起，遮住了阳光，并形成了一堵真正的绿墙和顶盖，使得旁观者不能窥见森林的内部，从其内部也难以看到外部的世界。事实上，1502 年在瓜德罗普岛的类似雨林中，几名哥伦布的船员失踪了数天，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头顶的天空，所以无法找到星星和太阳来确定方向，最后，他们才跌跌撞撞地回到了海滩。

有些山脉似乎绵延到无限的远处，例如在海地，巨大的峰峦延绵不断，以致海地人喜欢称他们的国家为“山外有山”（Bellegard - Smith, 1）。有些山脉的风景非常优美，如牙买加著名的蓝山山脉，由不同的岩石构成，并因其岩石为蓝色而得名。有如画的小山环抱的海湾，如在圣马丁岛和特立尼达岛。有些小岛由海底抬升而成，形状像握紧的拳头，看起来不那么亲切。

珊瑚岛是如何形成的

珊瑚岛在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专家对它作了如下描述："珊瑚虫是一种生活在甲壳中的小的动物，生活在较浅的温暖而清澈的海水中。当珊瑚虫死去，其身体的柔软部分被水冲掉，而下部的骨骼则保留下来。新的珊瑚虫在死去珊瑚虫的骨骼上继续生长，最终形成大量的珊瑚。环礁是一种珊瑚礁，它几乎完全是一个环形的咸水湖。环礁的底部深入水下，那里珊瑚不能生长……当岛屿下沉或海面发生变化，珊瑚会继续生长。最初的岛屿消失在水面以下，形成环礁。"①

并非所有的地带都是山地，如在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有大面积平坦的干旱草原，其间点缀着一些稀疏的灌木。海岸地带（一些地方含有盐分）长满了红树林，起伏的小山环抱着山谷。库拉索岛是多刺林木和仙人掌的故乡，有大片的荒漠（珊瑚是一种由特定的海洋动物产生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形成的暗礁或小岛）。巴哈马群岛富含海洋生物而缺乏沉积物来支持不同农业的发展。

植物与动物

1492 年哥伦布达到加勒比地区之时，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发现的主要动物都是小型动物，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不适合大型动物的进化，而且南美洲的动物无法迁移至此处。所发现的一些在加勒比地区进化的动物包括一种体型小且不会吠叫的狗、蝙蝠、鳄鱼、鬣蜥蜴、蛇、海龟、鹦鹉，在靠近大陆的一些岛屿，如特立尼达岛，发现了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如树懒、食蚁兽、美洲虎猫、浣熊、小鹿。在海中和河流中发现有鲈科鱼、红笛鲷、金枪鱼、蛤蜊、螃蟹、龙虾、乌贼、

① David, Kenneth C. *Don' t Know Much about Geography: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World but Never Learne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1992, p. 184.

海牛，而移动缓慢的海象既生活在海水中，也生活在淡水中。群岛上的植物有棕榈树、兰花、夹竹桃、秋海棠、菠萝、番石榴、曼密苹果、花生、小麦、豆子、南瓜、胡椒、烟草、甘薯和丝兰等。留存下来的植物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土壤，能在干旱、大雨和强风中生存下来。例如，飓风能将树木连根拔起，但只能刮弯而不能撕破丝兰的叶子。

加勒比地区一直有一些令人注目的、独特的动植物。古巴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仅有人的拇指指甲般大小的蜂鸟——的故乡。古巴的大王椰子树长得又细又高，超过了75英尺，白色的树皮好像手工描画的眼睛。波多黎各的科奎鹧鸪叫声优美，“co－quí，co－quí，co－quí”的叫声恰如其名。云实在阿鲁巴岛的海滩长得枝繁叶茂。灌木的干似乎被吹得永久弯曲了，顶部绿色的树冠像一顶王冠。

帝王鹦鹉和灰鹦鹉来自多米尼克岛，一对生活在一起的鹦鹉，寿命可以长达70年，羽毛翠绿色间以红色条纹。灰色的反舌鸟生活在库拉索群岛，当有陌生人到来或离开时会发出祥和的叫声。还有一些礁湖，湖水内稠密的浮游生物使水发亮，好像在水下点亮了灯。

气候

加勒比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年平均气温在78—88华氏度，常年温暖。这里的气候受以15—25节[①]速度吹拂的东北季风的温和影响。季风来自亚速尔群岛海域，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经由百慕大群岛海域转向南，在太阳不断照射下，保持着温暖，而洋流也得益于这些季风。也正是这些季风和洋流，帮助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加勒比地区。

这些岛屿的大小与高度影响了季风，潮湿气流遇岛抬升，在上升

---

① 节（knot），国际通用航速单位，每小时航行一海里（约合1.852千米）为一节。——译者注

过程中气流温度下降，水汽凝结形成降水。地势较高的岛屿降水较多，尤其是多山岛屿，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而较低的岛屿则降水较少。环绕山地的气流，在白天受热迅速抬升形成云，当地面日照减少，气温下降，上升的热气流会因受热减少形成暴雨。几乎加勒比地区的全部岛屿都有三个季节：干季，2—4 月；夏季，5—9 月；湿季，10 月至次年 1 月。夏季，岛上居民喜欢到海里游泳（游客常年挤满海滩并随时下海游泳，这令当地人感到惊奇）。

科奎鹧鸪[①]——波多黎各的青蛙

在波多黎各的夜晚，尤其是在乡下，空气中充满了音调优美的自然的摇篮曲：“co – quí，co – quí，co – quí。”这种歌声来自一种小型两栖蛙类，它在警告其他雄蛙离开它的领地，并且邀请雌蛙来与其交配。当地的传统解释中，“co” 意思是“滚开”，“qui” 意思是“过来”。

这种小蛙身长 15—80 毫米，有棕色、绿色、黄色和灰色。科奎鹧鸪只有三个趾，并且趾之间没有游泳用的蹼。相反，它的趾端长着肉垫或吸盘，使其能够紧贴在任何垂直的表面上。科奎鹧鸪不是将卵产在水中，而是将卵产在树叶上。雄蛙守卫着蛙卵，这些卵孵化成与其父母一样的幼蛙，从而绕过了蝌蚪阶段。

科奎鹧鸪有 16 个种类，其中 13 种是波多黎各的特有品种。这些小蛙曾被带到别的国家，如巴拿马、美国，但根据习性，它们一旦离开波多黎各就不再鸣唱了。有人质疑这种说法，但是岛民们却对此深信不疑，并以之为骄傲。

对波多黎各人来说，科奎鹧鸪是大地洁净和对海岛热爱的象征，科奎鹧鸪的绘画和雕刻作品在波多黎各随处可见。[②]

---

① 科奎鹧鸪，拉丁学名为 Eleutherodactyluscoqui，是叫得最响亮的一种青蛙。雄性科奎鹧鸪聚集在密集的森林中，每 10 平方米就有一只。有记录表明在 90 厘米以外，小科奎鹧鸪的叫声还能达到 95 分贝。——译者注

② Silva Lee, Alfonsoe. *Coquí y sus amigos: Los animales de Puerto Rico* (Coquí and his friends: The animals of Puerto Rico). St. Paul, Minn.: Pangaea, 2000.

自然现象

加勒比地区的主要自然现象是地震、洪水、火山喷发和飓风。1527年，探险家、编年史家阿尔瓦尔·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1490？—1556？）记录了飓风如何从海湾里的一艘船上卷起一只小艇抛到了数英里外的陆地上："我们走进树林，往里走了四分之一里格[①]，我们发现船上的一只小艇挂在树上，距那儿十里格之处，我们发现了来自我们船的两人的尸体……由于碰在岩石上，面目全非以致无法辨认。"（Cabeza de Vaca，32）1692年，一场地震破坏了牙买加金斯敦的大部分地区，地震引发的海啸冲上海岸，吞没了著名的皇家港（罗亚尔港）部分，这里一度是海盗的避难所。1902年，马提尼克的培雷火山喷发，将圣皮埃尔镇完全毁灭。更近的时期，1995年，苏弗里埃尔火山的一系列喷发，毁坏了蒙特塞拉特岛，9 500名居民中的三分之二被迫离开该岛。那里的火山活动仍然是一种危险，最近的一次喷发发生在2003年。预报天灾是很困难的，如果是持续这样，海岛上的人口数量将永远地退回到1995年前的水平。在这些大灾难中，飓风最为频繁，平均每18年将加勒比地区扫荡一遍。

自然资源

糖是加勒比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岛屿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不同占支配地位的产品，但作为一种作物，甘蔗在所有的小岛上种植，以供日常消费与出口之用。18世纪，海地和牙买加是最知名的糖的生产者，然而，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古巴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糖的生产者。在进入21世纪之际，尽管糖的重要性在下降，但作为主要出口产品，古巴每年的生产量仍然超过300万吨。对

① 里格（league），长度单位，在英美为三英里或三海里，约合4.8千米。——译者注

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巴多斯、牙买加、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来说，糖仍然是重要出口产品。

咖啡和烟草种植主要在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平均每年出口 36 000 千克咖啡，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咖啡主要供本地使用。雪茄的生产会让人想起古巴与多米尼加共和国。香蕉的出口为多米尼克、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这些小岛提供了一半的收入。在牙买加，香蕉是第二位的出口产品，仅次于糖。其他重要的产品有可可、椰子和柑橘。

受自然的恩赐，一些小岛拥有油气和矿产资源，最突出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石油和天然气。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估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每天生产石油 15 万桶，储量为 9.9 亿桶；据估计，其天然气储量同样也很丰富。古巴有储量丰富的镍和钴，牙买加的铝土矿是一种重要的矿藏。其他还有渔业资源，每年能为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提供 30 亿至 40 亿美元的收入。

经济

勒比海地区具有优势的产业是旅游业，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近 20 亿的旅游者到该地区旅游观光，为这些小岛提供了一半的国民收入。加勒比地区的旅游业依赖于别国的繁荣，主要是美国，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在这里停留一周，约花费 3 000 美元。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副产品，包括卖淫和使用童工。另外，对当地岛民来说，大多数名胜太昂贵以致无法光顾，旅游业在加勒比人中创造了所谓的“旅游种族隔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哥伦布到达之前的居民

瓜纳哈塔贝人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加勒比地区生活着三个主要的土著族群：瓜纳哈塔贝人、泰诺人和加勒比人。瓜纳哈塔贝人（有时被误认为是西沃内人）在这三个族群中是人口最少的，而且，他们的文化最为纯朴。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靠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的文化处在旧石器或石器时代，尽管他们也用木棒、海贝和鱼骨制作工具，就像没有打磨的石器。”（Foner，1962：17）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军事技能，相信他们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尽管他们埋葬死者时似乎也起丘。他们可能生活在小的、松散的群体组织中，并且在哥伦布达到时，他们已处在被泰诺人文化同化的过程中。瓜纳哈塔贝人和他们的文化在我们能够进行更多的了解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古巴西部是他们的居住地，对该地考古探险获得的证据表明，他们露天居住，或居住在山洞中，主要依靠贝类、鱼类生活，有时也以赌博维持生计。在这个族群中还没有发现使用陶器的迹象。

从理论上说，瓜纳哈塔贝人起源于佛罗里达，并从那里航行到这些岛屿上，他们能够制造航行用的帆船，这种帆船可能由掏空的树干做成。考古学证据表明，瓜纳哈塔贝人与佛罗里达的土著在文化上存在着联系。哥伦布依靠泰诺人向导的帮助与瓜纳哈塔贝人建立了联系。

2

泰诺人与瓜纳哈塔贝人操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交流起来比较困难。无论如何，哥伦布对他们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当然在其看来也就没有任何价值。

泰诺人

从哥伦布留下的大量描述，我们对泰诺人的了解更多。泰诺人可能起源于南美洲北部，大约 2 500 年前，他们乘挖空树干制成的独木舟，用船桨划行来到了加勒比地区。他们的文化十分复杂，学者们通常依据地理边界来划分“典型的泰诺人”，他们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波多黎各，有一小部分在古巴东部。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多黎各是泰诺人世界的中心，他们之间的贸易很多。主要居住在古巴、牙买加和巴哈马群岛的泰诺人被认为是西泰诺人，那些居住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泰诺人以其被称为东泰诺人而闻名。

欧洲人将所有这些土著人统称为“印第安人”，但是，他们自己则以地域来互相区分。居住在巴哈马群岛的泰诺人以卢克雅思而著称，而居住在波多黎各的泰诺人则认为自己是伯林克。泰诺语成为识别加勒比地区土著族群的另一种方法，因为它们是哥伦布第一次听到的另一种语言。在加勒比地区的语言中，这意味着“优秀”或“高贵”，这种语言被泰诺人所使用，并以此将他们与其加勒比人对手区分开来。哥伦布将其第一次看到的泰诺人描述为：相貌堂堂，身材高挑，比例适中，有着橄榄色的皮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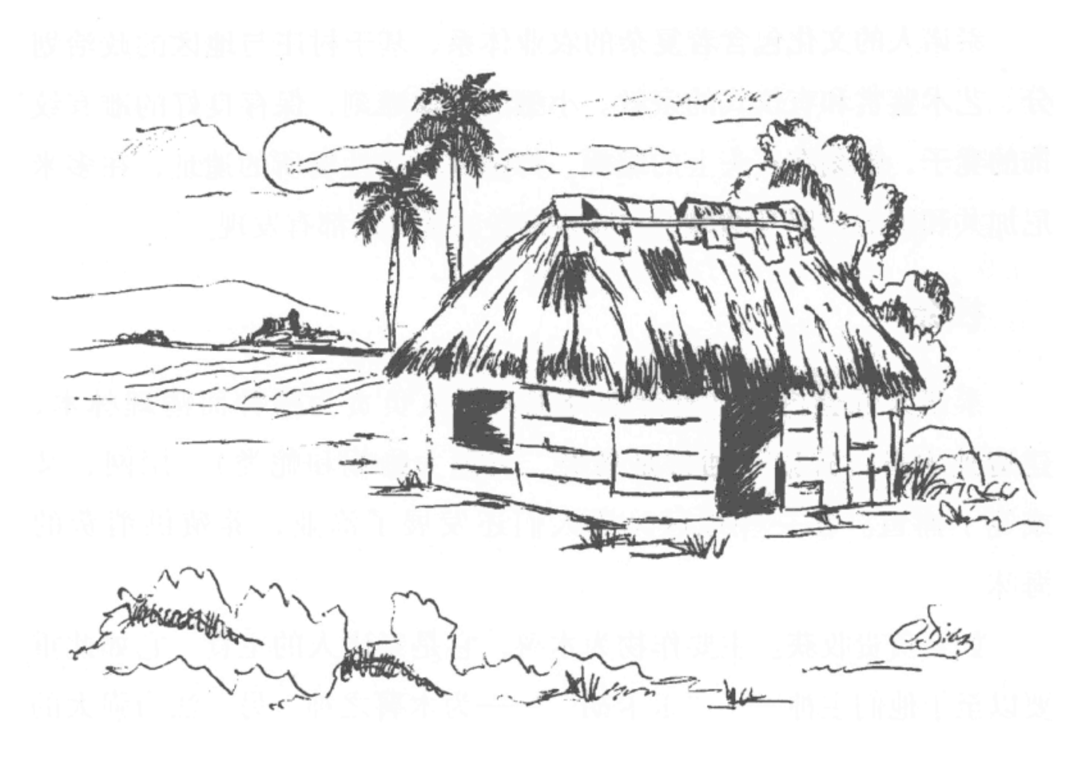
泰诺人的文化包含着复杂的农业体系、基于村庄与地区的政治划分、艺术鉴赏和有仪式的宗教。小型的神像雕刻，保存良好的雕有纹饰的凳子，雕刻在石头上的蝙蝠，舞蹈或仪式性场所的遗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罗马纳附近和波多黎各的蒂贝斯都有发现。

社会

泰诺人社会内部已有劳动分工，男人负责为播种而清理林木，建造独木舟，狩猎（通常是鸟类、美洲大蜥蜴和蛇类），用网、叉或笼子捕鱼。在一些地区，男人们还发展了渔业，养殖供消费的海味。

妇女负责收获。主要作物为木薯，它是泰诺人的主食，它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主神——“玉卡胡”——为木薯之神。另一法力强大的神“埃塔贝”，是掌管清洁水与生产力的女神。妇女编织吊床，缝制能遮住身体前面的裙子，并负责准备伙食。母亲将婴儿背在背上，用两块板子将婴儿头的前后夹住，使额头长得扁平，所以泰诺人创造的扁平额头是其显著的体质特征。不管传统性别的劳动分工，很多学者认为，泰诺人的社会十分平等，女首领也不罕见。

泰诺人靠近海岸和河边定居，根据历史学家富兰克林·奈特的研究，“从许多的家庭单元到上千户三四千人的镇子，村子房屋围着圆型（舞蹈）场地排列，首领的稻草覆顶的土坯小屋，被称为茅屋（bohio）”（Knight，1978：13）。他们将其岛民分成由酋长或首领统治的省，其职位通过母系血统传承。这些省份由权力较小的首领或副首领统治的村子组成。



1492年甚至直至今天，泰诺人的旧式住宅遍及整个加勒比地区。（Carlos Diaz 绘）

一个酋长的代表性特征是一夫多妻，妻子通常来自为结盟而联姻的部落，酋长监督宗教和舞蹈事务。这些首领负责解决争端，并因其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如派人建造大独木舟，猎获像美洲巨蜥等特别的食物，制作华美的衣服，雕刻泰诺人信奉的保护个人和村庄的神灵“泽米”的小型精美雕像。奈特将“泽米”描绘为“有着夸张的性器官的图案怪异的人神同体的形象”（Knight，12）。除了首领，在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精神与肉体的治疗师，叫做“博胡提”，对满足社区的医疗与精神需求有帮助。“博胡提”因其了解神灵的知识和对本地植物疗效的掌握而享有声誉，而对其服务的报酬通常是木薯。

泰诺人拿着武器的形象或描绘为勇士的形象的“泽米”还没有出现过，以致一些学者提出，面对大自然，他们不具攻击性。哥伦布本人也见证了泰诺人的温和性情。1492年，当哥伦布的一艘船只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失事，当地的酋长用独木舟救援水手，运送船上的货物，然后给哥伦布和他的人员提供住所。泰诺人一般性格平和，对他们来

说，暴力闻所未闻。私人争端偶尔用凶杀手段来解决，村子之间偶尔也为越界渔猎而争斗。

泰诺人有一个敌人：加勒比人。哥伦布注意到，一些泰诺人身上带有伤疤，他推断另外一个族群与他们发生了战争。后来，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一位海军上将从一个酋长那了解到，加勒比人不仅袭击泰诺人的村落，而且抓走他们的女人，还杀死并吃掉年轻的男子。

哥伦布也变成了泰诺人的敌人，尽管他们最初对哥伦布的到来并未表现出害怕；完全相反，泰诺人表现得相当友好。他们愿意与这些欧洲人分享自己的食物，“教他们认识草本植物、农作物，建造房屋”，种植烟草、土豆和花生之类的农作物（Knight，1978：16）。然而，一些事情总让人怀疑，如哥伦布想雇佣他们做翻译。海军上将写信给西班牙君主说：“我通过武力迫使他们中的几个人学习（西班牙语）……现在我还把他们带在身边。”（Morison，184）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哥伦布及其后来者凭什么不经这里的居民允许就将他们的人和殖民者想要的东西从加勒比地区拿走？

5

传统、习惯和神话

泰诺人认为世界是由美好和邪恶组成的。神“玉卡胡”代表了所有美好的事物，例如美好的天气、优良的作物和幸福。“胡拉坎”则相反，代表狂风与暴雨、洪水和毁灭。也有一些邪恶的精灵，被称作“马伯牙斯”，他们隐藏在森林里，晚上出来害人，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泰诺人害怕黑暗的原因。泰诺人相信有来世，所以，私人物品例如珠宝会随死者埋葬。他们通过吸食烟草而达到一种幻觉状态，这是其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有些舞蹈和音乐活动被称为阿衣图，通过这种形式向神表达敬意。阿衣图活动在田间或仪式广场举行，通常由叙述、诗歌、歌唱和舞蹈组成，以此来讲述过去的事件，或评论最近发生的事件，如出生或死亡。阿衣图曾被用来召集村子里的人同敌对家族或别的村子战斗。

泰诺人还举行被称为巴图的球类游戏，有点像排球。游戏中防止

球落在地上；然而不能用手接球。让球落在地上的一方算输。这种球类游戏给不同的村子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每个队有10—30名队员，男女都可以参加。

语 言

泰诺人所说的语言与南美洲亚马逊河和奥利诺科河流域的一些地区今天仍使用的阿拉瓦克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种伴有鼻音特质的柔和的、音乐般动听的语言，它有许多元音和送气的辅音，如“h”，“Hamaca”的音为“amaca”。

加勒比人似乎有两种语言交流方式，一种由男人使用，而另一种由女人使用。访问过多米尼加保留下来的加勒比人的学者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使用不同的词语和表达方式，这表明语言的使用是由性别决定的。这也可能是泰诺人与加勒比人联姻的副产品。嫁给加勒比人的泰诺女人，不是被挑选过去就是被劫持过去的，她们说泰诺语，而大陆出生的加勒比男人则说加勒比语。它还表明，因为海岛上的加勒比人穿越南美洲北部海岸，他们学会了加勒比语的词汇和发音。这种语言的元音发音就像西班牙语，而其辅音的发音则像英语。

科努科：环保型的农业

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在被称为“科努科”的小型农场中种植木薯——我们通常所说的“尤卡”或“树薯”，这种农场系统被称为“科努科”。种植木薯幼苗的方法是，块状根平放埋入地下几英寸深，周围要有足够的泥土和空间，以保证根能向四周生长。有时，会把一些泥土弄成球状来培植木薯。“科努科”系统不需要大量的水和泥土，这样就可以在海滨和山脚下开展种植。木薯长得高大粗壮，叶子细小，能经受住强风。

这种农场体系今天仍在使用。在古巴，这种被称为“科努科”的小型农场，致力于这种保留下来的种植业，并且受到政府的保护。一些小型公寓的家庭菜园也常被描述为“科努科”。这

种“科努科”种植业还出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库拉索岛，在这些地方被称为“库努库”（kunuku）。这个词已经代表了一个对生态或环保敏感的家庭或小型社会的农业实践。

当今，木薯仍然是一种深受古巴人、海地人和波多黎各人欢迎的食物。海地人把它压平，做成类似面包的团块，吃法与面包一样；而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用水煮木薯，有时则用油炸。木薯加热后，也可以淋上橄榄油，抹上蒜酱，再配上几片大蒜或洋葱。它与牛肉或猪肉拌在一起可做主餐。①

今天仍在使用的泰诺语词汇

7

数百个泰诺语词汇仍在当今的西班牙语中使用，也有少量词汇被英语所吸收。20 世纪早期，波多黎各的学者卡耶塔诺·科利—塔斯特（1850—1930）收集且识别了许多泰诺语的词句。一个被称为泰诺人统一联盟的组织，1998 年在纽约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编一本西班牙语和英语中的泰诺语词典。现在，一些泰诺语词汇仍在英语中使用，其中的一些过去为加勒比人所使用，这也表明泰诺人和加勒比人之间存在着语言方面的交流。具体词汇如下：

泰诺语	英语
barbacoa	barbecue
canoa	canoe
hamaca	hammock
huracán	hurricane
manatí	manatee
yucca	yucca plant②

① Spector, Amy. “Yuca: Chefs Go Maniac for Manio.” *Nation's Restaurant News* 37, 27 (July 2003): 37.

② Colly Toste, Cayetano. *Selección de leyendas puertorriqueñas*. Boston, and Washington, D. C.: Heath, 1932.

音乐

泰诺人使用多种乐器——不同式样的鼓，来伴奏阿衣图表演和宗教仪式，泰诺人称这些鼓为“马尤哈沃”。它是由细木做成的加长鼓，上有凹槽，内置两球，其中一中空球被称为响葫芦，供乐师摇动（一种现代的变种鼓仍在使用）。一位或一群歌手用同一曲调演唱诗歌，以此来讲述历史事件或神的故事，这些诗歌很长，演唱时间可达数小时。乐师通常是部落的杰出领导者。

视觉艺术

泰诺艺术表现了泰诺人的社会价值观和对外界的看法。所以，泰诺人经常用木头雕刻不同尺寸的神像，大型的雕像被当作礼物送给酋长，在石头和贝壳上雕刻与绘画的内容通常为鸟类、蝙蝠和青蛙之类的小动物。在波多黎各，考古发现的遗物包括有人类加工特征的三尖石、动物图案、石匕首、石面具、护身符和陶瓶。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催吐用的压舌板，饰有或人或动物的复杂图案；雕有图案的木凳子，展示了人、动物或几何的精巧图形。这些凳子也在宗教典礼中使用。这些关于泰诺艺术细节的发现，表明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阶层的存在，他们耗费很多时日来完成艺术工作。这些工匠可能在村子里深受尊敬，其中的一些很可能在整个地区都享有声誉。

关于消失的泰诺人的新研究

现代社会已没有泰诺人的后代，这是人们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这一假设的前提是，不是这一族群在被征服和殖民中灭绝，就是他们和加勒比人、西班牙人通婚而被同化。

在18世纪，一群生活在波多黎各莫纳岛的泰诺人被发现，当时他们被安置在波多黎各中部，与非洲人、西班牙人通婚。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在他的著作《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1800年）中描述了19世纪古巴的一个残存的土著社区。20世

纪早期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在古巴的乡村，有一些小的泰诺人社区，他们与当地人通婚。

波多黎各研究人员研究了在一个考古地点发现的3个泰诺人的头发和遗物，并将他们头发的DNA结构与56个波多黎各人志愿者的DNA比对，这些志愿者来自泰诺人曾经生活过的岛屿的一个地区。比对结果证明，60%的志愿者的DNA与来自考古地点的泰诺人的DNA相吻合。在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同的研究也在进行，历史学家期待着研究结果，现在人们相信，当时泰诺人被西班牙人击败，他们并没有完全灭绝。

加勒比人

这三个族群之中，加勒比人是最后到达加勒比地区的，他们可能来自2 000年前的南美洲，他们与南美洲大陆的加勒比人在文化上与人种上有关联。为区分他们，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加勒比人被称为海岛加勒比人，他们自称为卡利纳人。在哥伦布达到之时，他们占据着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向风群岛和瓜德罗普，并且正在征服较早的以埃耶里人而著称的文明。

9

加勒比人以其勇猛的战士而闻名，他们对泰诺人进行定期的战争，泰诺人告诉哥伦布，加勒比人是食人族。他们吃人的名声可能被西班牙人夸大了，因为他们以此为借口来征服加勒比人。他们可能是在某些宗教仪式上吃人，而不是将此作为食物的正常来源。

海岛加勒比人能够建造一次运载超过100人的巨型独木舟，他们乘着这些独木舟从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去袭击泰诺村落。他们特地为寻求老婆而去远征，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人口统计学上的不平衡。泰诺妇女的存在对海岛加勒比人社会影响非常显著，证据同样可以在陶器和家庭装饰中发现。另外一点是木薯农业，加勒比人吃鱼、蜥蜴、螃蟹、豆类，他们还酿制啤酒。

加勒比人不像泰诺人那样喜欢建造大型村庄或社区，他们总是准

备迁移，所以喜欢家庭成员的小规模聚居。研究表明，他们实行男女分居制，男人住在中心的大房子里，女人住在大房子周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房子里。加勒比人喜欢住在山上，这样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视野，这也是斗争的策略。他们的武器包括弓、毒箭、矛、木棒。不像泰诺人在哥伦布达到后的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人口大量减少，加勒比人设法生存下来，至少部分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也因为他们居住的海岛是不在西班牙殖民者来去的冲要之地。他们文化的一些方面在征服中保存了下来，尽管在17世纪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影响。海岛加勒比人进行了很多次战争抵抗欧洲人，逃亡的奴隶定期加入他们的社区，这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动力。一些土著社区被称为“黑加勒比人”（Black Caribs）。

20世纪早期，一个加勒比保留地建立在多米尼加东部海岸。18世纪60年代，加勒比人被重新安置到多米尼加北部，一个世纪后，英国教会许诺对其保护，这些加勒比人的后代成了这个保留地的居民。1903年，3 000多英亩的土地被宣布为加勒比保留地，这个并不完美的保留地保存了加勒比文化，它使得学者们能够一瞥过去的前哥伦布时期的真实情景。加勒比人的影响和文化现在仍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发现，包括圣文森特岛。

第二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西班牙的征服（1492—1552）

1492年1月，在格拉纳达宫廷的外面可以看到一个骑着骡子的骑手离开，这个骑手不是一位爵士，而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水手，最近曾被西班牙统治者王后伊莎贝拉（1451—1504）和国王费迪南德（1452—1516）驱逐。他向统治者提出了一个方案：绕过危险的陆路，向西穿过大洋到达对岸的印度和亚洲。 11

这个中年的水手平静地骑在骡子上，怎么说服别的统治者为他那直达印度而不是绕过非洲的新路线提供资金？又有多少欧洲的君主他能够拜访？一个人从后面喊着他的名字飞奔过来，这位使者告诉他，受资金困扰的宫廷找到为其冒险提供经费的方法，国王和王后愿意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Morison，136）

当这位水手回到格拉纳达，立即准备他的将来会改变世界面貌、使哥伦布成为家喻户晓名字的第一次旅程。

拥有许多名字的海军上将：科隆、科伦坡、哥伦布

在英语世界里，“广阔海洋的海军上将”即指闻名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于1451年出生在今属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的克里斯托弗科伦坡丰塔那罗萨。他的父亲是一个涉足于不动产和政治的工匠，

母亲是一个成功的纺织工的女儿。热那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亚欧的商业中转站，在那里，商人们将香料、丝绸以高价转售到欧洲。年轻的哥伦布为航海和探险所吸引，十几岁时就报名参加了几次地中海的短途航行。二十岁时在爱琴海的航行，提高了他的航海技能，他学会运用洋流、使用星表。后来的1476年，在另一次航行中，他们的船遭遇海盗后在葡萄牙海岸沉没，他们靠一艘小艇划到海岸而得以生还。

当时，葡萄牙人统治着大海，在15世纪，葡萄牙在大西洋中的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殖民，还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征服了非洲的城市休达，探险活动远达非洲大陆的塞拉利昂。探险活动的狂热支持者主要是王室成员——航海探险家王子亨利（1394—1490）。王子亨利支持父亲约翰国王（1357—1433）和他的兄弟杜阿尔特国王（1391—1438）扩大葡萄牙领地，寻求通过撒哈拉沙漠的商路。他整天和地图制作者、地理学家在一起，他的遗产是使葡萄牙作为欧洲地理知识的中心出现。

在葡萄牙，哥伦布置身于新的航海理论之中，包括通过观测太阳确定纬度，利用潮汐的推动力；他与那些知识渊博、不相信地球是一个平面的人交往，就像受到较少教育的人那样。[学者杰弗里·伯顿·拉塞尔在《发现平坦的地球：哥伦布与现代历史学家》（*Inventing the Flat Earth: Columbus and Modern Historians*, 1991）中主张，不论教育背景，欧洲人熟悉航海，知道地球是个球体，那种哥伦布不得不使人相信地球不是平的观念是一个错误的神话。] 他也开始思考通过向西航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画像，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长相。

行达到印度和日本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受到了意大利地理学者、数学家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里（1397—1482）的影响，据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研究，哥伦布曾与其通信（Morison，13—15）。托斯卡内里相信，安提利亚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可以作为到达印度与日本的一个中转站。







在王后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国王费迪南德在格拉纳达战胜穆斯林之后，他们开始注意哥伦布。（摘自 *The Christian Recovery of Spain*, by Henry Edward Watts,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894. p. 1，280）

1479 年，哥伦布与一位和葡萄牙王室有关系的贵族家庭的女人结婚。1484 年，哥伦布获得国王亨利二世的召见，但国王不愿意为哥伦布提供资助，他只对通过环绕非洲航行到达印度感兴趣而不愿探索其他路线。当时的王室文件记录这个水手的名字为“Christovao Colom”，一个葡萄牙语翻译的早期意大利语姓名。

1485 年，哥伦布的妻子死去，他和他的儿子迭戈移居到西班牙。在一个修道院，哥伦布帮助了一位方济各会修士，他对哥伦布的计划很感兴趣，于是他把哥伦布介绍给了与西班牙王室有关系的贵族。

1486年，这位热那亚水手用的名字是克里斯托瓦尔·科隆，被王后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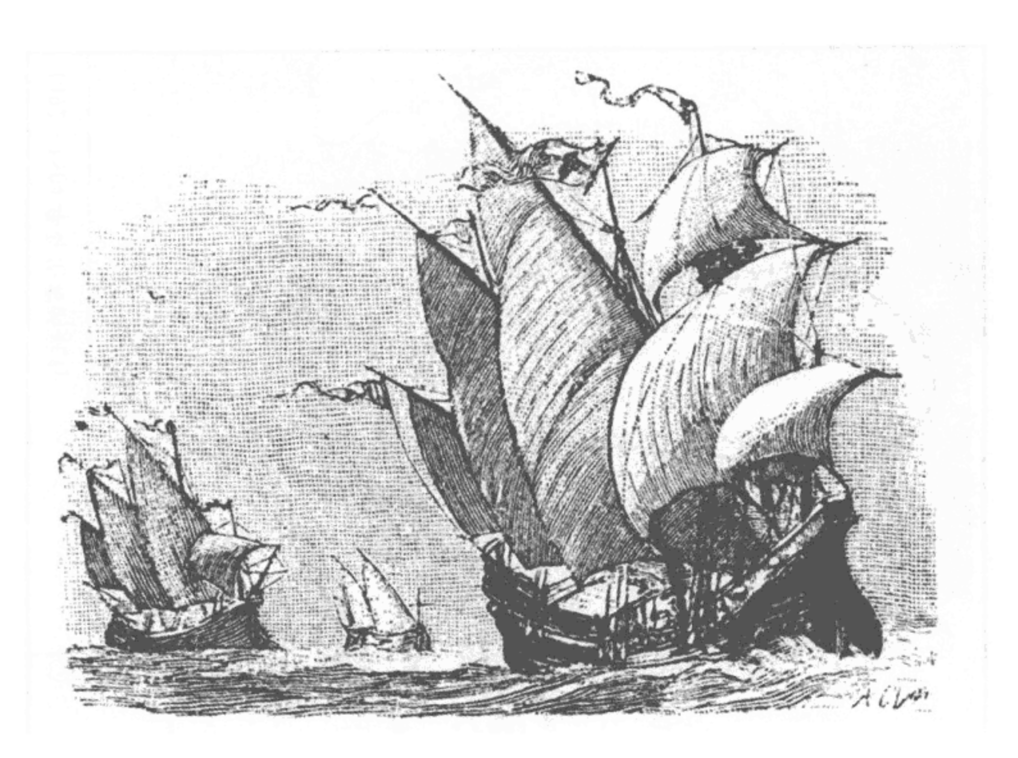
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德召见。王后伊莎贝拉希望与葡萄牙的海上支配地位竞争，因此对哥伦布的计划很感兴趣，但是当时不是支持探险的时机。国王和王后正处理更紧迫的西班牙光复运动（即再征服运动），当时正处于将摩尔人驱赶出伊比利亚半岛的当口。

1492年1月，国王和王后最终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收回了西班牙的控制权。王后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德正考虑准备将统治区域扩大半岛以外，正巧遇到了哥伦布，他们对他的从印度和日本获得黄金以及无数天主教信仰的皈依者的希望给予了回应。王后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德为这名手水的第一次航行提供了三只轻快帆船。

三只船扬帆大海

八年间，哥伦布航行了四次，以第一和第三次为最为著名。第一次航行始于1492年9月6日，哥伦布和100名全体船员离开加那利群岛——非洲西海岸外的西班牙占领地。传说增加了冒险的色彩。一则故事将全体船员描绘成近期释放或赦免的罪犯，胆颤心惊地到达了世界的边缘。但是像哥伦布这样经验丰富的水手不大可能接受罪犯作航行的成员，他仅雇用专业水手倒是可能。同样，手水们都不畏惧跌入深渊，倒是有点担心到时候没有朝东吹的风帮助他们回到西班牙。

哥伦布用36天时间航行了2 400海里，到达了加勒比地区，于1492年10月12日在华特林岛的萨马纳湾登陆。在这次航行中，他到达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在古巴，他们冒险进入岛屿内部，哥伦布看到泰诺人抽雪茄，这也是欧洲人第一次目睹了烟草的用途。接近旅程的最后，哥伦布在海地角（今属海地）附近建立要塞，并在此留下40人寻找黄金。1493年1月16日，这位热那亚水手带领船队返回西班牙。



这种轻快帆船有两到三根桅杆，易于操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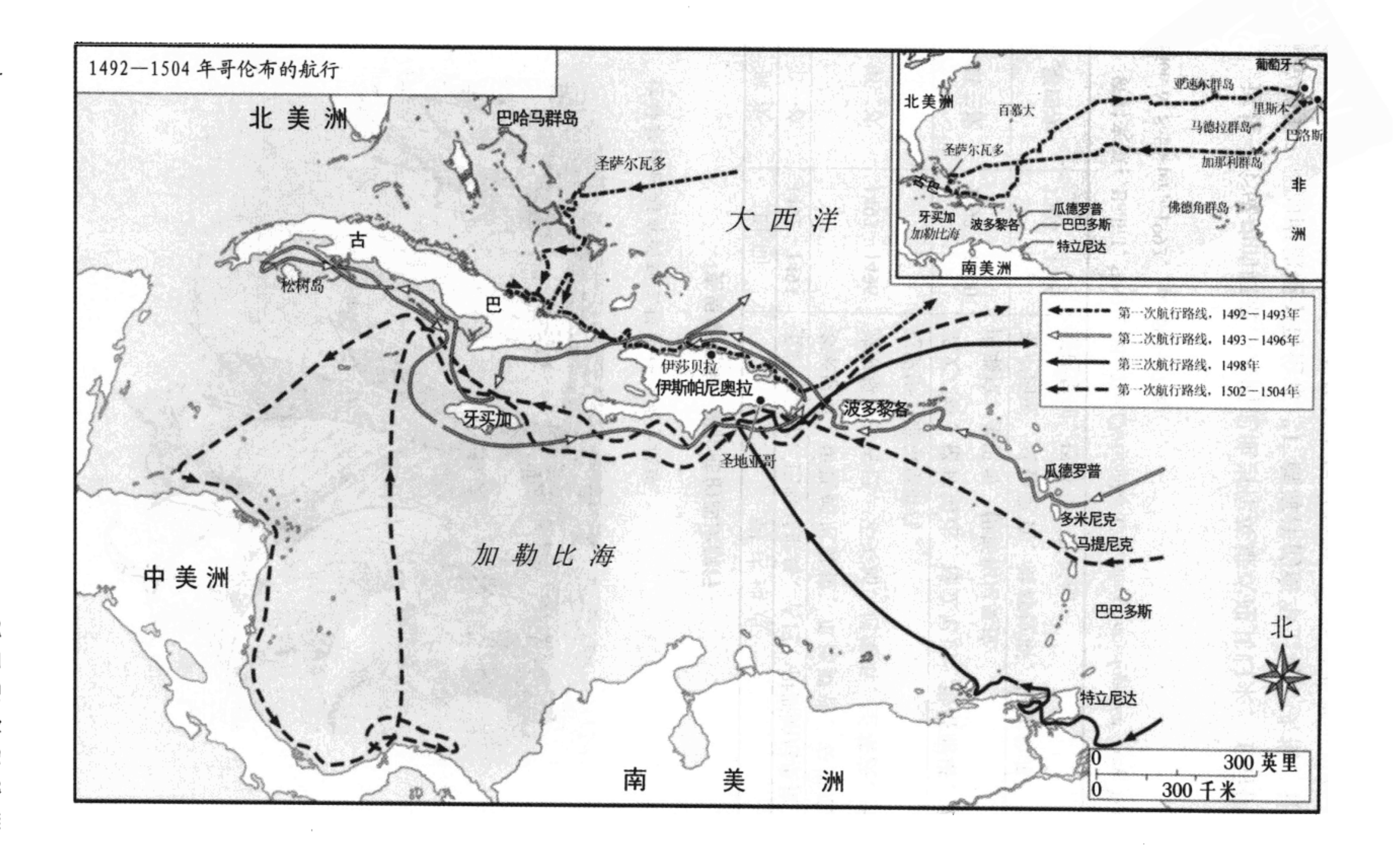
15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四次航行

航 次	时 间	到 达 地 点
第一次	1492 - 1493	圣萨尔瓦多、巴哈马群岛、古巴、伊斯帕尼奥拉
第二次	1493 - 1496	多米尼克、伊斯帕尼奥拉、瓜德罗普、安提瓜、波多黎各、古巴、牙买加、尼维斯、圣基茨、圣克罗伊、维尔京群岛
第三次	1498 - 1500	圣文森特、格林纳达、特立尼达、玛格丽塔、委内瑞拉、多巴哥、伊斯帕尼奥拉
第四次	1502 - 1504	圣卢西亚、马提尼克、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牙买加

资料来源：Bedini, Silvio, ed.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Encycloped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p. 693—728.

这是一个成功的归来，人们把他当作英雄欢迎其归来，王后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德授予哥伦布“广阔海洋的海军上将”头衔，让他做新大陆的总督，并允许他在他们在场时就座——这是非常少见的礼


1492—1504年哥伦布的航行
北美洲
巴哈马群岛
圣萨尔瓦多
大西洋
古
巴
松树岛
伊莎贝拉
伊斯帕尼奥拉
牙买加
圣地亚哥
波多黎各
瓜德罗普
多米尼克
马提尼克
巴巴多斯
特立尼达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第一次航行路线，1492—1493年
第二次航行路线，1493—1496年
第三次航行路线，1498年
第一次航行路线，1502—1504年
0 300 英里
0 300 千米
北
北美洲
百慕大
圣萨尔瓦多
古巴
牙买加
加勒比海
波多黎各
瓜德罗普
巴巴多斯
特立尼达
南美洲
亚速尔群岛
葡萄牙
里斯本
马德拉群岛
巴洛斯
加那利群岛
佛德角群岛
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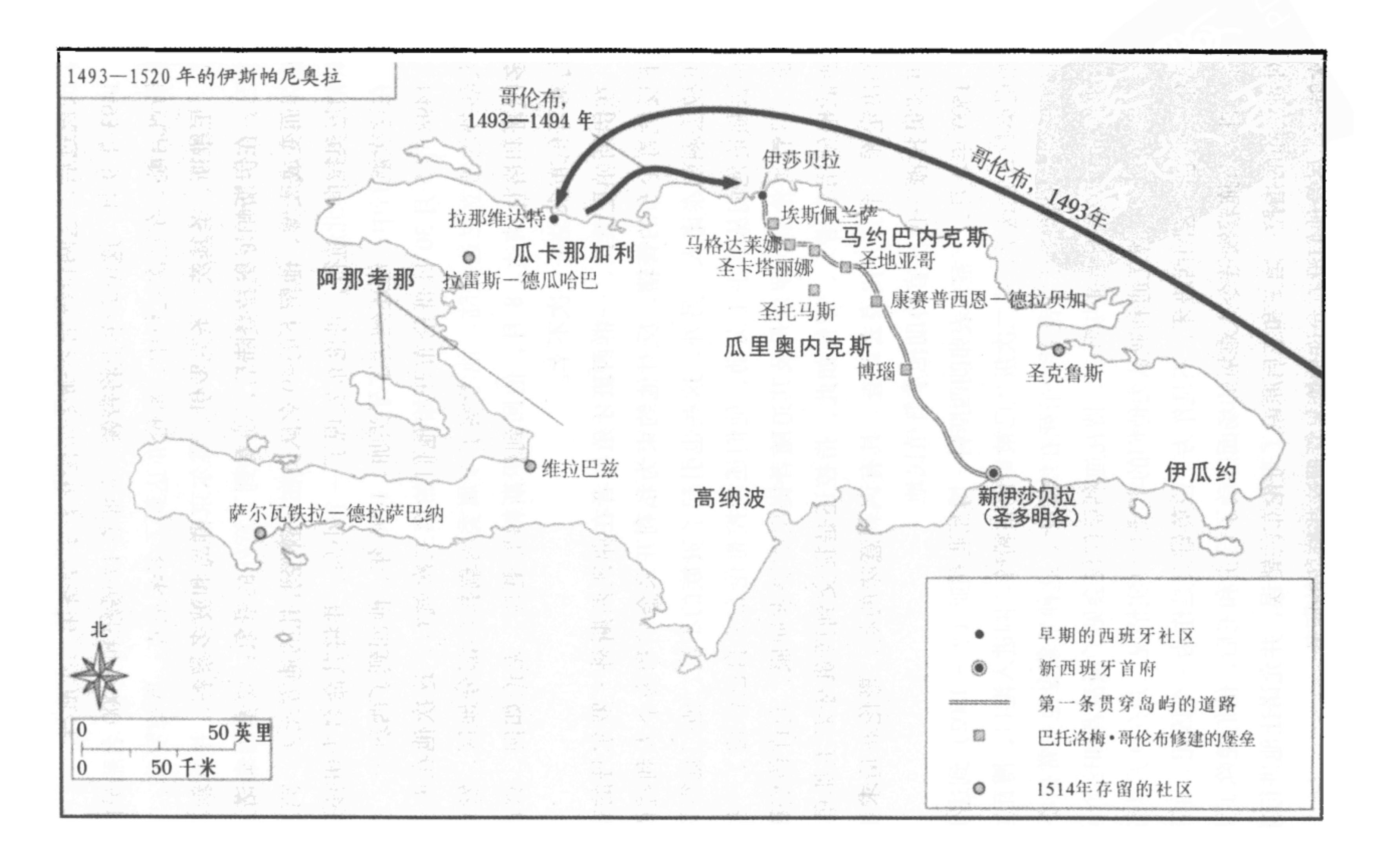
遇。庆祝过后，这两位统治者命令哥伦布着手准备第二次航行。

1493年9月，这位海军上将带领一支拥有17艘船和1 000名船员的舰队扬帆启航。在这次航行中，哥伦布达到了多米尼克、瓜德罗普、安提瓜、尼维斯、圣基茨、圣克罗伊、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并重新造访古巴。在伊斯帕尼奥拉登陆后，他看到了意外的景象：要塞因泰诺人的破坏而变成废墟，他留下的40名队员在他曾经驻扎的地方死去。离开伊斯帕尼奥拉向北航行，哥伦布发现了一个小岛，并将其命名为伊莎贝拉。在这次航行中，他还到达了牙买加。1496年，他回到了西班牙。

1498年5月30日哥伦布开始他们的第三次航行，这次他在南美洲大陆外的特立尼达登陆。他考察了今属委内瑞拉的部分地区，发现了多巴哥和格林纳达。8月，他回到伊斯帕尼奥拉。无论如何，这次航行对哥伦布来说是一次不幸。

在伊斯帕尼奥拉，一群西班牙殖民者在弗朗西斯科·罗尔丹的带领下反抗哥伦布的管辖，反对他约束为私利开采金矿和为个人利益而非王权去剥削泰诺人。另外，这些也引起了贵族的不满，他们觉得哥伦布去强迫他们从事手工劳动，他们还指控哥伦布为自己保留了一些黄金。尽管哥伦布对罗尔丹及其追随者提出的要求屈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泰诺人，即使如此，指控还是提交到西班牙君主那里。他们决定派一个官方代表去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哥伦布请求王后伊莎贝拉派一位法官协助他掌管殖民地。

1500年8月，王室代表弗朗西斯科·博瓦迪利亚（？—1502）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在这里，第二次叛乱已被哥伦布粉碎。刚进入港口，博瓦迪利亚就看到七个西班牙叛乱者被吊死在绞架上，这种景象令他非常担心。由于哥伦布正在乡下追捕叛乱者，博瓦迪利亚仅仅会见了叛乱者和这个位海军上将的敌人。博瓦迪利亚认为他们的牢骚是真实情况，并在9月决定将哥伦布绑起来送回西班牙，不是作为一位英雄而是作为一个囚犯。在西班牙，哥伦布拖着锁链令人难堪的场面感动了君主和王后，他们免除了那些对哥伦布的指控。国王和王后原谅了哥伦布的错误，并允诺让他进行第四次航行，尽管他们没有允许他恢复管理这些群岛的职务。


1493—1520年的伊斯帕尼奥拉
哥伦布，1493—1494年
伊莎贝拉
哥伦布，1493年
拉那维达特
埃斯佩兰萨
马约巴内克斯
瓜卡那加利
马格达莱娜
圣卡搭丽娜
圣地亚哥
阿那考那
拉雷斯—德瓜哈巴
康赛普西恩—德拉贝加
圣托马斯
瓜里奥内克斯
博瑙
圣克鲁斯
维拉巴兹
伊瓜约
高纳波
新伊莎贝拉（圣多明各）
萨尔瓦铁拉—德拉萨巴纳
北
0 50英里
0 50千米
早期的西班牙社区
新西班牙首府
第一条贯穿岛屿的道路
巴托洛梅·哥伦布修建的堡垒
1514年存留的社区

很多西班牙学者认为对哥伦布的处罚是严厉的、不公正的，但对很多加勒比学者和作者来说，这些海军上将的命运是诗意般的公平。（例如，在小说《安妮·约翰》中，作者牙买加·金凯德描述她们的帼国英雄庆祝对哥伦布的拘禁。）对他们来说，哥伦布是加勒比伊甸园的破坏者和导致泰诺人、加勒比人及非洲人奴隶制的资本主义压迫发起人。



修士用来改变土著皈依天主教的图书的封面复制品（*An Otomí Catec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8）

1502 年，哥伦布开始了他们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加勒比地区的航行。他在马提尼克登陆，他们沿着中美洲海岸和南美洲北部海岸航行，在 1504 年返回西班牙之前，哥伦布在牙买加度过了一段时光。两年后，他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去世。不知哥伦布是否意识到他探险的重要意义——他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而不是通向远东之路。

18

19

欧洲人与加勒比人的第一次接触

欧洲人喜欢空洞的表演，他们进入加勒比地区也不例外。哥伦布到达第一个岛时所使用的形式为后来的探险者遵循。

1492 年 10 月，这位海军上将登上一只小船，他的军官向岸上划去。按照王室的标准，当到达海岸时，哥伦布双膝跪地，感谢上帝之后，他宣布该岛屿为西班牙君主所有，并给岛屿命名。古巴变成了胡安娜，基斯克亚（Quisqueya）变成了伊斯帕尼奥拉，伯林克（Borinquén）变成了圣胡安包蒂斯塔，等等。这种占领仪式在哥伦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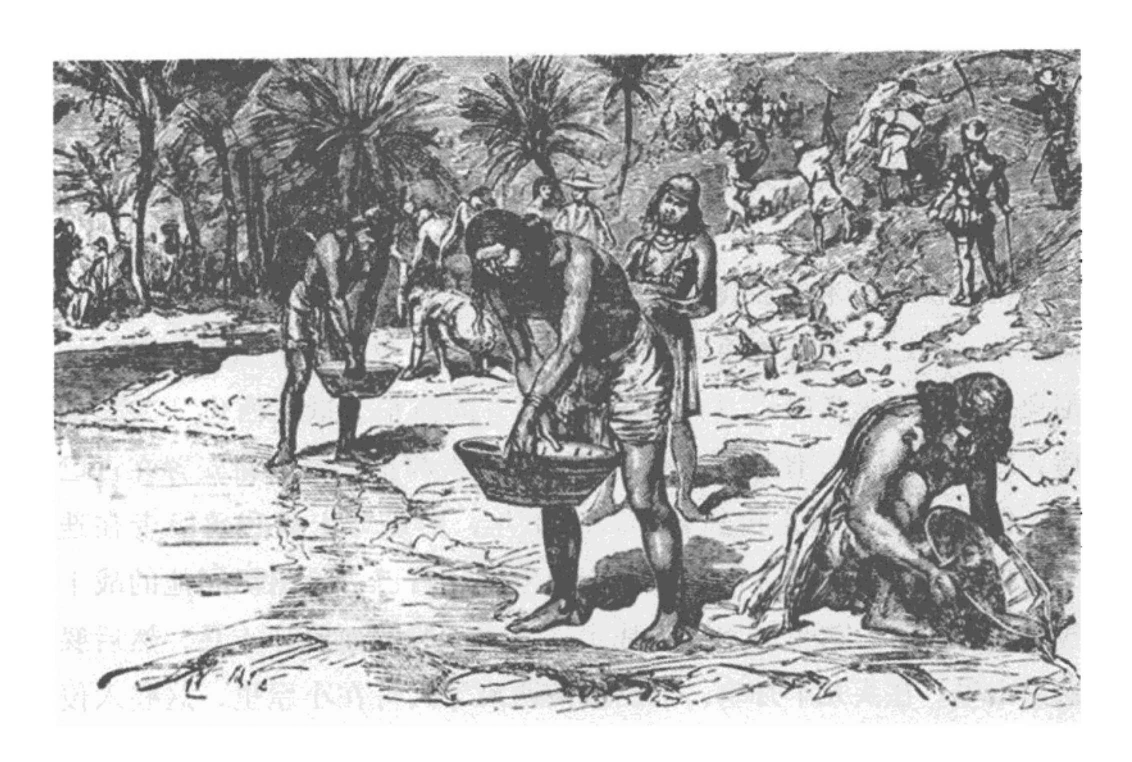
新到达的每一个岛屿上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并没有请当地居民参与。

先假定这些岛屿原先就没有名称并给岛屿以欧洲语言命名，这位海军上将就取得了优势地位——主人占有无主物品。这成为一个范例被其他西班牙探险者所使用，如埃尔南·科尔斯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也被来自像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其他欧洲强国的探险者所使用。这种仪式使那些不情愿的美洲泰诺人转变成了西班牙君主的臣民。一旦拥有了加勒比地区，西班牙认为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统治新发现的臣民。尽管其最初的愿望是使这些泰诺人和加勒比人皈依天主教，但寻找黄金的欲求改变了这种宗教设想，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很快就被迫进行艰苦的劳动。

疾病、奴隶制、灭绝

对加勒比地区的征服始于1502年，当时，王后伊莎贝拉派遣了第一个西班牙总督到这个新世界。第一个被殖民的岛屿是伊斯帕尼奥拉，时间为1502—1509年。相较而言，占领其他较大的岛屿则较为迅速：1508年，波多黎各；1509年，牙买加；1511年，古巴。殖民开拓者最初为海员和士兵，但随着定居点的建立，工匠、农民、不熟练的劳工相继到来，16世纪上半叶，每年移居新世界约3000人。最初这些人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要么是单身汉，要么不带妻子。他们与泰诺女人结合——后来是非洲奴隶——不论她们是否愿意。殖民者进入第十年，西班牙本土的女性开始到来，男女比例为3：1。

殖民地化的模式为：整个领地迅速进步，土著人改宗天主教，由王后伊莎贝拉委任统治，严厉消除土著人的叛乱，强迫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劳动。劳动的目的就是为统治者获取黄金和白银。几乎所有的狂热探寻都是被哥伦布所激发，初期在伊斯帕尼奥拉奥萨马河上（入口处在今圣多明各附近）发现金块时，他就坚信这些岛屿富产黄金和白银。西班牙人管理矿山，而工作由泰诺人来做。当泰诺人大批病倒并死去后，西班牙人就到加勒比地区别的岛屿上劫持来更多的泰诺人。被捕获的泰诺人被运到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和波多黎各从事工作。



在加勒比地区，泰诺人被西班牙人强迫在河岸开采金矿以换取宗教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并没有来临。（North Wind Archives）

到16世纪20年代，泰诺人灭绝了。多米尼加历史学家胡安·德·赫苏斯·多明格斯总结了泰诺人消失的原因："对毫无防御能力的（泰诺）妇女、儿童和老人进行集体屠杀；饥饿和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在兴建城市、要塞和农业、淘金以及采矿中的强迫性劳动；自杀；自愿流产以逃避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主要是梅毒。"（Domínguez，13）

泰诺烈士与英雄

当意识到西班牙人的意图，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开始反抗。1493年，从破坏伊斯帕尼奥拉的纳维塔堡开始，几名领导者脱颖而出：酋长夫人阿纳卡奥那、酋长哈图伊和反叛的领导者恩里基洛。

1503年，一位名叫阿纳卡奥那的酋长夫人统治了伊斯帕尼奥拉西部地区，她丈夫在1492年被哥伦布绑架，并死于去西班牙的路上，此后她就在该地区寻找避难所。为了结束阿纳卡奥那的统治，1503年，

西班牙总督尼古拉斯·德·奥万多诱骗她与其会面。酋长夫人安排宴席欢迎她的客人，但是奥万多安排伏兵对付她赤手空拳的士兵，并俘获了这位酋长夫人。为显示西班牙的权力，奥万多判处其死刑，并当众绞死。

哈图伊，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其喝彩，在古巴受到钦佩，海地人以其为荣，他已成为抵抗西班牙争取自由的一个象征。哈图伊是伊斯帕尼奥拉一个叫做瓜哈巴（Guahabá）地方的酋长，抵抗西班牙人失败后，1510 年左右，他连同 400 名男人、女人和孩子被重新安置在古巴岛，他们希望在那儿找到和平。1511 年，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在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利亚尔领导下到达古巴，哈图伊同他的战士攻击了入侵者。酋长使用游击战术，攻击小股的西班牙士兵，然后躲藏进山里。在头几个月里，哈图伊使西班牙人待在小屋里，这些入侵者不能离开他们修建的城堡。然而，1512 年贝拉斯克斯抓住了哈图伊，将他判处死刑，并活活烧死。

当哈图伊被绑在柱子上，一个牧师与他交谈，希望他能接受天主以便如牧师所相信的那样进入天国，哈图伊反问到："白人也进入天国吗?"牧师回答说："是的，只要他们是好人。"哈图伊说："如果是那样，我不想进入天国。"很快，他便被烧死在刑柱上。（*Encyclopedia of Cuba*, 87）

较为成功的是泰诺人酋长恩里基洛，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与西班牙征服者对抗达 13 年之久。1533 年，作为皇帝卡洛斯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00—1558）休战协定的部分内容，他被赦免。尽管他活了下来，并使西班牙人遭受到了损失，但他不能改变由西班牙人导致的他们的人口和文化走向消亡之路。

16 世纪：西班牙统治

自驶入这些新世界的港湾开始，西班牙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强国的新时代。1492 年之前，在欧洲与亚洲出现的帝国都实行中央集权统

治，相对封闭。的确，有像高山大河这样的天然障碍，从来没有海洋将统治者与其统治区域分开的情况，直到西班牙占据新世界。

1513 年，也就是哥伦布到达加勒比地区后 11 年，西班牙人对新世界的占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他们穿越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同时，胡安·庞塞·德·莱昂宣称佛罗里达归西班牙所有。1519—1521 年，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1526 年，西班牙水手在今天的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探险。1528—1536 年，卡韦萨·德·巴卡——坦帕外海遇难船只上的剩存者，裸体赤脚从佛罗里达走到得克萨斯。1532—1536 年，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攻占了库科斯，建立了利马城，1536 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两年之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建立。1548 年，拉巴斯建立，后来成为玻利维亚之地。

对加勒比地区的占有特征

将哥伦布绑回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博瓦迪利亚，接手管理伊斯帕尼奥拉，直到 1502 年被委派到加勒比地区的真正的总督尼古拉斯·德·奥万多（1540—1618）解职。奥万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他安抚叛乱的西班牙殖民者，高效而有力地管理着新殖民地的金矿开采，在其任职的七年间，运回西班牙的黄金价值高达 3 000 万美元。他开始城市建设，组织食品生产以使伊斯帕尼奥拉自给。奥万多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西班牙征服者，他受过剑法训练，临危不惧，对俘虏毫不手软。这些军事品格使西班牙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中获得成功，并深受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敬重。对奥万多来说，泰诺人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外交的成功，而是消灭觉察到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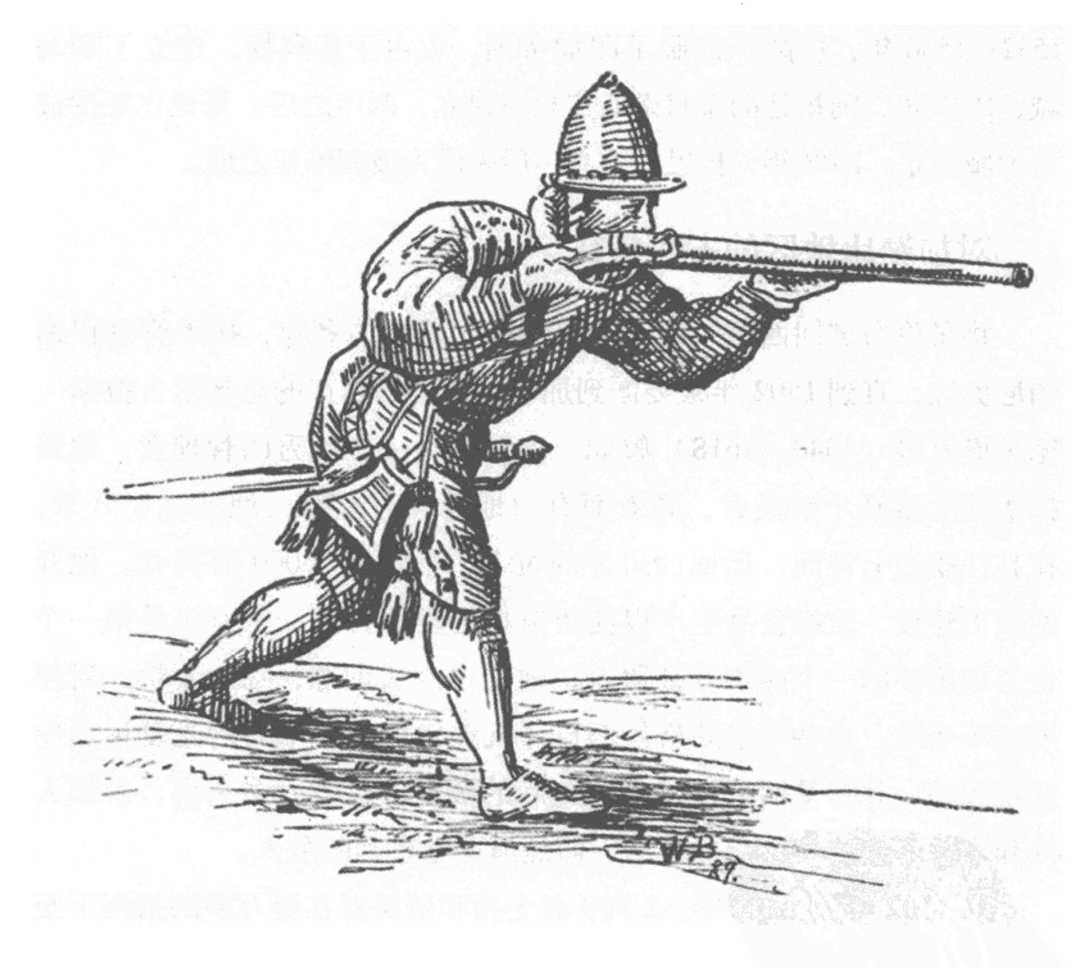
23

从 1502 年到 1504 年，2 500 名士兵和殖民者在奥万多的指挥下至少发动了三次主要战役，导致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泰诺文明的实质性破坏。他运用的战术包括直接欺骗和背信弃义，奥万多对泰诺酋长夫人阿纳卡奥那的处置就是证明。

奥万多的残忍手段被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所效仿。天主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对西班牙人对泰

诺人村庄进行的大屠杀作了这样的描述：

“当西班牙人到达印第安人村庄，发现人们生活和睦，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破坏，这让印第安人十分震惊。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可以供给，西班牙人夺去他们可怜的赖以活命的东西，更甚者，这些西班牙人追逐他们的妻女，在印第安人中，西班牙人的这些行为成为司空见惯……一个将内心恶魔伪装起来的西班牙人突然抽出剑，随之，所有的西班牙人也抽出他们的剑，剖开印第安人的腹部，砍杀那些羔羊般的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de Las Casas，25）



16 世纪晚期西班牙征服者正在用火枪射击。（North Wind Archives）

1509 年胡安·德·埃斯基韦尔在牙买加，1511 年胡安·庞塞·德·莱昂在波多黎各采用了同样的手段。在一次战役中，庞塞·德·莱昂

率领125人急行军翻越山脉进入一个村庄在夜里发动袭击。据说那里居住着6 000泰诺人，其中200多人被杀，而西班牙人却没有什么损失。（B. Williams，24）

西班牙征服者的典型特征很快在泰诺人中变得清晰起来：无耻、残忍、暴力。他们公开宣扬的让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的目标，在其黄金欲求和对强迫劳动的需求面前变得黯然失色。 24

如果能够实现目标，他们实施暴行时极尽其能事。在对付入侵者方面，泰诺人可选择的则很有限：要么战斗，要么逃到山里以免被抓到。他们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集体自杀或者杀婴，这种选择其实在这个新世界并不存在，而是由西班牙人创造的。

殖民古巴、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多黎各

当泰诺人被征服、奴役，西班牙征服者在加勒比地区开始殖民。一些城镇建立起来，这些城镇的名称后来成为岛屿的名称，包括波多黎各、圣地亚哥和圣赫尔曼。1521年，波多黎各改名为众所周知的圣胡安，而波多黎各则成为该岛的名字。然而，西班牙人口的数量仅保有数百人，他们的住处则是简单的木结构房屋。

25

墨西哥的征服开始于古巴

西班牙人将加勒比地区作为海军基地，从这里向美洲大陆派出探险队。在这一节里，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一个墨西哥征服的参与者，回忆了在古巴的准备与启程的情景：

“当古巴总督迭戈·贝拉斯克斯意识到这个新发现的大陆是如何的富庶，他命令一支规模比以前大得多的舰队准备出发，他已在圣地亚哥港聚集十艘舰只……他为舰队装备粮食，包括木薯和咸猪肉。这里装备仅够我们用到哈瓦，因为，在那儿我们将进入自己的仓库……

“当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一被任命为将军，他就立即开始

搜集各种武器，枪、火药、弓弩，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战争物品，各种用于交换的物品，以及其他一些探险的必需品……我们这支总数超过三百五十人的舰队从何处出发……第二天……得到消息之后，我们集中登船，在众多的交谈中贝拉斯克斯和科尔特斯拥抱在一起，直到我启航。"①

然而在同一时期，西班牙征服者还侵入了大陆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在这里他们发现的财富比在加勒比地区曾经见到的任何财富都要多。在墨西哥，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见到的神庙和大厦使西班牙的城堡和威尼斯的运河与桥梁相形见绌。在秘鲁，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描述印加王子为生存讨价还价，如何用金雕像填满一间大屋子。这些黄金引起了西班牙殖民者占有巨大财富和过上比在加勒比地区更好生活的欲望。一种共同的悲伤产生了："上帝把我带到了秘鲁！"

如果海岛上缺少财富，就会阻止殖民者到来，或者导致对它的忽略，正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带来的财富使得西班牙统治者占据着该岛，仅仅是为水手和士兵提供休息的地点。此外，南美洲的财富激起了欧洲君主的欲望，他们很快开始攻击往西班牙运送赃物的船只。因此，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变得很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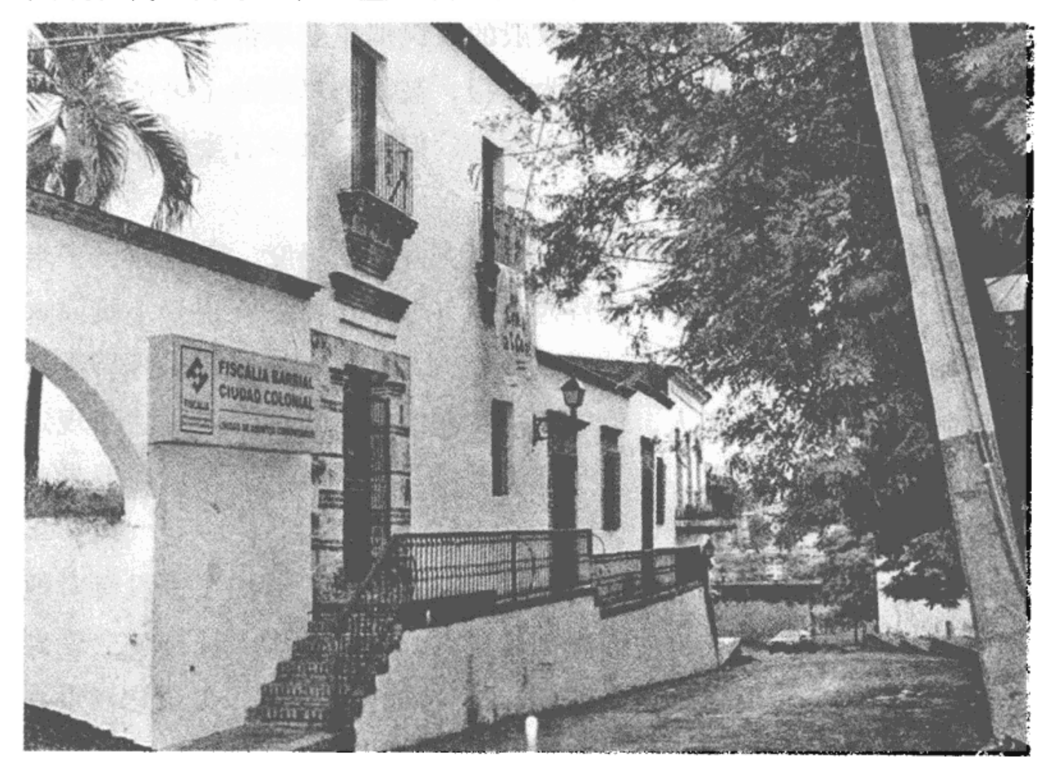
26

西班牙通过了严厉的法律禁止殖民者移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然而，殖民者们不顾禁令离开加勒比地区。很多岛屿成了殖民地的穷乡僻壤，没有人关心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再过很多年，欧洲强国才致力于农业，并将之作为经济生存能力的手段。

在过渡时期，也即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西班牙人在岛上建设了军事防御工事来保护这些获利不匪的黄金和白银贸易。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港口建设了一系列的堡垒。这些防护坚固的海港包括哈瓦那、圣胡安、圣多明各、西班牙港，甚至包括佛罗里达北部的

①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Translated by A. P. audslay.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56.

圣奥古斯丁。这些海港成为在欧洲强国或海盗竞争下西班牙商船寻求安全的避难所。这些城市的经济以军事投资和从美洲大陆到西班牙的周期性商队为中心，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加勒比地区的第一座欧洲人的殖民城市圣多明各（Matos Family Archives）

委托监护制的建立

27

决定继续保有这些岛屿意味着殖民地必须自给自足，而且仍然要生产能给西班牙君主带来收入的产品。如果不能得到黄金，农产品出口到别的欧洲国家也能给西班牙带来收益。委托监护制是获得工人的最佳途径吗？委托监护制曾运用于西班牙人反抗穆斯林的光复运动，这种制度1499年被哥伦布介绍到伊斯帕尼奥拉，1503年为总督尼古拉斯·德·奥万多所接受。在这种制度下，殖民者——著名的委托监护主，被分配给小块的土地，泰诺人被迫在这些土地上的河边淘金，在田地里耕作以生产粮食。一个委托监护主可以拥有不超过300个泰

诺人，他们被分组后派去从事采矿、耕作、照看牲口等工作。通过委托监护主，土著人被“委托”给每一个征服者，他们有使土著皈依天主教的职责，有权让土著人为自己劳动……有委托监护权的征服者很像欧洲的贵族，他们可以靠从农奴般的农民那里获取部分作为赋税的谷物来生活（Chasteen，53）。作为回报，被认为卑贱的土著被教授天主教义和西班牙文化，并接受军事保护，但是，极少有委托监护主会履行他们的部分协议。

在殖民地，并非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支持这种制度。1511 年，多米尼加修道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1545）在讲坛上抗议这种委托监护制。1512 年，国王费迪南德（1452—1516）既想维持委托监护制又希望帮助泰诺人，他颁布法律来改善劳工的命运，法律规定泰诺人一年工作九个月，妇女孕期的九个月免除工作。他们还要求酋长的儿子必须接受教育。

然而，这些法律根本没有人理会，大多数委托监护主也没有对他们的指控做什么。相反，他们滥用泰诺人，如果泰诺人反抗就会受到惩罚。尽管他们没有对泰诺人的所有权，委托监护制其实就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

委托监护制使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大批死去，仅仅伊斯帕尼奥拉的泰诺人数量就从 1492 年的 30 万人下降到 1510 年的不到 5 万人。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举出泰诺人的理由，说服西班牙君主为泰诺人仲裁。1542 年，《新法》改变了委托监护制。“委托监护制将继续被使用，尽管仅在有限的几代人身上；现在的重点是印第安人的贡赋而不是劳役；实际上，这种制度逐渐停止是重要的。”（Collier，109）

28

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迟来的救星

少数修道士在加勒比地区和西班牙抗议粗暴地对待土著人。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最主要也是最出名的抗议者，史书上将他看作“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他出版于 1552 年的最著名的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最早希望给加勒比地区

带来社会公正的图书之一。

拉斯·卡萨斯（1474—1566）是第一位在美洲被任命的牧师。他是犹太人的后裔，1494 年参加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到达加勒比地区的水手的儿子。1502 年，拉斯·卡萨斯达到伊斯帕尼奥拉，参加镇压了几起泰诺人的起义，由于他的成就被授予委托监护权。

1510 年，拉斯·卡萨斯被任命为牧师。三年后，他去了古巴，参与征服该岛。他亲眼看到了泰诺人遭受的虐待、贫困和奴役，这使他很后悔参与征服活动，决定献身于保护土著人的活动，他把奖赏给他的委托监护权退还给古巴总督，并返回伊斯帕尼奥拉。他从该岛回到西班牙，在王室法庭为泰诺人进行辩护。

1515 年，西班牙国王称其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拉斯·卡萨斯建议结束委托监护制，以减轻对泰诺人的奴役，将这些岛屿交还给泰诺人。他还建议将当地人从艰苦的劳动中解救出来，白人和黑人劳动都应该输入到加勒比地区，尤其是非洲人。这样，拉斯·卡萨斯提出让一种罪恶代替另一种罪恶。后来，拉斯·卡萨斯的著作被别的欧洲作者引用，攻击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他们将此作为一种证据挑战西班牙的支配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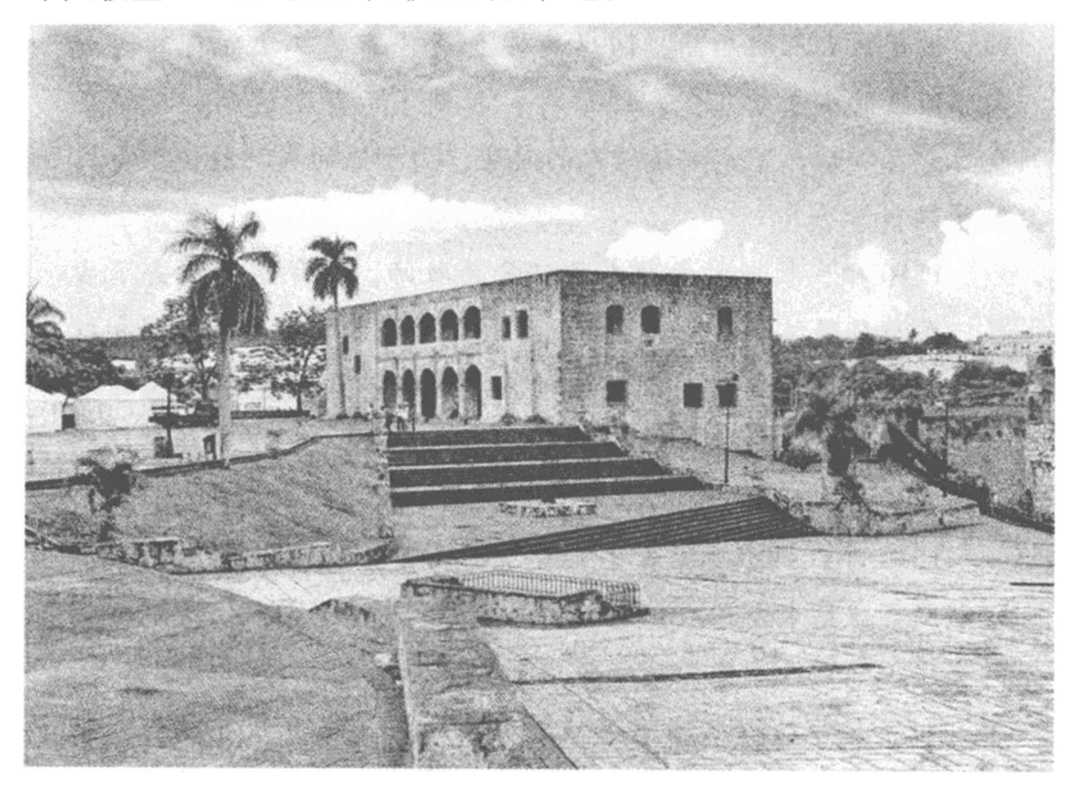
1550 年，委托监护制在加勒比地区被正式废除，但是到那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泰诺人幸存下来了。泰诺人的世界已经消失，西班牙人开始打算强迫一个种新的劳动力——来自非洲的奴隶，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29

美洲的钥匙：哈瓦那和圣多明各

16 世纪早期，当了解到加勒比地区的山地与河溪几乎没有什么黄金，西班牙人有点失望。圣多明各是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建立的第一个城镇，因其木结构而得名，1502 年，在飓风中被毁。总督奥万多命令在奥萨马河边建设一座新城，由砖石筑成以抵御强风。1508 年，该城得到了王室的认可，从而成为新世界第一个由欧洲认可的城

市。圣多明各是一个行政中心，担负着贸易港的功能，是美洲的第一个大教堂——圣玛丽亚大教堂的所在地。



迭戈·哥伦布的房子建于1510—1511年，当时，圣多明各是加勒比地区的重要首府。迭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儿子，也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Matos Family Archives)

30 到16世纪20年代，圣多明各扩展缓慢，从这里派出探险者到墨西哥和今属美国的佛罗里达与南卡罗来纳。圣多明各还是一个发展中心，在这里，殖民者与商人为伊斯帕尼奥拉规划经济项目，努力保持圣多明各的殖民地和积极发展贸易方面可实现的项目，不顾大陆方面的强烈呼吁。

在古巴，哈瓦那最早是在古巴西南部的沼泽地建立起来的，1519年，被迁移到了该岛的北部。港湾为其提供保护，免受飓风还有后来的海盗的影响。它的酒馆和客栈接待随舰队两年来此一次的士兵和水手，这些舰队将黄金运回西班牙，将补给品送到殖民地。

舰队不是哈瓦那的仅有访问者，另外，独自航行在加勒比地区的

西班牙商人会寻求港湾的保护，偶尔会与舰队结伴返回西班牙，这些商人携带着贵金属、珠宝、皮革、香料、染料和粮食。在返回时，这些商人做些买卖，购置水、食物和海上航行的补给品。大船与小船需要修补，这鼓励了古巴人追求技术，并最终使造船业成为古巴的主要工业。

1583 年，哈瓦那被认定为古巴的首府。它靠近墨西哥，这使得其转变为贸易中心和自圣多明各到哈瓦那的集结中心。这一切引起了一个建设城堡和大厦的浪潮，并吸引了技工、手艺人和服务于军事的商业、武器修理店、裁缝店和酒馆。到 16 世纪末，西班牙君主称哈瓦那为“新世界的钥匙”。古巴的居民有 2 万人，其中哈瓦那就占了 1.3 万人。(P. Foner，34)

16 世纪，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支配地位达到了顶点。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地发展缓慢且分散，其他欧洲强国逐渐公开表明的策略是在挑战西班牙的支配地位，开始时是间接的，后来更多的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加勒比地区遂成为欧洲人在美洲竞争的焦点。

第三章　欧洲人对西班牙统治的挑战（1500—1850）

31

1492年，当哥伦布将在加勒比地区发现陆地的消息带回去，西班牙从一个半岛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它曾一度要求对新发现领土的拥有权。当时葡萄牙是一个海上强国，在海洋探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向西班牙发起了挑战。争议提交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1493年教皇下达敕书，1494年以《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条约规定以非洲海外的佛得角岛以西100里格为界线，以西发现的新土地属西班牙，以东发现的新土地归葡萄牙。后来，根据葡萄牙的要求进行了调整，美洲的巴西归葡萄所有。

这条人为的边界意欲阻止其他欧洲国家勘查、开发加勒比地区和美洲大陆的财富，也成了欧洲与新世界的边界。当欧洲的交战国达成休战协议时，他们经常想到协议并不适用于“超越边界线”的土地，于是他们又开始敌对和冲突。也是就说，如果西班牙和法国在欧洲达成休战协议，他们在这条界线之外的美洲交战是可以的，结果，加勒比地区成为欧洲国家的相互交战的场地，尤其是对西班牙的战斗以及对付海盗——形形色色的海盗、穆斯林的私掠船、17—18世纪抢劫美洲大陆西班牙属地沿岸的海盗、私有武装船，这些都是传奇文学和小说创造的——他们从抢掠中获得成就并积聚财富。

欧洲对西班牙霸权的反映

32

到16世纪90年代，吸引西班牙的岛屿包括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波多黎各，不到9万名殖民开拓者不均衡地分布在整个地区。不久，海上航行戏剧性地增加了，西班牙的船只出没于加勒比地区和从墨西哥到秘鲁的航线上，随处可见人数达数百甚至上千的船队，而且总有一艘军舰跟随这些船只护航。

英国十分羡慕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活动，渴望参与殖民地的经济开发。在哥伦布达到加勒比地区后不到100年，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1522—1616）用他的笔表述了他们对西班牙占有新世界的看法，鼓励英国不去理会1493年罗马教皇的敕书。哈克卢特声称敕书反映了教皇的偏见，因为教皇来自西班牙，而且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极端暴虐、残忍”（Hakluyt，34）。无论是哈克卢特关心西班牙虐待土著人口，还是他号召在新世界以新教教义来对抗天主教教导，真正的诱惑是该地区的财富以及对英国来说潜在的财富。

几乎整个16世纪，欧洲国家并没有准备直接挑战西班牙的统治。一种威慑力来自对西班牙强权的认识，以及他们在征服过程中被证明了的效能与残酷。毕竟，两位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斯特（1485—1547）在墨西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8—1541）在秘鲁，仅用几百人就消灭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西班牙人为确保其领地不受其他欧洲人染指而抱有高度的警觉，这一点不容置疑。1564年在佛罗里达就发生了一场大屠杀，200名法国人被西班牙人结果了性命。

这是一次教训，它使法国集中探查加拿大而不是去挑战西班牙在更南地方的霸权。至于英国，尽管新教已正式建立，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与西班牙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亨利的第一位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女儿。英国和法国使用了这样的策略——避免公开竞争，鼓励由个人的旅行、为私人或团体利益的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而非官方的为国家或王室目的。



马坦萨斯河与入海处滩地，位于圣奥古斯丁之南——1564年胡格诺教徒大屠杀的遗址。这场大屠杀奠定了西班牙在佛罗里达近3个世纪的霸权地位。（Gabriela E. Figueredo 拍摄）

33

走私

对该地区的侵入是走私。依靠财政的支持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西班牙人将自己当作这些海岛的独占者。1503年，政府制定房产契约以监督新世界的商业贸易。西班牙不允许殖民地与其他任何国家贸易，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者被迫从西班牙购买由西班牙定价的商品，他们还为每一种商品交纳税金和关税。当加勒比地区的商品出口到西班牙时，同样的条件也在执行。结果，殖民者的生活费用要比在西班牙国内高昂得多。这使得走私活动在加勒比地区不断增加。

很多走私者是商人，他们乐意打破西班牙贸易法来获取利润，因为西班牙舰队不可能巡逻到加勒比海的每一片水域，这使得这些商人在殖民地之间买卖商品变得很容易。由于走私者不交税金与关税，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在殖民地出售货物，同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加勒比地区的货物，如烟草。仅1611年，20万磅的烟草从加勒比地区运往英国和法国，

而仅有 6 000 磅交税的烟草运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尔港。（P. Wood, 104）

34

为了促进他们的企业发展，一些走私者探查适合他们生产和种植像烟草之类作物的地点。怀着这种目的，走私者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安顿下来，吸引别的走私者以及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种植者。1629 年，西班牙对非西班牙殖民者作出反应，他们攻击了圣基茨，毁坏了住所与农作物，并将 700 名俘虏运回欧洲。这是一次权力重申行为，它激起了对西班牙帝国的仇恨。

加入海盗

加勒比地区的财富及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独占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海盗的高潮。漂浮于海上的劫掠者搜寻能让他们发财的从美洲运往西班牙的财富。加勒比地区海盗的巅峰阶段是从 1692 年到 1725 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海盗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形成海盗的浪漫概念见诸拉斐尔·萨巴蒂尼（1875—1950）、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2—1911）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在后来的埃罗尔·弗林（1909—1959）以及更近的约翰尼·德普的电影都有描述。海盗的这种浪漫形象在美国和英国更加普遍。由于海盗经常秘密地促进英国的对外政策，而他们的牺牲品则是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实际上，海盗一点也不浪漫，他们多为逃犯，在战时为雇佣他们的任一国家服务。在和平时期，海盗随意攻击，有时为重金许诺而有计划进行攻击。海盗们冒生命危险抢来财宝，而一登陆则愚蠢地将它们花得一干二净。众所周知，他们经常吃出疾病，或喝得不省人事。他们不发动攻击时则喜欢相互吵架。

海盗实际上可分两种：私掠船和海盗。最早的海盗是成伙的猎人，他们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的偏远地区，很多人最初来自欧洲，一些是受契约约束的雇工，一些是从不良的主人那里逃出来的奴隶，另外一些则是在他们的合同期满后不愿返回欧洲的雇工。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在荒凉的海岛上寻求自由。这些海盗从土著人那里学会了生存技巧，包括用木框保存肉的方法，就是在法国闻名的“巴克”。这种肉是他

们的主食，“巴克”（“buccaneer”的音译，意为“海盗”）也因此而得名。17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一些海盗开始喜欢大海。

私掠船雇佣人手服务于与别国交战的一国，他们的任务是劫持敌人的船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使用私掠船，包括西班牙。私掠船从劫掠的财物中分得利润，而掠得财富的数额则根据主顾的国库来计划。使用私掠船的好处是他们的行为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这就使得君主们声称他们对加勒比地区私掠船的行为并不了解［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因为给私掠船提供资金而臭名昭著］。使用私掠船的另一个好处是经济实用。由于私掠船已经拥有船只或资源，主顾国可以自由地像使用自己的海军一样去骚扰敌人的船只。

海洋上的海盗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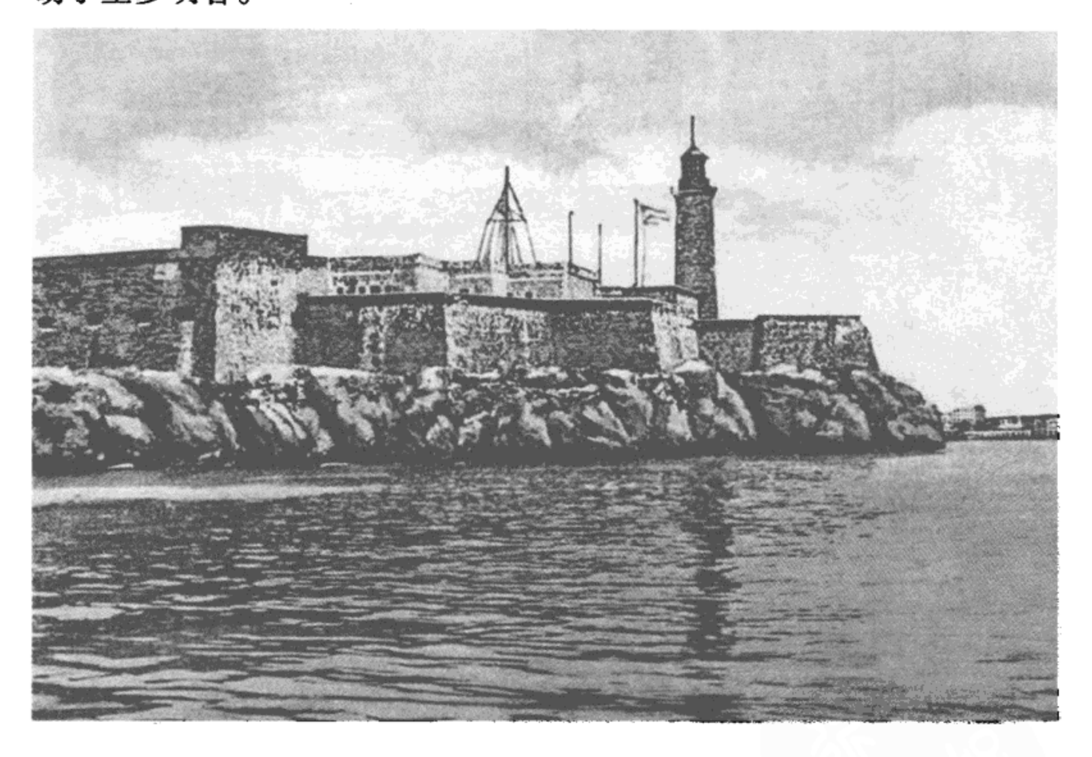
不论他们的起源，两种类型的海盗都被西班牙舰船所吸引，他们研究那些从美洲装满金银财宝运往西班牙船只的航行路线。起初，这些返回西班牙的船只多为单独的西班牙商船，1523 年法国海盗劫得了一船满载的黄金，之后，西班牙修改其航行政策，发展出一种以舰队闻名的护航制度——护送货物到加勒比地区，再将新世界的财富护送回西班牙。在春季，约 30 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在闻名的西班牙大帆船的护卫下航行到墨西哥，这种大帆船既可运送货物，亦可作为战船。在夏季，第二支船队航行到巴拿马。约 12—20 艘战船护送这两支船队。在美洲，两支船队在不同的地区装载货物，然后在哈瓦那会合，组成一支近百艘穿越大西洋的船队。船队的规模可以抵御海盗，而海盗专挑因暴风雨、大雾或船长缺乏航海技能而与船队走散的船下手，海盗还抢劫在加勒比海单独航行的船只，因为这种护航制度不适用于从岛屿到岛屿之间的货物运送。

攻击行动经过认真计划，通常使用突袭的方式，或者背着太阳航行，伪装成友好船只。典型的攻击包括一系列步骤，先是由舷侧火炮轰击，然后靠近，用钩子勾住目标船只，再登上船只。在战斗的喧嚣声中，海盗可以通过摇晃他们的耳环来交流，有时被俘获的船只就变

成了海盗船，通常幸存下来的人被邀请加入海盗，那些拒绝加入的人则被放在船上漂流，任其生死。 36

陆地上的海盗

很长一段时间，西班牙殖民地的城市与海港并没有像船队那样得到很好的保护而易于成为海盗的目标。通常，一旦海盗进入一个城市，他们将市民聚集起来驱赶到一座教堂，然后索要一笔赎金。人质会受到折磨，直到他们交待出他们的财产藏在哪里。1555 年，法国海盗雅克·德·索雷斯袭击了哈瓦那，并将其烧成了一堆瓦砾。1573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劫掠了巴拿马，1585 至 1586 年间洗劫了圣多明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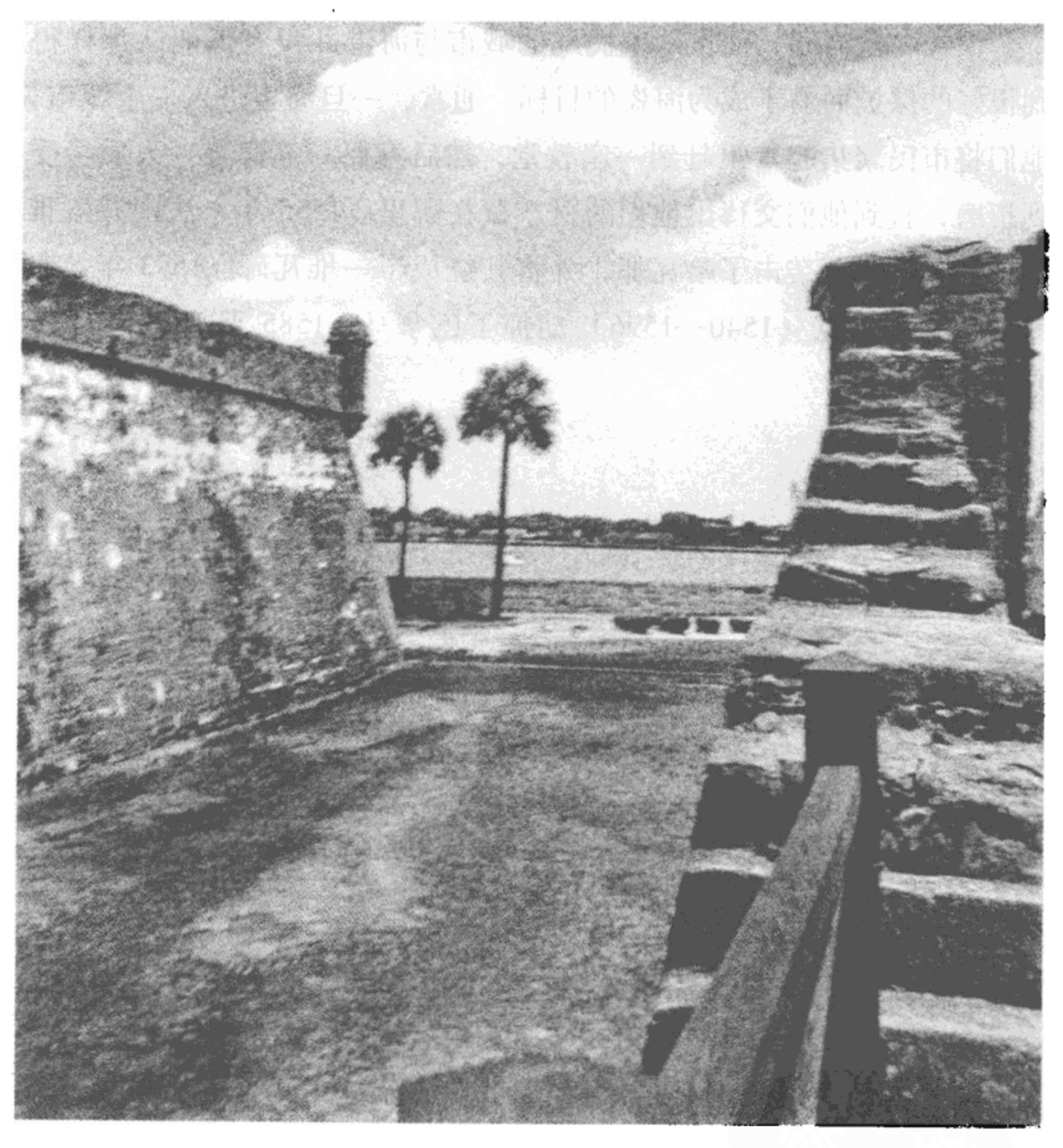


强大的摩罗堡垒保护着哈瓦那港，该工程 1589 年开始，1630 年竣工。（Tarjeta Postal, República de Cuba. Mark Jackson's Postcards Archives）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和殖民地总督许诺建立堡垒以保护城市。意大利工程师胡安·包蒂斯塔·安东内利（1550—

1616）是出名的“国王的防御建筑师”，1586 年，他为整个加勒比地区，包括哈瓦那的摩罗城堡、圣胡安的埃尔摩罗城堡及其他一些城堡和要塞进行了规划。建设历时数十年，加上城堡扩大或扩建，有的甚至经历了几百年。

37



仍在保护着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的城墙局部。同样的城墙竖立在哈瓦那、圣胡安以及整个加勒比地区，保护着城市免受攻击。（D. H. Figueredo 拍摄）

典型的防御工事由建在山顶的巨大堡垒组成，保护着海港的入口处，城市周围环绕着城墙。至 17 世纪中叶，主要的城市和港口形成了

一个坚固的防御链条，然而，较小的城镇由于没有保护设施而经常受到海盗的攻击。

尽管海盗是反社会的和非道德的，但是一些海盗在加勒比地区实施了最早形式的民主。他们通过投票来选举头目，决定特别的目标。这种制度使海盗头目去游说全体成员以获得对其任务选择的支持。这种民主的萌芽将监督置于首领的权力之上，毫无疑问，在战争时他能够被监督。海盗们遵循一套行动惯例，与其符号相一致，或打上 x 的标记。当海盗受伤时，他们能够获得补偿；如果受到严重伤害，如失去右臂，会得到由参与者提供的更高的补偿金。

38

加勒比地区的一些防御工事

位置	防御工事类型	建筑时间
海地角堡，海地	几个要塞由法国海盗建造的墙连接起来	1760 年
多芬堡，海地	建在海地角的一个小半岛上的堡垒	1732 年
德利尔斯堡，瓜德罗普	带有塔楼的堡垒与建有兵营的桥联接着，可以瞭望大海与海滩；由夏尔·奥弗尔将军和 R. P. 拉巴为法国创建	1650—1780 年
国王乔治堡，多巴哥	堡垒带有拱门和砖铺的休憩场地，由英国和法国军队建造	1779—1803 年
拉巴库堡，海地	塔楼面向大海，兵营建在塔楼之间	可能建于 18 世纪，未经考证
拉卡巴纳堡，摩罗堡、拉本达堡和皇家军队堡，海地、古巴	宏伟而复杂的堡垒体系保护着海港的入口，由建筑师胡安·包蒂斯塔·安东内利设计	1589—1774 年之间
圣乔治堡，格林纳达	要塞建在山项的悬崖边，俯瞰海湾，由一堵保护墙和一些塔楼组成	1706—1783 年之间

圣路易斯堡，马提尼克	小的要塞带有由火山岩筑成的保护墙	1609—1703年
金斯敦港，牙买加	广阔而宏伟的堡垒体系配有98门火炮，保护着金斯敦湾	1740—1750年之间
圣胡安，波多黎各	保护墙，由工程师和建筑师托马斯·奥戴利和胡安·包蒂斯塔·安东内利设计	1654—1765年
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	保护墙上建有塔楼，由胡安·包蒂斯塔·安东内利设计	16世纪和17世纪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Fortificaciones del Caribe*. New York, UNESCO, 1997.

39

女海盗

安妮·波尼和玛丽·瑞德与一个名为杰克·雷克汉姆的海盗出海，这两个女人都是英国人。据一些材料，瑞德（？—1720）是一个私生子，她的寡妇母亲将她打扮成男孩子，假装成晚生的儿子，以便从她婆婆那里得到补助。另外一些材料则说，瑞德母亲不诚实，希望她的孩子能得到当时男性的优势。在她十几岁时，瑞德加入了皇家海军，后来受到英语的限制，她去了荷兰，又作为一个男青年，受雇在一艘前往加勒比地区的船上服务。这艘船受到海盗杰克·雷克汉姆（？—1720）的攻击，他给被俘获的水手一个加入其队伍的机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并赢得了勇敢战士的声誉。在她成为一名杰出的、令人畏惧的海盗之后，她被英国逮捕，1720年死于牙买加狱中。

波尼（1697—？）出生于爱尔兰，生长于南卡罗来纳，在那里她嫁给一个水手。夫妻二人开了一个酒馆，海盗们经常出入于此，包括杰克·雷克汉姆，当时他试图过平民生活。雷克汉姆和

波尼成了恋人。当雷克汉姆决定回到海盗的生活时，波尼加入他的队伍，并打扮得像一个男人。她因其单打独斗的能力和她的领导才能而受到尊敬。1720 年，她与玛丽·瑞德一样被逮捕，但关于其后来的生活与死亡则没有记录。①

好的海盗与坏的海盗：霍金斯、德雷克与摩尔根

一位现代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讽刺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习惯地授予英国海盗以爵士（Fuentes，158）。女王伊丽莎白将爵士之剑佩在海盗约翰·霍金斯（1532—1595）的肩上，他的堂兄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是女王的亲信，女王亲切地称他为“我的海盗”。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面具，存于伦敦塔。这个面具来源于生活，栩栩如生。伊丽莎白一世雇佣海盗抢劫西班牙人的财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其亲信。（Daniel A. Figueredo 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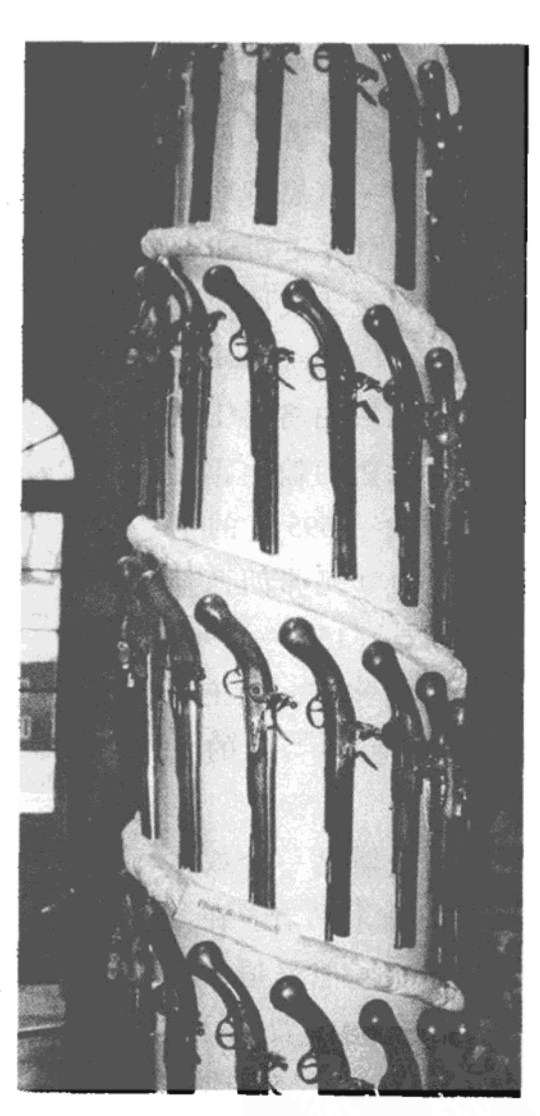
40

霍金斯是一个奴隶贸易商和走私者。在加勒比地区，他强迫西班牙殖民者与其贸易，如果被拒绝，他就威胁烧毁他们的城镇。霍金斯的出现解释了很多西班牙殖民者所面临的困境：西班牙统治者禁止他们与英国人贸易，而他们又害怕霍金斯和他的士兵。16 世纪 80 年代，霍金斯通过设计较小

① Salmoral, Manuel Lucena. *Piratas, bucaneros, filibusteros y corsarios en América.* Madrid: Editorial MAPFRE, 1992, pp. 239—240.

的、快速的船只，帮助发展了英国舰队。同时，他们公开鼓励加勒比地区的海盗，将其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来对抗西班牙统治者。1568年，西班牙的船只在墨西哥外海攻击了霍金斯的舰队，击毁了其大部分船只，俘获并处决了一百多名士兵。这一事情引发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公开战争。

再没有比霍金斯的堂兄弗朗西斯·德雷克更希望参与英西两国冲突的了，德雷克被西班牙人称为“龙”，他恐吓古巴和波多黎各。1572年，德雷克抢劫了巴拿马，给英国带回了价值10万英镑的赃物。在其进行环球航行时，将其沿线的加利福尼亚宣布为英国所有，德雷克返回并恐吓了加勒比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1587年，他攻击了西班牙的加的斯，以突袭队袭击并导致了24艘西班牙舰只被毁。一年后，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支配有7 000名手水和18 000名士兵的强大舰队——到达英国海岸，德雷克得到风暴的帮助，击毁了这支拥有130艘舰只的强大舰队。霍金斯和德雷克的海盗行为，被认为是爱国行为，增加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财富，这些财富帮助女王伊丽莎白偿还了英国的国家债务，并使伦敦转变成为贸易和商业中心。



16世纪英国海盗与士兵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手枪。(Daniel A. Figueredo 拍摄)

41

一个较小的、偶尔为之的海盗是亨利·摩尔根（1635—1688），

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特许其骚扰西班牙。1668 年，他带领 12 艘船近 500 名海盗抢劫了加勒比海边巴拿马的巴里奥斯港（今属危地马拉）。1671 年，他带人在中美地峡的丛林里披荆斩棘开辟了一条路，去袭击巴拿马。他率领 2 000 名海盗与 3 000 西班牙士兵对抗。这次大胆袭击的新闻在加勒比地区引起了恐慌，尤其是报道提到的摩尔根通过将几十个西班牙士兵锁在一所房子里然后将他们炸死的方法进行屠杀。不幸的是，就在摩尔根得到特许和他攻击巴拿马之间，英国与西班牙达成关于加勒比地区的协议。在 1670 年签订的《马德里条约》生效之后，西班牙承认英国对加勒比地区的拥有权。结果，英国开始镇压海盗。

国王查尔斯二世（1630—1685）命令摩尔根回到伦敦接受惩戒，由于国王钦佩摩尔根的胆略，所以对他的惩戒似乎比较温和。此后不久，查尔斯给这个海盗授予爵位，并任命他为牙买加总督。或许，查尔斯认为以先前的海盗负责管理加勒比地区，那么就比较容易消除海盗。

回到牙买加，摩尔根从一名海盗变成了政府官员，并对那些准备遣散和即将被处绞刑的人大赦。在他的领导下，大商店和仓库开始矗立在皇家港，还产生了数百家酒馆，现在仍有一种朗姆酒以摩尔根的名字命名。暴徒黑眉毛，穿着红衣服，手执宝剑，已成为海盗的标签——这种例子则是对海盗的理想化和商业化。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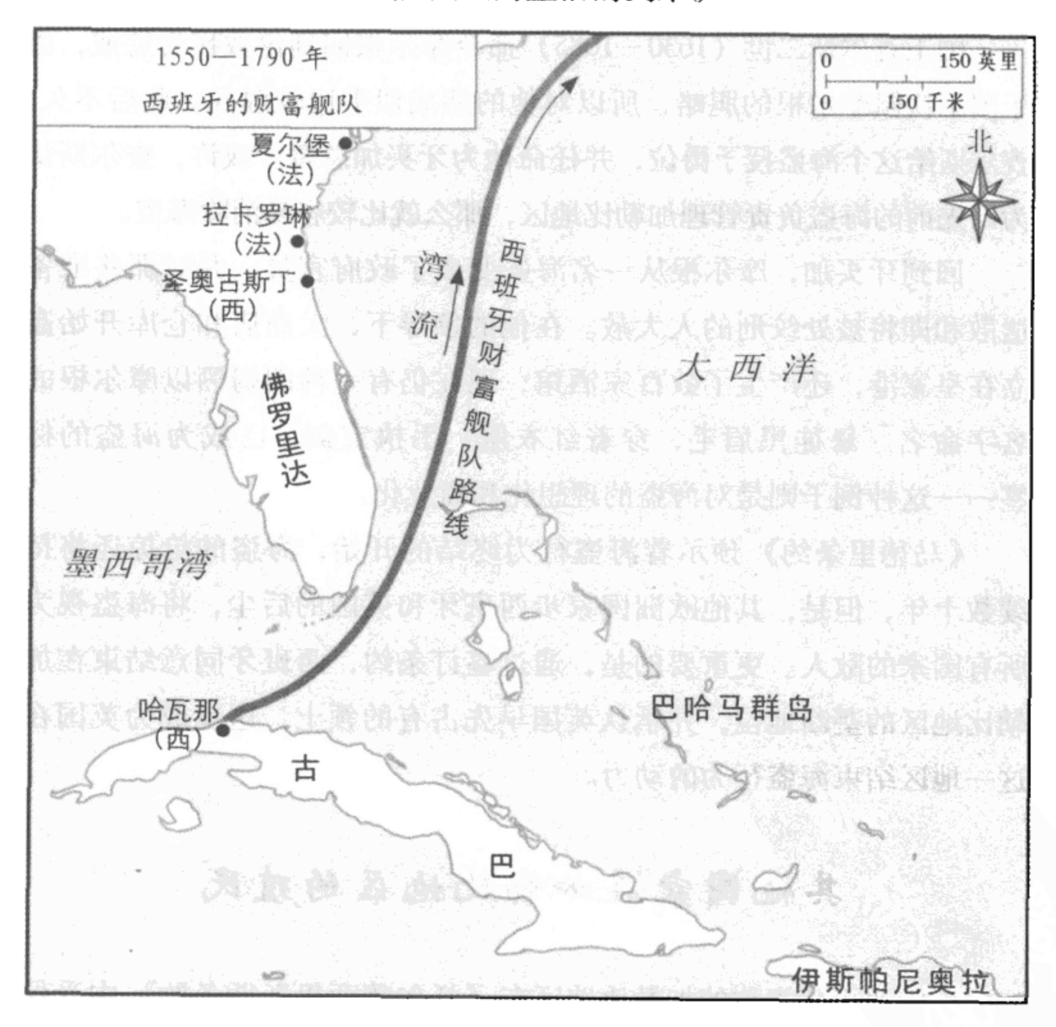
《马德里条约》预示着海盗行为终结的开始，海盗的抢掠还将持续数十年，但是，其他欧洲国家步西班牙和英国的后尘，将海盗视为所有国家的敌人。更重要的是，通过签订条约，西班牙同意结束在加勒比地区的垄断地位，并承认英国早先占有的领土，这也成为英国在这一地区结束海盗行为的动力。

其他国家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

不顾西班牙声称的加勒比地区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受保护的范围，别的欧洲国家也参与到这一地区来。荷兰、英国、法国成

功地削弱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垄断地位，西班牙被迫保护主要港口，如哈瓦那、圣胡安，被迫去保护他们的舰队，将其注意力放在最大的岛屿上：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和波多黎各，那些被认为价值不大的小岛则被放弃。对西班牙的对手来说，这些岛屿则是重要关口——首先是海盗和私掠船，其次是商人，最终导致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加勒比地区的出现。

尽管在他们新获得的土地上殖民的速度很慢，英国、荷兰和法国很快看到了这些岛屿的价值，不仅仅是从这里可以攻击西班牙。农业——尤其是甘蔗种植的发展——商业和矿业很引人注目。这些活动详细地说明了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生活的到来。



英国的殖民

英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建立在百慕大，此地位于北大西洋中，在南卡罗来纳东面、加勒比海的北面。这个殖民地并不是经过规划，而是1609年偶然得到的，当时一艘由乔治·萨默斯（1554—1610）爵士指挥的船在该群岛失事。1612年，英国人宣称占有该群岛，但是，真正的殖民直到1624年才开始。随后英国开始在加勒比地区的圣基茨、蒙特塞拉特和尼维斯殖民。然而，在这些岛屿上发生了持续的骚乱——与西班牙人战争和法国竞争的结果。

43

对英国人来说，最大的战利品是牙买加，1655年，英国人武力征服伊斯帕尼奥拉彻底失败。英国舰队害怕无功而返，选择了攻击牙买加。这个岛装备很差，受到了来自38艘船只8 000名士兵登陆的挑战，西班牙殖民者被包围，并同意回到欧洲。然而，直到1670年，西班牙从未宣称放弃对该岛的拥有权。

荷兰人和丹麦人的到来

荷兰人来到加勒比地区，不是为殖民，而是为打击西班牙人，并获得荷兰渔业所需的盐。荷兰西印度公司创立于1621年，目的是监督荷兰水手抢劫加勒比地区。1623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派出一支仅有3只船的小舰队到加勒比地区，但在以后的5年里探险的次数和舰队的规模不断增长，至1628年，每年由荷兰驶出30只船。对荷兰人来说，最初的战争结果却发展成为高额利润的商业冒险。

44

1631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接管了圣马丁岛的南部，有两重目的：修建一个海军基地以监视西班牙舰队的活动，建立一个盐厂。两年后，西班牙人收回该岛，荷兰人迁移到库拉索、阿鲁巴和博奈尔岛。另外一些殖民地则建立在苏里南河边和圭亚那。

1648年，西班牙悄悄地放弃了圣马丁岛，荷兰人重新占据。库拉索成了奴隶贸易的一个主要中心。奴隶由非洲运来，在出售给加勒比

岛屿上的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之前，通常到这里适应水土。

1671年，丹麦人效仿荷兰人建立丹麦西印度和几内亚公司。1672年，由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琴五世颁发特许状，荷兰殖民者定居在圣托马斯岛。1683年，他们扩展到圣约翰岛，并与英国争夺该岛，1733年，他们从法国西印度公司手中购得了圣克罗伊岛。

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要求

法国通过建立几个与荷兰西印度公司类似的公司到达该地区：圣克里斯托弗公司，由枢机主教黎希留（1585—1642）建立；美洲群岛公司；西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建立于1622至1664年之间。正如他们的特许状规定的那样，其目的是殖民小安的列斯群岛。按照这种精神，1627年，300名法国人定居圣基茨。此后不到十年的1635年，该岛成为殖民马提尼克岛的跳板，同年，法国人占领了瓜德罗普。1665年，法国占有圣克罗伊岛（后来卖给了丹麦），1697年，通过条约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圣多明各，使其成为伊斯帕尼奥拉的法国部分。

对加勒比地区的统治

不同的欧洲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加勒比地区建立殖民地，它们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与殖民者的数量也不尽相同。西班牙去征服新世界，另一方面，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本来也没有希望永久殖民，他们到加勒比地区是为了抢劫西班牙人的财富、袭击西班牙的殖民地。一段时间后，每个国家都发展了自己的模式达到对加勒比地区占有的目的。

西班牙模式

西班牙到新世界去征服、殖民和探险，欧洲其他国家却嫉妒西班

牙在新世界的财富，并希望攫取西班牙的财富。西班牙倾向于建立永久性的殖民地和赢利的企业，甚至在加勒比地区也是这么做的。早期，这些岛屿只是作为征服的滩头阵地或西班牙船队的会合点。管理规则和派往海外殖民地管理人员的需求很快出现了，为满足这些需求，西班牙制定了法律和政治官僚体系。1524 年，西印度群岛议会成立了，作为国王的顾问并负责任命新世界的官方教会。议会决定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到新世界旅行，监督土著人改宗基督教，管理负责控制殖民地商业的贸易署。这两个机构互相协作，互为补充，但从本质上说，议会是一种政治工具，而贸易署则是商业的促进者。

总督是行政管理官员，代表西班牙君主，并以君主的名义对从墨西哥到南美洲南端和加勒比地区的广大殖民区域实施统治。总督一职是 1535 年为管理加勒比地区而设立的；首府设在墨西哥的新西班牙总督区也管辖墨西哥、巴拿马、菲律宾和委内瑞拉。国王委派总督，总督以国王名义进行统治，行使广泛的民政和军事权力。总督依次委派地方的州长，州长委派当地的镇长或市长，市长与地方议会联合管理，称为市政府。议会的成员有义务为政府的特定项目服务，但是，他们的家族关系和经济与政治上的影响力决定谁在市政府中任职以及任职的期限。当时，政治地位意味着经济利益，殖民者们试图购买政治职位来获取金钱上的回报。

几十年之后，西班牙人对一些实体或部分的管理职位作了调整，包括许多头衔与名称。但是，加勒比地区的命运与福祉全都依赖于国王。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国王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西属美洲，最初的权力制度是……一种通过很少执行的温和专制主义的法律进行垂直管理的独裁政府，然而，在当地，地主与政治实力派人物之间的协议，使严厉的且经常是无效率的对土地和劳力的开发得到保证。"(Fuentes, 137)　46

在理论上，君主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有义务服从，毫无疑问，其行政官员被赋予执行王室命令的职责，但是在实际上，制度的执行

却有很大的差别。命令达到哈瓦那或圣胡安需要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当命令到达时，周围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得命令变得毫无意义。王室命令的执行也可能与当地政府及地方精英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背道而驰，这就使得命令的执行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执行的话。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的结果是地方行政官员给予自己很大的自主权，这些都反映在当时的一句俗语中："我服从但不执行。"（Collier，307）

这种统治哲学在王室官员与克里奥尔商人之间培育出一种联盟，王室官员以其是出生在伊比利亚的半岛人而闻名，克里奥尔商人则出生于美洲。当时，这两大集团进行许多联姻，而这种结合的后代成为新世界的精英。

地方统治者修建城镇，伊斯帕尼奥拉最早开始于1502年。城市规划采用网格模式，它首创于西班牙，后来甚至在整个殖民地得到推行。城市有城市广场或中心广场，通常是一个公园，广场的一侧矗立着教堂，另一侧则是城市会堂，教堂与会堂通常两两相对。在城市的主要广场边还有一个军队司令部或国民军总部。房屋以广场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周围分布，房子有巨大的装有栅格的窗户，周围是环绕的院墙，外面是狭窄的人行道。殖民者在郊区配有用来耕作的土地，一天结束时，西班牙人会回到他们城里的家。在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在公园或广场集会。这种殖民模式是基于对城市生活的偏爱，从殖民地时期起已成为西属美洲的特色。（Comisión Económica，17）

47

英国人如何统治

最初，英国批准个人到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岛屿进行殖民，建立定居点，如圣克里斯托弗或圣基茨就是清教徒的梦想之地。托马斯·沃纳（？—1649）于1624年说服伦敦商人为岛上100人的定居点提供资金支持，后来他被授予爵位并被委派为总督。同样，1625年一位英国船长要求对巴巴多斯殖民，他用来自一位商人的资金为殖民提供支持，

这位商人为此创办了一家公司。这些经营者被称为贵族经营者，根据参与者的建议进行管理。

为殖民地颁发特许状是殖民地经营的第二步。国王给私人公司——通常是贸易公司——而不是给个人颁发殖民特许状。这样的殖民地管理起来更像一种业务，而不像一个殖民前哨或定居点，不像一种实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个人阻碍君主的统治。

变化发生在17世纪，当时英国君主决定对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加强控制，此后，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命和派遣。总督指定一个由12人组成的议会，代表不同的选民，维护代表殖民地利益的言论权利，征集地方税，监督殖民地的开支。在牙买加，殖民地被分成不同的教区，当地的代表对地方教区管理负责。在议会供职，必需拥有一定的财产，而且必须是白人。议会制定地方法规，总督负责执行。

英国总督不像西班牙总督那样有权力，他必须与议会协商且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议会，总督签署法规必须得到议会批准。实际上，总督的权力被议会限制在检查核实的层面。

有例证表明，英国实施的统治并不均衡，1797年接管特立尼达后，英国国王命令总督统治而不设立议会。先前西班牙管理的标杆被废除，例如市长和市政府。这为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运用意志提供了舞台。一位总督、陆军上校托马斯·皮克顿（1758—1815）选择那样做，忿忿不平的殖民者称他为独裁主义者，他改组警察，扩大他们对大众的权威。为了控制皮克顿的权力，英国君主创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三人平等分享权力。

48

极富特色的英国管理模式是与加勒比地区的情绪与文化相分离的，殖民者在当地占有较高的比例，他们开发了这些岛屿，并将之变成他们英国的家乡。英国家庭的这些卓越成绩使他们在加勒比地区挣得了财富，监工和管理人员经营着他们的财产。在热带环境之下，英国人在他们的住处通过保持欧洲人的习惯使自己与当地人区分开来，在完全由不同的规划运作的典型的奴隶种植园社会中，这给他们一种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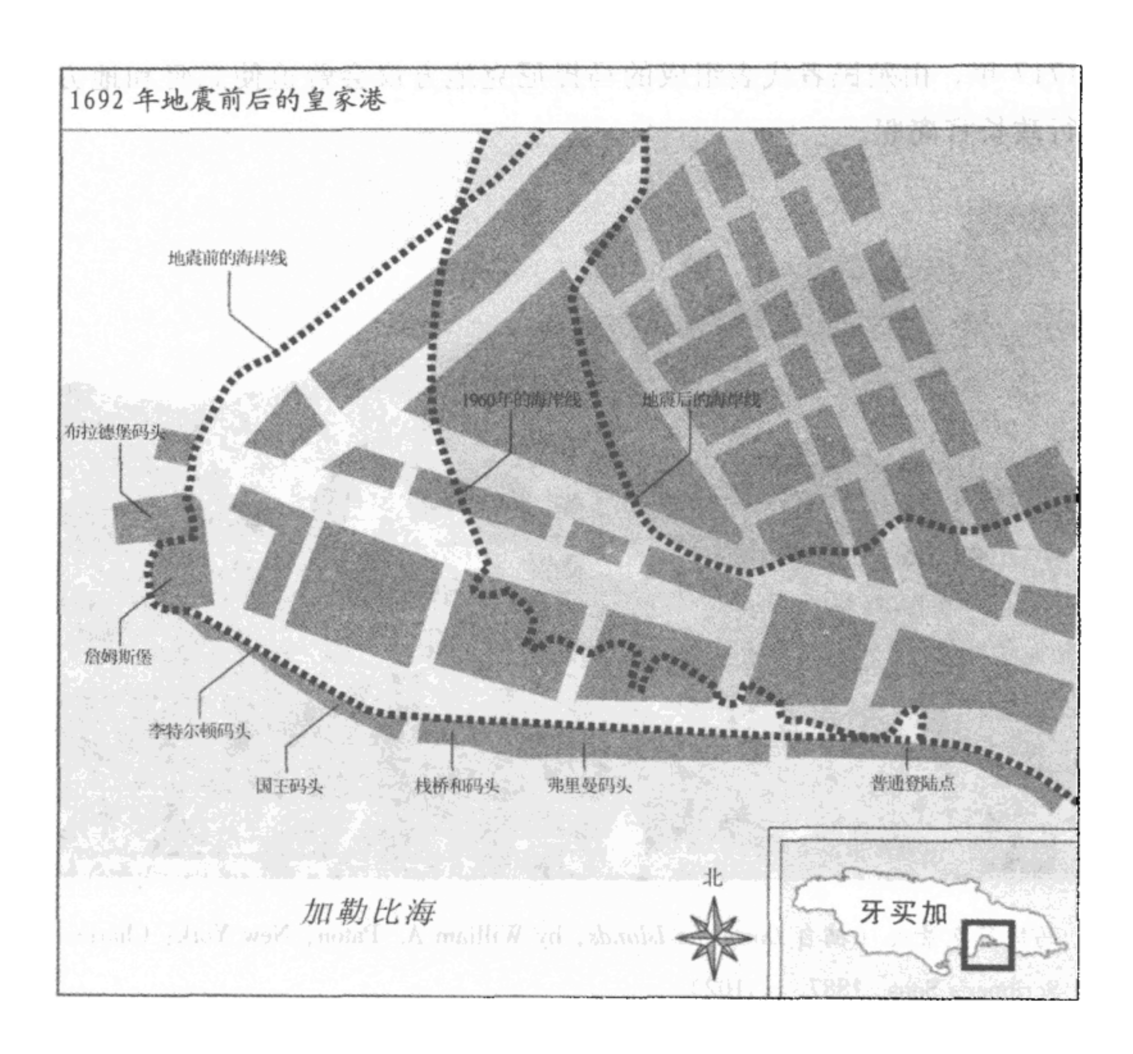
结果，英国殖民者花费大量资金从欧洲进口奢侈品，他们进口了大量的面粉，因为他们不喜欢像木薯粉和大蕉之类的热带替代品。他们对英国葡萄酒和烈酒的喜爱超过朗姆酒，他们怀念牛肉和家乡的羊羔肉，但只能以进口的咸肉将就一下。一些人坚持在正午到下午两点之间吃主餐的习惯，尽管在加勒比地区这一段时间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尽管天气炎热，穿马甲和戴假发的习惯被保留下来。英国人将饮食与穿着看作是等级制度的内容，食用当地菜肴和穿本地人的服装被认为有失身份。富有的英国人殖民者在西印度印岛挣钱的套路是如此普遍，以致他们的形象在舞台表演和戏剧中经常出现。最典型的是，这些富有的殖民者被描绘成没有礼貌的人，他们的不良习惯是在加勒比地区养成的。

这种与欧洲的分离让一些地方培育了 17 世纪的建设风格，如牙买加的皇家港，在那里有 800 多座房屋挤在一个细小的半岛上，面向海湾，客栈与酒馆相互竞争地盘。这种局面鼓励了冒险家而不是家庭来到此地。西班牙人选择用砖块和灰浆建造大厦，而英国人用木头和泥土搭建的房子则易于毁坏。1692 年，一场地震及随之产生海啸摧毁了牙买加的皇家港。

法国人的方法

法国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的行为侵犯了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的权利，因为他们清楚西班牙将法国人的侵扰视为海盗行为，所以殖民者的目标要避开西班牙人的攻击，并抢劫西班牙的船只。这些殖民者多为冒险家，如海盗和小部分殖民开拓者。他们经常抛下财产加入远征队攻击加勒比地区或南美洲的西班牙港口。为了维持秩序，建立殖民地的公司委派主管，主管有薪水，实际上他们是法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并因其职位而变得富有。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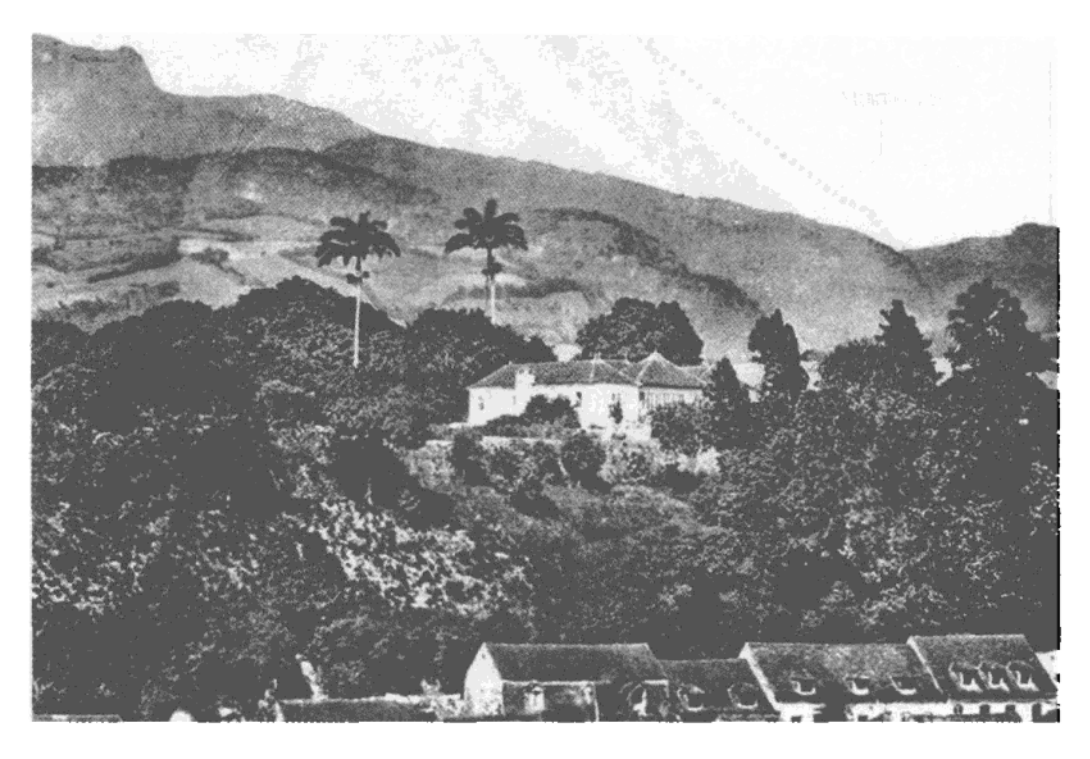


根据一项出名的政策——《殖民地条约》，新获得的殖民地直接置于法国的垄断之下，岛屿上的殖民者只准与法国海军进行贸易，代表法国；法国岛屿上的殖民者不能生产能够从法国购买的商品，同时，法国人被迫只能从法属加勒比获得热带产品。对照法国人如何激烈地批评西班牙在殖民地坚持垄断，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发展。

1664 年，法国从其伙伴那儿夺取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并使之成为法兰西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殖民地，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代表王权，前者掌管军事，后者负责法律与财政事务，他们都直接向国王汇报，互不隶属。他们的权力因巴黎的议院外游说者而大大缩小，这些游说者为殖民者和对加勒比地区商业感兴趣的商人鼓吹。由于法国国王需要加勒比的产品，形势有利于殖民者与商人，如

50

1717 年，由殖民者代表组成的马提尼克地方议会曾迫使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离职。



马提尼克景观（摘自 *Down the Islands*, by William A. Pat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7, p. 102）

在瓜德罗普和圣马丁，一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和殖民者是地方政治的塑造者，在圣多明各，加勒比地区的最宝贵的财富——地方权力掌握在监督人员和管理人员手中。这种现象是因为，英国殖民者、种植园主喜欢城市生活，他们很少在殖民地长期居住。所以，城市建筑并不被优先考虑，即使在圣多明各的首府太子港，郊区的发展与哈瓦那和圣胡安也截然不同。历史学家 C. L. R. 詹姆斯引用 18 世纪作家莫罗·德·圣梅里的描述，太子港的街道就像下水道，并对此作了解释："如果夜里下雨，第二天城里就没法行走，水流涨满了街道边的沟渠，甚至可以听到癞蛤蟆呱呱的叫声。"（James, 31）殖民者喜欢住在城里，甚至有一种返回法国的强烈愿望。

51

荷兰人与丹麦人的公司

如早先所提及的，荷兰人并不渴望在加勒比地区建立永久性殖民地，对他们来说，加勒比地区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机会，他们全力骚扰西班牙的航运和贸易，并走私货物。这种行为由荷兰西印度公司来实施，该公司由一个委员会管理，由 19 名成员组成，被称为“阁下十九”。17 世纪 20 年代晚期，政府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荷兰的殖民地，拥有军队，并且处理法律事务，还与外国签订条约。政府委派一系列的管理人员来管理公司和它的殖民地。

丹麦的殖民地是由一个公司发起的，这个公司就是丹麦西印度和几内亚公司。尽管该公司努力吸引投资者，丹麦国王还是于 1754 年购买了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委派王室董事来管理圣托马斯、圣约翰和圣克罗伊。

都市与文化的形成

随着人口与国际贸易的增加，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城市开始发展成为文化与金融中心，并形成了殖民者自我身份认同的统一性。

18 世纪 60 年代，古巴的首府哈瓦那是一个人口达 75 618 人的拥有城墙的城市，比拉丁美洲的其他城市都要大。它有教堂、修道院、一个出版社和一所大学（Hernández, 17），1776 至 1855 年，这里修建了四座大剧院。为促进教育、商业、工业、历史、文学和优秀艺术的发展，1792 年古巴成立了国家之友经济学会。凭借其提供的奖学金，古巴的学生可以在马德里和墨西哥游历和学习。学会创立慈善组织，并出版经济与文化刊物，学会的成员是精英家庭和古巴知识分子的代表，并在 19 世纪晚期的独立运动中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形象。1812 年，整个哈瓦那至少流通着 12 种报纸，根据旅行者的描述，到 19 世纪中期，哈瓦那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剧院之一——脚跟剧院。（Dana, 21）

52

18 世纪，波多黎各整个岛屿的人口总数达 150 426 人（Ribes Tovar, 205），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小的农庄，依靠农业生活，其中的 8 000 人居住在圣胡安。到 1784 年，城市的格局已固定，居民参与军事与贸易，或者为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服务。至于娱乐，他们支持售票制，实际上，这些节目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当地政府以此为公共基金募集资金。票价 2—4 西班牙里亚尔，相当于 25—50 美分，这些收入相当于当地政府关税收入的 6%。

在波多黎各出版的第一本书出现在 1806 年的圣胡安，是西班牙诗人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尔德龙（生卒年不详）的两卷本诗集——《诗集》和《闲散的年青人》，它展现了波多黎各人早年在诗歌方面的兴趣，这些流派在 19 和 20 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为了了解新闻，居民们购买《学报周刊》的复制本，该刊物创刊于 1807 年。这里的第一座剧院建造于 1811 年，总督米格尔·德·拉·托雷亚（1786—1838）将军 1824 年为建造圣胡安的城市大剧院下令征税，今天它仍矗立在那里，名为塔皮亚剧院。与这些剧院建筑同样重要的是戏剧组织，它们在波多黎各周边地区表演西班牙经典剧目。西班牙戏剧公司表演的深爱大众喜爱的说唱剧，是一种喜剧与歌剧的糅合体。

音乐对文化是一种推动力，尤其是教堂、唱诗班和宗教机构的音乐伴随着大多数人。圣诞节期间，圣诞礼物或颂歌，在大街上、教堂和家庭联欢会中，都能看到或听到。

在西班牙控制的伊斯帕尼奥拉地区，圣多明各成长为一个都市和文化中心。当 1801 年海地武力从伊斯帕尼奥拉独立时，圣多明各的独立被阻止。海地关闭了大学，并试图利用法国的非洲文化影响圣多明各人。入侵者组织表演法国的喜剧，对这种文化的灌输，多米尼加人以躲避来抵抗。在此之前，音乐表演由天主教堂发起，贯穿了所有假期或宗教节日。1771—1779 年，西班牙总督何塞·索拉诺—博特（1725/26—1806）在总督官邸发起文化活动。1822—1844 年，在海地第二次被占领期间，大学再度被关闭，居民避开宗教活动。然而，西班牙贵族继续集会，通常是秘密的，读书、写诗、指导文化活动，以此来重申自己与西班牙的纽带联系。

53

在海地的太子港，这种发展被海地革命所阻断，然而，海地1804年独立之后，太子港最终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都。在十年革命战争之后的恢复中，太子港的海地精英仿照在其宗主国巴黎流行的文学沙龙，组建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的知识分子讨论政治，从事诗歌创作，并举行竞赛。一个1836年的文学社团从乡村吸收未来的作家，并将其培养成为海地的国家文学精英。

在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和牙买加的金斯敦，音乐特别受尊崇，它是奴隶和殖民者的文化表达方式，殖民者经常参加奴隶们的音乐庆祝会。在宗教节日，如圣诞节，会举行盛大的公共娱乐节目，街道上挤满了舞蹈者的队伍，他们身着漂亮的用平纹细布和丝绸做成的衣服，带着面具，模仿白人殖民者，举行的歌唱会使用各种源自非洲的乐器伴奏：长笛、五弦琴和各种不同的鼓。这些游行队伍使20世纪的英属加勒比人建立著名的国家狂欢节。

正在发展的文化身份

在早期的西班牙殖民地，宗教戏剧被发扬与鼓励，尽管当局对社会反抗文学的先锋形式并不热心。一个例子就是剧作家克里斯托瓦尔·德·莱雷纳（1540—1610?）的著作，他是圣多明各的教会圣职人员。因市长与教会对弗朗西斯·德拉科有关首府的威胁反应过慢而终致该城被其洗劫，莱雷纳批评了市长与教会。整个17世纪，哈瓦那的居民喜欢稍微有点猥亵的喜剧，这促使教会禁止他们的表演。19世纪早期，在太子港，宫殿作为戏剧创作的背景来描述发生的事件——海地革命或海地领导人生活中的事件。这种创作可能只是戏剧表演中出现美洲人的第一个例证，包括黑人演员、作家和舞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54

奴隶的音乐

音乐在加勒比地区早已盛行：最早的是“阿衣图”，1492年前由泰诺人演奏，其次是被西班牙人带到殖民地的音乐，最后是由奴隶演奏的音乐。经常被人们遗忘的是，奴隶通过音乐与舞蹈

> 来逃避。
>
> 奴隶，在工作、游戏及礼拜时唱歌跳舞，可能由于恐惧、悲伤或高兴。这是他们社会和艺术的典型表现形式，它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二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在两个世界之间，这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理解的障碍。因为这种音乐与舞蹈是如此令人费解，也因为音乐基于音色而舞蹈基于编舞传统，这些完全都在白人观察家的体验之外……他们的音乐被视为噪音而摒弃，他们的舞蹈被视为不端的性行为和放荡。另一方面，奴隶音乐的政治功能是被其首领快速识别——因此，在击鼓之处禁止击鼓——通常的借口是干扰邻居。①

1850 年，第一个波多黎各人亚历杭德罗·塔皮亚—里韦拉（1826—1882）创作的剧本在圣胡安上演，该剧的名称为《罗伯特·德弗罗》，讲述了女王伊丽莎白与艾塞克斯郡第二伯爵罗伯特·德弗罗（1556—1603）之间的著名爱情故事，伊丽莎白因罗伯特·德弗罗阴谋背叛自己而将其处死。同时，这一剧目在舞台上揭示了人间现世王室的愚蠢。西班牙当局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并迫使他写作对贵族与特权阶层批评较少的剧本。

这种文化方面的努力帮助他们培养了一种加勒比人内部身份的感觉，在欧洲出生的殖民者喜欢欧洲文化，认为它优于加勒比地区生长的任何事物，西班牙人的后裔和英国及法国人的后裔培育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因此而享受了欧洲的平等。但他们之间发展出一种差异。古巴将军曼努埃尔·塞克拉—阿朗戈（1764—1846）的一首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其创作于 18 世纪晚期的《凤梨颂》中，作者以高超的手笔描写了凤梨，并着重强调了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古巴的凤梨之美。他这样做就否定了欧洲的物质与文化都优越的论调。他的这种态度并不为殖民当局所赏识，因为诗中所体现的文化分歧很容易被看出，

① Brathwaite, Edward Kamau. *Folk Cultures of the Slaves in Jamaica*. London and Port of Spain: New Beacon Books, 1981.

作者在诗的结尾写道："风梨，我们国家的骄傲!"这里指的是古巴而非西班牙，这是一种潜在的叛乱行为，希望与殖民统治者决裂。殖民统治者的解读是正确的，19世纪的叛乱与独立战争给他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证据。

第四章　工业与奴隶制

56　欧洲殖民者打算在加勒比地区发财致富，却不愿付出自己的劳动。从一开始，种族主义和压迫就是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殖民的特征，正如埃里克·威廉斯在《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加勒比地区史》一书中所指出的："西班牙征服者……起初是双膝跪地乞求土著人，然后就寄生在土著人身上。"[①]（E. Williams, 30）

大多数欧洲人的潜在信念是，加勒比地区的土著不能与欧洲人等同：他们是异教徒，没有仁慈之心，缺乏灵性。按照这种逻辑，强加给泰诺人的劳动制度是使他们走上文明的康庄大道，是教导他们守纪律的艺术，也是使他们接近基督教精神的途径。西班牙的委托监护制就是这样的一种途径，但是它导致了泰诺人的大量死亡，西班牙国王对剩存泰诺人的保护结束了这种在加勒比地区的恶劣试验。

然而，这里对劳动力仍有需求。最初是围绕采矿与淘金，到16和17世纪转变为农业与商业，烟草和甘蔗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农作物。

---

① 埃里克·威廉斯著，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加勒比地区史（1492—1969）》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的译文为："他们先向土著居民跪下，然后向土著居民进攻。"——译者注

棕色人与白人：烟草和蔗糖工业的开端

尽管禁止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者迁居大陆的法律已通过，但西班牙最高统治者深知，仅有法律还不能使殖民者永久居住在岛屿上，必须有另外的吸引力，另外的财富资源——蔗糖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蔗糖工业的简单开端为加勒比地区作了及时的定位。哥伦布1493年第二次航行时将甘蔗引入到伊斯帕尼奥拉，但是，当时他们认为采矿业比农业更重要。1503年，在伊斯帕尼奥拉的康塞普西翁—德拉维加镇，一位殖民者开始种植甘蔗并生产蜜糖。1514年，一个功率有一马力的制糖作坊设立在这个镇上，两年后，一个甘蔗种植园和一个蔗糖精炼厂建立，精炼厂使用水力以减少劳动力，生产效率是作坊的两倍。20年后，在伊斯帕尼奥拉有四五十家精炼厂，每家使用80—100个奴隶，产值约10 000达卡金币，相当于75 000美元，但没有精炼厂生产收入的实际数据。 57

工业需要大牲口供工人食用，拉车，从田地里运送甘蔗到精炼厂。种植甘蔗需要土地和水，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资的计划，开始由西班牙当局提供资金："国王免除了从事甘蔗种植者的债务，后来，奴隶、工具和生产蔗糖所需的物品都被取消了回赎权……进一步放松信贷以鼓励蔗糖的生产，国王还下令拨出一批资金支持糖厂的建设。"（B. Williams, 43）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计划：甘蔗种植者每年可挣到6 000达卡金币以上。

这种观念传播开来，在波多黎各，殖民者试验甘蔗的种植，1523年，第一个糖厂在圣赫尔曼附近建立，到1528年，有五个精炼厂在运作。在这10年中，牙买加建立了30家精炼厂。然而，制糖工业在古巴却发展缓慢，因为，这里的殖民者在集中种植另一种作物种植：烟草。

烟草的出现

达到加勒比地区不久，哥伦布看到泰诺人将一种长长的叶子插入鼻孔或嘴里，吸气后吐出一股股的烟。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了解到泰诺人用一种被他们称为“库赫巴”的植物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以求达到祈祷的目的。16 世纪 60 年代，烟草的种子被带到西班牙，1571 年，一个医师尼科洛·马纳德斯（生卒年不详）撰写了一篇论文，辨明了 36 种病症，像头痛或起水疱，可以用烟草这种植物来缓解病症。一位法国外交官兼学者让·尼科（1530—1600），将烟草介绍给巴黎的社交界，并给其取名为烟草。至 17 世纪早期，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烟草市场不断扩大，1609 年，古巴运至西班牙的烟草至少有 15 000 磅。4 年后，运送的烟草超过了 400 000 磅。

58

随着被称为“维加斯”的小型农场的建立，烟草的种植扩展到了古巴全岛。潜在的财富在西班牙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国王也从中看到了另外征收关税的途径。1717 年，皇家烟草商行建立，从古巴烟农手中收购烟草，禁止他们将烟草直接卖给别的西班牙殖民者。烟农将这种新的垄断视为一项由国王制定的严厉的经济措施，它立即遭到了强烈反抗。烟草种植者抵制这项政策断断续续经历了好几年。1723 年，国王处决了 12 名叛乱的烟草种植者。



18 世纪，古巴的烟草享誉世界。(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Habana. Mark Jackson's Postcards Archives)

为了避免与殖民政府发生冲突，一些烟草种植者迁移到古巴

西部众所周知的大阿瓦奥地区，即现在的比那尔德里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更适合烟草种植的土壤。这里生产的烟草富有香味，被认为比古巴其他地区以及加勒比地区其他岛屿生产的烟草要好。到 17 世纪晚期，在英国，古巴生产的烟草比英属美洲殖民地弗吉尼亚生产的更受欢迎，当然购买古巴烟草需要付出更多金钱，所以经常发生烟草走私事件。

这一时期，烟草在古巴也渐受欢迎："古巴吸烟者的数量令所有的来访者吃惊，甚至一些老年妇女也吸烟……甚至马索拉收容所的疯子也在不断地吸烟。"（Thomas，134）这成了古巴的一项特色，一项古巴社会与种族的特色，包括雪白的蔗糖（属欧洲血统）与棕色的烟草（非洲血统）。

59

奴隶制的引入

烟草与甘蔗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作物。西班牙殖民者不愿意进入甘蔗田去收割运送甘蔗，绝大部分土著已被西班牙人消灭，替代的劳动力很急需。

白人劳工

第一个解决劳动力需要的方案是输入白人劳工，通常要么是签有合同的佣人、以劳力抵偿路费之移民，要么是判了刑的罪犯。签有合同的佣人常常是那些穷得付不起到加勒比地区川资的移民。为了偿付盘缠，他们在家乡先签订协议，答应到达后为某个主人服务一段时间。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可返回欧洲或留在加勒比地区。

以劳力抵路费之移民是未来的殖民者，虽然他们穷得连路费都付不起，但他们没有事先签好的劳动协议，他们向船长许诺偿还他们的路费，到达加勒比地区后，他们找一个朋友或雇主偿还欠船长的费用。如果他们不能偿还，船长会将他们卖给另外的船长或商人。

白人劳工的第三个来源是罪犯，他们被运到殖民地并待上相当

长一段时间，通常是7—10年。被监禁的原因可能是任何事情，如未成年人从女士那里偷一条丝织的围巾，对其判决并不总适于罪犯的刑罚。在加勒比地区，罪犯被关在有围墙的种植园中，在监工监督下劳动。当罪犯劳动期限到达后，他们会获得自由，有时也允许返回家乡。当被释放或逃亡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加入了海盗的行列。

在获取和运送白人奴仆中的虐待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在海港地区绑架是补充奴仆的可靠方法，绑架通过武力或是绑架者将受害人灌醉的方法。订立契约者经常借口奴仆没有履行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方式对契约进行合法的再解释来延长奴仆的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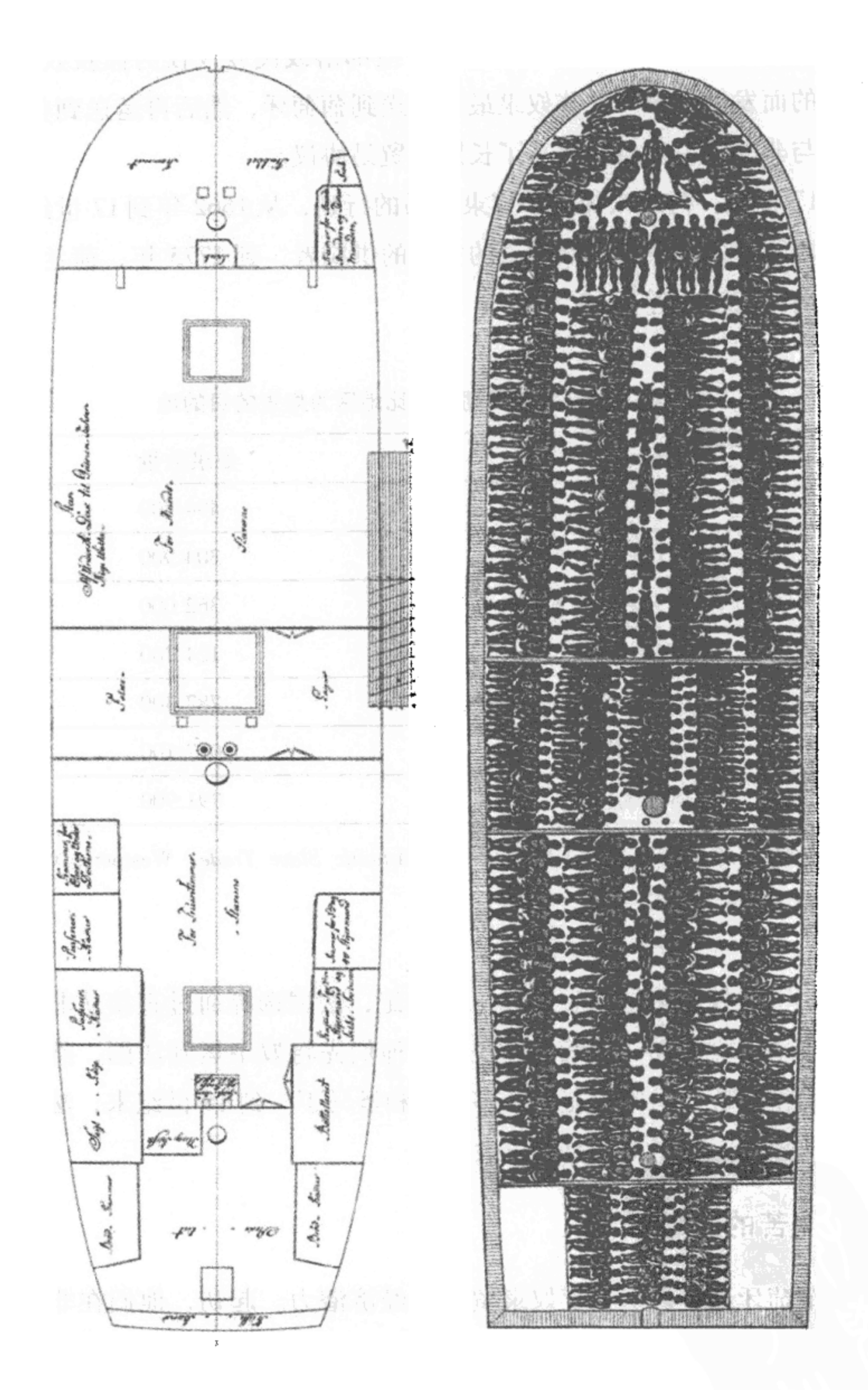
60

尽管存在虐待，这种制度终究被奢侈地提供给了殖民者与商人。奴仆希望在契约到期后获得一小块土地，当产生争端，奴仆同雇主和法庭进行斗争。殖民者可以购买奴仆的有限期限的服务，不能购买他们的自身，而且只能购买服务。受契约约束的奴仆可能逃跑并混入其他的殖民者中，或逃到海外去。

奴隶贸易的开端

欧洲商人和殖民者找到了一个补充加勒比地区劳力的较好方法。殖民者接受了拉斯·卡萨斯的建议，这一建议是其在保护泰诺人时提出的：非洲人适于加勒比地区的气候，出名地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不像泰诺人那样对疾病敏感。后来，拉斯·卡萨斯很后悔提出这一建议，然而，为鞭挞奴隶制度，将责任都推到拉斯·卡萨斯一人身上是错误的。15世纪，非洲奴隶劳动力已在靠近非洲的欧洲殖民地中使用，如加那利群岛，所以即使没有拉斯·卡萨斯不小心的提示，西班牙也可能或早或晚地转向非洲奴隶。

欧洲殖民者渴望廉价的劳动力在其种植园里从事艰苦的劳动，非洲奴隶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购买一个白人奴仆十年服务的费用可以买一个黑人。”（E. Williams，19）此地有一个现成的制度，而非洲是一个拥有数百个民族的广袤大陆，包括互相战争的国家，他们从抓



奴隶们像货物一样被装上运奴船的甲板，根本没有可能伸展身体。(North Wind Archives)

获敌人并将其卖为奴隶从中获利。一些部落或民族仅仅为抓获奴隶这一目的而发动战争。这些奴隶最先被送到葡萄牙，然后再运送到美洲，他们与非洲的一些酋长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协议。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了奴隶贸易的行列，从1662年到17世纪末，荷兰西印度公司成为美洲奴隶的主要的供应者，到1775年，荷兰往美洲运送的奴隶超过了10万人。

61

62

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加勒比地区为奴隶的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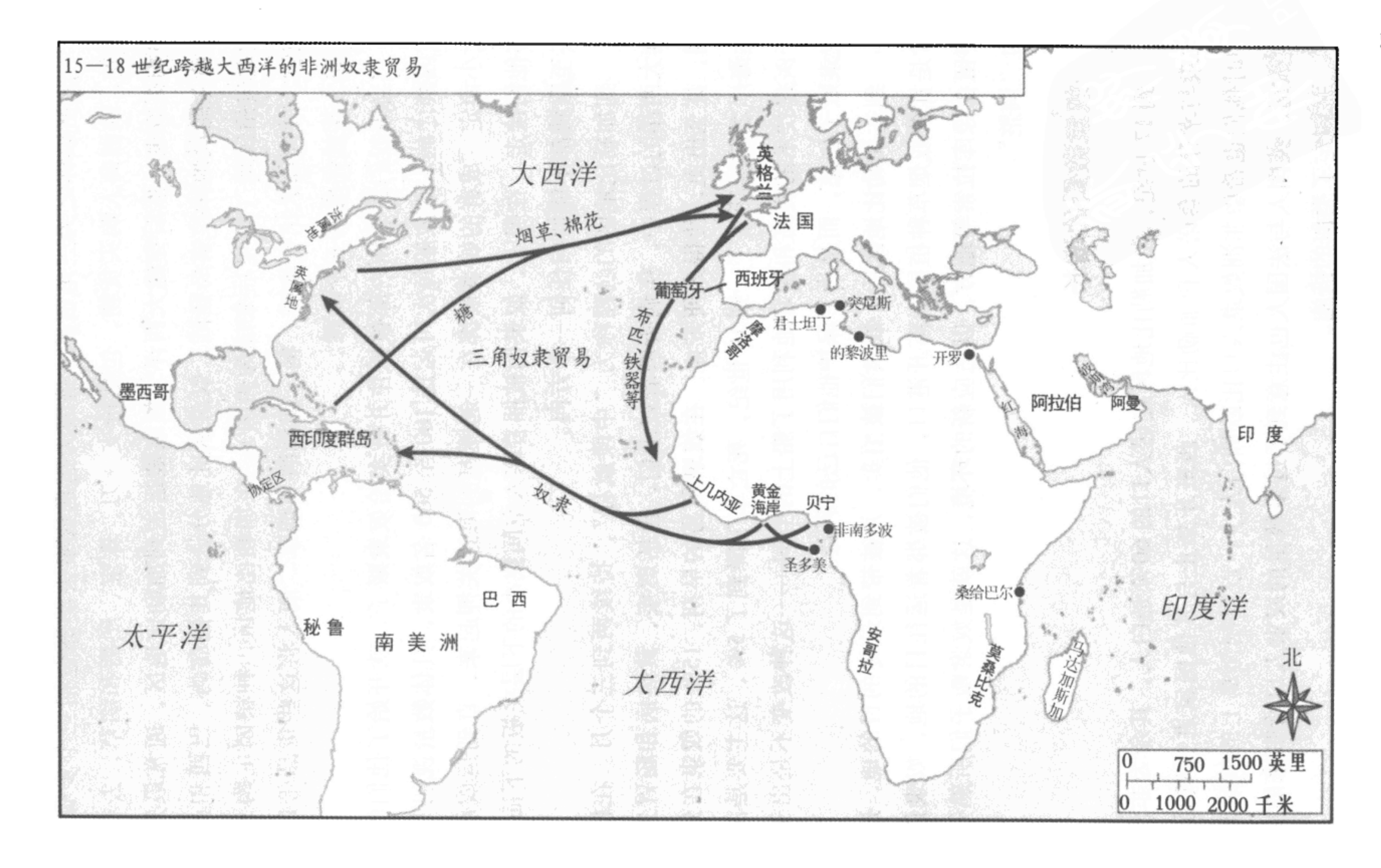
殖民地	奴隶数量
巴巴多斯	494 200
英属背风群岛	304 900
英属向风群岛和特立尼达	362 000
丹麦属加勒比	124 700
海地	787 400
牙买加	1 077 100
西属加勒比	791 900

资料来源：Postman, Johanne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法国是奴隶贸易的后来者。18世纪，法国选择通过直接从非洲获取奴隶来供应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他们先将奴隶运到法国，然后再运到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多明各和圣马丁。到18世纪末，法国向加勒比地区运送了125万名奴隶。

痛苦的三角

葡萄牙最早认识到了奴隶贸易的经济潜力。起初，他们在非洲海岸各港口收集奴隶，然后将他们运回伊比利亚半岛。这种方式费用高、速度慢、效率低，所以很快被改变。从1518年开始，奴隶被直接运送到加勒比地区，一个痛苦的三角形成了。



15—18世纪跨越大西洋的非洲奴隶贸易

之所以称之为三角贸易，是因为运送奴隶去美洲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欧洲商人购买货物，包括枪支、刀、珠宝、烈酒和烟草，去非洲购买奴隶。然后穿越大西洋，奴隶被运送到加勒比地区，通常最先在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登陆，奴隶从此地分送到其他岛屿、巴西和英属北美殖民地（这里后来成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购买奴隶，并向商人出售咖啡、糖、朗姆酒和烟草。商人将这些货品带回 63 欧洲，这就完成第三个步骤。

当黑奴们在非洲内部被抓住并被卖给奴隶贩子，就开始了他们的 64 被囚禁之旅。贩奴船每次可运送 100 至 500 名奴隶，具体数量视船只大小而定。成群的奴隶被绑在一起驱赶到海边关押起来，直到运奴船将他们接走。在船上，奴隶们被捆着塞入空间狭小的下层夹板的下面，甚至胳膊都不能伸向任何一个方向。

到加勒比地区的航程称为“中段航程”，持续两到三个月。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疾病折磨着奴隶们，包括虐疾、黄热病和肠胃失调，甚至出血，使得大便带血。在奴隶贸易的早期，15% 的奴隶在到达海岸之前就死去了。到 19 世纪，死亡率下降到了 5%，这主要是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和较好地利用了船上的空间——这种改变不是出于奴隶贩子仁慈，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到达加勒比地区后，奴隶们被拍卖，并被带到最终的目的地，通常是甘蔗或烟草种植园。离开港口，他们被绑着运往目的地，奴隶们停留在像库拉索等地方，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奴隶贩子们所熟知的“调整”。

奴隶数量的增长

到 17 世纪，在加勒比地区定居人口的 60% 是白人，其余为非洲奴隶与幸存的泰诺人和加勒比人。西班牙禁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同时他们也希望非洲奴隶人口比欧洲白人少，以限制海岛上的奴隶现有数量。英国人与法国人也注意到了过多数量的奴隶人口所带来的威胁，并制定了类似的措施。

多年以后，欧洲的国家将这种警告抛诸脑后。当小农场主被拥有大地产的甘蔗种植园主所取代时，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首先在巴巴多斯出现。到 17 世纪 70 年代，白人数量为 17 000 人，而奴隶数量为 37 000人。每年卖到巴巴多斯的奴隶超过 1 000 人，到 17 世纪末，岛上的奴隶总数达 50 000 人。整个加勒比地区都变成了这种态势。

加勒比地区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发生在圣多明各。1789 年，受繁荣兴旺的蔗糖工业的影响，圣多明各的奴隶人口数量为 460 000 人，而白人仅有 30 000 人。绝大多数奴隶出生于非洲，而白人则出生于法国。古巴是第二个奴隶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其奴隶从 1790 年的 50 000人增长到 1817 年的 239 000 人。从 1811 年到 1867 年，输入古巴的奴隶数量共达 637 000 名（Martínez Fernández，113）。波多黎各是这种趋势中的一个例外。1827 年，其奴隶人口数量约为 34 240 人，而白人和其他有色人则为 320 000 人。这主要因为此处的大多数农场是小型农场，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缺少谷地或宽阔而平坦的土地。波多黎各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甘蔗的种植，但却是咖啡种植的理想之地。

65

对奴隶劳力的需求是持续性的。甘蔗种植园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而且奴隶经常中暑。工厂经常发生事故，机器故障可能导致工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从 1600 年到 1850 年，估计有 1 000 万到 1 500 万奴隶输入到美洲，约 400 万到了加勒比地区。英国是重要的奴隶输送国，占奴隶市场的 28%，法国占 13%，丹麦占 12%，西班牙和荷兰约各占 4.5%（Postma，36—37，41）。葡萄牙提供的奴隶占据了市场的 40%，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地是巴西。

种植园奴隶与城市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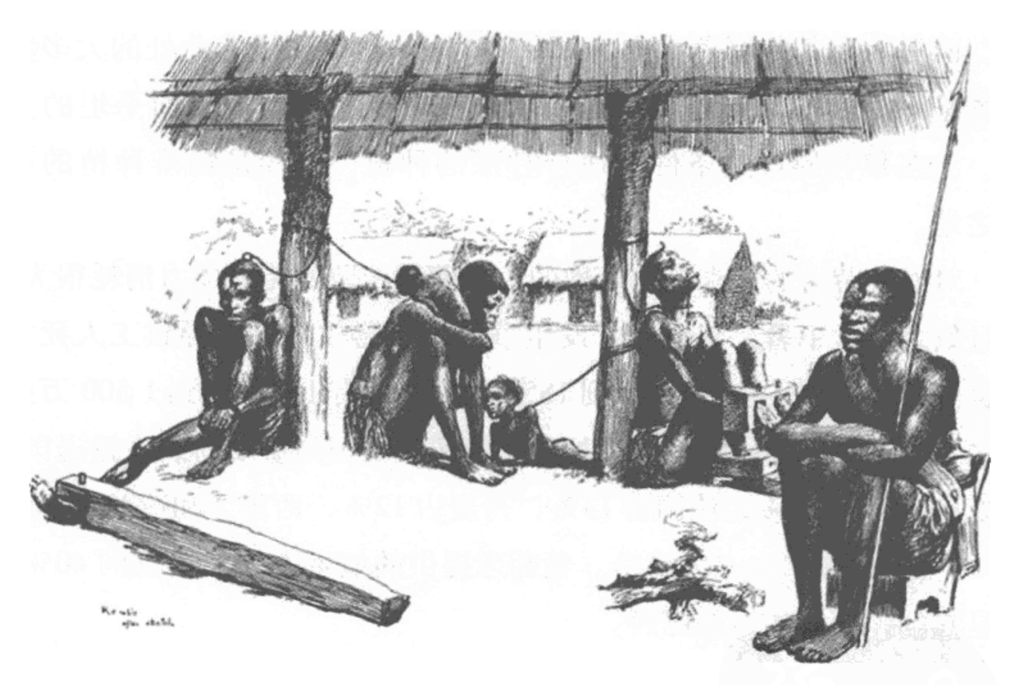
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约 60% 的奴隶在田间从事种植工作，田间劳力被分组从事种植、除草和甘蔗收割等工作。其工作岗位主要由奴隶的年龄与体力，而非由性别决定。约 10% 的奴隶劳力在磨甘蔗或提炼蔗糖，其余作为家庭劳动的仆人。妇女参与到蔗糖生产的各个方面，

除了怀孕并接近临盆之时才不从事劳动。

在法国的一些大地产上，类似的劳动组织也被使用，但有一种类型——“大组”例外，它通常由年轻的男子组成，被分派为耕种、清除林木并移去树根和树干的任务。8—12 岁的儿童被组织到“小组”的人群中，承担除草的任务。约 10% 的男子在工厂中工作，而另外的 10% 在船上和需要技能的贸易中工作。

在西属加勒比地区，劳动的情况大体相似。所有的田间奴隶在一起劳动，不论性别，他们在带着鞭子的监工监督下劳动，监工通常是贫穷的白人或有色人。在收获季节，成组的奴隶可能被强迫连续劳动 24 小时，星期天才允许一天的休息。那些没有分组的奴隶也被分派工作，这些奴隶并不被直接监督，偶尔，如果足够幸运，还能有一些自由时间。

66



在草棚下等待出售的奴隶。(North Wind Archives)

田间的奴隶生活艰苦，寿命较短。一些种植园主不愿在奴隶中鼓励自然的人口再生产，奴隶在艰苦的工作中死亡后，他们只是简单地换一批奴隶。一些人认为，他们最初对奴隶的投资要六七年可以收回，

此后的收益就是纯利润。也有种植园主宁愿输入替代奴隶，也不愿投资改善奴隶的健康与公共卫生条件以延长他们的寿命。

城市中奴隶的条件可能稍微轻松一些，因为他们的劳动与某种生意相关，例如木工，或与某个庆典相关，如赶马车。在这里，一种技能或才干，例如裁缝，不像收割甘蔗那样容易替代。在哈瓦那，一个例子是，一位贵妇人因她的一个年轻奴隶的语言模仿的天赋而对其十分偏爱，以致允许他记录诗篇与训诫，并经常将其当作养子看待，他就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1797—1853）。这个孩子长大后成了一名重要的诗人。

67

城市生活所提供的条件和在家庭中服务并不总是能使奴隶得到温和的对待。“奴隶总是在主人的监督之下，因此，他们更易于受到突然的惩罚与屈辱……这种情况对女性奴隶更加真切……”她们可能受到性虐待，或受到主人的妒妇的虐待而求告无门。（Patterson，175）

不论是在田间还是家庭中，也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奴隶都不会被当作人来看待，确实与白人不平等。奴隶被法律定义为既是人又是一种财产。他们因主人的需要而工作，也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卖掉。奴隶制是代代相传的，通常由母亲一边传下去，奴隶也可以像不动产的一部分被继承。当主人欠债时，奴隶就可能被卖掉。法典，例如法国的《黑奴法典》，被编撰用来保护奴隶——毕竟他们是可以获利的东西——但在欧洲各国之间，保护的水平不同，奴隶主并不总是遵守这些法典。

奴隶们发明了各种抵抗策略。这种反抗从毫不稀奇的手段，如破坏工具，用唾沫或尿弄脏主人的食物，到公然的抗命或反叛。一些奴隶以自杀来从其悲惨的生存条件下求得解脱。女奴隶用药草或植物使自己流产，而不愿生下长大后仍然成为奴隶的孩子。奴隶们努力保存他们的一些非洲文化传统。许多奴隶假装接受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但私下里仍然遵崇非洲传统的神。这种文化抵抗的结果，混合了非洲与欧洲传统元素的宗教出现了，包括西属加勒比的萨泰里阿教、法属

加勒比的巫毒教和巴西的康多姆波教。今天，这些信仰在全世界仍有上百万的信众。

逃亡奴隶的社区

许多奴隶通过逃跑以脱离，这些逃亡的奴隶被称为“马隆人”（来源西班牙语的 *cimarrón*，意为“逃走的人”），他们逃入森林或大山中。如果逃亡的奴隶被抓到，惩罚包括从砍脚到处死，主要看其试图逃跑的次数。一般情况下，结伴逃亡易于成功，并形成社区，这种社区以其儿时生活过的非洲村庄为模式，或以其简易的棚子或以他们在种植园居住的院子为模式。

68

圣者之路

萨泰里阿教混合了天主教与非洲的传统，奴隶皈依拥有天主教圣人品质的非洲神，由此创立了一位非洲—天主圣徒（African - Catholic saint）。但是，萨泰里阿教也主张神和灵魂能够通过人类在冗长的仪式之后来证明他们，在这个仪式上，其中一人为超自然的存在附体之用。许多基督徒相信祭司、萨泰里阿教牧师是魔鬼崇拜。萨泰里阿教否认这种观念，并坚持认为此教的目的是帮助别人。

萨泰里阿教专家米格尔·A. 德·拉·托雷（Miguel A. De La Torre）解释说：“萨泰里阿教是一个无组织的、实用性的宗教，它希望即刻的、有形的力量来处理生活中的难题……其中心不是对萨泰里阿教神的神圣力量的理解，而是关注宇宙力量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所运用。”①

① De La Torre, Miguel A. *Santeria: The Beliefs and Rituals of a Growing Religion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ch., and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pp. 189—190.



萨泰里阿教舞者在表演19世纪甘蔗种植园时代的宗教仪式。(William Luis 拍摄)



逃亡的奴隶是英勇的战士，他们建立的社区一直存留至20世纪。(North Wind Archives)

69

逃亡奴隶村庄的地点很典型地选择在森林的深处，并且通常是沼泽环绕。随着社区的成熟，逃亡奴隶能够发展他们的耕作农业，种植稻谷和蔬菜。他们种植树木，用棕榈叶搓制绳子，编织吊床。他们与走私者和海盗联系，并从其那里购买物品。

欧洲人对逃亡奴隶不断追踪，阻碍了女奴隶加入他们与世隔绝的社区，结果，一些岛屿上的逃亡奴隶绑架加勒比妇女。最终，与加勒比人的和平关系使得没有敌意的他们能够接近加勒比妇女。由于妇女的缺少，使得她

们在逃亡奴隶的社会中很重要。18 世纪 30 年代，逃亡女奴南妮（Nanny，1680—1730）在牙买加的蓝山山脉建立了地方自治体南妮镇，成了一个传奇性的战士。报道称其是如此的勇敢与强壮，以致她能用屁股挡住子弹，然后捡回去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尽管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但据信她从 1725 年至 1740 年领导着牙买加的逃亡奴隶。

牙买加的逃亡奴隶定居点可上溯至 1655 年，这一年英国接管了该岛，许多奴隶逃入山中加入逃亡奴隶和猎人已经组建的群体。逃亡奴隶们骚扰英国殖民者，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如在夜间偷袭种植园，天亮之前又消失在森林中。在这样的偷袭中，奴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女奴也经常被带走。英国当局与逃亡奴隶斗争超过了 80 年，一项主要的努力是放慢甘蔗种植园的发展。1739 年，当局最终决定停战，并与逃亡奴隶签订了一项条约，授予他们自治权，在山区为其划出 15 000 英亩土地，称为“科克比特地区”，同时，逃亡奴隶也同意不再接受新逃亡的奴隶，并帮助英国当局追踪脱逃的奴隶。1793 年，发生了第二次战争，但是这次英国当局使用从古巴购买的猎狗来追踪逃亡奴隶，结果 500 多名被抓住，并将他们从牙买加驱逐到了塞拉利昂。在牙买加，仍然有逃亡奴隶的后代将其残存社区保存下来。在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至今还有一些逃亡奴隶社区的遗存。

70

盐与糖：发展中的工业

到 18 世纪，糖在加勒比地区居于首位。糖业居于支配地位，并对巴巴多斯、牙买加和圣多明各作了定位。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糖成了珍贵物品，其价值与西班牙帝国生产的黄金与白银相当。

尽管甘蔗由哥伦布引种到加勒比地区，但直到 17 世纪 40 年代，甘蔗种植才成为种植园主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蔗糖革命的开端，这要归因于欧洲贪得无厌的食欲，尤其是在大不列颠：“对糖的嗜好……在英国增加很快。1700 年，英国人每人平均食用 4 磅糖，到 1750 年，每人对糖的平均消耗量翻了一番。”（Rogoziński，107）

英国殖民地的糖

巴巴多斯满足了对糖的需求。1664—1665 年，英国输入了 2 800 万磅的蔗糖（B. Wood, 47）。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从荷兰人那里学会了甘蔗种植与蔗糖提炼技术，而荷兰人则是从巴西学来的。荷兰人在巴西东北部定居，并成为成功的殖民者，他们进口并使用西非的奴隶。1656 年，葡萄牙人将荷兰人从巴西驱逐出去，荷兰人就带着他们的奴隶及甘蔗种植技术到达加勒比地区的岛屿，如巴巴多斯。巴西蔗糖生产的中断有利于巴巴多斯以糖为中心的产业，而且它发展起来并满足了需求。巴巴多斯蓬勃发展的工业增加了该岛屿的人口，到 1670 年，这里 166 平方英里的地方生活了 70 000 人，其中 75% 是奴隶，在白人中有超过 700 个主要的甘蔗种植园主。典型的种植园约 100 英亩大小，“40 亩种植甘蔗，40 亩休耕，其余 20 亩用于放牧、种植粮食和甘蔗苗圃”（E. Williams, 1984 : 113）。另外还有一座榨甘蔗的工厂和生产车间。

有限的土地和过度利用的土壤决定了巴巴多斯甘蔗占统治地位的短暂命运。到 18 世纪中期，牙买加成为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1740 年，牙买加一年就生产了 36 000 吨蔗糖。这些糖被送到英国加工，然后再分送到整个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牙买加生产的糖和朗姆酒都很受欢迎。牙买加成为英国糖的主要供应者，也使得种植园主变得富有。1759 年，英国获得了瓜德罗普，它成了蔗糖市场的一个竞争者。牙买加的许多种植园主居住在伦敦，并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由加勒比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向国王和英国议会游说。牙买加的种植园主获得了胜利，他们贸易保护的吁求是英国 1763 年取代法国回到瓜德罗普的一个原因。

法国进入蔗糖市场

蔗糖工业并不仅限于牙买加一地，圣托马斯岛和尼维斯岛也进入了蔗糖市场，另外还有马提尼克，但是最成功的竞争者是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一直到 19 世纪，该地注定要成为蔗糖殖民地的王者。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典型甘蔗种植园（Mark Jackson's Postcards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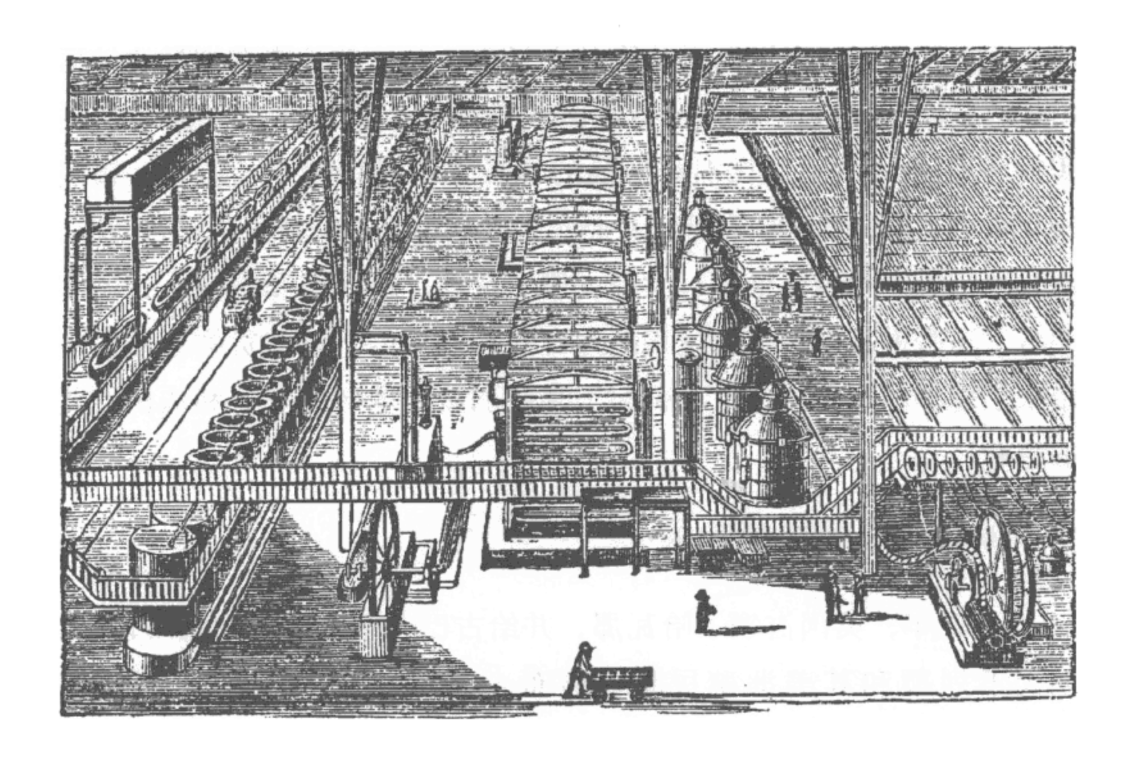
到18世纪50年代，圣多明各每年生产61 000吨蔗糖，而牙买加每年生产36 000吨（Klein，59）。棉花、蓝靛与咖啡的种植发展缓慢，奴隶与白人的人口数量增长也都比较缓慢，在80年代，法属伊斯帕尼奥拉的圣多明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而且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是被认为最有效率的蔗糖生产者。圣多明各有460 000名奴隶，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种植园，甘蔗种植园的数量超过800个。由于这里的土壤比牙买加或巴巴多斯的肥沃，在工人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圣多明各的产量是牙买加的两倍："法国蔗糖的成本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圣多明各与牙买加的平均出产为五比一。"（E. Williams，1984：122）因

此法国种植园主可以以低于竞争对手 10%—20% 的价格在加勒比地区出售蔗糖。据估计，18 世纪末圣多明各生产的蔗糖占世界总产量的 30%（Klein，90），法国对外贸易的 40% 由其殖民地产生。这一市场每年吸引了超过 1 500 艘船到太子港。圣多明各不仅与法国进行贸易，而且也与美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酒、咸肉、亚麻布和服装运到圣多明各，这些都是由种植园主和商人订购和购买的。这些货物给殖民者带来了奢华和富有的表象，引起了其在加勒比地区的邻居和法国同胞的忌妒。

19 世纪：古巴的加入

1762 年，英国占领了哈瓦那，并给古巴介绍来了新的贸易伙伴，如大不列颠和其美洲殖民地，遍布全岛的甘蔗种植园主购买的 10 000名奴隶也抵达古巴。已经存在的 70 个甘蔗种植园现在需要更多的劳动力，1791 年的海地革命成为古巴大量进口奴隶的催化剂。圣多明各退出了市场，古巴种植园主看到了填补这个真空的机会。法国种植园主与技术人员逃离海地涌进了古巴，带来了他们的技术。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种植园主害怕海地的入侵，跟随法国人来到了古巴。西班牙当局允许运送更多奴隶到该岛，并输入资本、机械和技术人员。

在前几十年里，他们通过蒸汽动力使甘蔗工厂现代化。1780 年至 1836 年，蔗糖产量从每年 18 000 吨增加到 113 000 吨。1840 年，牙买加释放奴隶使该岛甘蔗种植园的劳动力迅速削减，古巴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当 19 世纪中期蔗糖价格从每磅 4 美分上升到 14 美分，古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生产者，占市场总量的 29%。1870 年，古巴达到了它 19 世纪的最高峰：产量超过了 700 000 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41%。（Klein，93）



19世纪80年代古巴蔗糖厂内景（摘自 *Cuba's Struggle for Freedom*, by Gonzalo De Quesada and Henry Davenport Northrop, s. n. , 1898, p. 428）

在19世纪，欧洲发现了另外一种制糖的原料——甜菜。然而，古巴的制糖工业通过实施新技术来增加产量使蔗糖工业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包括在1837年修建拉丁美洲的第一个铁路系统，768英里的铁路使用到19世纪60年代。其他革新包括过滤甘蔗渣和使用机械化的容器接收榨出的甘蔗汁。在一个大工厂里集中管理蔗糖的提炼，称为"集中管理"，允许垦殖者、独立的种植者种植、收割自己的甘蔗，以加快生产进程。然而，在蔗糖工业取得成功之后，早期的工厂与其他岛屿上的一样依靠奴隶提供劳动力。

74

圣马丁的盐业

在圣马丁，盐业与糖业同等重要。在这个很小的岛上有几个盐池，最大的也即最著名的是大盐池，面积约一平方英里，几乎整个池子深约28英寸，由一圈围墙围着。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池水的表面温度由92°F上升至110°F，随着水分的蒸发，盐结晶析出沉淀。盐层的形成

在不同地方的池子所需时间不一，有的只要一周多点，而有的则需一个多月，最后形成盐块。届时，由奴隶、贫穷的白人和自由的有色人组成的成群的工人提着篮子收集盐块，他们趟着滚烫的盐水，赤足走在炙热的沙子上。一年中有 11 个月开展工作，1789 至 1961 年是产盐高峰期的年份，6 000—7 000 个工人同时在盐池中工作。

到 18 世纪末，这些盐床生产的盐运往荷兰的总计 200 000 吨。英国占领期的 1810 年，圣马丁的档案遭到了破坏，尽管无法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年份在这里工作的奴隶数量作出准确的估计，但在 17 世纪末到 1795 年奴隶制结束，约 50 000 名奴隶曾到达该岛（Sekou，115）。

随着奴隶的增多，他们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白人种植园主发了家，在加勒比地区从事蔗糖、烟草和盐贸易的商人也发了财。对种植园主和商人来说，奴隶是一种可靠的财富源泉。他们很难想象到近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源泉终结后会怎样。

第五章　美国、法国与海地革命（约1700—1850）

75　当欧洲人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时，他们的加勒比地区的财产成了有利条件。他们的军事策略在18世纪发生了改变，欧洲国家将战争放在远离其家门口的地方进行，欧洲的冲突现在将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到底。他们不再用海盗船攻击单独的商船或离开船队搁浅的无助船只，而是用大的舰队进行战争。七年战争（1754，1756—1763）就是欧洲重要利益相关国——英国和普鲁士——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结果。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英法之间的仇恨，在北美殖民地，英法就领土边界俄亥俄河产生争端，都对领土声称拥有权力。两国沿河布置军事力量，1754年战争爆发。战争还在欧洲、非洲海岸、印度、北美、菲律宾群岛和加勒比地区展开。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冲突是第一次全球性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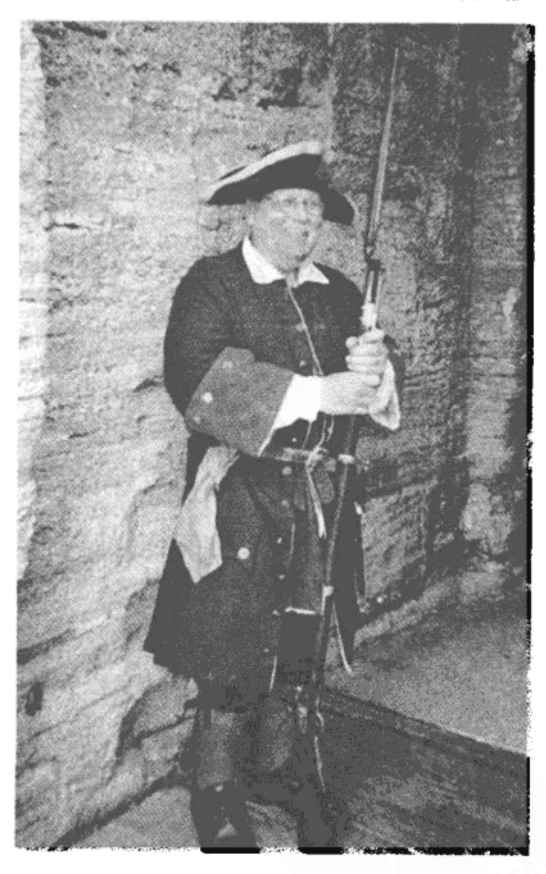
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1776—1783年，它导致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法国和西班牙支持北美殖民地对抗英国。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法国的彻底失败，这场战争接着点燃了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超过了欧洲以往的任何一次冲突，它帮助改变了加勒比地区的生活方式。

如果把哪一次冲突视作英国成为世界大国提前彩排的话，那么一场不大为人所知的战争则当之无愧，它有一个古怪的名字：詹金斯耳朵之战。

詹金斯的耳朵：1739年战争

76

一只耳朵引发了一场冲突，英国和西班牙卷入其中，冲突在加勒比地区的公海和佛罗里达海岸一带展开。这只耳朵是一位名为罗伯特·詹金斯（1700—?）的水手的。1738年，在伦敦的英国议会下议院，詹金斯出示了一卷干皮，并说那是他的耳朵。他声称自己的耳朵已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上尉胡安·德·莱昂·凡迪尼奥切成了薄片，在远离西班牙领地数英里之处，那位上尉登上了他的船。当时的很多观察员质疑詹金斯的证言，但他声称自己将耳朵在其领地上保存了7年。一些人认为他的耳朵根本没有掉，尤其由于他在听证会上戴着假发，并且没有摘下假发来展示疤痕。虽然如此，詹金斯的报告还是激怒了伦敦人，他们要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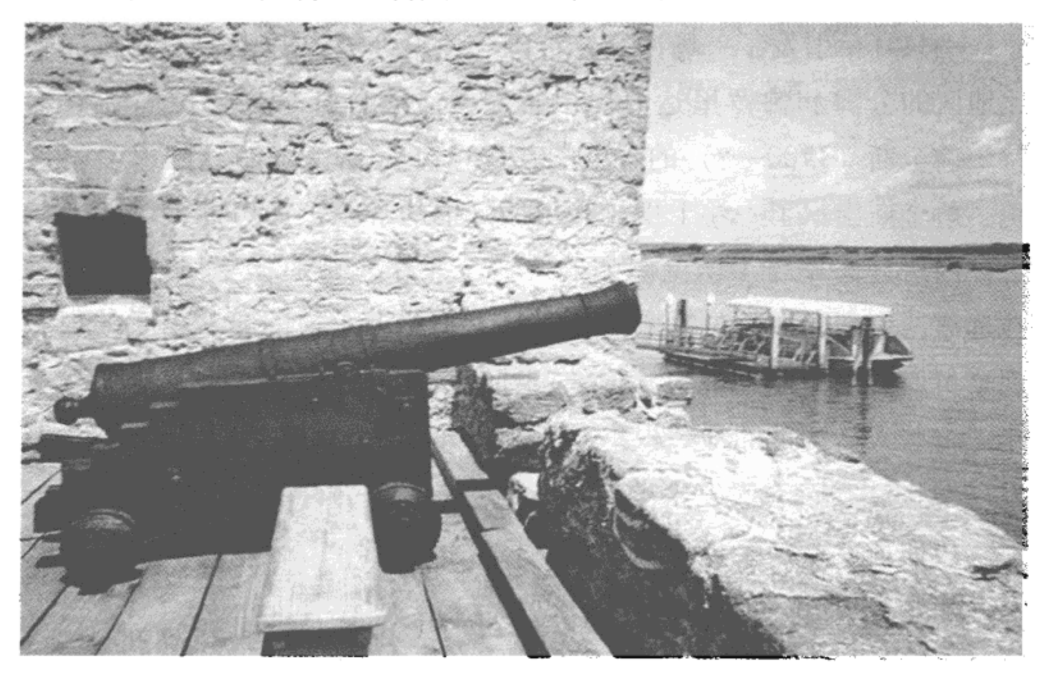
在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的圣马利诺堡扮演的约1740年西班牙人或西班牙的古巴士兵形象。（D. H. Figueredo 拍摄）

到来的战争全面引爆了西班牙与英国之间数十年来因加勒比地区的走私贸易引发的时断时续的紧张。西班牙当局雇佣西班牙的私有武装船来巡逻古巴、伊斯帕尼奥拉、牙买加和波多黎各的海岸，并负责攻击英国船只。英国声称西班牙人是海盗，他们抢掠运往英国的货物，因此，不论詹金斯的故事是否真实，它却足以使英西两国走向战争。

1739年10月23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派出8 000人、80艘船只到加勒比地区。这是英国第一

77

次指挥跨越大西洋的战争，它需要在本土、加勒比地区和美洲殖民地设立军官进行管理和服务（Syrett）。战场之一就是佛罗里达海岸，这两个欧洲国家为控制圣奥古斯丁而大打出手。



在1742年第二次詹金斯耳朵之战时，这些炮用来抵抗英国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他试图夺取圣奥古斯丁。（D. H. Figueredo 拍摄）

这次战争没有解决以往的争端，也没有改变欧洲国家之间的平衡：英国保有其美洲的殖民地，西班牙仍然占据着圣奥古斯丁。然而，它却证明了英国能够指挥和支持跨越大西洋的军事行动（Syrett），能够运用强大的武力夺取海外城市。这次经历激励了20年后的一项宏大的计划。

1762年英国占领哈瓦那

作为七年战争的一部分，英国与奥地利、法国、葡萄牙、俄罗斯帝国、西班牙、瑞典和萨克森作战，1759年夺取瓜德罗普岛，1762年占领马提尼克岛。1762年6月，英军抵达哈瓦那港，并进行了长达42天的围城。8月13日，14 000名英国士兵通过城墙缺口涌入莫罗堡，

同时步兵攻击城市的侧面。占领要塞之后，英军调转炮口向城市轰击，破坏了数量众多的宅邸。 78

起初，古巴人害怕且不信任英国，但是占领者证明了他们比西班牙管理者聪明，英国人很快进行了改革，首先取消了税收，这使得古巴人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占领古巴，而不是限制古巴，给古巴人以自由的感觉："英国开放港口，实行自由贸易，降低商品和奴隶的价格……使古巴人第一次尝到了与所有国家进行合法贸易的滋味。"（P. Foner，42）上千艘船只在这里卸下来自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货物，然后装载古巴的烟草和糖运回欧洲。天主教的控制放松了，新教和共济会——一种秘密的兄弟般的非宗教社会——被介绍进来。后者将证明其在19世纪独立战争中的重要性，这种来自共济会成员相互依赖的、巨大的、秘密的沟通网络，为古巴协同反抗西班牙人提供了支持。

随着英国奴隶贸易的增长，古巴糖业变得欣欣向荣起来，还有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古巴身份意识的增长，它不同于西班牙的特征，被称为"新古巴"（Cubanidad，意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这种意识的形成表现在几个方面。它是古巴民兵和志愿者在古巴官员与古巴市民领导者的带领下同英国斗争的副产品，他们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当局的指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许多古巴精英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兴趣与其祖国并不一致。在此后的100多年里，这种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的分歧日益增加，最终导致了古巴与西班牙契约的消亡。这种日益增长的新古巴意识被古巴作家马丁·德·乌略亚(1716—1795）进一步发展。英国刚刚离开古巴，乌略亚被问及是愿意做一个西班牙人还是做一个英国人，他回答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既不是西班牙人也是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古巴人。(Santovenia，202)

1763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英国对哈瓦那的占领结束，同时七年战争也随之结束。英国将哈瓦那交还西班牙，换得了佛罗里达，他们将佛罗里达当作北美殖民地的附属品。法国向英国屈服，将北美的殖民地除了转让给西班牙的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都转让给英国。

79

美国独立战争

七年战争证明了大不列颠的海军力量和军事能力，这一事实却使北美的爱国者烦恼，他们于 1776 年发动起义反抗国王乔治三世。北美人看到他们的斗争需要获得外国同盟的支持，于是他们转向法国和西班牙，而法国却因放弃了北美大陆的领地而乱了阵脚，西班牙因在哈瓦那受到攻击和失去佛罗里达而寻求复仇。在 1779 年，也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的三年前，古巴间谍在佛罗里达为北美的反叛者搜集情报，他们还帮忙从法国和西班牙运送金钱给殖民地军队。1779 年秋，西班牙路易斯安那总督贝尔纳多·德·加尔韦斯（1746—1786）率领几支远征军抵抗英国，并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和佛罗里达取得了胜利。1781 年，法国和西班牙保证了 1 200 本账簿的安全，相当于 3 亿美元（R. Hernández，24），这些是乔治·华盛顿和大陆军继续进行战斗的必需。西班牙人受到加尔韦斯的鼓舞，打算重新从英国手中夺回牙买加。

加勒比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英国和法国，他们的海军卷入了竞争，在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追逐中对抗，在海湾附近战斗。1778 年 9 月，法国舰队从马提尼克出发，夺取了第四十个英国岛屿多米尼克，它位于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之间。12 月，英国击败守军侵入法国的圣卢西亚。一支法国舰队后来从北美赶来，意欲驱逐英国人。10 天之内，70 多艘英国船只和 5 000 名士兵与法国 7 000 人的军队进行战斗。尽管组织了几次护卫海湾的英勇冲锋，但法国指挥官舰队司令让—巴蒂斯特·特奥德特伯爵，孔泰德斯坦将军（1729—1794）无法击败英军，被迫撤出。该年 7 月，法国的这位指挥官攻取了英国的格林纳达，并成功击败了英国海军的反攻。

1780 年，在马提尼克附近海面发生了几次非决定性的战役。1782 年英法之间在多米尼克海域发生了一次主要的遭遇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桑特海峡战役。在这场遭遇战中，由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1718—1792）指挥的英国舰队，被置于海湾与法国海军之间的狭小空间里，他们突破法军防线，并向被分隔开的法军舰只射击，俘获了

法军指挥官舰队司令弗朗索瓦—约瑟夫·德·格拉斯（1722—1788）。这次失败迫使西班牙和法国进行重新评估，然后放弃侵入牙买加的企图。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生在加勒比地区的最后一次重大战事。 80

乔治·华盛顿在巴巴多斯的短暂停留如何帮助独立战争

1751年冬，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兄弟劳伦斯（Lawrence）前往西印度群岛："华盛顿决定前往巴巴多斯旅行是为了加强与那里家庭的纽带联系。劳伦斯的妻子是弗吉尼亚显赫的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一员，与巴巴多斯一位地位稳固的居民格德尼·克拉克有联系。兄弟二人在布里奇顿（Bridgetown）的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这里可以俯瞰卡莱尔湾。在剧院进行的邀请晚餐，中间穿插了签约，焰火表演，在乡间骑马参观各种种植园，这些占据了乔治的所有时间。然而，劳伦斯（为肺结核所累）对当地医生的治疗并没有多少反应。乔治自己却染上天花，并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星期。天花给他留下伤疤，也给他了免疫力，使其远离18世纪最主要的灾难。后来，当天花夺去了大批为独立而战斗的人的生命，作为他们领导者的乔治却安然无恙。当疫苗研制成功后，他是第一个为其军队接种的人。"①

经济对独立战争的反应在整个加勒比地区都能体会得到。许多殖民者，甚至在英国的领地上，都同情美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同情他们反抗殖民经济的垄断。对古巴、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多黎各来说，西班牙与美国联盟签署协议，允许美国与法国船只到达西班牙的港口。在英属加勒比，短暂的封锁加上英国船无力向这些岛屿运送货物，导致了牙买加和安提瓜的饥荒和巴巴多斯的食品短缺。食品短缺影响了大多数人，如15 000名奴隶不幸饿死。（E. Williams，1984：226）另一方面，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也创造了一个加勒比地区商品的新市 81

① Kiernan, James Patrick. "George Washington's Barbados Connection." Americas 53, 3 (May/June): 5

场和一个热心贸易的伙伴。

然而，对西属加勒比来说，美国对英帝国的胜利有更广泛的政治和理念上的意义，它带来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殖民政权可以被它们的受压迫者推翻。

法国大革命在加勒比地区

1789 年回荡在巴黎街头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同样也响彻了法属加勒比。法国大革命从 1789 年延续到 1799 年，它点燃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伊斯帕尼奥拉以及港口城市圣多明各的反抗之火。法国革命的消息，就像欧洲和北美其他进展的消息一样，在巴黎的官方报告到达之前，通过旅行者传到了加勒比地区（Banks，198，219）。1789 年，法国国民会议宣布，所有白人一律平等、同样拥有财产权，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的总督欢迎这一消息。但是，在马提尼克，贫穷的白人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而富有的白人则支持法国王室。同样，在瓜德罗普，共和派与保王党人的分歧日益增长，保王党人经常策划谋杀共和派的官员。（Dubois，98）

其间，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黑奴在静静观察事件的发展，并等待自己的时机。“他们听说了大革命，并以自己的想象来解释：法国的白人奴隶已经起来，并杀死了他们的主人，正在享受土地的果实。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已经受到了鼓舞。”（James，81）

1791 年 3 月，来自法国的一个新总督和新军队恢复了马提尼克的秩序，结束了街头的斗争和乡间的小规模冲突。同年，巴黎的国民会议将国王赶下宝座，一年后，国王和其家庭成员被处决。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对此作出反应，宣布支持君主制，这一行为发出了从法兰西共和国独立出来的信号。瓜德罗普的奴隶发动起义，在杀死 23 名白人后，殖民当局宣布他们无罪，并解释说他们的行为只是反对保王党。这是岛上法国大革命支持者的解说，得到巴黎共和派的欢迎。

82

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支持君主制的种植园主寻求英国的支持。1794 年初，6 000 多人的英国军队侵入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圣卢西

亚，这一军事行动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1794年7月，1 150名法国人在谜一般的人物维克多·于格（1774—1826）的指挥下返回瓜德罗普，他是一位高效的管理者和无畏的战士。他召集了2 000名奴隶，与法国士兵一起迫使英国人退出瓜德罗普。于格派出间谍到邻近岛屿，鼓励奴隶反抗英国，当时在整个加勒比地区有90 000人的英国军队。

英国最薄弱的据点在圣多明各，受法国种植园主鼓励，英国首相派出20 000人的部队干涉1791年爆发的海地叛乱。1793年9月，英国军队从牙买加来到圣多明各，一年后，他们控制了圣多明各的主要港口。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战役，英国人不断受到海地军队的袭扰，他们使用游击战术。英国人耗尽了力量，无法增援，1798年，他们只得承认失败，并且与海地领导者杜桑·卢韦杜尔签订了合平条约。在圣多明各的5年，英国共有14 000人死亡，其中1 000人死于战争，其余则死于疟疾、黄热病、痢疾和其他疾病。

断头台与瓜德罗普

维克多·于格将断头台带到了瓜德罗普，在这里搜寻革命的敌人时，他带着断头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并宣判700多个叛国者死刑。断头台成为革命者异想天开的本质的一个象征。在法国，许多雅各宾派成员将法国大革命的敌人送上了断头台，当被以前的同僚指控为反革命时，他们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加勒比地区，断头台的盛衰反映了于格怎样设法废除奴隶制。1794年，于格支持废除奴隶制，并使与之一同抵抗英国人的奴隶获得自由。后来，他转变为主张逐渐解放奴隶的方法来确保岛屿经济的动力，维持国家的生产力。那些反对于格政策的自由人被于格强迫去劳动，具体期限未加说明。那些反抗者被指控为反革命，并被威胁推上断头台。

83

对于格来说，其政策的动机既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为了奴隶的自由，而是保持种植园正常运作的需要。于格意识到，如果没有奴隶的劳动，种植园将不复存在，因为使奴隶自由就要重新安置城镇、村

庄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工作，如木工。1802 年，当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劳力时，于格发现他毫无困难地实施了来自法国的新指令：恢复奴隶制。

维克多·于格离开瓜德罗普到南美大陆的法属卡晏（Cayenne），在这里，他作为一个殖民管理者的统治几近于暴政。他从一个解放者到压迫者的转变所体现的，正如一个学者所描述的，是一个“革命及其局限性的粗俗故事”，即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旦大权在握就变成了反动的官僚，热心于维持经济秩序。（Dubois，195）于格是 20 世纪加勒比地区革命的先驱，就像格林那达的莫里斯·毕晓普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受人尊敬。

海地：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18 世纪，圣多明各是加勒比地区殖民地中最富有的，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特立尼达伟大作家 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概括了殖民地财富的道路：“至 1754 年，共有 599 个甘蔗种植园和 3 379 个蓝靛种植园……在 1767 年，（海地）输出了 7 200 万磅粗糖、5 100 万磅白色染料、100 万磅蓝靛和 200 万磅棉花，以及数量众多的皮革、蜜糖、可可和朗姆酒……这些产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质优良。”（James，45）当时，殖民地出口占法国对外贸易的 40%，这种繁荣招致了所有国家的嫉妒，尤其是英国和西班牙，它是建立在产生裂隙的奴隶制基础上的繁荣。

圣多明各的白人种植园主生活奢侈，通常比欧洲相同阶层的生活更好，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其财富付出劳动，劳动、汗水和痛苦都由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来承担。他们像动物一样被运到圣多明各，然而，白人种植园主不承认也不感激奴隶的劳动，并且会因为轻微的错误而丧失人性地虐待奴隶，诸如像弄翻一桶水等。即使禁止种植园主对奴隶造成永久性伤害，也是因为那样做会减少奴隶的数量或破坏奴隶的劳动力，这是他们的基本劳动力来源和主要投资。

84

意识到保证奴隶健康和强壮的需要，1685 年法国颁布了《黑奴法典》。这部法典为人道地对待奴隶提供指导，详细说明奴隶们必须的饮食，必须接受宗教教育，对有不端行为的奴隶进行惩罚所施加的鞭数，对小偷的适度惩戒，等等。法典主张对那些蓄意使奴隶致残或杀害奴隶的种植园主进行惩罚，然而，这很少能够得到执行。数百起违法事件，甚至杀害行为都没有受到惩罚。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是，一个名叫勒·热纳的种植园主在 1788 年杀害了 4 名奴隶，因为他怀疑奴隶们企图毒害自己，他还折磨两名女奴隶，并指控她们是同谋。勒·热纳告诉他的所有奴隶，他将杀害他们。受到恐吓的奴隶将这一事件报告了总督，总督就此事件安排了一次听证会，该地区的白人种植园主代表进行作证。即使这样，证据仍然不利于勒·热纳，但是法庭投票支持勒·热纳，而且判决被指控的和作证反对他的奴隶打 50 鞭。这就是即使白人杀害了奴隶也不会受到惩罚的确凿证据。

奴隶不是不公平的消极接受者，一些人企图自杀，而另一些人则逃入深山老林，形成了马隆社区。几个奴隶试图杀害白人主人，1720 年，一个名为麦坎达（1715—1758）的逃脱奴隶，通过一系列秘密组织与种植园的奴隶进行联系，征集了 1 000 名奴隶用在食物中下毒的方法大规模谋杀白人。

种植园为麦坎达的人所渗透，他坚信这些地区的一些奴隶将加入反叛的行列。最后，麦坎达被出卖，计划失败，他被抓住且活活烧死，但是被麦坎达点燃的反叛之火却没有熄灭。1791 年，充满了被压抑的仇恨与怒火的奴隶们点燃了圣多明各的革命之火。

反抗的根源

1789 年，在圣多明各有两个特权阶层：有土地的特权阶层和白人特权阶层。前者基于其财富，后者则是因为他们是白人。那些白人，不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总是社会的中上层，不会处于社会的底层。富有的白人处于社会阶层的上流，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大白人”，在他们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之间的是贫穷的白人，被称为“小白人”。黑白混

85

血种人是自由的白人和黑人或生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后代，后者还指那些挣得自由与黑白混种人相似的非洲奴隶。在海地的社会中，尽管黑白混血种人很少被欧洲白人认同，但他们与两个人种都有血缘关系。

基于个人祖先的种族分类决定了一个人的肤色是“黑色”还是“白色”，但是，基本的观念是白人优于黑人。这是殖民地的基本形态，尽管贫困的白人和有色人为工作岗位或在小的生意中竞争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并不罕见。一些自由的有色人也拥有土地和奴隶。

黑人和有色人的数量远远超过白人。18 世纪 80 年代，共有28 000 个白人、22 000 个黑白混血人和自由的有色人，以及 460 000 名黑人奴隶。这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人口统计学上的不平衡为反抗和革命开出了处方。白人掌握着权力，黑白混血人认同拥有权力的人种肤色，倾向于站在白人一方。自由的有色人通常依据他们的忠诚来划分阵营。实际上，许多殖民地的国民军基本上由自由的有色人和黑白混血人组成。由于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武器，奴隶无法挑战白人，但是，很多人记得麦坎达，梦想着除去奴隶制的枷锁。

巴黎的革命

获取自由的机会来自大西洋的另一边。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不仅动摇了法国的基础，也动摇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基础。起义者召开国民会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废除封建制度，并宣称人人有权参与政府。巴黎的奴隶制度废止论者学会、黑人之友协会，紧急向圣多明各发送宣传物，要求让所有人一律自由平等。1790 年，一个黑白混血儿的领导者樊尚·奥热（1750—1791）作出反应，他领导了 200 名自由的有色人和圣多明各北部以前的奴隶起义，要求自由。奥热并不主张给奴隶平等，仅仅是给自由的有色人平等，此外，他也不要求从法国分裂出来，而仅仅要求被当作法国人一样对待。种植园主抓到了奥热，并将其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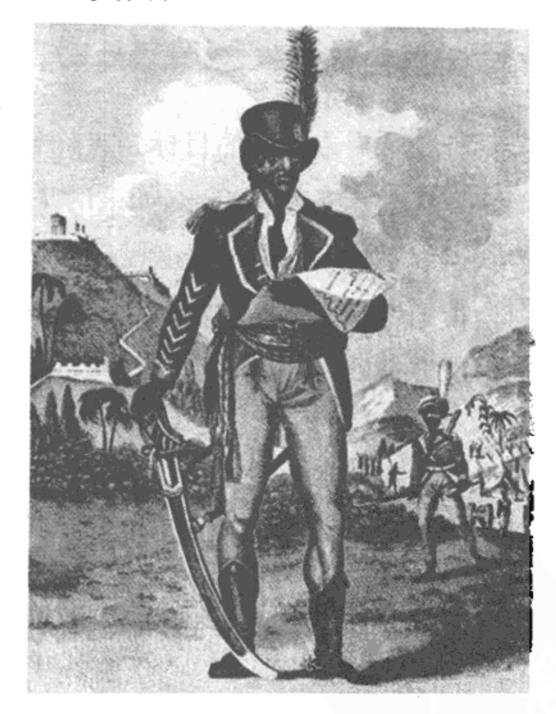
对奥热的处决促使巴黎的国民会议 1791 年通过一项法令，给予圣多明各所有自由的有色人以平等权力。然而，几个月之内，国民会议屈服于来自白人贵族阶层的压力，他们不支持给予自由的有色人以平

等权力，这表明国民会议对白人的福利比对所有人的权力更感兴趣。事实很清楚：不管法国大革命如何，白人仍然处于上层。法令的倒转引起白人与自由的有色人之间的内战，不和很快因奴隶的起义而加剧。

杜桑·卢韦杜尔的天才

争取自由、平等和圣多明各奴隶的权力需要一位坚强的领导，这个人就是杜桑·卢韦杜尔。杜桑·卢韦杜尔生于1742年5月24日，是一个奴隶的儿子，据说是一个非洲国王的继承人。他出生于一位较为宽容的主人巴永·德·利比泰迪家里，并受到主人的喜爱，允许他使用主人的图书馆。卢韦杜尔的监护人是一位牧师，他教卢韦杜尔读和写，并向他介绍拉丁语。这位年青人在20岁之前就成了一名医师，能够与主人谈论经典与哲学，这使得主人很高兴，以致允许他管理一个40英亩的种植园和12名奴隶。奥热死后几个月，起义爆发，卢韦杜尔在加入起义前，帮助其主人逃到了美国。

起义计划在1791年8月14至15日举行，领导者是巫毒教牧师布凯曼（？—1791）。他们举行了巫毒教仪式，据传闻在仪式上宰了一头猪，并饮了猪血，仪式之后，约200名参与者宣誓与白人斗争到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布瓦凯曼仪式，这一事件是现代海地历史的里程碑。



海地的解放者杜桑·卢韦杜尔（North Wind Archives）

仪式一周之后，50 000名奴隶参加了谋划，并开始进入圣多明各北部的种植园，他们焚烧了1 000个种植园，屠杀男人，强奸、杀害女人，并割下婴儿的头。白人种植园主惊恐万状，他

们从来没有想到黑人奴隶能够如此秘密大规模组织起来。几天之后，白人种植园主组织起来，他们趁着反叛者的疲惫和一些奴隶组织的解散发起攻击，杀死他们所遇到的任何黑人，无论是不是反叛者。他们将割下的黑人头颅挂在种植园周围的杆子上，数百名奴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很多被吊死在树上。挂在杆子上的其中一个人头颅是巫毒教牧师布凯曼的，他在1791年11月7日的行动中被杀。一封签名的邮件中写道："这是叛乱者头子布凯曼的头颅。"

革命活动持续了13年之久，其间，由来自不同集团的领导者领导，他们主要来自圣多明各北部地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经常共同战斗来对付奴隶，而许多自由的有色人则支持奴隶。前两个集团想保住自己的权力，维持奴隶制度，而黑人则希望废除奴隶制。在法国，保王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就是否保持君主制或给所有人以权力，在集会上和大街上相互不断斗争，然而，他们对保持圣多明各殖民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为自由而战

杜桑·卢韦杜尔的目标是废除奴隶制。在1791至1794年间，他组织并训练了一支有4 000名奴隶的队伍。据历史学家马丁·罗斯的研究，他获得奴隶的忠诚有三个途径：第一，医药知识使他能够医治士兵的伤口，帮助他们治疗疾病；第二，有关法国、西班牙和基本的拉丁语知识使他能够很容易与白人进行交流，尤其是搜集信息；第三是纪律（Ros，57—58）。黑人领导者训练他们的士兵忍受在炎热的赤道地带背着背包和武器长途行军，长时间忍受饥渴，服从、尊重指挥官。

88

海地革命是以巫毒教为起点的吗?

在海地的历史教学中，尽管布瓦凯曼仪式是最基础性的文本，仍有学者在探究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最初的报告是由法国人在布瓦凯曼收集资料后撰写的，在一些方面对白人表示同情，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支持奴隶。第一份报告出版于1814年，

由白人安东尼奥·达马斯撰写，他并未目睹仪式的过程，但是在对被抓获的奴隶审问中获得了一些信息。他描绘参与者为无知，并将仪式等同于原始宗教。19世纪的海地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避而不谈，不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拒绝巫毒教，就是因为他们是亲法分子，想让海地革命与法国的理想主义相一致，而不是与非洲传统相一致。

虽然如此，1853年一份由博布兰·阿杜安撰写的报告成为20世纪在海地出现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海地的儿童教育中，这一仪式都被当作是真实的事件。一些人认为非洲本来的信仰体系的影响了集会的重要政治意义。莱昂—弗朗索瓦·霍夫曼写道："那些拒绝的人……布瓦凯曼……认为只有在盲目的复仇和破坏的渴望中才可得到宣泄，布凯曼的乌合之众被训练成为西方式的正规军之后，叛乱才转变为革命。他们……（认为）种植园的奴隶，只有在监工的带领下才能高效率工作。"霍夫曼又写道："那些美化传说的人……尊敬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像得到神灵启示般地成为人的意志与本能的解说者。"

结论是，不论这种仪式是否发生，非洲的信仰都影响着奴隶对自由的渴求。①

西班牙和英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卢韦杜尔的反叛。英国担心整个加勒比地区发生类似的起义，他们支持白人种植园主，而西班牙则支持反叛行动。1793年，卢韦杜尔加入了西班牙人，并带领他们取得了几次胜利，夺取了几座城池。然而，1793年夏，法国在岛上的代表莱热—费利西泰·索托纳（1763—1813）宣布废除圣多明各的奴隶制。这是按照来自法国的指示做的，他们预计废除奴隶制将会骗取奴隶站在法国一边，并帮助其击败英国和西班牙的入侵者。这种鼓动起了作用，卢韦杜尔离开了西班牙去支持法国特派员索托纳。

89

① Hoffman, Leon - François. Haitian Fiction Revisited. Pueblo, Colo.: Passeggiate Press, 1999. pp. 159—180.

在卢韦杜尔的领导下，海地人打败了西班牙的军队，然后，1797年黑人领导者驱逐了英国入侵者。4年后，卢韦杜尔占领了该岛的西班牙的一边。作为伊斯帕尼奥拉的实际领导者，卢韦杜尔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协助自己统治，并起草了一部宪法，宣布对法国的忠诚，但给予圣多明各以自治权，他自任长官。

拿破仑的军队入侵海地

在法国，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掌握了政权，他对卢韦杜尔的声望和影响感到很不舒服。奴隶制的终结意味着圣多明各种植园经济的财政灾难，对此他深感忧虑，1802年，他命令22 000人的军队在其内弟夏尔—维克托·勒克莱尔（1772—1802）指挥下侵入殖民地，将卢韦杜尔赶下台，重新建立奴隶制。是年5月，拿破仑的军队在克里特—皮埃罗（Crête-à-Pierrot）的卢韦杜尔大本营包围了他。这位黑人将军投降了，并撤退到他的种植园。他预计酷热和地方病，像黄热病，将使入侵者疲于应付，那样会使他的军队处于有利形势，接下来将再次击败入侵者。然而，这次他的预想没有发生。

1802年6月，卢韦杜尔中了法国军官会谈的圈套而被逮捕。他被押上船，并被送到欧洲。这位黑人将军说道："你们打倒了我，你们砍倒了这个仅有的自由之树的主干，但深埋地下的数量众多的根将会速迅发芽。"（James，334）第二年春，卢韦杜尔死于法国监狱。

海地的胜利

尽管拿破仑不能声称在圣多明各取得了胜利，但在卢韦杜尔被捕不久，他的副将让—雅克·德萨林（1758—1806）寻求与法国入侵者进行暂时结盟。当黄热病使勒克莱尔的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而勒克莱尔本人也死于疾病，德萨林重举义旗。1803年12月，法国以失败告终，德萨林宣布圣多明各为共和国，并命名这个新国家为海地。为新共和国选择这样一个名称意味着强调欧洲人之前的印第安

人之根，因为“海地”是泰诺人对该岛的称呼。在世界历史上，海地革命是一非同寻常的事件，它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被用来压迫奴隶和其他非欧洲人的种族观念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欺骗并逮捕了卢韦杜尔，但这并没有用，他的精锐之师被海地人彻底打败。这是拿破仑的军队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失败。

1804年1月，德萨林和他的部下起草了《海地独立宣言》。宣言的主要作者路易斯·布瓦龙—托内勒（1776—1806）是德萨林的顾问和秘书。托内勒回顾了奴隶制的恐怖和白人对黑人犯下的虐待罪行，他宣称：“为了我们的独立宣言，应该用白人的皮肤作纸，用他们的头盖骨作墨水池，用他们的血作墨水，用一把刺刀作笔！”

在暴力时代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强权才能够统治。于是德萨林成为独裁者，并于1804年9月宣布自己为海地皇帝——雅克一世。他命令处决岛上的几乎全部白人，并创造了一种农业强迫劳动制度，他的命令遭到了抵抗，几名助理人员计划暗杀他。1806年10月17日，德萨林被谋杀，尸体被肢解。

91

海地的独立宣言

海地的独立宣言实际上可称为“海地独立法案”，它是在海地北部的戈纳伊夫（Gonaïves）签署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今天，1804年1月1日，本地军队的首长和军队的将军们

一起集会，将设法领导我们的国家走向幸福……要让外国知悉国家独立的决心，享有经过人民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自由……将军们已向后世子孙，向全世界，向永久断绝联盟的法国，向那些在法国管制下死去的人们而非现在活着的人宣誓。”①

分裂的海地

海地共和国在 19 世纪分裂：黑白混血儿对抗黑人，北方对抗南方。亨利·克里斯托夫（1767—1820）在杜桑和德萨林手下时就已成为将军，他宣布自己为北部海地的国王。他以前的亲密伙伴亚历山大·佩蒂翁（1770—1818）在黑白混血儿的支持下，统治了南方。

在北方，克里斯托夫重建了农业种植园制度，这有助于创造一个黑人精英的上层。他创造了海地的货币，邀请欧洲知识分子帮助推行教育改革，建造纪念碑和宫殿。在南方，佩蒂翁分配土地给以前的士兵，鼓励小块土地的耕种。他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支持委内瑞拉的解放战争，邀请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到海地南方。

1815 年，玻利瓦尔邀请佩蒂翁。玻利瓦尔解释了将他们的国家及其他南美国家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梦想，并要求佩蒂翁支持他们的事业，为其提供“金钱、军队、军火、船只和食品”。反过来，佩蒂翁要求玻利瓦尔释放他将要解放的国家的奴隶，玻利瓦尔答应了，并补充说，他采取此项行动是以佩蒂翁的名义，这样就可以为海地人在南美洲建立了一座自由的纪念碑。然而，佩蒂翁谢绝了这样的荣耀，他所想的只是为了奴隶的自由。历史学家格哈德·马苏指出：“佩蒂翁和玻利瓦尔达成的关于解放奴隶的协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亚伯拉罕·林肯将其声音传到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之前，他们两人在加勒

92

① Schutt - Ainé, Patricia, and the staff of Librair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Haiti: A Basic eference Book; General Information on Haiti.* Miami and Port - au - Prince: Librairi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1994, p. 66.

比地区的一个小岛上，宣告自由平等的原则适用任何一个不具姓名的奴隶。”（Masur，272—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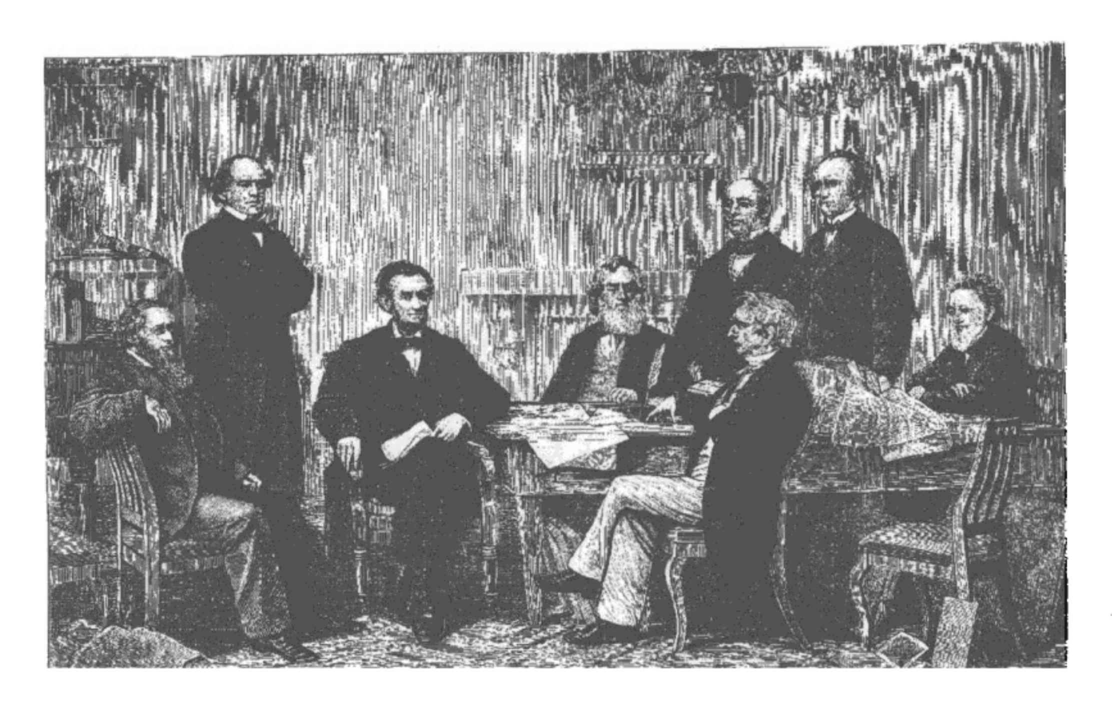
1818年，佩蒂翁死于虐疾，年仅48岁。一个名为让—皮埃尔·布瓦耶（1776—1850）的黑白混血儿僭取了总统职位。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布瓦耶能够在克里斯托夫死后的1820年将海地的南北方统一（克里斯托夫用银弹自杀，时年57岁）。布瓦耶追随卢韦杜尔的梦想，在两个国家占领下的伊斯帕尼奥拉创建一个国家，1822年，他驱逐了该岛一边的西班牙人。在19世纪20年代海地实现和平之前，有超过10万黑人在为创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努力中付出了生命。

美国避开黑人共和国

在海地革命期间，美国对这块殖民地保持着警惕，它愿意帮助法国种植园主平定叛乱，不是因奴隶们叛乱，而是因为他们是黑人。美国人害怕黑人叛乱蔓延到美国，在海地成为共和国之后，美国拒绝承认。1806年，美国总统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禁止与海地进行贸易，这种禁令一直持续到1809年。

1826年，美国不希望海地参加在拉丁美洲举行的国际会议，当第一次美洲各国间的会议在巴拿马举行时，没有海地的代表出席。美国坚持海地独立是非法的，不能承认黑人共和国是美洲的一部分。

同时，美国从海地革命中获益良多，革命期间的动荡迫使法国集中其经济与军事资源来对付海地，而放弃了它对大陆美国的权利要求。于是，1803年法国将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了托马斯·杰斐逊总统（1743—1826）。另外，美国还获得了阿肯色和密苏里、艾奥瓦、明尼 93 苏达、密西西比河、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部分新墨西哥、蒙大拿、怀俄明、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堪萨斯和科罗拉多。1862年，在亚伯拉罕·林肯任总统时，美国最终承认了海地共和国，并开始了热心的贸易活动。



在拒绝承认海地为自由的共和国多年之后，美国政府在亚伯拉罕·林肯任总统时的1862年承认了它。



第六章　奴隶反抗、废奴运动和独立战争（约 1700—1850）

从征服美洲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奴隶贩子、白人种植园主认为自己优于他们统治的较低等的人，首先是土著人，其次是非洲奴隶。在暴力和恐吓下，在欧洲政权的支持下，奴隶贩子、种植园主和奴隶主赚得盆满钵满，过着舒适的生活。只要他们是白人，有自由，甚至那些不富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优等的。 94

这是他们预想的亘古不变的生活道路，毕竟在圣经中也有奴隶，而且“他们生而为奴”在世界历史的早期就已存在了（Barnes，22）。但是，在征服加勒比地区的初期，就有一些人，如天主教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就曾质疑白人优于世界上的其他人以及把奴隶当作罪恶之身的观念。经过数个世纪，奴隶和其他赞同拉斯·卡萨斯的自由人一起或分别努力来结束奴隶贩子和白人种植园主所怀有的观念。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白人宗教领导者扮演了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开展废奴运动来终结奴隶制的角色，而奴隶抵抗的作用长期被低估。更加均衡地解释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终结需要重视废奴论者的努力、奴隶的抵抗和使奴隶劳动变得不再是必须的工业技术的进步，所有这些因素是解释 19 世纪中叶奴隶制的关键。

95

奴隶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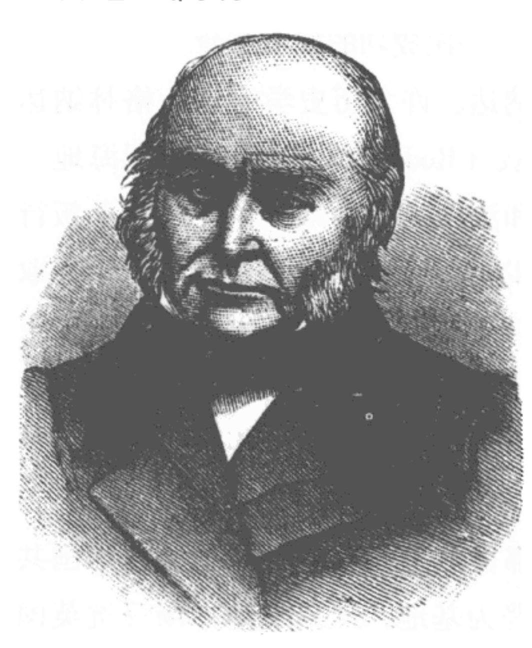
奴隶们进行了反抗，很多次的反抗。1735～1834年，整个加勒比地区至少有57起反抗事件，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起义，考虑到奴隶们饱受压迫，生活在几乎让人失去抵抗精神的条件下，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反抗发生在种植园和船上，有个人的反抗行为和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通常被白人监工解释为部分奴隶纯粹的无知或厌倦。学者和作家将这些归类于日常抵抗的普通标题之下，这些行为包括从破坏工具到以不良的工作习惯去弄脏主人的食物的任何事情。奴隶还通过短暂的或永久的逃亡方式来抵抗，由逃亡奴隶组成的奴隶社区，著名的有马龙镇，西班牙语称“帕兰克”，葡萄牙语称“基隆博”。拥有重要技术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奴隶偶尔会暂时消失在如闻名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小逃奴堡之类的地区，以此与主人讨价还价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大量的奴隶逃亡，同时形成了永久的奴隶社区，作为奴隶反抗的典型，最出名的是大逃奴堡。

早期的学者经常将日常的抵抗行为看作是黑人劣等的特征或缺乏基督教教养的结果（Bush，4）。但事实上，当奴隶说谎、欺骗主人，或没有完成分派的任务，原因经常是故意反抗，黑人妇女是日常反抗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在西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声称，女奴比男奴更麻烦……在所有部门的许多工作中女奴纷纷挫败她们的主人，以各种方式逃避工作，比如装病。”（Bush，53，62）下毒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些家庭奴隶由于要准备食物，他们有机会接近药品、厨柜、酒和其他家庭物品，他们能够下毒。尽管没有对实际的下毒事件进行估计——同样的症状可能是疾病的迹象而不是中毒——但种植园主生活在中毒的恐惧之中。

更多的自我毁灭的抵抗行为是自残和自杀。例子就是，女奴隶在她们的胳膊上、手腕上或腿上弄出伤口，敷上脏东西包扎起来以引起感染；船上的奴隶通过捆起四肢跳海，或抱着重物使自己沉海来自杀。

运奴船偶尔会发生反抗，但通常不会成功。最著名船上的反抗可能是发生在古巴海上“友谊号”的那次。1839年，一位来自塞拉利昂的王子，也即闻名的约瑟夫·辛克（约1813—1879）——一位西班牙人改换了他的真实姓名辛戈贝与54名来自塞拉利昂的土人及一位年轻女子组织了一次叛乱。奴隶们抓住了船上的六名船员，杀死了船长和厨师。在海上57天之后，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抓获。在随后的审讯中，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替奴隶辩护。由于奴隶被西班牙奴隶贩子非法贩卖，违犯了1807年订立的国际贸易法，这些奴隶被法院判为不合法，买卖无效。奴隶们赢得了官司，并于1841年11月返回非洲。

96



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成功地为奴隶进行了辩护，这些奴隶于1839年在“友谊号”船上进行反抗。

发生在陆地上的反抗更加常见。起初，在16世纪，许多种植园主没有认真考虑大规模的起义，因为当时的奴隶数量相对较少。奴隶与欧洲人的数量之比（10∶1）还不是非常的高，欧洲人可以获得几乎所有武器；另外一个因素是种植园主没有重视奴隶知识分子的能力。种植园主相信新的环境、奴隶互相之间的语言障碍、分散在不同的主人家、长时间的劳动和持续不断的恐吓威胁能够阻止奴隶起义。种植园主还使用其他方法在奴隶之间播散不和，如设立格斗场使奴隶相互对抗。有时让来自非洲敌对部落社会的成员在田间相互监督，这种安排会挑起往日的仇恨。

17世纪，甘蔗成为加勒比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的作物，潜在的武力冲突增加，因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收割甘蔗。在一些岛屿上，奴隶

与自由人的比率戏剧性增加，在一些场合甚至达到了50:1。这些岛屿成为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桶，一些殖民地开始采取步骤来减少反叛的可能。例如在巴巴多斯，种植园主建立一支强大的民兵组织，并支持英国军舰经常在该岛停靠。

97

然而，反叛终究还是爆发了。1649年、1675年和1692年，巴巴多斯相继发生了奴隶起义。1675年的反叛，全岛有100多名种植园奴隶参与，起义的消息被一名为福图纳的女奴隶泄漏，密谋者被抓住，一半被处决，其余被惩罚，然后被送回种植园。参与1692年反叛的奴隶超过300名，近1/3的参与者被处决。18世纪下半叶，牙买加发生了8起反叛行动；19世纪上半叶，古巴见诸报道的反叛运动有6起。如前章节所述，只有海地革命是世界现代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

最血腥的起义之一发生在格林纳达。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格林纳达的费东革命是海地革命在该岛的翻版（Rodriguez, 266），如同海地一样，自由的有色人、奴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卷入斗争。尽管反叛行动开始于1795年，其最早的发源可以追溯至英国人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格林纳达的1763年。英国强行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并禁止本土出生的格林纳达白人掌管公共事务。自由的有色人没有投票权力，不能在军队中服务，也不能获得土地。朱利安·费东（生卒年不详）就是其中一位自由的有色人。

费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都很熟悉。1795年，他寻求法国共和派代理人的支持，他们以瓜德罗普为基地，计划发动一场反抗英国的起义。费东任革命队伍的总司令，这支队伍包括7 000名奴隶（该岛的奴隶总数为14 000名）及以近200名白人和自由的有色人。令英国军队和民众惊奇的是，3月1日费东占领了3个村庄，迫使殖民者逃回首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费东的军队占领了除首府以外的格林纳达所有地区。

1796年6月，英国人攻占了费东的营地，迅速处决所有黑人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支持费东的白人被流放到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岛屿。费东消失了，这还是一个待解之谜。反叛给英国造成了近300万英镑

的损失，白人的种植园被破坏，并使英国在该岛创造一个蔗糖殖民地的计划落空。1796 年之后，格林纳达的殖民者集中发展小型农场，并彻底抛弃了种植园经济的观念。

20 年后，英国在他们认为平静的巴巴多斯面临着另一场大规模的起义。1816 年，复活节起义席卷了该岛的南半部，起义的领导者是非洲奴隶巴萨。起义持续了三天，500—1000 名奴隶付出生命。暴动迫使伦敦的英国当局劝说该岛的统治者和地方议会实施善待所有奴隶的政策。1825 年，该岛的议会通过了《巩固法》，允许奴隶拥有财产，有权向法庭作证、降低奴隶赎身的费用。 98

反叛的特征

非洲的新来者，也即刚被贩卖出国的奴隶，比在加勒比地区出生的奴隶——土著黑人更愿意反抗，组织起义。在海地革命中，新来的奴隶在非洲多为参加战斗的武士，他们在抵抗欧洲军队和地方民兵的军事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活动能为反叛带来灵感和组织途径。奥比巫术和巫毒教牧师对他们的集会拥有一种神秘的影响。他们组织集会，强迫保密。宗教的超脱现世的自然力，允诺死后返回非洲，鼓励公开反叛，因为信教可以善终，来世在非洲自由地生活，而不是做奴隶。

基督教也对叛乱的形成起了帮助作用。一名 19 世纪的牧师写道："基督教不赞成奴隶制度，在《新约圣经》中并没有言及：奴隶制是一种良好的和令人向往的关系，或是一种宗教为了良好的社会而创立……确实找不到一种提示去证明，基督或他的传道者创立了奴隶制，或他们将奴隶制视为一种良好的、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Barnes，341）同时，许多种植园主引用《圣经》中的章节来证明奴隶制度的正确性，对《圣经》断章取义来解释他们的政治与经济需要。1831 年，牙买加的叛乱发展出了浸信会奴隶教友的集会，他们以《圣经》尤其是保罗的"一个人不服务于两个主人"的言论为根据。对基督徒奴隶来说，耶稣是仁慈的主，他能给人自由和永恒的生命。种植园主是罪恶的主人，他们偷窃奴隶的生命。在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种植

园主指责传教士鼓励奴隶反叛，反过来，这更激励传教士支持通过严厉的方法废除奴隶制，这样反叛活动才会被彻底消除。例如，1831 年牙买加的叛乱，300 名奴隶被匆匆审判之后绞死在蒙特哥贝（Montego）公共广场。

99

关于废除奴隶制（反奴隶制）的文学作品

到 18 世纪末，废奴文学开始在英格兰和美国东北部地区出现，然后传播到整个加勒比地区。印在报纸和船舷侧的废奴文学，也称为反奴隶制文学，它致力于一个政治目标：结束奴隶制。然而一些废奴论者写作是出于脱离奴隶制的需要，他们一旦获得自由，就另谋生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最著名的著作或许是欧劳达·埃齐亚诺写的自传《欧劳达·埃齐亚诺生平传奇》(1787)。

第一次写作的一个奴隶的故事中的主角完完全全就是作者自己，埃齐亚诺是个非凡的人物，他为自己赎得了自由。他视航海为科学探险活动，并以此为题材写成自传体小说，出版后在其有生之年销售数量巨大，成为 18 世纪的一本畅销书。他死后给孩子留下了一笔约 15 万美元的遗产——按当时的标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埃齐亚诺约 1745 年出生于今天的尼日利亚，约 11 岁时，他和他的姐姐被奴隶贩子抓走，两人从此分离。他 12 岁时到达英格兰，然后被转运到巴巴多斯，在那儿他目睹了奴隶像牲口一样的买卖；奴隶与其朋友和家人被白人殖民者活生生地分开。



埃齐亚诺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为自身赎得了自由，并且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Schomburg Center for Research in Black Culture,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埃齐亚诺被带到了弗吉尼亚，在那儿他被卖给了一位皇家海军军官。这位军官给他取名为古斯塔夫斯·纳萨，这是通常的做法，即通过不使用奴隶原有的名字来隐藏他们的身份。埃齐亚诺作为这位军官的私人奴仆参加了七年战争（1754 或 1756—1763）。在英格兰，这位军官允许埃齐亚诺上学学习读写。令埃齐亚诺吃惊的是，这位军官后来将他卖给一位上尉，上尉将他带到蒙特塞拉特，在那儿他又被卖给了一位教友派（Quaker）商人。

100

埃齐亚诺跟随这位商人走遍了加勒比地区的岛屿，他开始做买卖并攒了 40 英镑，这笔钱也是他能够赎得自由的数额。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返回英格兰，先是做一名理发师，然后去做了水手。他在地中海地区航行，1772 年到北极探险，也曾与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岸度过了一些时光。1783 年，他帮助废奴主义者格兰韦尔·夏普（1735—1813），1787 年，他被任命为“商店代表”，负责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在塞拉利昂再安置而进行远征的供应。埃齐亚诺意识到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计划不足，以及许多白人组织者的贪污行为盛行。当这些意见公之于众时，他却遭到了斥责，并被从其岗位上调离。远征失败后，埃齐亚诺被证明是清白的。

围绕这段经历，埃齐亚诺开始有目的地写回忆录：“奴隶贸易使我不幸的同胞遭受悲惨遭遇，这又将激起人们的同情。”（Equiano, iii）为了出版他的回忆录，他向废奴主义者寻求资金支持，他的赞助人包括威尔士王子和约克郡公爵。回忆录一出版，埃齐亚诺即通过演讲和讨论在整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推广自己的作品，使之很快成为畅销书。该书在英国重印了 8 次，后来又在美国出版。1792 年，埃齐亚诺与一位英国白人妇女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之后，他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中去，用自己的书和亲身经历来宣传废除奴隶制度。埃齐亚诺于 1797 年去世。

埃齐亚诺的故事有力地谴责了包括奴隶制在内的所有不人道行为，描绘了 18 世纪非洲人的生活场景，为人们提供了其第一次到加勒比地区的旅行见闻。埃齐亚诺对其改宗基督教的说明是一个宗教文学的完

美例证。该书的文本结构十分紧凑，埃齐亚诺的角色形象动人心弦：可爱、富于想像、谦逊。他是这样结束其自传的："只有那些令我们变得更善良、更聪明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Equiano, 255)

玛丽·普琳斯的著作《玛丽·普琳斯的经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她自己的讲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且易于令人接受，这些著作作为反奴隶制的小册子于1833年出版。玛丽·普琳斯1788年出生于百慕大，她在百慕大和安提瓜的盐场工作，盐场的化学物质损害了她的双脚。1826年，她嫁给了一个自由的黑人，但作为奴隶，她仍旧被其主人约翰·A. 伍德控制着。主人对她进行肉体虐待，经常剥光其衣服进行毒打。1828年，伍德和妻子到英格兰旅行时带着普琳斯，玛丽·普琳斯借机逃脱，并在伦敦的摩拉维亚人的教堂中找到避难所。玛丽·普琳斯将她的故事讲给一位诗人雷弗恩德·汤姆斯·普林格尔（1789—1834），他对普琳斯的讲述作了编辑整理。回忆录从个人的角度讲述了奴隶制的恐怖，同时这也是奴隶反抗的一个证据。学者桑德拉·波茨特·帕克特认为，故事呈现了"个人自由……作为道德与法律上的权利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就像与生俱来的权利一样"。(Paquet, 32)

普琳斯和埃齐亚诺的故事包含了强烈的、由英国宗教经典《天路历程》（1678年）唤起的宗教动机。该文本经常作为英格兰新教的布道基础，这有助于推动废奴运动。

奴隶制的证言

经过了几代，对奴隶遭遇的认识已被大打折扣，或被降到了最低。在重塑历史的进程中，奴隶被描述为只是被动行事，而非积极参与者。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奴隶的故事被普遍地认为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现在的重点是对白人主人和奴隶的证言进行考察。

"如果学者想知道奴隶的内心和秘密的想法，他们必须研究奴隶的证言。但是，由于奴隶不知道主人的内心与秘密的想法，

历史学家也必须研究白人的证言。白人和黑人都没有垄断真理，都没有揭开对方生活的面纱，或者说都没有弄清由肤色和种性界定的痛苦与幸福……因此，不论我们是关注奴隶还是主人，我们必须系统地研究黑人和白人两方面的证言。”①

19世纪的反奴隶制运动

102

18世纪90年代，废奴主义者通过1787年在英格兰成立的“实现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和1788年在法国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的努力游说，最终促成了奴隶贸易的终结。英国的社团对奴隶在殖民地的生存条件进行调查，并访问了在运送奴隶航线上工作的20 000名海员，以证明在海上发生的野蛮行径和海员及奴隶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由圣公会和教友派信徒组成的社团断定，奴隶制完全与上帝的意愿相背。

法国的组织成员相信，法国正通过实施给奴隶以平等权利的政策向世界树立一个典范。黑人之友协会通过传播废奴主义文学和举办演讲，宣传雇佣劳力做特定的工作比蓄养奴隶更加经济。1790年，该协会首次在巴黎的国民会议中安置代表，但国内的混乱、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使得对推进奴隶制的终结并无实际效果。1794年，该协会获得了胜利，国民会议废除了奴隶制。然而胜利是短暂的，1802年，奴隶制得到了重建。

同一时期的1807年，英国通过了法律，结束了奴隶贸易。英国人试图说服葡萄牙与西班牙人也放弃奴隶贸易，但没有成功。这两个国家坚持认为，由于英国失去了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并且对发展大种植园不再感兴趣，所以英帝国不再需要奴隶。据他们的看法，结束奴隶贸易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毫无痛苦的决定。

1810年之后，废奴运动改变了策略，由提倡改善奴隶的条件、生活、劳动转变为支持彻底释放奴隶。1823年，反奴隶制协会在伦

① Blassingame, John. Introduction to *Slave Testimony: Two Centuries of Letters,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xiv.

敦成立，该协会以保护奴隶免受非人道对待和制定逐渐释放奴隶的计划为宗旨。20年代，英国议会批准法案，同意给予奴隶宗教实践的时间，保证奴隶家庭成员团聚，减少肉体惩罚，使奴隶通过自己攒钱赎取自由更加容易。

英国殖民者反对这些法案。牙买加的种植园主注意到，这些法案的实施将会使他们在与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竞争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声称，西班牙种植园主将会继续苛待他们的奴隶以增加生产量，而英国种植园主则不得不考虑奴隶的生存条件而受到束缚。不管种植园主如何反对，废奴主义的浪潮愈来愈猛烈。最后，1823年，议会通过《奴隶解放法案》，结束了英国所有领地上的奴隶制。该法案包括了一个折衷法案，以抚慰加勒比地区的种植主，给他们一个由奴隶制转变为自由制度的五年过渡期。

103

废除奴隶制的时间	
1792	法国（到1848年止，奴隶制的重建与废除有几个反复）
1794	海地
1807—1808	美国和英国废除奴隶贸易
182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24	西班牙
1833	整个英帝国
1848	丹麦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地
1848	圣马丁岛
1865	美国
1873	波多黎各
1886	古巴
1888	巴西

Based on several sources, including: Sekou, Lasana M. *National Symbols of St. Martin. St. Martin: House of Nehesi Publishers*, 1996, 1997; *Williams, Eric.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1984.

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反奴隶制运动是在本地发起的。不像英国政府，西班牙政府不支持废除奴隶制。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知识分子和废奴主义者以文学为武器，奴隶制的不人道在作品中受到谴责，如1839年由古巴的安塞尔莫·苏雷亚斯—罗梅罗创作的小说《弗朗西斯科：甘蔗种植园》、《乡村的快乐》和1867年波多黎各的亚历杭德罗·塔皮亚—里韦拉创作的戏剧《混血女》[①]。1867年，也是来自波多黎各的塞贡多·鲁伊斯·贝利韦斯（1819—1867）撰写了一篇光辉的提纲——《废除波多黎各奴隶制的方案》来反对奴隶制。古巴经济学家何塞·安东尼奥·萨科（1797—1879）提出一个结束奴隶制的方法，即从西班牙输入白人劳动力来逐渐替代奴隶劳动，将来要付酬雇佣以前的奴隶。萨科相信，自由劳动力的经济激励将对整个经济体有利。他建议欧洲工人移民加勒比不仅有经济上的目的，也有种族上的目的，正如他所担心的，古巴可能变成一个“非洲化”的国家。由于受到英格兰的压力，西班牙开始考虑废除奴隶制，支持奴隶制的古巴人害怕西班牙人可能最终向英国人屈服，他们游说美国获取该岛。这些计划没有结果，19世纪晚期，古巴人为独立而发动起义，并解放了残余的奴隶。这使得西班牙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实施逐渐废除奴隶制的计划，1873年，波多黎各奴隶制结束；1886年，古巴奴隶制结束。 104

加勒比地区的华人

种植园主希望在奴隶制结束后，奴隶转化为有偿劳动者来维护种植园经济，这种想法在一些地方实现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原先的奴隶离开种植园到城镇中去追求新的生活，许多人做生意，或在商店、旅馆和饭店中打工。蔗糖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很快增加，解决的办法是输入东印度人和中国劳工。

---

① 该戏剧于1867年在波多黎各搬上舞台，讲述了一位肤色较浅的穆拉托女人和她的白人恋人的悲惨爱情故事，起初它并不受欢迎，因为它主张废除奴隶制并批评奴隶主和贵族阶层。它描绘了奴隶未来的幸福生活，系反奴隶制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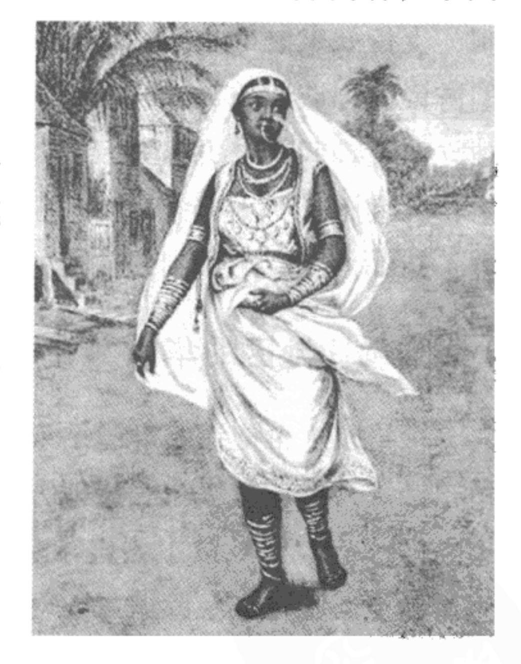
中国移民渴望避开家乡的动荡，向往更好的经济机会，他们满足了这种劳力需求。约25万中国移民来到加勒比地区，约12.5万人去了古巴，1.8万人去了英属加勒比，其余的分散在法属的岛屿和苏里南。(Lai，3)

典型的中国劳工要签订一个5年或7年劳动契约，以支付雇佣者提供的路费和服装。标准的劳动契约包括一项退出条款，允许劳工在给契约代理人支付路费后终止契约，这笔费用按契约规定的服务时间折算。例如，一个劳工第一年终止契约要偿还75美元，第二年终止契约要偿还50美元，以次类推。协议偶尔也会提供预支的薪水给劳工在中国的家庭，大约20美元。

中国劳工的生活并不比非洲奴隶的生活好多少，承包商担任了奴隶主的角色，虐待很普遍，因为承包商认为中国工人比欧洲白人低等。19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中止了对古巴的移民，直至1877年，中国与西班牙谈判改善中国工人的待遇。作为新协议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劳工想离开之时，即可以自由离开。强迫性的诱骗工人也被禁止。

105

中国劳工最初在甘蔗种植园工作，到19世纪末，他们开始移入城镇，并贩卖小商品来供应种植园的工人和乡间的穷人。中国人以合算的价格出售少量的指定商品，使顾客的支出尽可能减少。当顾客没有足够的现钱时，中国的货主经常允许记账销售，这些账目直到顾客偿还后消除，当时也有中国店主借钱给他们顾客的例子。这些商店的特征是长时间的服务，从黎明到半夜，工作由店主的亲属或关系密切的朋友来完成。



19世纪晚期特立尼达的东印度妇女（摘自 *Down the Islands*, by William A. Pat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7, frontispiece）

东印度人的到来

1845 年，225 名东印度人——第一批来自印度的劳工——到达特立尼达，东印度开始移民，至 1915 年，东印度人移民总数达 143 000 人；到 19 世纪末，牙买加约有 39 000 人。和中国人一样，东印度人获得渴望经济机会，同时也受到英国的鼓励，以减少印度某些特定地区的失业，如北方邦；契约规定，服务期男人为 5 年，妇女 3 年。契约可以续签，工作 10 年之后，劳工可以获得资助返回印度。



作为奴隶劳力的替代，东印度人被招募来在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中劳动。（摘自 *Down the Islands*, by William A. Pat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7, p. 207）

劳工在甘蔗田和棉花农场中工作，以农场为生，并最终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离开社区直到他们作为农业经营者创建自己的社区……达到经济上的独立。随着独立的完成和村庄的建立，印度人的社区建立了”（Tikasingh, 12）。在他们的村庄里，东印度人坚持他们自己的传统，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 106

在特立尼达，东印度人作为一种经济的推动力量出现在 1870—1900 这段时间。之后的 20 年，东印度人从 1900 年拥有 5 万英亩土地到 1921 年上升到 9 万英亩。在牙买加，一小部分东印度人以种植水稻挣钱作 107

为独立的手段。当离开甘蔗种植园，他们就在沼泽边建立村庄。东印度人种植甘蔗，收割后卖给蔗糖厂；种植水稻供自己食用，也能挣得额外的收入，因为水稻的秸秆可以用来养猪。这些收入可供东印度人付房租和小块土地的租赁费用，并以此保证他们的收入。在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留在乡下的东印度人不与其他人交往。在特立尼达，这种情况在20世纪才发生了改变，东印度人为政治权力而挑战非洲裔特立尼达人。

莫兰特贝起义

奴隶制的终结并没有立刻改变牙买加的社会关系。象征奴隶制的人种和种族的界限继续成为解放后社会的特征，白人仍旧居于经济与政治的上层发号施令，歧视盛行，黑人在经济上上升的机会受到限制。例如，在英属加勒比有75万名释放的奴隶，但在所谓的自由允许下几乎没有能做之事，如不能参与负责征税会议的投票，征税需要拥有一定的财产，有些事对绝大多数已经解放的奴隶来说是不可能的。1863年，牙买加的人口总数有44万人，而仅有1 457人是符合条件的投票人。这些不平等导致的紧张与愤怒在整个加勒比地区一触即发。

1865年10月7日，在莫兰特贝进行的一场司法诉讼中，一位引起混乱的黑人被逮捕，一群人去保护他，并将其从民兵手中救了出来。一位名叫保罗·博格尔（1822？—1865）的黑人牧师被怀疑煽动人群，于是，10月8日，8名黑人去逮捕他，他们被博格尔的支持者拦截住，并被缴了械。博格尔将官员们送回莫兰特贝。

10月11日，博格尔和400名以枪、矛和刺刀武装起来的士兵进入城镇，并与地方治安官发生了言语冲突，民兵向博格尔和其人员射击，而他们则以投掷石块还击，并迫使民兵和地方官员退入政府驻地。激于义愤，博格尔的人员点着了房子，并将试图逃离的人打死。

反叛者洗劫了莫兰特贝，烧毁了城镇中心的所有建筑，释放了监

狱中的所有囚犯。反叛者转入乡村，并发誓杀死该地区所有的白人。人们预期这将是一场类似海地革命的起义，牙买加全岛陷入恐慌之中。总督爱德华·艾尔（1815—1901）迅速派遣军队来到该地，所见黑人不管是否参与叛乱，一律射杀。博格尔被抓住并被杀害。在20世纪，牙买加歌唱家鲍勃·马利在其歌曲《如此多的事情要说》中对受到殖民当局镇压的博格尔表达了同情。时至今日，博格尔在牙买加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在10月11日的起义中，22名平民和官员被杀，34人受伤。在艾尔的报复中，约900名所谓的反叛者被处决，叛乱者及其同情者的1 000幢房屋被毁。（Cundall，245）

英国总督还逮捕了乔治·威廉·戈登（1820—1865）——一位苏格兰农场主的儿子——和一名奴隶，就是认为他在起义中起了作用。戈登是一位会计师，也是博格尔的朋友。据说，戈登在教区内富有影响，他参加了这一地区为穷人服务的浸信会，而且他还是议会的一员。他同情农民的处境，批评总督和城镇官员。戈登曾称总督为独裁者，鼓吹以武力将其从位置上赶下来。10月23日，总督对戈登进行了审讯，陪审团裁定他犯煽动莫兰特贝叛乱罪，也不顾叛乱发生时其不在该地区的事实，判处其死刑。戈登的尸体一直吊在被焚毁的政府前的杆子上，直到腐烂。

总督艾尔的残酷镇压使得英国议会很不高兴，他被撤了职，该岛由国王直接统治。然而，英国报纸将反叛视作由不守规矩的黑人领导的暴动进行宣传。这给种族主义者政客以口实，他们声称牙买加的黑人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自我管理。此后近一个世纪，莫兰特贝起义一直被视为犯罪行为，而不是一次政治起义。直到1949年维克·里德的小说《新的一天》，才将这一事件以反抗的观点加以叙述。该小说使学者们对1865年10月的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认识到莫兰特贝起义为牙买加的居民播下政治自觉意识种子的重要性，这个自觉意识的种子到20世纪中期才开花结果。

109

西班牙的独立战争

由于西班牙宫廷的政治分歧，1808 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1748—1819）将王位传给其儿子费迪南德（1784—1833）王子。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热心于扩张他的帝国，并且意识到西班牙宫廷的分歧，于是进行干涉，强迫国王将王位让给拿破仑的弟弟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1808 年 5 月 2 日，西班牙人奋起反抗拿破仑，这场战争就是闻名的独立战争，又称为半岛战争。战争的结果，西班牙王权失去了对美洲帝国的有效控制和勾通。西班牙殖民地形成了独立的团体进行自治。1813 年，西班牙在英国的帮助下击败法国入侵者。这场战争导致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的产生。1812 年宪法建立了议会政体和有限的君主权力。然而，在法国干涉时期，殖民地学会了不依赖宗主国指导自我生存，到 1824 年，西班牙帝国成了历史。

最忠诚的岛屿

18 世纪末，经过经济与管理方面的改革，西班牙的统治比以往更加有效。然而，拿破仑的入侵给西属美洲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也暴露了殖民地与宗主国正在恶化的紧张关系。西班牙没有能力直接管理殖民地，而法国军队的占领却在整个西班牙帝国引发了一波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只剩下波多黎各和古巴属于西班牙。

殖民地迅速相继脱离。委内瑞拉 1811 年宣布独立，其后哥伦比亚 1819 年、秘鲁 1921 年宣布独立；1821 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建立了中美联合省；厄瓜多尔和墨西哥 1822 年脱离。1824 年，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彻底击败南美的西班牙军队。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经常问为什么波多黎各和古巴继续忠诚地留在西班牙。部分答案在于奴隶制度，尤其是古巴的这种情况。奴隶制度

阻碍了古巴对国家主义的渴望，因为当地的农场主害怕海地式革命，它依赖西班牙军队来保护适当的奴隶制。西班牙王室的拥护者纷纷逃到了古巴和波多黎各也影响了它放弃立即独立的决定。

这种移民的结果是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人口戏剧性地增加。在波多黎各，人口从18世纪80年代的15万增长到19世纪初的40万，其中的80%的人员在乡下安顿下来。他们包括400名科西嘉移民，按照1815年的王室特许令被允许进入波多黎各，这是用来吸引来自欧洲其他地方而非西班牙的定居者。他们定居在波多黎各西南部部分山区的乡村，种植咖啡、甘蔗和烟草；至19世纪60年代，该岛上7/10的咖啡种植园属于科西嘉的家族（Casablanca，19）。特许令给予移民特定的利益，包括给每名家庭成员分配有6英亩土地，每名奴隶有3英亩土地，并成为西班牙公民的权利。这些利益使得新来者不支持反叛西班牙的图谋。 110

因独立战争产生的难民来到殖民地的岛屿上，他们也不愿支持反叛。由于1809年西班牙授予的政治权利，独立运动更加缓慢。拿破仑1808年侵入半岛，西班牙公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政府由军队或公民组成，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与入侵者斗争。1809年，加的斯的团体宣布波多黎各为一个省，而非殖民地，以寻求联盟对抗拿破仑，它在西班牙宫廷或议会有足够的代表。该岛的代表帮助起草了1812年自由主义宪法，并要求万一西班牙被法国打败，波多黎各有权宣布独立。这种示意使得波多黎各人认真考虑是否要与宗主国分道扬镳。

然而，这些政治自觉是短期的。1813年，拿破仑失败之后，西班牙的君主制重建，立宪政府被解散。回到专制主义是导致许多西班牙殖民地寻求独立的关键因素。西班牙仍然动荡不定，1820年，恢复了王位的费迪南德七世被迫恢复以前的立宪改革措施。君主与政治精英的斗争在继续，1823年，国王再次取消了立宪的成果。国王派遣总督和总司令带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到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些总督和将军们统治着这些岛屿就像国王一样。他们的粗暴鼓励了渴望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

111

帝国在波多黎各的统治

考虑到北美大陆的独立战争将会传播到波多黎各，西班牙对其采取了一手给予其权力，而另一只手将权力拿走的办法。当宣布波多黎各为一个省时，国会又命令总督就像被围困的状态下一样进行统治，如果需要可以限制个人的自由。另外，西班牙国会为波多黎各制定了特别的法律，取消其立宪的权利，并迫使波多黎各人为西班牙偿还50万比索，以补偿拿破仑入侵时期对宗主国造成的损失。

从1822至1837年，军人总督的统治异想天开且冲动（Wagenheim，54）。总督米格尔·德·拉·托雷亚实行3B政治（baile，botella，baraja，即跳舞、喝酒、玩纸牌），在其任职期间，鼓励跳舞、喝酒和赌博，以使波多黎各人从政治活动中转移开。别的总督也制定富于心计的法令，如惩罚解雇懒惰工人的主人，禁止留八字胡和山羊胡，晚上11点之后禁止黑人出门，禁止人们迁移和在全岛旅行、禁止印刷关于独裁和暴政等方面的作品。在19世纪30—40年代，至少三种主要的报纸被西班牙当局禁止。

此间，几个谋反者因被出卖而遭逮捕，其中包括玛丽亚·梅塞德斯·巴尔武多（1780—1825），她是一名波多黎各妇女、西班牙裔加勒比人的独立先锋之一。巴尔武多将自己的家作为讨论独立问题和传播革命传单及作品的中心，分发在南美和美国出版的反西班牙的宣传物。1842年，总督德·拉·托雷亚将她驱逐到古巴，后来她在流放中死去。

波多黎各废奴运动的兴起

随着基于小型农场和多样化作物——包括咖啡、玉米、水稻、烟草和甘蔗——的发展，波多黎各的地主没有必要蓄养大量的奴隶，该岛的奴隶数量不像加勒比地区地区其他岛屿的奴隶数量那样庞大。

1827年，岛上的总人口包括162 311名白人和34 240名奴隶；1872年，这里有618 150名白人和31 635名奴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巴1817年拥有279 689名白人和239 694名奴隶，而1867年则有833 157名白人和344 615名奴隶。（E. Williams，1984：291）

112

古巴的早期革命文学

古巴第一份公开寻求独立的报纸是《哈瓦那人》，1823—1824年在费城，1824—1826年在纽约出版。该报纸由古巴流亡者费利克斯·巴雷拉神父编辑出版，然后偷偷运进古巴，并在古巴产生了轰动。西班牙政府谴责《哈瓦那人》的出版，并禁止其流通。统治者甚至批准对巴雷拉实施暗杀。

该报纸因激发古巴寻求打破殖民统治而受到赞颂。巴雷拉也因于1826年撰写了第一部在美国出版的拉丁美洲小说《希科坦卡尔》而为人称道，它批评了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①

胡利奥·比斯卡龙多（1830—1889）是一位居住在西班牙的波多黎各人，于1865年创办了西班牙废奴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分支遍布西班牙，并出版了一份反奴隶制的杂志——《西班牙废奴主义者》。1867年，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委员会到西班牙游历，恳求废除奴隶制。其中的一名成员塞贡多·鲁伊斯·贝尔维斯撰写了一份反奴隶制的宣言《废除波多黎各奴隶制方案》。在这些爱国者的齐心努力下，西班牙1873年决定废除波多黎各的奴隶制。

古巴反抗的火种

在古巴，第一次对西班牙的反抗发生于1809年，谋反者起草了一部宪法，规定选举权基于个人的财产，天主教被认定为官方宗教，希

---

① Leal, Luis, and Cortina, Rodolfo J. Introduction to *Jicoténcal*, by Félix Varela. Houston: Arte Public Press, 1995, pp. xiv - xv.

望藉此吸引富有阶层和保守的古巴人支持。这个图谋没有得到土地所
113 有者的支持，他们害怕独立会使奴隶制终结。1810—1811 年，受海地革命的影响，古巴发生了一次由奴隶计划的反抗，结果反抗被镇压，组织者何塞·安东尼奥·阿庞特（？—1812）——一位自由的黑人木工——被处决。在整个 19 世纪 20 年代，包括大量奴隶的同谋者遭到残酷镇压。

19 世纪出现了三大政治运动：改革、自治和合并。改革运动计划为本岛争取与所有国家自由贸易的权利，维护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使古巴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19 世纪 30 年代，改革运动放弃支持奴隶贸易，而允许维持奴隶制。自治运动以英国在加拿大建立的政体为范本，促使了奴隶制的终结，与西班牙分享平等的政治权力，享有贸易自由、出版自由和举行政治集会权利。自由论者不支持与西班牙正式决裂。

合并主义可能是整个 19 世纪最大的运动。受奴隶主的鼓动，合并主义者希望古巴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制州，这样就可维持奴隶制。可考虑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美国购买该岛，价格从 1848 年的 1 亿美元变为 1854 年的 3.1 亿美元；另一个途径是支持军事行动，由一位古巴领导人接管该岛，宣告独立，然后并入美国。这是古巴最值得纪念和最受争议的爱国者之一纳西索·洛佩斯（1797—1851）将军的最初计划。

洛佩斯将军：独立还是合并？

洛佩斯出生于委内瑞拉，与富有的古巴家族有联系，他在南美洲与西班牙军队一起同西蒙·玻利瓦尔作战。在古巴，洛佩斯与富有家庭的女儿结婚并成为其家庭一员，同时他为合并主义者的理论所吸引。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洛佩斯开始就是一名合并主义者，而非一般认为的是后来为争取完全独立而加入斗争的。在美国南方，他是一位受欢迎的人物，在那儿他被视为一位支持古巴加入美国成为奴隶制州的重要人物。当时的出版社，尤其是美国南部 1898 年的赫斯特（Hearst）杂志社的前身，鼓吹以战争对抗西班牙，将洛佩斯描绘成一个浪漫的冒险家。

1848年，在古巴参与了一次对抗西班牙政府的阴谋之后，他逃到新奥尔良，在那儿他密谋侵入古巴。1851年，洛佩斯带领400人在古巴北部登陆。他们的军队包括古巴的爱国者，也有美国人，他们都是参加过1846至18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的富有经验的老手。在古巴登陆后，洛佩斯被抓住并被判处死刑。1851年，在哈瓦那，洛佩斯被公开行刑前的几分钟，他大声叫道："我的死将不会改变古巴的命运！"

114

古巴旗帜的升起

洛佩斯携带到古巴并第一次在古巴开起了这个岛国的旗帜。洛佩斯设计了旗帜，它由一个由共济会使用的锥角符号和蓝白相间的条形组成，锥角中心嵌着一颗星。这面旗帜由洛佩斯的同谋者米格尔·特尔比·托隆（1820—1857）的妻子埃米莉亚·特尔比·托隆（1828—?）缝制。那一颗单独的星象征古巴的主权，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觉察到，那颗星意味着要与美国国旗上的其他星合并在一起，这是洛佩斯计划的反映。洛佩斯被处决17年后，在十年战争期间与西班牙政府作战时，古巴选择了这面旗帜作为这个岛国的旗帜。

海地侵略圣多明各

多米尼加共和国，后来称为圣多明各，最初的独立斗争不是反对西班牙，而是反对其邻居黑人的海地共和国。1795年，西班牙通过《巴塞尔条约》将伊斯帕尼奥拉的2/3让给了法国，条约令西班牙与其欧洲盟友一起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尽管原先法国军队击败西班牙军队并侵入西班牙时，西班牙输给了法国。西班牙后来提出以法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去的圣多明各（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部分）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法国同意了。然而，法国政府逐渐要求对该岛的权力。杜桑·卢韦杜尔决定占领代表法国的圣多明各，并在1801年付之行动。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宣布废除奴隶制。

1802年，拿破仑皇帝企图对海地进行再征服并重建奴隶制时，在

该岛的法国军队与多米尼加的武力合并一处，驱逐卢韦杜尔。1805年，卢韦杜尔的继承者，海地皇帝德萨林企图侵入圣多明各，但被击退。当德萨林退入到海地时，将沿途的几个城镇付之一炬。17年后，海地总统让—皮埃尔·布瓦耶带领12 000人成功地武装占领了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一方。

115 海地占领圣多明各从1822年持续到1844年。布瓦耶立即释放了约9 000名奴隶，并分配给他们从西班牙种植园主那里得来的土地，这些种植园主逃到了古巴和波多黎各。他强行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关闭了美洲最古老的大学——圣多明各大学。

从海地统治下独立

1838年，富有的西班牙—多米尼加人在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1813—1876）组织了一个名为三位一体会的秘密社团，其目标是获取独立。秘谋者寻求与反对总统布瓦耶统治的海地政治改革派结盟，当黑人共和国的发展迫使布瓦耶流亡后，他的继任者里维埃·埃拉尔企图监禁三位一体会的谋反者，迫使杜阿尔特逃离该岛。1844年，105名多米尼加爱国者签署了《东部宣言》，要求从海地统治下独立。这一要求未被海地政府接受。接下来的20多年里，海地指挥军队对抗新形成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在20世纪，这段侵略历史将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用来煽起反海地主义的火焰。

40 000名海地士兵参加战斗以对抗15 000名多米尼加人。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海地的军队并没有得到其同胞的支持，他们害怕冲突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内部分裂阻碍了海地总统进一步的统一斗争，以致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来对抗反叛的多米尼加人。

西班牙关注海地

从海地独立出来后的1844—1861年，佩德罗·桑塔纳（1801—1864）和布埃纳文图拉·巴埃斯（1812—1884）两位多米尼加总统轮

流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每个人的主要目标是权势和财富，他们急切关心的是海地人的再次入侵，害怕国内骚乱会夺走他们的权力。1861年，桑塔纳邀请西班牙吞并这个共和国，西班牙照此做了，并从古巴和波多黎各调来20 000名士兵协助。多米尼加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派出于对桑塔纳的忠诚，支持西班牙的吞并；另一派则认为对自己国家的再殖民是耻辱，尤其是因为这是由他们的多米尼加同胞发动的。

116　支持者希望政治稳定，并希望西班牙以平等的立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但西班牙将这块新得到的土地当成一个难以控制的殖民地，实施专制，对出版物进行检查，禁止新教传播，关闭共济会的分部。西班牙计划奴役多米尼加黑人并将他们运到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谣言迅速流传。

第一次反抗西班牙的行动发生在1863年，这引发了一场内战。两年后，桑塔纳寿终正寝，西班牙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退，冲突随之结束。战争使国家变得千疮百孔，很多城镇被破坏，农业完全陷入停滞。然而西班牙的失败却再次肯定了多米尼加的主权，并在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激发出自豪感。多米尼加的胜利给海地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会招致失败。战争也给波多黎各和古巴的独立斗士带去了一个信息：西班牙终将被击败。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战后的恢复期，地方首领培育了个人主义的统治，他们团结地方武装，并且控制着他们的区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种个人主义的领导模式就是众所周知的“考迪罗主义”，即效忠于强力的政治人物，这些地方领导者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考迪罗”。

19世纪多米尼加的总统就是典型的最强力的地方“考迪罗”。很多多米尼加的“考迪罗”使用游击战术抵抗西班牙人，将侵略者驱逐出去。他们招募地方青年，依靠熟悉的地形，并不与其他地方的领导者联合。这种策略使得地方领导者权力强大，无需首都或国家的帮助即可实施统治。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掌握了权力的“考迪罗”热心于积

累自己的财富，攫取个人利益，不顾公众与国家利益。直到20世纪建成了国家的道路系统后，多米尼加共和国才充分发展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实现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权益。

这些独裁特征并不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所特有的，在古巴和海地，铁腕人物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而加勒比说英语的地区在自治时期或独立后，则略有不同，或许独裁较少。



第七章　波多黎各、古巴和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1850—1900）

117

19 世纪 60 年代，西班牙很重视古巴和波多黎各，高额的赋税和关税是其巨额财富的来源。岛上殖民者的特权阶层感到在经济上受了压迫，然而尚未寻求与其祖国西班牙决裂。在古巴，殖民者害怕与西班牙决裂会使奴隶贸易终结，也引起像海地一样的黑人暴乱；在波多黎各，殖民者害怕美国会占领该岛。这里还有一种西班牙的文化认同：西班牙属岛屿的宗教是天主教，语言为西班牙语，其传统与家庭的价值观念根植于西班牙的传统。

岛上的居民心怀不满，他们希望进行关税制度改革，在西班牙的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渴望与西班牙的国民平等。然而，西班牙并未打算进行改革。1868 年，革命推翻了伊莎贝拉二世女王（1830—1904），一个新国王——萨伏伊的阿马德奥（1845—1890）被推上王位。西班牙新政府自身的政治并不稳定，不同的意见之间相互争斗，来自这些岛屿的带有严厉批评的请求很困难，批评对象包括增加军事权力、关闭出版业、禁止政治集会、增加赋税与关税。

西班牙对评判表示遗憾。

波多黎各

19世纪50年代，波多黎各人对西班牙的统治深感不满，并开始谋划革命。除了对不公平的赋税与高关税不满之外，波多黎各人希望结束所有他们认为是西班牙暴政的事物，除奴隶制外还包括记录本制度，它使受压迫者世代不能翻身。1848年，西班牙总督认为这项制度非常合适，在这种制度下，受压迫者生来就得在种植园劳动，没有种植园主的允许不得离开种植园。记录本必须随身携带，劳工必须在记录本上记录自己的行动：停止工作的时间、离开种植园的时间和返回的时间。通过记录本，种植园主可以了解劳工所做的任何事情。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被视作西班牙暴政的明证。

118

一个委员会到西班牙游说，请求废除奴隶制。名为塞贡多·鲁伊斯·贝尔韦斯的委员提交了一份反奴隶制的宣言：《废除波多黎各奴隶制方案》。在这篇宣言中，他描述了奴隶制对经济、社会与家庭结构的不良影响。他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波多黎各的农业当时基于小农场，而不是像古巴和牙买加的大种植园，因此奴隶制已没有必要；更进一步的区别还在于该岛的白人远多于奴隶：白人为328 806名，而黑人仅有31 635人。鲁伊斯·贝尔韦斯相信，废除奴隶制后，那些以前的奴隶可以当作工人来雇佣，并保证有偿劳动将成为劳动的激励措施，这样将会增加生产力。

拉雷斯呼声

一位名为拉蒙·埃梅特里奥·贝坦塞斯（1827—1898）的内科医生反对奴隶制，于1850年代创立了废奴协会。他和其他富有的协会成员通过协会购买新生的奴隶，并将他们解放为自由人。贝坦塞斯创作的反奴隶制的宣传册激怒了政府，西班牙当局将其流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他创作了一份自由宣言，即闻名波多黎各的《自由人的十条戒律》，要求废除奴隶制，要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的权利。当贝坦塞斯准备返回波多黎各时，却引起了一次反抗，他

们的同谋者被出卖。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遵守中立条约，没收了运送贝坦塞斯的船只和为准备起义的武器。

1868 年 9 月 23 日，在没有贝坦塞斯在场的情况下，起义还是发生了。革命者接管了拉雷斯镇，并竖起了旗帜，波多黎各的第一面旗帜。临时政府建立了起来，奴隶制被废除，一堆令人仇恨的簿子被付之一炬。当起义者推进到另一城镇时，西班牙国民军突袭了他们，经过一次战役，起义者被击溃。 119

被称为“拉雷斯呼声”的反叛仅持续了一天，但它对波多黎各和西班牙却有持久的影响。用一个民族主义作家的话来说，这一天使得“西班牙人变成了西班牙人和波多黎各人”（Corretjer，61），它象征着波多黎各在政治上与其祖国的决裂。

起义的后果

起义结束了波多黎各的奴隶制。1869 年，作为对“拉雷斯呼声”的反应，为平息波多黎各人对殖民当局的不满，西班牙政府宣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日程。最后于 1873 年，奴隶被宣布解放，尽管他们还是被要求继续为其原先的主人劳动三年。

在“拉雷斯呼声”之后，波多黎各平静下来。改革开始实施，这给予了该岛一种自治意识。波多黎各的领导者和知识分子讨论是寻求自治，还是融合到其祖国西班牙中去。

1887 年，新政府出现了倒退，认为渴望独立自由的波多黎各人在密谋反对政府，因此逮捕了数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狱中受尽折磨或被杀害。是年 11 月，总督计划处决著名的自治主义的领导人，但是受到了来自波多黎各民众的反对，其邻岛圣托马斯则向西班牙国会（Spanish Cortes）报告，国会将总督解职。

运动继续朝着自治方向推进，1897 年，西班牙接受了折衷的方案——波多黎各领导人路易斯·穆尼奥斯·里维拉的构想。波多黎各被给予省的地位，波多黎各也能够参与地方选举。这个方案是由西班牙派出军事上的总督，他只能在承认和支持波多黎各选举出来的官员

的前提下进行统治。波多黎各被允许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甚至可以拒绝同西班牙进行贸易。

古巴的十年战争

120

古巴的命运完全不同，1868—1878 年，战争摧残了古巴岛。在 60 年代之前，古巴人强忍着不参与公开对抗西班牙的斗争，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驻守在此，二是古巴种植园主贵族害怕战争会结束奴隶制。由于在蔗糖业工作的黑奴都是单身，这将会使整个蔗糖工业陷入险境。古巴人没有反抗，而是试图通过做西班牙国会的工作来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并结束高额关税和赋税，但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

亚拉呼声

1868 年 10 月，听到波多黎各拉雷斯起义的消息，古巴的种植园主在奥连特省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反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亚拉呼声”，由富有的种植园主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1819—1874）领导。12 000 名“曼比斯”暴动者被组织起来，当起义扩展到古巴的中心地区，一部宪法诞生了，有代表性的议院组织起来，塞斯佩德斯被选为武装共和国的总统。穷苦的白人、自由的黑人、黑白混血儿、奴隶和华人移民加入了反叛的队伍。非洲裔古巴人安东尼奥·马塞奥（1845—1896）被称为“青铜巨人”，他与多米尼加人马克西莫·戈麦斯（1836—1905）两位将军英勇机智，队伍依照他们的策略进行战争。戈麦斯是位战略家，而马塞奥则是活跃的指挥官，在他们两位的领导下，到 1873 年，“曼比斯”控制了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

然而，至 70 年代中期，内部分裂阻碍了“曼比斯”前进的步伐。临时政府的保守派成员反对戈麦斯向哈瓦那进军的大胆计划，他们还害怕马塞奥在非洲裔古巴人中日益扩大的声望。对戈麦斯管理的革命政府的争论迫使其辞职，1874 年，戈麦斯被西班牙的军队杀死。

1877年，西班牙向古巴派遣了一位好斗的军事领导人——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1831—1900）将军，并将军队的数量增加到70 000人。在首都，西班牙志愿者创建的辅助正规军的武装力量也有近20 000人。1877年10月，马丁内斯·坎波斯俘获了共和国新总统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835—1908）。马丁内斯·坎波斯开始停战谈判。

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反对停战，在与马丁内斯·坎波斯的会谈中，非洲裔古巴将军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寻求古巴独立，西班牙的领导者并没有同意。在马塞奥的领导下，战争又进行了数月，直到古巴的军队被西班牙的军队击败。马塞奥被允许离开古巴去牙买加。

传奇英雄：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和佩鲁乔·菲格雷多

121

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古巴十年战争的领导者，体现了古巴废奴主义者的反抗品格。塞斯佩德斯是一个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在殖民地时代早期，其祖先即定居在古巴。他是一个奴隶拥有者，他把自家的奴隶解放，以便他们能够加入反抗西班牙的斗争，听从他的命令。当他宣告起义时，他宣布结束古巴的奴隶制。稍后，为使意欲脱离西班牙统治、但并不支持废除奴隶制的白人种植园主满意，他缓和立场，主张逐步结束奴隶制。1780年，作为武装共和国的总统，塞斯佩德斯故地重游，再次宣布废除奴隶制。

他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佩鲁乔·菲格雷多（1818—1870），是古巴贵族的一员。得到塞斯佩德斯召其从军的消息，菲格雷多立即离开了自己在巴亚莫的家，声称："我将加入塞斯佩德斯，与其并肩战争，不成功则成仁。"

随着塞斯佩德斯掌管起义军，菲格雷多协助其控制巴亚莫地区。他在马背上，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非常流行的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书写战地歌曲，当返回的2 000名西班牙士兵夺回巴亚莫，城中的百姓唱着歌撤到乡村。

1870年，菲格雷多被俘后被判处死刑。西班牙将军的信使说，

如果菲格雷多承诺不再反对西班牙就可以得到自由，菲格雷多回敬道："在我将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

菲格雷多战地歌曲成了现今古巴的国歌，塞斯佩德斯则被当作古巴的创建者。

1878 年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是古巴军队中的分离主义者在 8 月份发动叛乱，并与西班牙军队产生了几次冲突。然而，古巴的种植园主上层并不支持这次叛乱。西班牙的宣传机构称，叛乱是一场种族战争，非洲裔古巴人想建立一个类似海地的共和国，这些分离主义者被劝服。10 月，起义失败。

十年的冲突造成了约 3 亿美元的损失（Thomas，269），西班牙和古巴所遭受的人员损失合计达 20 万。

122

1878：伊比利亚人统治下的和平

1878 年，得之不易的和平降临古巴。主要成员来自中产阶级的自由自治党创立，该政党热衷于古巴自治，同时主张古巴应该继续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其成员主张扩大古巴人的权利，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拥有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自治主义者还主张废除奴隶制，这一主张直到 1886 年才实现。到那时，许多奴隶已经获得了自由，不是在独立战争时造了反，就是因为参加冲突而被西班牙政府大赦。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蔗糖工业实现机械化，蔗糖价格下跌，欧洲发展甜菜糖工业，最终使奴隶制度走向终结。为使蔗糖生产集中化，种植园主取得了大块土地，修建并扩大了铁路系统。1881 年，首都设立了电力与电话服务。

这一时期，西班牙对古巴和波多黎各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前者更加专断，而对后者则给予更多的自由和宽容。古巴的上将禁止公众集会，对西班牙和政府的批评则有可能导致被拘禁或流放。

古巴的独立战争

十年战争结束 6 年之后，古巴的政治状况仍旧毫无改变，自由与

独立的梦想仍旧召唤着人们。在美国的富有的被放逐者以新的革命建立基金作为响应。1892年，诗人兼演说家何塞·马蒂（1853—1895）在纽约创建古巴革命党，其目标是争取古巴独立，在古巴建立一个共和国，并且将波多黎各也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何塞·马蒂的哲学基石之一是“古巴人”。这是一种古巴民族主义的表达，它意在淡化古巴的种族差异。马蒂强烈反对种族主义，并认为歧视非洲裔古巴人对古巴民族的认同发展是一种危险，对古巴的独立是一种威胁。他希望在古巴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在奴隶制的年代他写作以增进种族自由的观念。他鼓励古巴民族主义观念主导的独立运动。 123

何塞·马蒂

何塞·马蒂成了独立斗争的象征。他穿行于整个美国，促进古巴人的主张。他1880年定居纽约，为《纽约太阳报》和几份拉丁美洲报纸撰写文章。在评论中，他试图反映拉丁美洲所需要的、而非受美国影响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在其著作中，马蒂警告拉丁美洲不要屈从于美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他担心一些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独裁主义的倾向，并表达了对美国作为帝国强权出现在拉丁美洲的担忧。他主张创建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古巴共和国。

1891年，他的演说家名望将他带到了坦帕市，在那儿，他像领导者一样被古巴雪茄工人簇拥着，他们为其对所有古巴人的号召而喝彩：不分种族，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雪茄工人，站在马蒂的一边，捐钱建立基金，协助解放古巴岛。

马蒂是一位战斗型的战略家。1895年，他批准发动起义，并撰写文章，阐明需要一场正义的战争给古巴带来自由与平等。暴动——众所周知的“巴依雷呼声”，于2月24日在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发动。4月，马蒂回到了他心爱的古巴，但一个月之后，即1895年5月19日，他在战争中牺牲。在流放中，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面对太阳而死的渴望：

不要把我藏在黑暗中
让我像叛徒一样死去
我是一个有德之人
也喜欢有德之人
我情愿面对太阳而死

当他的尸体被发现时，据说他是躺着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

由于害怕美国介入，何塞·马蒂希望反抗西班牙的战争取得迅速的胜利。然而，在富有经验的将军安东尼奥·马塞奥、马克西莫·戈麦斯和卡利斯托·加西亚的领导下，战争持续了3年多。尽管西班牙政府拥有12万人军队，数量仅为2 000人的暴动者，在几个将领的率领下像几个世纪以前的泰诺人那样运用游击战术，西班牙军队无法取胜。西班牙军队与“曼比斯”之间的战斗很激烈，双方都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古巴反叛者常常带着砍刀以自杀性冲锋来抵抗西班牙步兵。

124



古巴士兵攻击西班牙步兵（摘自 *United States in War with Spain and the History of Cuba*, by Trumbull White, Chicago: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1898, pp. 72—73）

由于古巴叛乱者受到乡村群众的支持，该岛的军事总督巴莱里亚诺·韦勒—尼科劳（1838—1930）将军采取“以战止战”的策略。为切断民间对叛乱者的支持，在乡村地区他使用一种被称为“压缩”的手段，建立集中营，将百姓关在其中；由于恶劣的条件、营养不良和疾病，约有25万群众死亡。在古巴被撤空的地区，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被认为军事目标，包括农作物和牲畜。然而，巴莱里亚诺·韦勒—尼科劳并没有能够结束战争，到1896年，“曼比斯”已经到达哈瓦那的外围地区，一年之后，西班牙和古巴的军队陷入了胶着状态。

125

波多黎各的爱国者，如贝坦塞斯，密切关注着古巴事态的发展，他们渴望再次燃起独立之火。许多观察家和参与者都认为战争的结束和古巴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事情却在1898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1898年：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

恰好在19世纪末，哈瓦那作为催化剂，不仅改变了古巴，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古巴北面的美国正舞动明显的命运之旗，渴望领土扩张，渴望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获得承认，占领古巴是美国一个存在已久的梦想。在19世纪末，在怀有自己光荣梦想的新闻记者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和海军秘密人员西奥多·狄特·罗斯福（1858—1919）的鼓动下，美国已走向同西班牙对抗的边缘。

这两人都憎恨西班牙人对古巴的统治，并且相信美国帮助古巴获得自由是正义的、正确的，但他们都怀有别的动机。对赫斯特来说，战争意味着他的《纽约日报》会有更大的发行量，《纽约日报》是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所有的、更加受欢迎和被认可的《纽约世界报》的对手。罗斯福认为，说英语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Burton，36），对他来说，战争将允许美国引导古巴走出落后，也将确定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帝国权力；这还会给他自己提高声望提供一个机会，对其在国家政治职位上追求大有帮助。

在大西洋的另一面，西班牙要拼命控制住古巴，因为它对西班牙

的经济至关重要。这样做是因为它想将古巴保持在帝国之内，但这也使得西班牙政府与每一个古巴人为敌。西班牙非但没有给予古巴自治，反而变得更加专断。

一位被遗忘的女英雄：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

传统上认为，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开始于1898年停泊在哈瓦126 那港中的美国“缅因”号军舰爆炸，然而，最近男女平等主义者认为冲突的起因是对使妇女身陷痛苦的性行为、骑士精神和人为操控的同情的反映。在这个事件中，女主角就是漂亮的埃瓦赫利娜·科西奥—西斯内罗斯（1878？—1967），在美国以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而闻名。

西斯内罗斯的父亲是参加过1868—1878年十年战争的一位老兵，1895年，因当地警察发现其在朋友的房子中藏有武器，并准备参加乡村战争而将其逮捕。当他被判处死刑后，其女儿说服总督，因她的父亲年纪太大，并患有疾病，不宜执行死刑判决，于是总督减轻处罚，将死刑改为关押。父女二人被送到古巴南面的小岛——松树岛[①]的监狱。松树岛是犯人的保留地，但犯人并不认为该地是危险之地，他们有一些渠道可与西班牙政府接触。一些犯人住在单独的小房子里，而另一些则被关押在靠近该岛主要城镇有围墙的大院子里。西斯内罗斯的父亲被按排在小房子里，由这位年轻妇女照看。

在松树岛时，西斯内罗斯年仅17岁，引起了殖民监狱长的关注。这种吸引不是相互的，监狱长将西斯内罗斯的父亲重新安排在大的监狱，希望利用赦免作为求爱的手段，但他的这一手法没有成功，这位年轻的女子拒绝了监狱长的求爱。一天晚上，虽然监狱长不知怎么发现自己单独和西斯内罗斯在她的小屋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现了两个版本：西班牙人的说法是监狱长中了圈套，进入这个小屋，以

---

① 松树岛（Isla de Pinos），古巴青年岛（Isla de la Juventud）的旧称。系古巴第二大岛，西印度群岛的第六大岛。位于古巴西南95千米处，是卡纳雷奥斯群岛的主岛。哥伦布1494年发现该岛，此后300多年一直作为监禁罪犯和逃亡奴隶之所。该岛北部多丘陵，遍布松树，故名。1964年起大批青年来岛发展农业，1978年遂改名青年岛。——译者注

便西斯内罗斯与其他犯人一起谋杀监狱长，并计划煽动一次大的反叛；然而古巴人坚持说，监狱长闯进小屋并强奸了西斯内罗斯，当她呼喊求救时，她的古巴邻居冲向她的住所，击打监狱长，并将其捆起来，扔到了乡下。西班牙人与古巴人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这个事件导致西斯内罗斯被逮捕，并被指控谋划叛乱和企图杀害西班牙官员。

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被判入哈瓦那妇女监狱。1897 年，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得到西斯内罗斯的消息，他在《纽约日报》报道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境况，并发动了一场书信活动请求释放西斯内罗斯。当时西班牙当局没有作出反应，赫斯特于是安排对西斯内罗斯进行营救。他派一位记者到哈瓦那，这位记者打开一个小窗户，帮助她脱身。记者与西斯内罗斯从古巴乘船到美国，在那里，她成了古巴自由梦想的象征。她游历了纽约，促进了对古巴的支持；游历了华盛顿，会见总统威廉·麦金利（1843—1901）。美国民众将她被西班牙政府逮捕与处置视为西班牙在古巴践踏人权的证据。以在报业的轰动性效应而著称的赫斯特鼓动公众舆论支持美国介入古巴独立战争，他声称美国有义务保护被压迫性政权控制的古巴，也即如西斯内罗斯所说的那样，古巴需要拯救。这样，西斯内罗斯和赫斯特提供了精神上的燃料，点燃了战争之火。

127

1898 年 6 月，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嫁给了她的一个同胞，在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结束后，她返回古巴，并居住在哈瓦那，直到 1967 年死去。在古巴，她的事迹很少被提起，古巴的历史学家也很少写到她，焦点换成了像何塞·马蒂和安东尼奥·马克西莫这样的英雄领袖，以及关于反抗西班牙的军队。在美国，对冲突的描述同样喜欢突出托德·罗斯福和其对圣胡安·希尔指控的伟大功绩。男女平等主义者则重视西斯罗斯的历史及其对古巴正义事业的贡献。

西斯内罗斯的故事在美国阅读民众中激起的兴趣将随着赫斯特推出的越来越多的在古巴发生的所谓的残暴故事而继续。《纽约日报》长时间掩盖了古巴人被韦勒将军“再集中”至指定的集中营的事实。

记住“缅因号”

来自联邦政府和美国民众的压力提醒西班牙召回韦勒将军。1898

年初，哈瓦那的总督支持者召开集会以支持总督，这导致了一场暴乱。一些暴乱者表达了反美的情绪，这使得麦金利政府担心居住在古巴的美国人的安全。1898 年 1 月 24 日，麦金利总统命令停泊在西珊瑚岛的战舰“缅因号”驶往哈瓦那港。

当“缅因号”抵达哈瓦那一天之后，西班牙当局希望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对全体船员殷勤有加，摩罗堡大炮为美国战舰鸣礼炮，西班牙人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供军舰停泊。为避免岸上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美国的舰长查尔斯·西格斯比（1845—1923）不允许船员离开军舰。



图为“缅因号”残骸，爆炸造成 266 名美国海员死亡，并引发了一场战争。（摘自 *United States in War with Spain and the History of Cuba*, by Trumbull White, Chicago: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1898, pp. 192—193）

几周之后，2 月 15 日的晚上，爆炸震动了哈瓦那城。陷入大火与浓烟之中的“缅因号”在港中沉没，事件共造成 266 名美国海员死亡。舰长西格斯比立即断定军舰是故意破坏的牺牲品。尽管西班牙人参与营救、协助照顾受伤人员，但故意破坏的传言很快传播。在美国，

128

赫斯特的美术师画了一幅水雷安放在船下的插图，报纸的大标题写道："谁破坏了'缅因号'?"爆炸发生两天之后，赫斯特以另一个大标题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战舰'缅因号'被敌人秘密的、恶魔般的装置炸为两半！"（Lundberg，73）

美国公众仍旧对西斯内罗斯迷恋，而且还在悼念死去的200多名海员，吵嚷着要复仇。4月21日，麦金利总统命令一支军队封锁该岛，4天之后，他要求国会对西班牙宣战。随着团结起来战斗的号召，超过125 000名志愿者参战。美国的战争策略不仅包括侵略性地侵入古巴，还侵入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至是月底，海军准将乔治·杜威已在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湾击败西班牙海军。

古巴的爱国者对事态的发展反应是犹豫和怀疑。在过去的1854和1859年，美国曾两次表露吞并古巴的渴望，提议向西班牙购买古巴岛，但被拒绝了。一些美国人建议派遣掠夺远征队。许多古巴的反叛者相信，西班牙已厌恶战争，而且他们取得独立将先于美国的介入。美国是位不速之客，它可能试图剥夺古巴的正当的胜利。

129

"缅因号"爆炸是偶然事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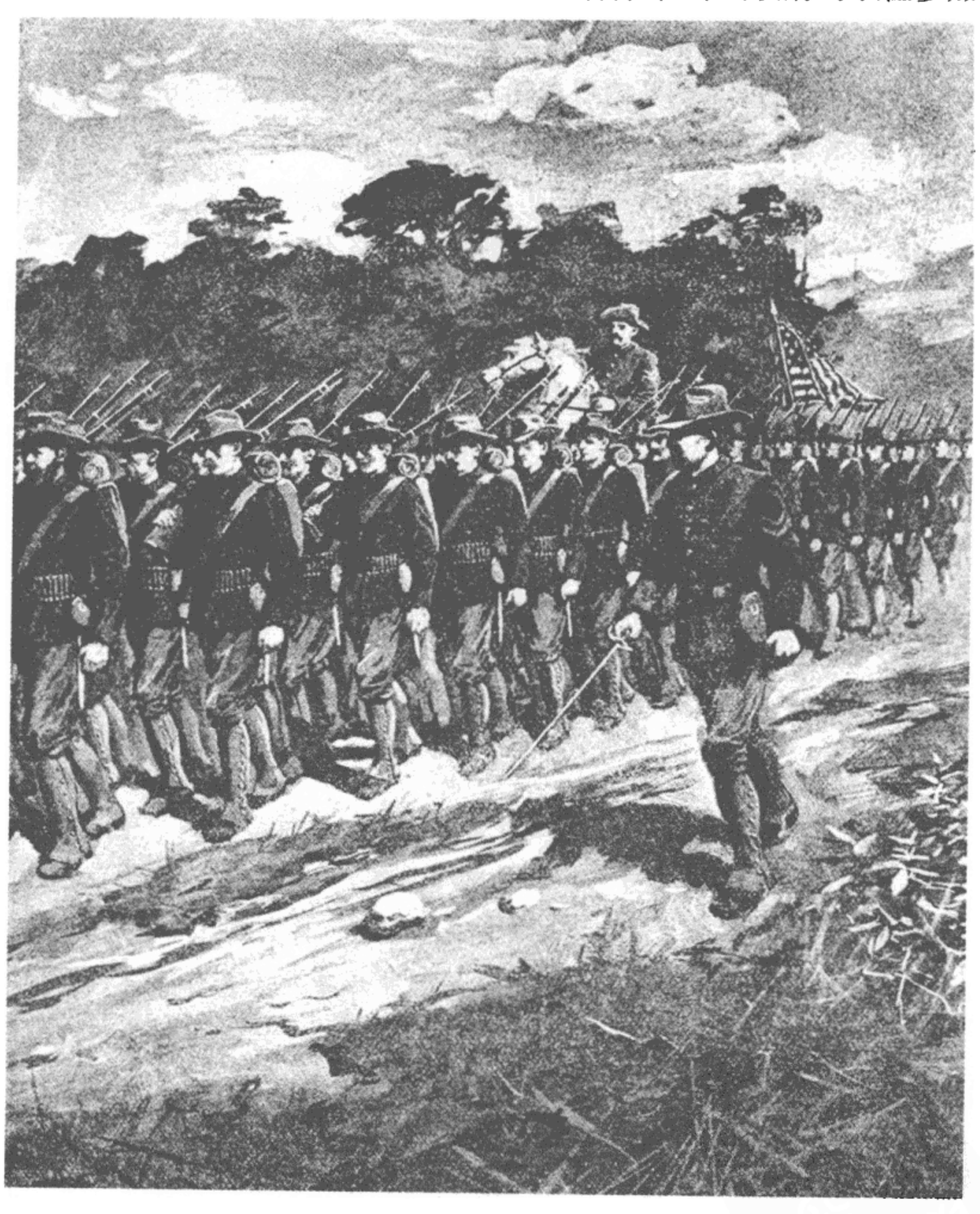
关于"缅因号"爆炸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最初的怀疑是西班牙人在船下安放了一颗水雷或鱼雷。然而，因为西班牙希望避免与美国的战争，这不大可能。根据《阴谋》（*Montaner*，250）一书推断，系古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安放了水雷，将美国引入冲突。

然而，至20世纪初，研究者相信爆炸是一次意外事件的结果。1976年，艾米罗·海曼·里科弗推断，煤存放得因靠近轮船引擎而变得很热，以致引起内部燃烧，由于煤紧挨着弹药储藏室，爆炸变得不可避免。里科弗认为是，一次意外事件导致了美国战舰"缅因号"的沉没。[1]（Rickover，1976）

---

① Montaner, Carlos Alberto. Trama. Esplugues de Llobregat, Barcelona: Plaza & Janes, 1987; Rickover, Hyman G. *How the Battleship Maine Was Destroyed.* Washington, D. C.: Dept. of the Navy, Naval History Division, 1976.

7月，美国海军在圣地亚哥湾击败了西班牙舰队，海军陆战队在圣胡安山的战役中打败了古巴的西班牙军队。胜利被视为美国强权的标志，并使陆军上校托德·罗斯福一举成名，他辞去政府的职位参加



130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去参加战争（摘自 *United States in War with Spain and the History of Cuba*，by Trumbull White，Chicago：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1898，n. p.）

了战争，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他的义勇骑兵团能够完成使命，掌控圣胡安山的战局，赶走侵入的敌人。7 月中旬，美国对西班牙宣战不到 3 个月，美国已在古巴战胜西班牙。随着杜威在菲律宾群岛的胜利，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都获得了殖民地。

占领波多黎各

1898 年 7 月 21 日，美国战舰载着 3 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离开古巴驶向波多黎各。在圣胡安，西班牙人准备战斗，绝大部军队集中在城里。很多波多黎爱国者自愿与美国作战，因为该年初西班牙给予了波多黎各政治自治。结果就和古巴一样，波多黎各的独立热情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由于得到过西班牙的让步，一些波多黎各领导人不愿冒美国介入的风险。然而，另一些人则仍然反对西班牙的任何存在，并鼓励他们的同胞武装反抗。“这极端重要，”拉蒙·埃梅特里奥·贝坦塞斯写道，“当美国的第一支军队到达海滩时，迎接他们的必将是波多黎各的武器与飘扬的独立旗帜”（Wagenheim，88）。 131

美国海军陆战队预料在圣胡安会遭到猛烈反抗，那儿驻守着约 8 000名西班牙士兵。7 月 25 日，他们选择在波多黎各南部登陆，然后向北部的首都进发。他们在穿越该岛的行军中，除了在科阿马镇遭到西班牙的驻军猛攻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

在圣胡安，几乎所有人都预料到了死亡，当西班牙军队备战时，城中的百姓逃离了此地。这里士气低落，据报道，至少两名炮兵对可能失守的波多黎各不抱信心，试图自杀。然而，进攻并没有发生。8 月 12 日，美国军队收到美国和西班牙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

《巴黎条约》

1898 年 5 月，英国接洽美国，建议结束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美国接受了谈判的想法，尤其因为美国对西班牙在军事上占有决定性优势，可能通过和解来获取利益。至 7 月中旬，西班牙完全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失败，于是请求法国政府代表西班牙求情，并将巴黎作为和平

谈判的地点。双方在8月达到停火协议，谈判贯穿了整个秋季。最后在1898年12月，《巴黎条约》完成起草并签署。条约条款包括美国和西班牙达成的协定部分。西班牙给予古巴自由，美国承担保护古巴的责任；西班牙放弃波多黎各、菲律宾群岛和关岛给美国；美国承担古巴的财政负担。

对美国来说，战争与条约吹响了作为世界强国进军世界舞台的号角。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John Hay，1838—1905）将这次冲突描述为一场“伟大的小战争”。这一事件激励了美国民众，他们高兴地看到全国的年轻人团结到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它使人们对使美国遭受巨大破坏的内战（1861—1865）的痛苦记忆逐渐淡化。对西班牙来说，签订条约被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古巴和波多黎各，任何一方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谈判。

132

美国的第一目标：黄热病

一占领古巴，美国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公共卫生设施。消除尽人皆知的可怕的黄热病是优先的目标。这种疾病在古巴很普遍，比加勒比地区的其他任何岛屿都严重。当黄热病爆发时，由于人们撤离到乡村，城市变成了鬼城，当局隔离所有邻近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被报告发现黄热病的建筑将被焚烧，以避免传染。

黄热病的死亡率为20%，尽管古巴人得了黄热病不像外来者那么痛苦。1762年，3 000多名派遣到哈瓦那的西班牙士兵在黄热病大流行期间死亡。一年后，一支英国舰队抓住机会进攻这个易于攻击的城市。入侵者取得了胜利，但几个月之内，英国士兵和水手也都死于黄热病。

黄热病因其症状而得名，它的第一个症状是患者变得很虚弱，发高烧，内脏出血。一些患者的病情会进一步发展，呕吐出浓稠的带有血腥味的黑色东西，皮肤和眼睛变黄。通常，如果高烧不退，患者不会恢复。那些到了呕吐阶段的患者会死亡。

19世纪70年代晚期，一位古巴医生卡洛斯·J. 芬莱（1833—

1915）推断，黄热病会通过蚊子传播。1881 年，他在一篇名为《假定蚊子是黄热病传播的媒介》的论文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直到美国黄热病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沃尔特·里德（1851—1902）博士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芬莱的发现是正确的，1900 年，科学团体才接受了芬莱的这一发现。

美国政府立即在古巴开始一次扑灭蚊子的战役，排干水塘，在死水中倒上油，以硫磺熏蒸街道和建筑物。在陆军少校 V. 哈佛的描述下，一位外科医生、令人满意的美军士兵建议应当把鉴定出黄热病的媒介视为“这个时代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官方文件将这一突破归功于美国人里德博士，而不是最初研究的作者——古巴人芬莱博士。 133

古巴的独立

美国设立军政府监督古巴和波多黎各。1900 年，美国帮助古巴起草宪法以建立民主政府。1901 年，古巴批准了宪法，但在其发起人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1827—1905）提议后，美国插入了一个修正案，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普拉特修正案》。

当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时，《普拉特修正案》允许美国干涉古巴事务。没有美国的允许，禁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并在古巴东南部的关塔那摩湾建立海军基地。修正案在古巴制宪会议中引起骚动，在投票中勉强通过。美国官员很清楚地表明，如果修正案不被采纳，古巴将继续处在军事占领之下。《普拉特修正案》详细规定了以后 30 年古巴与美国的关系，而且成为美国在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地区推行帝国主义象征。

1902 年，古巴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为总统。选举之后，美国的军政府宣布结束占领，它的离去标志着古巴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开始。

总统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被认为是亲美派。他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互惠条约》，规定古巴与美国在贸易中互相给予对方以优惠待遇。这一条约帮助古巴恢复其最主要的经济企

业——蔗糖工业，这有助于古巴相对繁荣。埃斯特拉达下令修建了超过300千米的铁路，使土地增值。

同时，成为20世纪古巴经济象征的经济不平衡开始出现。在古巴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人对古巴采取了大量消灭其人口的政策，古巴的人口从战前的1 800万减少到战后的1 500万。而战争损害了经济，战后成为外国资本进入古巴的大好时机。古巴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饱受战争的蹂躏，留下的经济真空被美国的商人和公司所填补。至20世纪早期，外国人、尤其来自美国的，拥有古巴主要业务的不相称的极大份额，包括铁路、公用事业和糖厂。

134

1905—1933年，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选举出了4位总统，然而，欺骗选举、军事冲突和一个政党企图从另一个政党手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叛乱使得古巴的政治生活污迹斑斑，这些都是由美国的参议员和外交官所操纵。

美国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一个殖民地象征的发展

在2001年9月11日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之后，美国将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一部分改造成监狱，关押在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抓获的恐怖嫌疑分子。这一决定富有历史讽刺意味，冷战时期激烈的战场之一变成了当今反恐战争的焦点。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古巴东南圣地亚哥湾入口处45平方英里的地方这样被隔离、被争议。1964年，古巴政府切断对基地的水源和陆上补给，并环绕以带有倒刺的铁丝网。结果，基地8 500名人员的补给靠水路或空中运来。令人痛苦的基地历史始于1903年，在古巴获得独立不到一年，美国对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古巴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海军基地，每年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2 000美元租金。1934年，租金略微上涨至4 085美元，尽管革命政府拒绝接受这点象征蔑视的现金。

乔治·W. 布什总统的行政部门开始将犯人转移到基地，并在2002年初转移到到后来广为人知的X射线营——一片一连串

的笼子。几个月之后，更加坚固的铁笼子取得了原先的设备。在拘押中心进行人员甄别，但是在这里发生了对犯人固执的指控和非人的折磨。2004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拘押中心的犯人可以就对他们拘押到联邦法院上诉。另一项决定则反对布什的政府部门，2006 年最高法院裁决，对未判决囚犯必须给予由日内瓦大会指定的法律保护。这些合法的辩论还将继续进行，布什的政府部门设立军事法官来判定犯人是否是“敌人的战争员”，以对抗最高法院的裁决。据最近的估计，现在只有不到 400 名囚犯被关在笼子中，几个人权组织和网站致力于跟踪对囚犯的处置。

135

基地建在古巴，但它并不希望其存在。撇开对拘押中心的争论和基地未来的担忧，美国的基地欣欣向荣，设有男、女童子军，少年棒球队。据美国海军的记录，基地内有餐厅、银行、大学、家具店、加油站、医院、干洗店、保龄球馆、图书馆、九洞高尔夫球场、十八洞小型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棒球场和 3 个游泳池，社区有《新闻周报》、《关塔那摩公报》和《大事记》。

古巴政府控制公众关于使用基地作为恐怖嫌疑分子拘押中心的言论，在过去，基地内居住着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海地人和古巴人，它还作为加勒比海军巡逻船的燃料补给站。

未确定的波多黎各

发生在波多黎各的事件则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1990 年，美国通过了《福勒克法案》，波多黎各的军事管制随之结束。法案规定，波多黎各总督由美国总统提名，最高行政会议主要由美国人组成，议事会代表由波多黎各人选举产生，但后者只能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

波多黎各与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他们努力抵抗使用英语，美国政府试图让波多黎各这一名称英语化，将“Puerto Rico”改为“Porto

136

Rico”。美国官员尝试建立一个基于英语的教育体系，并要求采用美国课程。关于美国殖民地化的努力，痛心疾首的路易斯·穆尼奥斯·里维拉悲观地写道：“在半个世纪之内，它将成为西班牙语这一名称的耻辱。”（Wagenheim，110—113）

第八章　古巴：独裁与革命（1900—2007）

137

1898 年，西班牙帝国被迫从西班牙的加勒比离开，使得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各自同新的现实进行斗争，即无法战胜的美国势力和想方设法创建界限以保卫自己的主权。由于民族主义者挑战与美国关系极度密切的古巴政治与经济精英，古巴的道路充满了革命与流血牺牲。古巴最终走向革命，这当然遭到美国的拒绝。20 世纪上半叶，一个要回答的中心议题是：古巴人意味着什么？

19 世纪，古巴人发展了他们作为克里奥尔人的自我意识，培育了他们出生地而非西班牙的文化和心理，创建了最终能与欧洲决裂的加勒比人角色，开始了他们自我定义的进程。古巴社会也有其另一面，正如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寻求与欧洲的认同的同时，淡化了非洲人与土著人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影响。许多古巴人认为自己是白人，是欧洲人的后裔。白古巴人通常将自己与黑古巴人，尤其是与那些非洲裔古巴人区别开来。

这种种族主义导致了因“种族战争”而闻名的冲突，当时参加独立战争的黑人老兵害怕他们被排除在新国家的利益之外，而拿起武器对抗政府。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07 年基于种族而建立的政党——有色独立党，古巴殉道者何塞·马蒂反对以肤色为基础的国家独立运

138

动，但以种族区分为基础的政党建立则与何塞·马蒂的教导背道而驰。

由于害怕发动一场使古巴非洲化的运动，古巴议会将有色独立党宣布为非法，之后起义发生。该党成员坚决抵抗，古巴政府迅速行动，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美国水兵与古巴士兵一道作战，在古巴白人官员的指挥下，屠杀了近 3 000 人，并杀死了许多非洲裔古巴人，不论他们是否参战。这是法国人在海地革命期间屠杀海地人、英国士兵在 1865 年的马龙湾起义中屠杀牙买加人悲剧的重演。

早期的古巴共和国深受腐败丑闻、美国干涉、自由党与保守党冲突的困扰，两个党派经常因资助与使用政府经费的额度而争吵不休。在古巴军方的普遍干涉下，选举使得事态更加恶化。古巴第二任总统何塞·米格尔·戈麦斯（1909—1913）镇压了有色独立党因被宣布为非法党派而发动的起义，又因其有使用政府经费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爱好，落了个“鲨鱼”的绰号。马里奥·加西亚·梅诺卡尔（1913—1921）是保守党领导人、古巴独立战争的陆军上校、卓越的糖厂管理者，他追随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左右。梅诺卡尔的百般侵占，更甚于戈麦斯。后来梅诺卡尔被迫去镇压由前任总统戈麦斯领导的、意在夺取其权力的叛乱。他见证了古巴糖业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协约国购买了全部古巴出产的糖。梅诺卡尔之后，阿尔弗雷多·萨亚斯（1921—1925）继任总统。至此时，腐败盛行，以至于华盛顿打算强迫萨亚斯指定“诚实内阁”以施加财政惩戒。“诚实内阁”由一群古巴领导人组成，意在减少腐败，精简膨胀的官僚机构。这还标志着美国有能力指挥古巴的内部事务，就如同其对外政策。对萨亚斯政府来说，一项引人注目的成绩是美国决定放弃对松树岛（今称青年岛）的任何要求。美国商界自 1898 年起游说华盛顿要维持对古巴的统治权，因为古巴恰好位于美国东南海岸的附近。

多数古巴人认为这种改变是必须的，人们认为带来这种变化的人将是赫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1871—1939），他是另一位独立战争的前军事领导人，发誓要为公共事业增加投入，并寻求结束

139

《普拉特修正案》。为古巴未来进行的斗争将带来革命性的转折。

马查多独裁政权

古巴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1925年因其提出国民改革计划方案而被选出执政，他一直统治到1933年。他执政的8年因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而变得黑暗。这段时期，古巴社会动荡，蔗糖工人一年只有两个月的工作可做（蔗糖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60%），3 900万人中有1 000万工人失业，大多数古巴人一年的工资仅300美元（Martínez Fernández，167）。工人与学生的街头抗议换来的却是警察的野蛮镇压，甚至向抗议人群开枪。

1933年夏，古巴陷入更深的经济与社会动乱。这个岛国基本财富的来源——糖的价格降到了谷底，世界市场上一磅糖的售价仅一便士。作为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之一，古巴的出口额由1925年3.53亿美元直线下降到1932年0.8亿美元。经济的低迷更加助长了人们对马查多的怨恨。经济衰退甚至到了政府财政开不出雇员的工资，而军方职位有可能被削减的谣言到处传播，这导致了军队的不稳定。

为了保持自己独裁，马查多暴力恐吓他的政治对手。随着经济的衰退，暴力事件逐渐增多，秘密组织很快在全国成长起来，最著名的是ABC革命协会，致力于在城市发动反对马查多政府的活动。秘密社会以小组构成，以至于组织成员仅认识自己小组的成员。这些组织的结构使得政府很难对其彻底破坏。除了这些秘密团体，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也多为马查多的劲敌。他们的反对导致马查多关闭了全国的大学与中学，这一步招致了彻底失败，因为它给了学生更多的时间去策划推翻政府的活动。

古巴是美国"睦邻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品，华盛顿保证将限制其对南部邻邦事务的直接军事干涉，其目的在于推进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华盛顿的官员对古巴的混乱十分敏感，因为美国的投资面临着危险，他们决定马查多必须走人。1933年，富兰克林·D. 罗斯 140

福（1882—1945）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任命本杰明·萨默·韦尔斯（1892—1961）为驻古巴大使，居间斡旋，并劝说马查多下台。

韦尔斯的出场正是时候——1933年5月，这使得古巴人同马查多进行了大胆的政治对抗。马查多的政治盟友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在老资格的官员、低资格的官员和应召入伍的士兵中酝酿着各自的阴谋。8月份，一场大罢工震动了全国，老资格的官员拒绝支持马查多，马查多于1933年8月12日乘船去了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马查多的离开使得限制解除，一场针对马查多支持者的暴力活动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马查多同盟者的住宅和生意场所被焚烧和抢掠。马查多的很多最密切的支持者被杀，尸体被肢解并被游街示众。总统官邸受到攻击，并被暴民洗劫。当今，马查多作为残暴和压迫的象征仍旧普遍遭受辱骂，他是20世纪第一个失败的独裁者，但不是最后一个。

马查多幕僚的头领阿尔韦托·埃雷拉，1933年被选为临时总统。由于未得到军方和民众的普遍支持，韦尔斯大使将新总统的职位转交给了古巴创立人之子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克萨达（1871—1939）。塞斯佩德斯是一位外交官，能够为美国所接受，但给人的感觉他是华盛顿的候选人，这最终损害了古巴民众对他的支持。1933年8月14日，新总统组阁，但不到一个月，塞斯佩德斯因受到来自一位不怎么知名的警官和一个学生联盟的弹劾而去职。

1933年革命的起源

在军队内部，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军官由于其社会关系和财富而升到了一定的职位，一般情况下，军队内部会歧视普通士兵，他们通常比较穷困，且为混血人种。普通士兵与军官使用的设备是分开的，而且前者的设备明显地低了一等。公共设施，例如剧院包厢，如果军官进入，普通士兵则不得进入，以示尊重，甚至在下班之后的时间也是这样。增加工资和批准休假被军官们异想

141

天开地认为是他们对普通士兵的恩赐，并以此强迫普通士兵来讨好他们以及其上司。入伍的士兵经常被当作仆人在军官家里从事服务，这在士兵中引起了强烈的愤慨。

1933 年，一则传言说，塞斯佩德斯政府可能清洗那些以前支持马查多的入伍士兵，并降低他们的工资（Thomas，635—636）。8 月份，少数军官开始谋划起义，9 月，一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军官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01—1973）脱颖而出，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具有混血血统的巴蒂斯塔是一位蔗糖工人，20 岁时从军，经过 20 年技术精湛的服务之后，他被提升为中士。作为一位起义的领导者，他指挥列兵、下士、中士去控制整个哈瓦那的军事警戒区以及古巴岛的其余地方。巴蒂斯塔成功地与官方团体建立了联盟，最重要是与大学生指导委员会——一个基于哈瓦那大学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盟。1933 年 9 月 4 日，士兵和学生驱逐了总统塞斯佩德斯。

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五人执政团建立，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五人执政团很快瓦解，并任命了一位来自哈瓦那大学深受欢迎的教授拉蒙·格劳·桑·圣马丁（1887—1969）担任总统。格劳内阁最有影响的成员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奥尔梅斯（1906—1935）是一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被任命为内政部长。9 月 4 日之后的几天里，中士巴蒂斯塔被提升为陆军上校和陆军参谋长。这三个人——巴蒂斯塔、格劳和吉特拉斯——为控制革命政府而在政府仅存的 134 天中相互斗争。



以一个革命者、总统出现的巴蒂斯塔，开始很谦恭，但后来变成了一个独裁者。（摘自 *Album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Habana，1959，postcard 11. D. H. Figueredo's Collection）

尽管政府执政仅 4 个多

月，但它采取了广泛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8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在一次工人罢工中，政府接管了古巴电力公司——一家美国股份公司的子公司，并将电费猛降了45%。革命政府努力处理涉及外国经济控制的事件，规定外国公司的员工至少50%为古巴人。农村改革包括强迫由垦殖者（*colonos*）——小自耕农经营的糖厂生产更多的糖。在劳动法规方面，8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起来。在国际上，政府不承认授予美国干涉古巴事务特权的《普拉特修改案》，并拒绝偿还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借给令人感到耻辱的马查多政府的贷款。

这些改革并未得到古巴富有阶层的支持，而且直接与美国进行对抗，美国拒绝承认革命政府，鼓励并挑起与政府的对抗。格劳、吉特拉斯和巴蒂斯塔的统治面临着几个挑战，最大的危险来自约300名官员在哈瓦那的国家宾馆发动的叛乱。巴蒂斯塔命令军舰从一艘军舰上炮轰宾馆，并用周围的火炮轰击据点，以驱逐叛乱的官员。

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打击另一个政治集团且逐步升级的暴力事件迫使格劳辞职，其后继任的是临时总统，即一个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卡洛斯·门迭塔·蒙特富尔（1873—1960），他被认为是巴蒂斯塔的傀儡。巴蒂斯塔继续掌管着军队，同时转变成为一个狡猾的政客。他让自己远离那些反对他的人和暴力事件，他虽然公开批评美国，而暗中却就政治与经济事态向美国大使请教。

尽管革命政府试图实现其社会议程，普通的古巴人仍认为1933年革命是一次失败。政府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没有减少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影响，也没有使美国将古巴作为一个平等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来看待。

独裁者巴蒂斯塔

塞斯佩德斯被迫离开总统职位之后，陆军上校巴蒂斯塔掌控着政局，他安放了几任没有权力的总统。19世纪30～40年代，巴蒂斯塔从政治领域的左派中退出，尽管是一位独裁者，他还是为其权力披上

了革命的外衣。受美国罗斯福新政和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革命政策的影响，巴蒂斯塔制定乡村教育计划，在古巴岛偏僻的乡村地区成功建成了1 100多所学校。巴蒂斯塔支持适度的土地改革，在全国建立结核病诊所和其他医疗设施。最重要的是，巴蒂斯塔认识到不能通过军队进行稳固的统治，他开始朝着在古巴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向努力。

1939—1940年的制宪大会起草了一部新的、进步的《1940年宪法》，该宪法保证了许多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包括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巴蒂斯塔与共产主义者和保守派形成了不太可靠的联盟，并赢得了1940年的总统选举，任期4年。

《1940年宪法》禁止总统连任，在1944年的总统选举中，巴蒂斯塔精心挑选的继任者被格劳击败。这次选举的败北结束了巴蒂斯塔第一任期内的权力，管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格劳。一些人惊惶失措地预见巴蒂斯塔将推翻这次相反的选举结果。但人们很快意识到拉丁美洲的军人不寻常、和平地放弃了权力，古巴人民因巴蒂斯塔的行动欢欣鼓舞。他作为一位英雄游历南美洲，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1945年定居在佛罗里达的戴托纳海滩。

巴蒂斯塔留居在佛罗里达，远离政治，他将可能作为民主选举的总统，实现民主政治，实施社会改革而被人们所铭记。然而，1948年，被选入古巴参议院后，他返回古巴，创立了自己的政党——统一行动党，并一再表达了再任总统的渴望。1952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巴蒂斯塔不会赢得这些选举，1952年3月10日，他出其不意地发动政变，驱逐了民主选举的总统，废除了其协助制定的、然而也是其敬畏的民主宪法，巴蒂斯塔毁灭了自己过去的成就。50年代的巴蒂斯塔实际上是在同自己的遗产战斗。

巴蒂斯塔这次无论如何无法为自己的政府找到合法依据，他将1952年出人意料的行动解释为净化腐败的古巴政府，人们亦不再相信。而且他没有为自己的政府设置退出策略。他掌权之初宣称，他的行动是暂时的，但他控制政权超过了6年，同时他的政府及其支持者 144

清除了其周围的一切障碍。他将成为新一代的马查多。

巴蒂斯塔的第二个政权深陷暴力和腐化之中。他的一些支持者恐吓百姓，而希望驱逐巴蒂斯塔的革命者的失败彰显了巴蒂斯塔的强大抵抗能力。虽然巴蒂斯塔直接卷入的暴力事件尚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没有处罚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员。有人断言巴蒂斯塔通过经营暴民管理的娱乐场所、接受贿赂和操纵国家彩票赚了数百万美元。



罕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特写照片。取得对巴蒂斯塔的胜利后，他的革命成为挑战美国力量的象征。（摘自 *Album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Habana, 1959, postcard 126. D. H. Figueredo's Collection）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蒂斯塔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平均每年的财政开支达4 000万美元（Santovenia，191），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约1/4的古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乡村的农民受到收割甘蔗的限制，一年仅能工作一半时间。"（E. Williams，1984：51）白人中产阶级、教授、大学生和农民开始密谋反抗巴蒂斯塔，有几位成为卓越的领导人，但没有哪个像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那样突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

卡斯特罗（1926— ）是一位富有的西班牙土地所有者的儿子，被认为是富有的加勒比政治家的代表。这些财富政治家的理想，例如来自牙买加的曼利家族，是将其公司董事会的办公室生活引入到政治舞台的斗争中。在其所在的享有声誉的私人名校，卡斯特罗证明了自己

是优秀的学生和具有天赋的运动员。1945 年，他进入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因其聪明才智和冲动与急躁的脾气而受到批评。 145



稀有的 1953 年 7 月 26 日攻击蒙卡达兵营的绘画。这次行动尽管失败了，但它却成为古巴革命的起点。（摘自 *Album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Habana，1959，postcard 24. D. H. Figueredo's Collection）

卡斯特罗 1950 年毕业，两年后，他为获得古巴众议院的一个职位进行活动，当时，巴蒂斯塔出人意料的行动激起了他的热望。卡斯特罗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他提出一个合法的简报反对巴蒂斯塔，指控其违犯《1940 年宪法》；接着，他谋划通过接管守备队推翻新政权，并号召古巴人民起来反抗巴蒂斯塔，建立一个新政府。

1953 年 7 月 26 日对蒙卡达军营的攻击失败了，120 名参与者中有 70 人死亡，卡斯特罗也被逮捕。在审判中，卡斯特罗因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说赢得了国际声望，现在仍被认为是政治修辞学的经典之作。这篇演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导致很多人推测当时卡斯特罗已成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被判入狱 20 年，但服刑 22 个月就获得大赦，被驱逐到墨西哥，在那里他继续谋划革命。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他的自我辩护演说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列举了革命政府的目标，并宣称历史将会承认他作为领导者和古巴解放者的角色：“第一，革命的法律将把权力归还给人民，并宣布《1940年宪法》——国家的最高法律，直至人民决定修改它……

第二，革命的法律将不可抵押的和不可转移的土地所有权给予所有佃农、转租的农民、租地者、拥有股份的种植者和开拓者……

“第三，革命的法律将保证大型工商、采矿企业、包括糖厂的工人和雇员拥有所在单位30%利润的权利……

“第四，革命的法律将给予所有甘蔗种植者享有55%蔗糖产量的权利，已经种植三年或以上的小型转租农场的经营者的最低配额为1 000磅……

“第五，革命的法律将会没收所有那些在先前政权期间运用欺诈手段获得的拥有物和运用不当手段获得的利益，以及那些受赠人和继承人从此中获得之物……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狱中将同任何人一样备受折磨，狱中的生活充满着卑怯的威胁和残暴的拷打，但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夺去了我70个兄弟生命的可鄙暴君的狂怒一样。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①

1953—1959年：暴风骤雨

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由城市的战士、几个乡村地区的游击队、提供财政支援的商人、宗教团体和硕果仅存的几名共产党组成。1952年，反对党真正党和正统党要求举行大选。1953年，卡斯特罗攻击了蒙卡达军营，号召暴力推翻政权。1954年，巴蒂斯塔举行了被认为是骗局的选举。1955年，传统党派的代表与巴蒂斯塔举行了一系列对

---

① Castro, Fidel. *History Will Absolve Me*. New York: Lyle Stuart, 1961.

话，要求新的、合法的选举。同年，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成立：革命 147
指导委员会和“七二六运动”。

革命指导委员会是由大学生组建的一个组织，其主要目标是推翻巴蒂斯塔政府。1957 年 3 月 13 日，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在哈瓦那指挥了一次攻击总统府的大胆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有 50 多名学生死亡。遭到挫折之后，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古巴中部拉斯维亚斯省的埃斯坎布雷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七二六运动”以 7 月 26 日攻击蒙卡达而得名，它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这一活动被认为是对游击战士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纪念。这一组织以奥连特省的马埃斯特腊山区为根据地，从 1956 年的 12 名游击队员增加到 1958 年的 7 000 名游击队员。“七二六运动”的一个分支在古巴奥连特省的首府圣地亚哥活动，破坏警察局，暗杀巴蒂斯塔的政府官员。山区的革命力量和圣地亚哥城里的革命力量使奥连特省成为抵抗巴蒂斯塔的大本营。

卡斯特罗的战争

1956 年 12 月，卡斯特罗与 82 名起义者乘一条挤得满满的船回到古巴。他的策略是在海滩登陆，然后向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挺进，在那里，他将发动一场抵抗巴蒂斯塔的解放战争。仅有 12 人在同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中幸存下来，然而，这一登陆行动却激励了城市抵抗的团体。

卡斯特罗运用游击战术戏弄巴蒂斯塔的军队。《纽约时报》刊出一系列文章，介绍卡斯特罗的大胆登陆行动，并计划使古巴回归民主，大大增加了其浪漫主义的英雄形象，使他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那些一直厌恶巴蒂斯塔的上层发现，卡斯特罗能够将反对力量团结起来抵抗巴蒂斯塔。当卡斯特罗吸引了富人、中产阶级，并将他们的资金导向了革命，巴蒂斯塔发现自己孤立了。当以“古巴现政权的残暴”为标题的新闻刊出后，美国公众开始转而反对古巴政府。这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巴蒂斯塔断绝关系的呼声与日俱增，结果美国禁止武器输入古巴。

卡斯特罗的游击战术打败了巴蒂斯塔的部队，因为对方年轻、没有经验、不熟悉乡村，而且不像起义队伍那样机动。通过一个秘密电台，卡斯特罗开展心理战，报导巴蒂斯塔的部队与起义者战斗的失败，以刺激巴蒂斯塔与其官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吸引了新兵和年轻的官员加入起义者的队伍。尽管巴蒂斯塔在全国拥有超过 33 000 名的士兵，但他不能打败卡斯特罗。巴蒂斯塔的自己人——一名指挥官怀疑他的能力，而且一些年长的官员转变了立场，私下与卡斯特罗谈判。

148



稀有的拉斯维亚斯战斗的绘画。1958 年 12 月，巴蒂斯塔被打败，这次战斗发生在圣克拉拉城中。（摘自 *Album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Habana，1959，postcard 1237. D. H. Figueredo's Collection）

1958 年 12 月，巴蒂斯塔发现他的一名重要将军与卡斯特罗谈判而转向了起义者队伍，这促使巴蒂斯塔在战场上接连失败，华盛顿减少了对他的支持，并劝说他于 1959 年 1 月 1 日黎明时分离开了古巴。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古巴，他只是在一本又一本的著书中企图恢复自己作为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并以此度过了余生。

成功的卡斯特罗于 1 月 8 日进入哈瓦那，他成了临时总理，并许

诺6个月内举行大选。他的画像出现在布告栏内和墙壁上，古巴人幸福地将其画像挂在家门口，并写上："菲德尔，这是你的家。"

卡斯特罗的胜利

149

掌握了政权的卡斯特罗加紧行动，他们的第一个内阁由所有经济部门的交叉部分组成。在变革开始的几个月里，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征兆，而且，实际上他在4月份到美国的访问中将自己描述为"人文主义者"。他第一次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公开冲突随着其对300多名巴蒂斯塔的支持者的审讯与处决而到来。卡斯特罗的土地改革计划使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古巴没收了一些大的由美国资本控制的股份公司。美国的几个土地所有者控诉他们没有获得适当的补偿，艾森豪威尔尖锐批评古巴的改革政策。

1959年末和1960年初，卡斯特罗和革命突然向左转，并导致与苏联结盟并加入冷战，苏联热切渴望在加勒比地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反击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莫斯科的支持使古巴能够与美国断绝关系，并切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政治纽带。革命最终将所有的美国公司收归国有，排除了几乎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并创建了邻里监督组织，也即保卫革命委员会以监督反革命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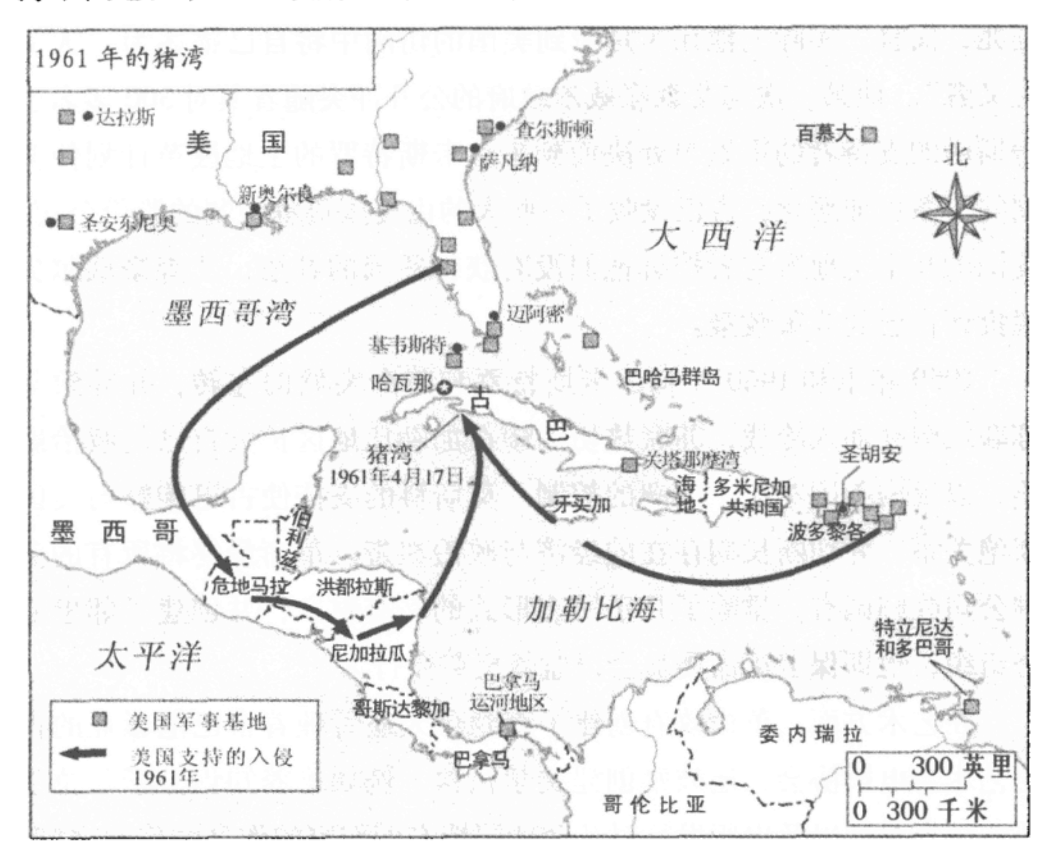
在艺术方面，革命政府创建了直到今天还管理着古巴电影业的古巴艺术与电影协会，还鼓励创建文学机构，例如培养知识分子与拉丁美洲国家对话以及出版发行对革命持同情态度作家的作品的美洲之家。卡斯特罗努力争取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邀请他们到古巴参加会议，对他们的作品给予资助，如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　)和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

卡斯特罗不能容忍不同意见。1959年11月，政府通过《基本法》，指控那些从事对革命带来任何威胁的人为反革命，反革命行为被最宽泛地定义，结果，数千人被判入狱或逃离古巴。60年代的任何时期，政治犯的数量估计在15 000—40 000人。卡斯特罗审查出版物，关闭教会学校和私人学校。

150

古巴人逃往迈阿密

从 1959 年至 1965 年，近 20 万古巴人流亡国外，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最终超过 100 万人逃离古巴。第一波流亡人士主要是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者。1960 年之后的那些离开者则与卡斯特罗政府持不同意见，而且政府没有重建《1940 年宪法》。



在古巴之外，一些流亡者密谋反对卡斯特罗。一项秘密活动导致了 1961 年 4 月在古巴称为吉隆滩的猪湾入侵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新成员，并训练了约 1 300 名古巴人打算在哈瓦那南面吉隆滩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在 4 月 15 日对古巴机场轰炸之后，流亡者于 4 月 17 日登陆，并占领了海滩一天。但是，入侵者很快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击败，美国空军许诺提供空中支持，但没有得到总统约翰 · F. 肯尼迪的批准，卡斯特罗的秘密部门抓获数千名同情者和所谓的谋反者，使这次抵抗活动的潜在发展遭到失败。这次入侵事

件使美国陷入窘境。卡斯特罗领导抵抗海滩上坦克的肖像使其富有传奇色彩，他被看作是一位英勇的革命者和古巴及拉丁美洲主权国家的保护者。对抗成为此后 50 年古美关系的主流，下一场战争也为时不远了。 151

十月危机

1962 年 10 月 14 日，两架美国 U2 侦察机拍摄到了古巴境内的核导弹装置。接下来的 13 天，一场战略上的决斗在肯尼迪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之间展开。从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一直在研究移除导弹的可能性，包括侵入古巴。10 月 22 日，肯尼迪向世界宣布，这些导弹已构成侵略，是不能容忍的。在古巴，卡斯特罗在北部沿海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并进行军事动员。10 月 23 日，苏联宣布，美国干涉古巴事务，侵犯了古巴的自决权。10 月 24 日，美国封锁古巴，并下令击沉任何试图穿越古巴水域的船只；一艘打算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运载了 20 只核弹头。

10 月 26 日，卡斯特罗告知苏联，美国入侵古巴将引发一场核战争。如果战争爆发，苏联应该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天，古巴击落了一架在古巴上空飞行的美国 U2 侦察机。同一天晚些时候，美国同意如果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不侵入古巴，并从土耳其撤除核弹头。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宣布同意这一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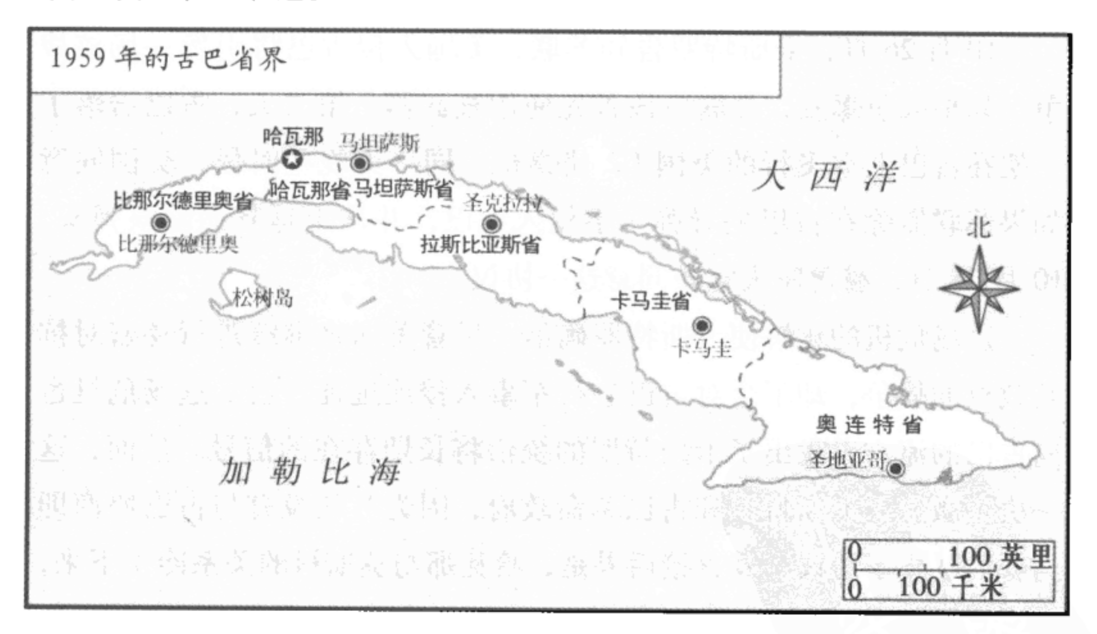
这场危机的化解使卡斯特罗确信，尽管美国将继续进行秘密对抗其政权的战争，却不会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或远征古巴。这场危机也向古巴的流亡者发出了卡斯特罗的统治将长期存在的信号。然而，这一决定激怒了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政府，因为苏联没有与古巴协商即与美国达成了协议。其直接后果是，哈瓦那与莫斯科的关系冷了下来，一直到 1968 年才完全恢复。

共产主义还是卡斯特罗主义

学者们推测过导致卡斯特罗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因。卡斯特罗转向 152

共产主义和苏联，是出于地缘政治策略的考虑以及美国不愿支持其革命吗？是因为其决定永远献身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经过对世界形势的谨慎分析之后认为大规模的斗争即将来临吗？他转向共产主义是否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以及他是否只不过以共产主义的修辞来证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合法性，所有这些也是人们争论的内容。不管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古巴几十年来的执政党就是共产党，1976 年宪法规定其要领导这个国家，并组织全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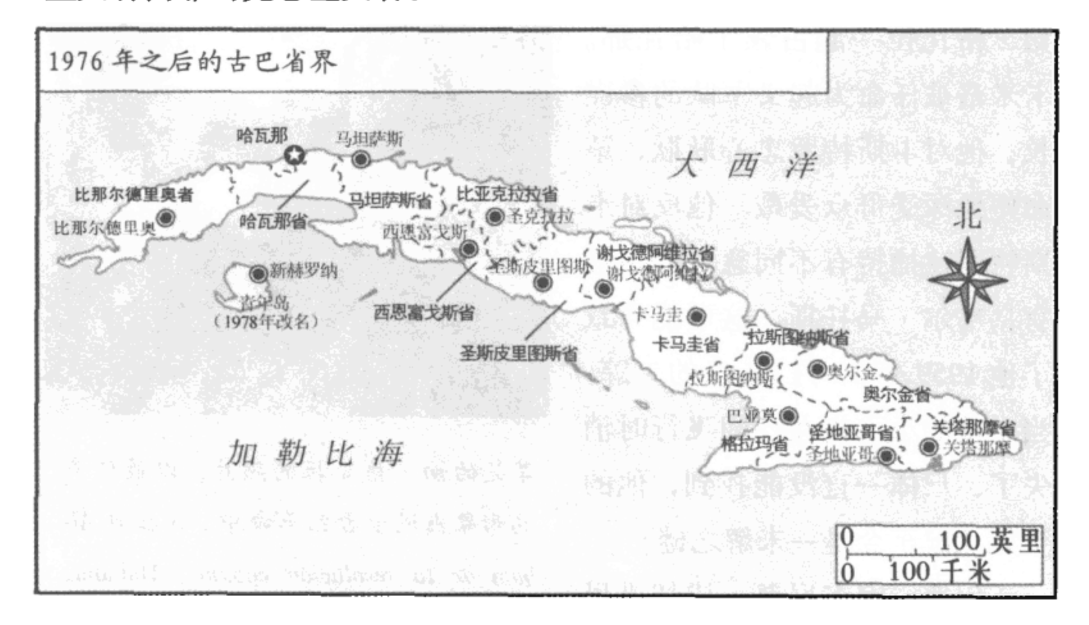
1961 年，这一党派称作人民社会党，1965 年变成了古巴共产党。1970 年，该党成为革命成就的关键因素，它的政权得到巩固并实现了中央集权化。1975 年，卡斯特罗宣布共产党是“古巴革命的灵魂”。党员人数从 1965 年的 5 万增加 10 年后的 20.3 万，至 2000 年，党员数量达到 80 万人。党内资格老的官员控制着政府与军队中的重要职位，他们对卡斯特罗负责；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他的弟弟劳尔是第二书记。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卡斯特罗何时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同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他再三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一旦他掌握了政权，他解释他不得不这样是因为古巴人革命之前还没有准备

好去拥抱共产主义。1961 年，他宣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65 年，他自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言明自己长久以来就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这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声称卡斯特罗转向共产主义是为了讨好苏联，而苏联的领导人则怀疑其更多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

153



争夺卡斯特罗的领导权

对卡斯特罗来说，胜利与权力意味着将他与巴蒂斯塔的斗争排他性地载入史册，其他革命者所扮演的角色黯然失色。在古巴，其中的一些人物则不被重视，或从政府编定的教科书中消失；在国外，历史学家往往在叙述古巴革命时将他们遗漏。

在反抗巴蒂斯塔的起义中，卡斯特罗是最有组织的、最有魅力的和最有效率的领导人，但是也有一些领导人可能挑战过卡斯特罗的角色与声望，而且他们在斗争中生存了下来，当然也有一些挑战卡斯特罗的人遭到了搜捕和关押。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1932—1959）是一个裁缝，他在墨西哥加入了卡斯特罗的队伍，并参与了 1959 年在古巴的登陆行动。他是一名

勇敢的战士，在几次战役使中表现卓越，包括1958年圣克拉拉战役，这次战役使巴蒂斯塔的军队最终失败。在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进入之前，卡米洛与切·格瓦拉一起占领了哈瓦那。卡米洛被任命为起义军队的参谋长，他对卡斯特罗忠心耿耿，革命使他深受群众爱戴。他反对卡斯特罗逮捕持有不同意见的指挥官乌韦尔·马托斯，这可能导致了他1959年10月28日的失踪，当时他的小飞机在夜间飞行时消失了，尸体一直没能找到，他的生死状况至今是一未解之谜。

154



罕见的切·格瓦拉的照片，以最传奇的形象出现于古巴革命中。（摘自*Album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Habana, 1959, postcard 129. D. H. Figueredo's Collection）

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1932—1957）是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城市游击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创立者，他的政治目标是撤除巴蒂斯塔的权力。

切·格瓦拉的传奇

切·格瓦拉是古巴除卡斯特罗外最著名的革命者，他根本不是古巴人。埃内斯托·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家庭，母亲在1965年去世前给他写信说，她已经老了，但"希望看到世界转向共产主义"。1953年，在驾驶摩托车游历南美洲之前，格瓦拉获得了医学学位。在秘鲁、哥伦比亚目睹这些国家的贫穷，他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1954年，他作为一名视察员在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913—1971）的政府中工作，该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

155

下被推翻了。次年，他到墨西哥旅行，遇到卡斯特罗并加入了古巴革命。格瓦拉是1956年12月注定失败的格拉玛登陆的幸存者之一。1958年，他和几名游击队员发动了一次对用装甲车运送的巴蒂斯塔部队的袭击。1959年，他带领起义队伍进入哈瓦那。古巴人民亲切地称为"切"——一个普通的带有阿根廷色彩的词语。

卡斯特罗胜利后，格瓦拉在不同的管理职位上服务，但他更喜欢运动与革命。1965年，他从古巴消失。谣言说他因遭到卡斯特罗的猜忌而消沉。实际上，这位阿根廷内科医生醉心于别处——非洲的刚果，然后是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的革命。在玻利维亚，他领导了一支游击队，希望他的行动能够激发整个大陆的革命。但是，玻利维亚共产党并不支持他的计划，而且玻利维亚的农民也没有团结到格瓦拉的一边。他的时间与地点选择也不对，玻利维亚政府刚推行农村土地改革不久，玻利维亚农村革命者的情绪就得到了安抚。事实上，玻利维亚农民向当局透露了格瓦拉的秘密藏身地点，1976年，他被有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地方军队抓获。格瓦拉被处决，而且他的双手被砍下，据传闻作为证据送给了卡斯特罗。他的尸体埋在了一个未做标记的墓里。1997年，他的遗骨被发掘出来，并空运抵达古巴，安葬在圣克拉拉——格瓦拉击败巴蒂斯塔军队的地方。[①]

卡斯特罗获得了声望，埃切维里亚决定扩大他的革命行动。他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计划通过攻击总统府来刺杀巴蒂斯塔，并通过占领电台来鼓舞古巴同政府进行斗争。攻击于1957年3月13日发动，但行动失败了，埃切维里亚和许多同志在同警察的斗争中牺牲。他的死造成了一个真空，并使卡斯特罗的地位与领导权得到了巩固。

在城市地下运动中，弗兰克·派斯（1934—1957）是一个受欢迎

① *Encyclopedia of Cuba*. Edited by Luis Martínez Fernández et al.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pp. 227—231.

的人物。1952 年，18 岁的他创建了一个组织同巴蒂斯塔斗争。1955 年，他加入了“七二六运动”，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为卡斯特罗的部队提供食物和武器。1956 年 11 月，他领导起义队伍成功占领了圣地亚哥的政府办公室几个小时。他发展了整个古巴的抵抗网络，使怠工与反政府行动协调一致。1957 年 7 月 30 日，他被警察杀害。他的支持者转向了卡斯特罗。

156

乌韦尔·马托斯（1918— ）首先从圣地亚哥到马斯埃特腊山区增援，在那里他参与了几次战役。1959 年，卡斯特罗任命他为卡马圭省长，由于害怕政府中的共产党掌管革命，马托斯辞去了这一职务。他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被判入狱 20 年，他的追随者也被逮捕。马托斯被捕是一个转折点，它证明卡斯特罗对古巴革命的远见不可能被不同意见所改变，不管公众意见如何，革命日程也将得到实施。

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1934— ）是埃切维里亚攻击总统府行动的参与者。攻击之后他逃到了古巴中部的埃斯坎布拉伊山中，在那儿开展游击活动。他的政治目标与卡斯特罗日益成长的社会主义议程相抵触，革命胜利后，他计划以暴动对抗卡斯特罗。由于反革命行为被发现，他在狱中待了 22 年，并受到拷问，一只眼睛失明。1986 年被赦免，之后一度生活在美国。2003 年，他返回古巴，并发誓要平静地工作。

西恩富戈斯、埃切维里亚和派斯是革命烈士，一些图书馆和大学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古铁雷斯·梅诺约和马托斯则没有进入革命政府的官方史册。

革命成就

古巴政府的大部分成就取得于革命的早期。到 1960 年，政府鉴定的文盲为 985 000 人，而总人口是 6 000 万人。一年后，超过 105 000 名学生在“识字运动”中作为志愿者教师，1962 年，古巴报告的识字率达 96%。当时，建设了 600 多所乡村学校和 300 多所城市学校，出

版了450万册初级课本。至1990年，古巴被认为是世界上教育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平均每42人就有1名教师，拥有50万受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才。

157

6 000多名反对政府的医生的离开对普通医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64年，以门诊病人为对象的诊所在全国设立，至1990年，约达400个。神经生理学、心脏学、X光线学、生物学的专业研究中心也建立起来。1990年中期，古巴拥有60 000名医生、9 000名牙科医生和75 000名护士。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古巴向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派出医生进行医疗服务。

1959年，土地改革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的上限为996英亩，这一政策加速了古美关系的破裂。1963年，第二部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上限为166英亩。城市改革法规定普通房屋和公寓的最高租金为居民收入的10%。70年代，志愿者团体在全国协助建设新住宅。

文化战争

20世纪60年代，古巴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古巴的标准新人被认为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自己发家致富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诸如增加薪水和休假时间等物质方面的激励措施都被取消，代之以精神方面的激励。在无私及自我牺牲方面表现出色的工人会被在媒体上予以表彰，并被颁发奖章和证书。人们对政府消除货币的计划进行了争论。由于工人生产积极性的下降，这些改造文化与社会的努力失败了。

1961年，卡斯特罗用一句类似习惯用语的话概括了对艺术和政治的不同意见的处理：“一切尽在革命中，革命之外之无他事。”古巴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必须考虑兼顾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革命将艺术视作在公民中加强忠诚的工具，卡斯特罗明确表示艺术的角色是使“人们变得更快乐，更美好”。（Lockwood，207）

卓越的作者对限制时期的艺术表述十分典型，如埃韦尔托·帕迪利亚（1934—2000），他是一名革命政府的批评者，1971年被逮捕入狱。帕迪利亚被迫在古巴作家与艺术家联盟进行自白表演，在此，他受到妻子贝尔克丝·库萨·马莱（1942— ）的指控，他的朋友也提供了其反革命的证词。限制制度一直实施到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则实施了检查制度，逮捕持有不同意见的诗人。

158

古巴的开放、改革与特殊时期

非凡的领导能力推动卡斯特罗取得了对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但是，一旦他掌握了权力，这种非凡的领导能力阻碍了古巴政府的管理效率。卡斯特罗表现出了一种显著的对古巴国家进行显微操作的爱好，他的压倒一切的权威和官僚机构的无能偶尔使革命陷入瘫痪。没有人愿意在没有征得卡斯特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出决定。这种管理模式受到拉丁美洲考迪罗主义——强有力的统治者参与决定一切——的影响，有时对古巴的经济是有害的。古巴的官僚和行政管理人员服从于考迪罗的每个愿望和梦想，不管它多么不切实际或者无用。

卡斯特罗的计划有点浪漫，而且宏伟。例如，1970年，他提出了生产1 000万吨蔗糖的目标，比历史最高纪录1952年的720万吨还多近300万吨。为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几乎全部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到田间收割甘蔗，公共汽车司机、教师、学生和律师被派去运送甘蔗，而且不顾他们的感受。场面宏大，但没有效率。然而，动员全国收获甘蔗——这就是闻名的甘蔗收获季节，别的经济部门却遭受损失。早年推动的工业化被忽视了，食品短缺加剧，豆子、牛奶和大米的配给量下降。60年代饲养的大牲畜超过700万头，而到70年代下降为不到500万头（Martínez Fernández，273）。咖啡的生产量也不足。

最终，尽管1970年蔗糖的生产量达到了850万吨——古巴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年产1 000万吨蔗糖的运动失败了。更为重要的是，这

一运动标志着古巴从工业化进程倒退到依赖蔗糖的出口，作为革命失败的直接后果，这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这与美国的经济起支配作用有关。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古巴政府找到了一个新的蔗糖市场——苏联。作为两国军事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苏联同意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补贴价格购买大批的古巴蔗糖。依赖外国力量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此前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古巴依赖于美国。在革命前，古巴 74% 的出口输入美国，65% 的进口来自其北方邻居（Martínez Fernández，285）。革命后，古巴的贸易仍旧保持着同样的水平，但是，目前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成为古巴的首要贸易伙伴。虽然政府试图平均分配食品，但食品短缺仍然在这个国家经常发生。为了换取外汇，古巴还出口一些粮食。为了换取津贴，古巴成为苏联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拥护者。当时卡斯特罗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他不顾古巴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仍将这种政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展到高峰。古巴的成就为苏联侵入阿富汗的结果所玷辱，因为古巴革命政府试图为苏联对一个弱小邻居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和解释。古巴提出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古巴人拼死保卫社会主义信条。70 年代，古巴人的战斗队在保卫安哥拉马克思主义政府对抗由美国和南非部队支持的反叛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古巴为纳米比亚铺就了通向独立的道路，并拒绝从安哥拉撤出，直到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从纳米比亚——这就是后来西南非洲的领土——撤出。在同一时期，古巴派出技术顾问帮助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或许以尼加拉瓜最为引人注目。

159

所有这一切在 1985 年开始发生转变，1985 年，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苏联的权力。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最著名的是开放与改革。开放政策意在寻求与西方的公开约会，努力减缓紧张与改良经济；改革意在鼓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公开争论。戈尔巴乔夫的出发点是改革共产主义，而不是破坏它。

卡斯特罗立刻抵制这些政策，古苏两国以及戈尔巴乔夫与卡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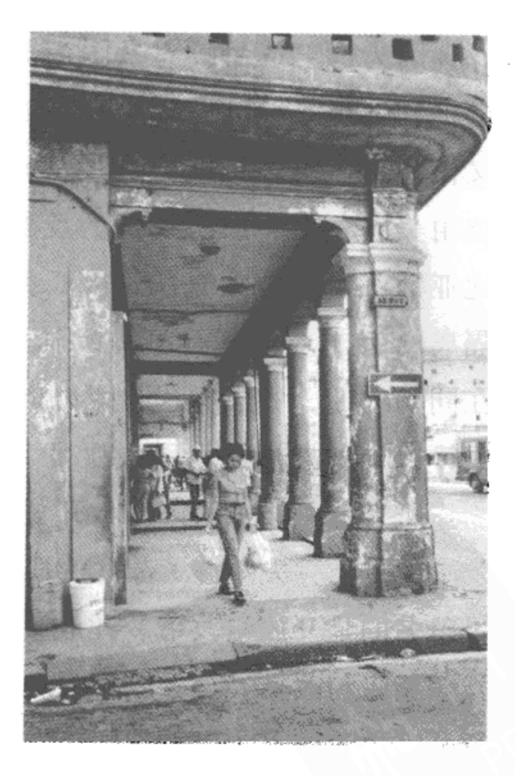
罗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陡然变化。为了回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政府实施了一项被称为“矫正计划”的新计划，意在减弱苏联对古巴的冲击。戈尔巴乔夫寻求打开苏联市场经济的力量，而古巴革命政府则在压缩小农市场和其他的自由交易。预料到即将到来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危机，古巴号召部分工人阶级更为觉醒，鼓励劳动大军中的志愿者增加生产。卡斯特罗精简政府的官僚机构以提高效率，并且遏制贪污行为。

160

戈尔巴乔夫没有控制住其改革的力量，苏联的 14 个加盟共和国强烈要求更加解放的思潮，并开始寻求独立。当这一切发生时，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放松了，很快，他们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制度。至 1991 年，苏联不存在了，它被意在重新创造它的改革弄得四分五裂。苏联被 14 个不同的国家所替代，最大也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短期内，东欧国家依次推翻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

古巴的经济危机

苏联的瓦解使人们思索古巴革命政府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古巴流亡社区的许多人希望卡斯特罗被剥夺权力。苏联集团的垮台使古巴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古巴的对外贸易额由 1990 年的 117 亿美元骤降至 1993 年的 27 亿美元（Martínez - Fernández, 286）。每年 40 亿—50 亿美元的苏联津贴戛然而止，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被卡斯特罗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


特殊时期老哈瓦那的破旧建筑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36%，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人口与政权的生存。古巴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尤其是在旅游方面，旅馆房间数量由 1990 年的 13 000 间增加到 2000 年的 36 000 间；允许外汇流通，尤其是美元；允许个体经营。约 20 万古巴人抓住机会经营起生意，如美容院，出租车服务，书摊，汽车、自行车和家庭用具的修理铺，小型家庭餐馆。在 1960 年被革命政府打击的卖淫活动也沉渣泛起，而且古巴政府默认了它的存在。20 世纪 90 年代的古巴，被称为“骑士”的妓女年轻、富有吸引力，并且受过高等教育，以提供性欢愉换取美元，她们进入外国人经常出入的高级商店、俱乐部，希望与可能帮助她们离开古巴的外国人建立关系。 161

162 政府采取多种手段以减缓经济的衰退。那些希望卡斯特罗下台的流亡人员有着讽刺性的发展，他们通过给古巴的家庭或亲戚汇款支持着这个政权，如 1989—1993 年，有 10 亿美元流入古巴。在美国的古巴流亡人员向古巴的汇款成为古巴外汇的第二大来源。

旅游业和对美元的渴望使得等级制度重新恢复。那些能获得美元的人——或在旅游业中工作、或与流亡人员有亲戚关系——成为一个特权群体。使用美元的古巴人可能购买朗姆酒、咖啡以及在美元商店能买到的各种器具。古巴人使用的法定货币——比索，不能在美元商店使用，在配给供给的古巴商店也受到限制，也不能购买通过政府配给体系发放的配给物。这种等级制度在主要城市里随处走走即可发现。那些能够获得美元的人家将房子修补并涂饰一新，而他们的邻居则破败不堪。总之，它证明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没有发挥作用。

经济手段不能解决那些因古巴的贸易伙伴瓦解带来的最根本的困难。一些疾病爆发，因维生素摄入不足，儿童也受到影响。灯火管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为保障不足的电力供应工厂和企业，家庭用电一断就是几个小时，工厂经常被迫停工。汽油缺乏导致许多城市不能使用汽车，自行车成为通常的交通工具。经济危机严重，出生率下降，流产率上升。

这些困难使得人们怨气增加。1994 年，数千名被忽视的青年冲向哈瓦那街头，向美元商店和一家受欧洲旅游者喜爱的旅馆投掷石块。当抗议者面对警察和非正规军时，更大的人群聚集在哈瓦那港的防波

堤上，并高喊“自由、自由”。秘密部门和军队逮捕一些抗议者，具体数字没有报道，政府切断了电话服务，试图确保最小数量的国际新闻报道。几天之内，古巴的人权领导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那些被怀疑参与防波堤事件的人的房子上被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者投了鸡蛋，涂了油漆，甚至被抹了粪便。

163

对卡斯特罗政府来说，防波堤事件并未发展成一场危机，这说明在古巴，当人们被控制、煽动和监视时，作为政治工具的人口动员是很成功的。没有政府的参与，集会抗议的企图都会被秘密部门和邻里监督组织——保卫革命委员会所破坏。

压制进入到了21世纪，2002年，一群改革者召集他们的组织巴雷拉计划纪念古巴牧师和爱国者费利克斯·巴雷拉，他们搜集了11 000人的签名，要求古巴实行政治改革和保障言论自由。这些改革者包括基督教解放运动的奥斯瓦尔多·帕亚和前古巴共产党秘书长之子费拉迪米罗·罗加·安图内斯。1992年修改过的1976年宪法规定，在古巴政府的许可下可以请愿。但古巴政府拒绝请愿，声称那是美国颠覆和破坏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一年后，50名巴雷拉计划的杰出成员被逮捕。帕亚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和欧盟颁发的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由于他的声望而没有被捕。他继续居住在哈瓦那的一处房子里，其前部墙上被一位涂鸦艺术家写上“叛徒”字样。至2007年初，随着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状况不佳，帕亚热心于被称为“国民对话”的活动，思考卡斯特罗之后的政治生活以及如何推动国家迈向民主与开放。

经过50多年的政治统治，尽管面对强大美国的压制和经常的危机，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政府被证明是有活力的。它以强制的团结、高压政治和保持权力的信念进行统治，自然担心古巴流亡人员返回并控制经济与政治。旅游与其他经济改革，包括制药工业的发展，还有欧洲与拉丁美洲的投资都使得古巴经济得到了适度增长。当然古巴会面对另外的转变，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可能不久于人世，人们感觉到，1959年革命的最后斗争还没有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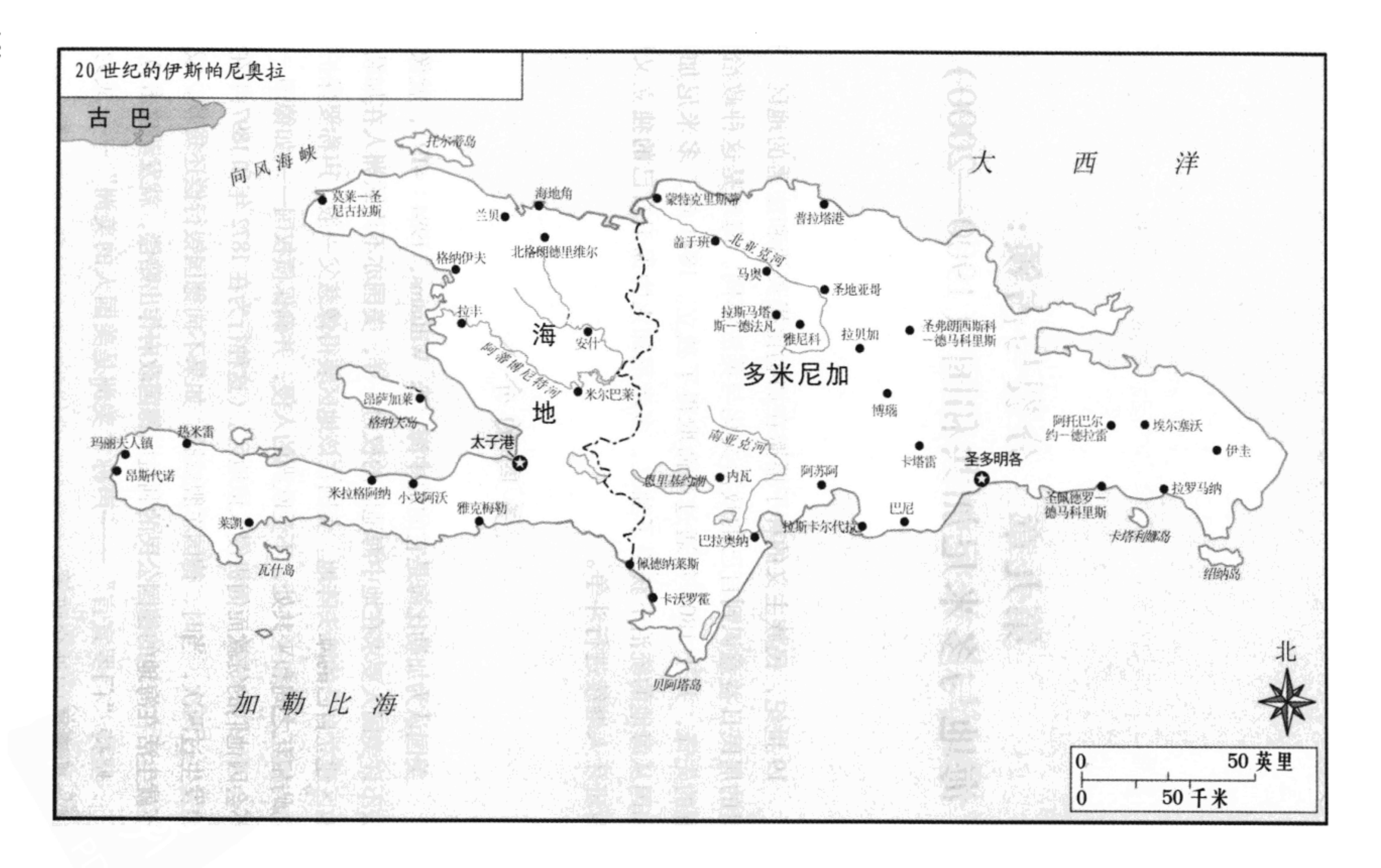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分裂与占领：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1900—2000）

19 世纪，民族主义的种子播撒在加勒比操英语和法语的地区，这里的居民日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与英法不同。海地是这种政治觉醒的先锋，并于 1804 年通过革命取得了独立。1844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从海地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多米尼加人为保卫自己的独立又同西班牙人继续进行斗争。 164

美国的介入

美国认为加勒比海是它的地中海（E. Williams，1984：419），就像英法不许美国人要求在地中海地区的权力一样，美国亦不许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自己的滩头阵地。美国在该地区装得像慈父一般，声称要保护各岛屿相互之间和平共处，不受欧洲的入侵，并确保债权国——如德国——不会因他们的贷款而伺机侵入该地区。（这种行为在 1872 年和 1897 年在海地发生过两次，当时，德国军舰威胁，如果不向德国银行偿还贷款，或者不就生活在海地的德国公民的利益向德国政府作出赔偿，就发动攻击。）

坚持“门罗宣言”——声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成为美国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165


20世纪的伊斯帕尼奥拉
古巴
托尔蒂岛
向风海峡
大西洋
莫莱—圣尼古拉斯
海地角
兰贝
北格朗德里维尔
格纳伊夫
拉丰
海地
安什
阿蒂博尼特河
米尔巴莱
昂萨加莱
格纳夫岛
太子港
热米雷
玛丽夫人镇
昂斯代诺
米拉格阿讷
小戈阿沃
雅克梅勒
莱凯
瓦什岛
加勒比海
蒙特克里斯蒂
普拉塔港
益于班
北亚克河
马奥
圣地亚哥
拉斯马塔斯—德法凡
雅尼科
拉贝加
圣弗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
多米尼加
博瑙
南亚克河
恩里基约湖
内瓦
阿苏阿
卡塔雷
圣多明各
巴尼
拉斯卡尔代拉
巴拉奥纳
佩德纳莱斯
卡沃罗霍
贝阿塔岛
阿托巴尔约—德拉雷
埃尔塞沃
伊圭
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
拉罗马纳
卡塔利娜岛
绍纳岛
北
0
50英里
0
50千米

166

20 世纪，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宣言”作了解释，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推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地将外国势力排挤出这一地区。然而，美国不是公开与欧洲国家对抗，而是积极预防。一种方法是确保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处理外债时由海关负责，为防止欧洲的涉足，美国控制了加勒地区经济极不稳定的国家的海关，强迫他们在偿还其他经济债务之前偿还美国外债。

190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临床试验的对象，这就是著名的“破产管理”。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多米尼加共和国积累了欧洲国家 3 200 万美元的债务。海关的管理充斥着腐败，许多海关官员被任命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关系，他们将海关税和国家进口产品的分摊税据为己有。收入的减少使国家难以偿还外债。为确保偿还债务，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意让美国管理其海关，并以关税收入额的 55% 偿还外债，其余给多米尼加政府用于公益。10 年后，同样的协议在海地实施。

正在展开的民族主义

日渐高昂的民族主义势必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到底。自我定义的过程在加勒比地区内部制造了矛盾，也暴露了文化统一性的缺乏和被视为“破碎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正如学者富兰克林·奈特在其著作《加勒比：破碎民族主义的创世纪》所定义的那样。从宗主国分离出来后，各个岛屿不得不面对已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现实。许多岛国从其前殖民主人的从属关系下独立出来，发现留给他们的却是成堆的经济问题和对其主权发展的暗中威胁。许多岛国的经济依赖于一两种主要的出口产品，这使得它们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剥削的对象。每一个社会的上层分子通常在美国或欧洲受过教育，他们自然向外国人寻求经济与政治的指导，而不是为本地公民的利益着想。他们经常为最大的外国利益而非本国利益而行动。结果，加勒比地区成了一个混乱、叛乱和革命的大锅。

167

破裂的年代

在种族事件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通过奴隶制度和伴随着它的种族意识形态，殖民帝国教育白人他们是最优秀的种族。他们创造了一个权力的金字塔，白人居于顶端，混血人种居中，有非洲血统的人位于底层。黑人减少这种分歧的努力却带来了掌握权力的白人的激烈反应。

在海地，黑人与黑白混血儿之间的鸿沟如同殖民地时期一样。当一个黑人当了总统，他总是喜欢黑人；而一个黑白混血儿当了总统，则正好相反。在牙买加，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带领他们走向自治的一代领导人由混血贵族组成，他们经常被称为“近白人”。当种族和种族特点不再具有优势，对文化价值理解的冲突则开始出现。在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富有的欧洲人倾向于认为欧洲先进、有教养，他们推崇像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都市中的文学、艺术和时尚。在海地，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的人物喜欢巴黎胜过太子港，并将自己看作黑法国人，而不是海地人。

不统一的例证

当一个岛屿的人审视其他岛屿的人时，这些看法会更加强化。在关于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的著作中，约翰·爱德温·法格说：“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在传统上互相敌视，而古巴人对其任何一方都不友好。”（Fagg，1）在过去的百年中，殖民国家经常发生战争，从而产生敌对，目前的加勒比地区就好比回到了以前的敌对状态。单一的农业助长了耕作的不统一，各个岛屿发现他们自己被迫与前殖民国家进行贸易，出售其种植的一种产品，不是蔗糖就是咖啡。即使有可能，加勒比各岛喜欢与欧洲和美国进行贸易，而不喜欢与别的地区进行贸易。

这是鼓励殖民依赖和培养裙带关系的典范。“商人依靠第一次或最初的血缘关系以保证忠诚和秘密”，历史学家斯坦利和芭芭拉·斯坦评论道，从“（欧洲）来的年青人通常是其外甥，在美国从事贸

168

易……赘入其家”（Stein and Stein，19，153）。家庭纽带与偏爱、朋友关系和社会阶层的束缚阻碍了他们与本地不同阶层及其他加勒比岛屿的团结。经济学酝酿并鼓励了这些弊病。种族特权、自我感觉文化优越和社会的排他性是对财富的奖赏，而且财富掌握在少数、通常是白人或肤色较浅的人的家庭。

对海地的占领

从1911年至1915年，海地发生了全面的动荡与混乱。1912年，总统在总统府被炸死，1913年另一位总统被毒死，第三位总统由选举产生，后来又被推翻。最后的危机是1915年7月27日总统维布伦·纪尧姆·桑（？—1915）被刺杀，这是对其简单下令处决173名政治对手的惩罚。总统桑在法国大使馆寻求安全与避难，但愤怒的民众发现其藏身之处，他们冲入使馆将其杀死并肢解了尸体。美国声称关心其财产与公民，随后派遣3 000名水兵到达太子港。

美国一直声称需要保护其利益，并渴望帮助海地，甚至在桑被杀之前，华盛顿就打算占领海地。美国海军新近起草了一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题目是“登陆并占领太子港计划”，勾勒了其军事行动（Schmidt，64）。考虑到已经加入世界大战（1914—1918）的德国可能在海地建立基地，美国希望保证莫勒圣尼古拉斯港的安全，所以要在此处设立海军基地。占有海地的海关是其第三个目标。

美国强迫海地的国民议会选举菲利普·絮德雷·达提格纳佛（1863—1926）为总统，此人对美国的利益有偏爱。海地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协议，给予美国对海地海关的控制权，由美国财政顾问监督，并建立海地国民卫队。当协议签订时，海地国民议会的成员十分犹豫，美国威胁要扣发他们的薪水。

美国控制了海地除教育和司法之外的所有政府部门，海地人不能在政府中占有高级职位。参议院被关闭，中心权力属于总统以及与之在一起的美国海军。 169

佩拉尔特起义

尽管海地上层富有爱国心，他们痴迷于法国文化并轻视美国文化，但他们并没有对美国的占领提出抗议，更不与之作斗争。因此，太子港实际上显得很平静。反抗美国占领的斗争在乡村展开，以私人武装为先锋，最为出名的是“懦弱者”及其领导者夏尔马涅·佩拉尔特（1885—1919）。1918 年，当美国强迫农民修筑公路，“懦弱者”奋起反抗。作为回应，美国在城市实施宵禁，检查出版物，解除政敌们的武装，并派遣海军陆战队到乡村地区。

“懦弱者战争”持续了一年，并因此出了名。美国首次动用飞机运送地面部队，冲突导致了 3 000 多名海地人死亡，而美国仅损失了 13 名海军陆战队员。冲突使美国再一次表现出其控制加勒比国家命运的能力，就像它 1898 年所做的那样。美国将佩拉尔特描绘成一个农民，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海地的将军，受过良好的教育。佩拉尔特运用游击战术不断骚扰美国人，他的军队估计在数千人，曾一度达到太子港周边地区。

“懦弱者”战争随着佩拉尔特的死亡而结束。美国的指挥官在佩拉尔特的军队中培养了一个代理人，以便能够突袭并杀死领导者。为了证明佩拉尔特确已死去，海军陆战队将佩拉尔特的尸体放置在门口拍照，并使其两臂伸展，就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照片被投稿给一个传奇文学杂志，这家杂志社至今仍在。

1922 年，海地成立了影子政府，由两个人管理这个国家，一个美国的高级特派员约翰·亨利·拉塞尔（1872—1947）少将和海地总统路易·博尔诺（1865—1942）。拉塞尔将军是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代表，对海地的民族与文化没有感觉。海军陆战队员多来自北美的南部，自大而傲慢，显然他们将海地人视为劣等人。美国报告说，军事占领使得公共卫生设施的改进和修筑公路成为可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侵犯人权的不断控诉。

海地作家对占领的反应

美国的占领激发了海地作家理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反抗，这成为海地文学复兴的催化剂。许多享誉国际的海地文学作品在此期间出现。占领激发作家们发展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国民身份和对黑人（négritude）的肯定。几十年来，对美国占领的反抗影响并塑造了占领后的作家及知识分子的著作。

诗人埃德蒙·拉福雷（1876—1915）以自杀抗议美国的占领。小说家莱昂·拉莱奥（1892—1979）发表小说《冲击》，描述了美国对海地的占领。让·普里斯—马尔斯博士（1876—1969）1932年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海地大使馆做顾问，回来后嘲笑沮丧的知识分子。1928年，他出版了《如此评说山姆大叔》，讽刺了占领事件以及导致被占领的某些心态。在书中，普里斯—马尔斯指责他的同胞实行集体的“包法利主义”（Bovarisyme，1856年，格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女主角对浪漫错觉的暗示），以为自己是有色的法国男人和女人，并否定他们是非洲人的后代。他还指责海地贵族忽视其他居民，尤其是黑人农民。

为了对普里斯—马尔斯的说法进行回应，年轻作家转向了自己的根源，并赞美他们自己的肤色。《当地时事讽刺剧》杂志由诺尔米尔·西尔万（1900—1929）创办，它试图在海地培育国家文化，并抵制美国的影响。海地作家模仿法国文学，使之流行起来。一种深受欢迎的文学是农民小说，其富有同情心地描绘了海地农民的斗争，最著名的作品是雅克·鲁迈思（1907—1944）的《露水的主人》（1944）。[1]

当一位新海地总统斯泰尼奥·樊尚（1874—1959）于1930年由选

[1] Figueredo, D. H., ed. *Encyclopedia of Caribbean Literatur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6, pp. 23 -25.

171 举产生，他迫使美国结束了占领。1934年，海军陆战队从海地撤出。美国的介入被一位学者描述为到处不受欢迎，而且激起了猛烈的反抗。（Renda，34）

海地

20世纪的许多时间，海地由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07—1971）——众所周知的“杜爸爸”所统治。通过父子王朝的强迫征税，杜瓦利埃试图给海地带来稳定，确实也带来了近30年的表面平静。然而，这种平静是基于恐怖的平静。

杜瓦利埃是一位教师兼面包师的儿子，他在海地太子港的佩蒂翁公立中学读书。1934年，他毕业于医科学校，并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此期间，他似乎主要关心文学活动和医学职业。他参加了一次消除雅司病——一种折磨人的皮肤和骨头、令人行动困难的疾病——的活动，这使他开始关注国家。由于他好像没有政治野心，而且因此被认为清廉和诚实，并被鼓励去竞选总统职位。他这样做了，并于1957年赢得了大选。

然而杜瓦利埃对权力的渴求证明了他贪求无厌，而且很快他任命自己为终身总统。他清洗了那些对其不忠的武装力量。1959年，他建立了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压制不同意见。他禁止工会，并通过驱逐牧师和选举主教将天主教置于其控制之下。

杜瓦利埃政权有两个特征，一是他声称自己是一位巫毒教牧师，有无处不在之能；二是实施黑人法西斯主义——基于其对黑人特点、黑人意识的邪恶解释，这种意识先前由海地人让·普里斯—马尔斯（1876—1969）和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1913— ）所倡导。杜瓦利埃断言，海地历史上的黑白混血儿的政权是基于人种和种族的选择，反映了欧洲人对肤色较浅的黑人的偏好。因此黑白混血儿习惯于并渴望权力，所以必须对其审查。杜瓦利埃政府对30 000—60 000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其中多为黑白混血儿。

在1971年死前，被称为“杜爸爸”的杜瓦利埃修改了海地的法律，他通过对超过200多万选名选民的虚假请愿书批准同意，允许其将权力传给儿子。这些请愿者担心，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受到迫害。

1971年4月，一个19岁的青年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在其父亲死后担起领导海地的大任。起初，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推翻了其父亲的许多独裁法令，允许自由出版，实行教育改革，发起公益事业。他与一位上层黑白混血女孩的婚礼花了300万美元，他喜欢肤色较浅的黑人，这使他与其父亲的支持者黑人中产阶级发生了冲突。尽管他试图放宽统治，压制与政治恐怖仍然是其突出特征，当反对者被逮捕并被军官拷问时，这位年轻的独裁者不能也不愿克制自己。不像他父亲将反对者的领袖判处死刑，让—克洛德喜欢将他们驱逐。

172

杜瓦利埃和巫毒教

杜瓦利埃以“民间宗教”为手段来控制海地人民。在与洛里梅·德尼合写的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杜瓦利埃描述巫毒教“按照国家的独立，作为海地统一的最优因素，在‘出生地’——本国的土地上——巩固非洲人的传统。‘杜爸爸’在政治上运用巫毒教是遵循了海地一系列领导人的传统，他们利用宗教以达自己的目的。……（他运用宗教）依靠三种基本方法：擅用宗教的神圣力量、运用魔法来伤害甚至消灭对手和滥用宗教作为政治宣传的渠道。有系统的宗教行为是沟通或接收来自民众信息的不错的途径。这表明‘杜爸爸’对民间宗教的利用不仅是将巫毒教牧师转变成他的令人畏惧的国民军——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组织、也即众所周知的通顿马库特——而且寻求建立海地群众与总统完全的、直接的沟通。经常与农民进行个人互动交流是‘杜爸爸’领导风格的突出特征。对来自乡下的人来说，受邀到太子港与总统会面是很不寻常的”。①

① Lewis, R. Anthony. “Language, Culture and Power: Haiti Under the Duvaliers.” *Caribbean Quarterly* 55, 4 (Dec. 2004): p. 1.

173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1924— ）强调人权，可能会促进年轻的杜瓦利埃表现出更宽容的态度。卡特将经济援助与人权直接联系起来，由于海地预算的一半来自美国政府的给予。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杜瓦利埃表现出了克制。让—克洛德放松了对出版的限制，1938 年他允许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拜访海地。

这一策略事与愿违，报刊开始批评政权，教皇利用拜访的机会要求政治改革。500 多个天主教团体建立起来，训练穷人组织有凝聚力的团体，游说社会福利，并挑战政府。当杜瓦利埃再次对出版物进行检查并逮捕了 100 名反对派领导人时，天主教在礼拜集会期间，利用牧师向集会群众通报海地的政治状况。

杜瓦利埃王朝的终结

有几个事件加速了杜瓦利埃政权的垮台。1980 年，100 多名海地人试图偷渡到美国，结果船只在一珊瑚礁处搁浅，海地政府没有设法营救，将这一责任留给了其他加勒比国家。杜瓦利埃对此事没有做出反应，这被当作他对穷人不闻不问的证据，并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1984 年，在食品暴动中，政府军队开枪射杀了 40 名抗议者。

当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崩溃时，学生团结起来对抗政府。1985 年，超过 60 000 名青年走上太子港街头，并高呼："宁愿站着死，不肯跪着生。"（Bellegarde- Smith，107）在乡村，一场以和平为目的的叛乱由农民领导者组织起来。同时，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军队中的官员推翻现政权。他们一起努力结束了杜瓦利埃时代。

1986 年初，美国政府取消了对杜瓦利埃的支持，并要求他离开海地以避免流血事件。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加之军中意见不合，杜瓦利埃决定逃离海地。1986 年 2 月 7 日，他飞抵巴黎，并居留在那里直到今天。虽然离开了海地，但现在他偶尔还表示要通过竞选总统在海地东山再起。

杜瓦利埃时代给海地带来了创伤。1960 年，海地有 200 位百万富翁，而 90% 的人口年收入不到 120 美元；1% 的最富有的海地人拥有

60%最肥沃的土地。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由 1958 年 21%上升到了 1980 年的 87%，而且通货膨胀率一直徘徊在 30%左右。（Bellegarde - Smith，109，125）

在杜瓦利埃统治的 1957—1986 年，20 000 至 50 000 海地人被杀害，1/5 的人口逃离了祖国（Bellegarde-Smith，97）。人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只能将抗议压抑在心底。一些人相信，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有效地利用了巫毒教，拥有无所不知的力量，能够听到他们说的任何事情。海地人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父子两人从海地盗取了近十亿美元，生活奢侈得像 18 世纪法国富有的种植园主。 174

1987 年，对新宪法的投票人数超过了百万。然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没有参加投票，因为很多人仍然害怕遭到报复。另一原因是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投票程序以供公民投票。新宪法确认克里奥尔语为海地的国家语言，巫毒教为合法宗教。平民总统莱斯利·F. 马尼加由选举产生。

当平民总统计划改革现有的军事结构时，军官们罢免了马尼加，并任命亨利·南菲将军为统治者，人们对改革和经济进步的期望破灭了。随后，南菲被另外一位军人普罗斯佩尔·阿夫里尔废黜。来自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制止了军人政府。在暴力频发的情势下，尽管两位总统候选人被刺杀，但总统大选还是于 1990 年举行。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前西里西亚牧师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1953— ）神父，以 67.7%的选票当选为总统，超过对手 300 万张选票。总统阿里斯蒂德用克里奥尔语进行就职演说。他们允诺将推行识字普及，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们的工作事项包括提高诸如糖和大米等来自美国的进口货物的关税，还将鉴别、没收由富人转移出海地的资金，并上缴国家。

很快，阿里斯蒂德遭到了很多派别的反对，包括希望自己的一名成员成为总统的海地共产党、认为阿里斯蒂德行为过激的天主教和其中很多人仍忠诚于杜瓦利埃的军队。结果，一场军事政变使第一位牧

师政治家流亡委内瑞拉，后来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发起夺回权力的运动。1994 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1946— ）可能考虑到海地政175治与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大量的偷渡事件，准备以 20 000 多人的部队侵入海地，以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总统之职。海地军方同意此后至阿里斯蒂德任满的两年为和平过渡时期。阿里斯蒂德很荣耀地接受了协议，并于 1996 年按照宪法规定卸任，宪法规定总统不能两届连选连任。阿里斯蒂德的行动使他受到海地投票人的爱戴。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表示将再次竞选总统职位。2000 年，他再次当选总统，但没有受到欢迎，由于他的竞选活动带有暴力污点，而且大多数海地人认为投票过程有舞弊行为。观察家写道："几个竞选对手被杀害；选举法庭受到恫吓而给予阿里斯蒂德先生的政党十个参议院的席位。阿里斯蒂德先生在反对派联合抵制的投票中再次当选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里斯蒂德几乎确定无疑地赢得了这些自由的投票选举，但是，他正转变成另一个海地独裁者，希望取得对其贫穷国家的绝对控制。他依靠阿飞党来执行其统治。"（Leaders: Whose Coup in Haiti? *Economist*, 13）

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阿里斯蒂德被控允许毒品贸易在海地自由进行，并雇用暴徒为其个人服务。至 2004 年，海地国内发动了一场罢免总统的民众运动。一场叛乱暴发，而且反阿里斯蒂德的叛乱控制了半个海地。由于害怕内战，美国和法国鼓励阿里斯蒂德流亡，就像 10 年前的杜瓦利埃一样。2 月 29 日，总统这样做了，只是他声称被美国的军事人员绑架并流放到中非，美国政府否认这种指控。

多米尼加共和国

就在占领海地一年后的 1916 年，美国开始了对多米尼加共和国为期 8 年的占领。很明显，其原因与占领海地一样：由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无力偿还外债，欧洲国家威胁要侵入。如同海地一样，一些多米尼加人试图抵抗美国的占领。一些品阶较低的官员、普通士兵和农民在

乡村地区发起抵抗运动。但是结果一样——具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轻易打败抵抗者。机关枪和大炮的使用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被证明是有效的，就像在海地使用飞机一样。一场战斗发生在海军陆战队登陆一个月后的1916年6月，这说明冲突并不均衡。抵抗者在拉巴那基达镇（La Barranquita）被击溃，这里是他们选择的一个立足点。参加战争的74名多米尼加人有26人死亡，而美国的陆战队员仅1人受伤。 176

在8年的占领期间，美国将军事法律强加给多米尼加人；强迫创建了许多新的部门，包括劳动部和卫生部；劳动部强制推行标准很低的最低工资，而卫生部则要求不合格的医生禁止行医，取得医生资格必须提供大学学历证明。修筑公路以便于武装部队的移动，创建国家警察部队以便于追捕强盗和乡村的反叛者。其中的一名警察就是后来的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1891—1961），后来他的组织技能得到了运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多米尼加民族主义者成立多米尼加全国联盟，发起一场旨在结束美国占领的大规模运动。该组织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开展公关活动，迫使美国结束占领。1922年，多米尼加人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撤兵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临时政府，与北美军事统治者共同治理，直到选举出新政府。在选举出一位多米尼加总统后，美国将结束占领。这项计划得到了双方的批准。1924年，奥拉西奥·巴斯克斯（1860—1936）当选为总统，7月美国军队撤离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20世纪的其余时间是两位超级考迪罗的统治时期：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和华金·巴拉格尔，从1930年统治到1996年。尽管特鲁希略利用傀儡总统，如他的弟弟和巴拉格尔，但他的统治（1930—1961）并不连续，以此来给人以他是一个文官的表象。巴拉格尔的统治被打断了几次，他作为总统的时间是1960—1962、1966—1978和1986—1996年。

多米尼加的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

1930年，拉斐尔·特鲁希略在其自1925年即指挥的军队的支持

下当选为总统。他即总统之位不久的9月3日，一场飓风几乎将圣多明各毁灭。灾难给予了特鲁希略一个展示管理能力的机会。他对首都177实行警戒以确保不会发生抢劫事件。他分配食品和水，并在数天内即已开始重建家园及邻近地区。他的坚决、果断和能力使其工作顺利完成，即使是反对派也保持了沉默，武装部队和中产阶级对其喜爱有加。

特鲁希略的统治持续了31年（1930—1961）。有时他作为总统统治，有时他在文官政府的背后控制。他的政府以经济进步和残忍为特征。1931年，特鲁希略命令外债延期偿还，仅支付利息。1933年，他平衡了国家预算。1940年，他从美国手中恢复了对海关的控制。这一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对国家主权的推动，使他赢得了“国家财政独立的修补者”的称号。20世纪40年代，特鲁希略收购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的支行并将其组建成多米尼共和国储备银行，付清了国家债务，并创造了多米尼加比索，替代了自1899年以来当作国家货币使用的美元。1955年，他们的政府购买了美国持有股份的圣多明各电力公司，并将其转变为多米尼加股份公司。所有这些财政上的获利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结果，它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在美国开辟市场。

反海地主义是特鲁希略行政的基本理念。这位独裁者利用多米尼加和海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多米尼加人中培养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身份意识。知识分子上层开始支持特鲁希略的看法——多米尼加文化浸满着欧洲和罗马天主教的先进理念，而与之对立的海地文化则被描述为落后的、非洲的和陷入迷信与巫毒教困境的文化。由海地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而造成的传统恐惧，则被用来煽起担心的火焰。反海地主义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它隐藏了特鲁希略时期几乎所有的对公民权力的漠视和特鲁希略家族聚敛的巨额私有财富。

1937年10月，特鲁希略下令对数千海地人进行屠杀。准确的死亡数据尚不知晓，但据估计在4 000—20 000人之间。特鲁希略命令他的军队用匕首和砍刀杀死任一被怀疑为海地人的人。为了确定国籍，他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测试，“pejeril”（欧芹）一词对讲克里奥尔语

的人来说发音比较困难，如果一个人被盘问时，不能发出这个词的音，那他就倒了霉。

178

种族屠杀持续了三天，国际报刊关注着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而对海地人的大屠杀则没有给予关注。最后，在美国、古巴和墨西哥的压力之下，特鲁希略装模作样地审判了几个官员。他们被判入狱 30 年，但从来没有在监狱服过刑，答应给予海地政府 75 万美元的赔偿，而实际只付了 50 万美元。

至特鲁希略政权结束时，一些人估计，特鲁希略家族占有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50%—60% 的可耕地。在政府与他们的私人生意之间，他们雇佣了 75% 的劳动力。在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 200 美元，而特鲁希略聚集了估计 8 亿美元的不动产。除了经济权力，特鲁希略还通过控制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体来巩固其政权。他的政治联盟在公众中精心地赞美他，官方教课书中将他称为“太阳”和“光明”。特鲁希略的雕像和半身像遍布全国；家中没有雕像的被认为不支持政权。公园、街道、山脉和城镇以其名来命名，以示尊重。他甚至走得更远，将圣多明各改名为特鲁希略市。这位独裁者建立了一党制以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只有来自多米尼加党的候选人才能合格地参加选举。

对政治对手的拷问和刺杀在特鲁希略时代很普遍，甚至那些在别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人也会成为刺杀的目标。1956 年，学者赫苏斯·德·加林德斯（1915—1956）著书揭露特鲁希略如何非法聚敛财富，被在纽约的特鲁希略的秘密组织诱绑，送回多米尼加共和国并被杀害。在其政权结束之际，特鲁希略的党羽杀害了三姐妹——米内尔瓦（1926—1960）、帕特里亚（1924—1960）和玛丽亚·特雷莎·米拉瓦尔（1936—1960），因为她们参加了秘密活动。三位女士被打死后放进一辆小汽车并被推下悬崖。1994 年，米拉瓦尔姐妹的故事被胡利娅·阿尔瓦雷斯（Julia Alvarez）改编成小说《烈焰飞蝶》。2001 年，该书被改编成美国电视剧，由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和爱德

华·詹姆士·奥尔莫斯（Edward James Olmos）主演。

1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 年 5 月 30 日，独裁者本人被反对派射杀在汽车之中。甚至在其被刺之前，特鲁希略在握有大权的时候即已显出将会被杀的征兆。当时，特鲁希略被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所孤立，他们讨厌他的独裁之路。在他政权的最后时期，特鲁希略试图暗杀其政权的批评者——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1908—1981），之后，美洲国家组织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贸易封锁。最后，与其保持长达 30 年融洽关系的美国撤回了对其政权的支持。

特鲁希略之死

1961 年，特鲁希略的被刺导致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混乱。在被埃里克·威廉斯称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无情和最有效的”独裁政权下生活了 31 年之后（E. Williams，1984：465），多米尼加人发现自己活在政治真空之中。独裁者的儿子拉姆菲斯·特鲁希略（1929—1969）接管了军队。傀儡总统华金·巴拉格尔仍然被安放在总统位置上，继续统治着国家。拉姆菲斯追索策划暗杀特鲁希略的成员，并几乎将他们全部处死。

拉姆菲斯·特鲁希略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并没有统治才能。不久，他的舅舅埃克托尔（Hector，1909—2002）和何塞·阿里斯门迪·特鲁希略（？—2000）试图管理政府。在此期间，培养出管理能力的信心且第一次在没有暴君的指示下行动的巴拉格尔，决定对以前反对特鲁希略的人进行大赦。特鲁希略兄弟反对这项计划，并试图将巴拉格尔赶下台，随后逮捕并杀害了反对者。

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1917—1963）深为多米尼加另一个潜在的军事独裁政权担忧。他派遣主力舰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劝说特鲁希略兄弟放弃权力。1961 年 11 月 22 日，也即特鲁希略死后 6 个月，这个国家首都的名称从特鲁希略市恢复为圣多明各——其殖民地时期的名称。特鲁希略政权的残余被清除，他遍布全国的雕像被推倒。巴拉格尔仍旧留职，作为文官政府议会的一部分。

诗人与总统——胡安·博什

1962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并选出胡安·博什为总统。如果巴拉格尔代表特鲁希略时代的旧秩序，而博什则是进步变化的象征，就像菲德尔·卡斯特罗改变了整个古巴一样。博什是一位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和评论家，1909年6月30日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贝加（La Vega）。1937年，博什向特鲁希略独裁政权提出抗议，并离开多米尼加到达古巴。两年后，他在古巴创建了多米尼加革命党，目标是推翻特鲁希略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在接下来的20年，博什和他的政党在财政上支持并计划了几次并不成功的驱逐特鲁希略的武装远征队。 180

1962年赢得了大选之后，博什政府实施进步措施，限制个人的股份公司发展大地产，同意男女同工同酬，创建平等的法律保障制度，保护合法儿童和非婚生儿童平等的权利。新政权很快就树立了敌人，它强调言论自由——允许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观点、促进共产主义以及喜欢将教育与教会教育相对——使天主教将其描述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新总统批准了一项限制制糖工业出口糖利润的法令（每百磅糖的利润限制是5.83美元；超出这一限制的任何利润都要交给政府），这下激怒了经营者。权力被博什削减了的军队开始密谋反对总统。

1963年，任职几个月后博什被迫流亡国外，一个军人集团接管了政府。多米尼加革命党共谋恢复前总统。1965年，多米尼加革命党的激进分子占据了总统府。当他们计划博什从流亡的波多黎各返回时，多米尼加空军袭击了总统府。接着内战爆发，持续了不到一年，导致了2 000名多米尼加人死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圣多明各登陆。1965年8月，停战协定签署，临时政府建立，大选在准备之中。

在花费了1 300万美元的竞选活动之后，巴拉格尔赢得了1966年的总统选举，57%的人参加了投票，巴拉格尔获得了40%的选票。

华金·巴拉格尔

1906年9月1日，华金·巴拉格尔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比利亚比索诺（Villa Bisono）[①]。23岁时毕业于圣多明各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他到巴黎继续学习，1934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

181

1930年，巴拉格尔协助特鲁希略取得政权。1932年，他被选派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1934年，被任命为多米尼加共和国议会驻巴黎的秘书，这是他在特鲁希略时代担任的多种职务——包括外交国务秘书、驻拉丁美洲几国的大使和共和国副总统——中的第一个职务。在这一时期，他不仅为特鲁希略撰写演说词，还撰写了几本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文学与历史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文学史》（1944）、《文学肖像》（1948）和《自由的基督》（1950）。

在巴拉格尔任总统的头两年，美国希望加勒比地区有一个保守的人物掌权以平衡卡斯特罗的影响，因此给巴拉格尔提供了1 300万美元的资金。他用这笔钱修路、造桥、建房、开挖河道、修建大坝以及旅游观光设施。外国公司受邀参与其金矿与镍矿的开采。

然而这种繁荣只是一种幻觉。资金主要来自美国，这些工程使那些富人和巴拉格尔更加富有。当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而蔗糖价格下跌时，选民们将选票投给了博什的老政党——多米尼加革命党。1978年，他们从多米尼加革命党中选出一个年轻一点的领导人安东尼奥·古斯曼（1911—1982）。

对多米尼加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10年是不幸的10年。糖的价格降至每磅4美分，而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了40亿美元。当政府提高石油价格以保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征税的限额一致，暴动于1984年爆发。1986年，巴拉格尔重新掌权，再次着手诸如修路、建造电厂等公共工程。1990年和1994年他再次当选，并且平衡预算、降低通

① 位于北部的圣地亚哥省，今称纳瓦雷特（Navarrete）。——译者注

货膨胀。在 1994 年的选举中他击败了对手弗朗西斯科·佩纳·戈麦斯（1937—1998），但却非常令人怀疑；戈麦斯发动了一场罢工以抗议大范围的选举舞弊。于是经过美国的调解达成了一项协议，巴拉格尔任期两年而不是四年后辞去总统职务。

巴拉格尔死于 2002 年 7 月 14 日，作为总统，他是一个独裁者，而且不诚实，经常侵扰候选人，包括阻止选民投博什的票、推迟计票。182 但他代表了从 19 世纪独裁的统治模式向 20 世纪在民主架构下政治家自愿工作的统治模式的转变。

多米尼加共和国成功的民主政治

1996 年，年近九十且感到身体不适的巴拉格尔离开总统职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考迪罗时代结束了。两位候选人——佩纳·古斯曼和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1953— ）——参加了竞选活动。佩纳·古斯曼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在美国长大的费尔南德斯是一位与美国有关系的保守人物。选举却成为种族主义的讲坛，由于佩纳·古斯曼被描述为有海地血统，因而被讽刺像只猴子，而且被指控想将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统一。竞选活动中更多的背信弃义的部分是主张候选人的海地血统要清楚地说明他们的非洲根源——这种种族根源在许多多米尼加人看来是低等的。竞选活动转入最坏的、过度的反海地主义——从 19 世以来一直盛行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种政治和种族的意识形态。尽管种族主义分子在活动，但佩纳·古斯曼还是获得了 49% 的选票。然而，获胜者费尔南德斯获得了 51% 的选票。

总统费尔南德斯结束了由巴拉格尔培育的孤立主义，并积极参与到世界中去，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在国内，他的政策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个位数，经济增长率为 7%。根据宪法的规定，费尔南德斯于 2000 年卸任，但是 2004 年他重新掌权。当时，经济处于崩溃之中，通货膨胀率达 50%，银行因被挪用 250 万美元而破产，42%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费尔南德斯实施节俭计划，精简公共部门职位，增加税收，并较好地控制了国家预算。这些手段使他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获得了6.65亿美元的贷款。他大力促进旅游业，每年为国家带来20多亿美元的收入。他讨好好莱坞工作室使之到多米尼加拍摄电影，并计划修建地铁系统。

他的计划也遭到了批评，因为费尔南德斯将教育经费拿出来修建地铁，没有控制住吸毒活动，而且没有与腐败行为作斗争。犯罪率高是费尔南德斯统治的另一个污点。记录显示，2001年共发生了1 086起见诸报道的凶杀事件。至2005年，凶杀事件上升到2 382起。在这段时期（2001—2005）有报道的凶杀事件总数达9 300起，其中受害者中790人是妇女（Pina，1）。总统声称这是国家长期受到折磨的结果，并命令军队在圣多明各街头巡逻。

这一行动被看作是1930年飓风毁坏了首都之后，特鲁希略对圣多明各管理的再次上演，当时他派遣军队到达受灾地区以取代当地政府进行军事统治。但是许多多米尼加公众并未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在特鲁希略统治期间，没有有组织的政党反对他，而且特鲁希略是个军人。对费尔南德斯来说，2005年并不是他这样做的好时机。在21世纪，作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家园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在见证脆弱民主政治的成长，虽然多米尼加仅是一种表面化的民主政治，而海地的也仅是激烈的政变过程，但海地人试图遵从宪法来建立并维护民选的政府。

第十章 联邦、联盟与自治：波多黎各、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荷属加勒比（1900—2000）

当政治领导人预想后殖民时期的政府时，独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殖民国家压迫殖民地确实不对，但帝国贸易确保了殖民地的收入来源和物资的供给，哪怕是最低的水准。许多领导人也意识到自己国家地理上的局限，如没有较大的河流供运输货物，没有辽阔的幅员供发展农业。与殖民国家完全决裂可能会使新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此，当这些小岛上的一些领导人称赞独立精神时，他们寻求一个更实际的途径，以确保经济进步和百姓的生活安定。 184

波多黎各发现自我

根据《巴黎条约》的条款，西班牙放弃波多黎各给美国。对美国来说，定义波多黎各的政治地位成为新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心议题。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不牢固。1900 年，美国通过了《福勒克法案》，结束了对波多黎各的军事统治。该法案规定波多黎各总督由美国总统任命，立法机构由执行议会和代表院组成。波多黎各人可以选举组成代 185 表院的 35 名成员，但绝大部分权力在总督和执行议会手中。

《福勒克法案》给波多黎各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为没有给予其独立、自治或者州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态，1917 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签署《琼斯法案》，给予所有波多黎各人以美国公民身份。该法案给予波多黎各以管理地方事务的更大的权力，并建立了波多黎各参议院和众议院；它还允许波多黎各人在美国与波多黎各之间自由旅行而无需签证。但该法案使波多黎各人受制于美国的军事计划，如美国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保留了任命波多黎各总督的权力，一直到 1947 年《琼斯法案》得到修改，允许波多黎各人选举出他们自己的总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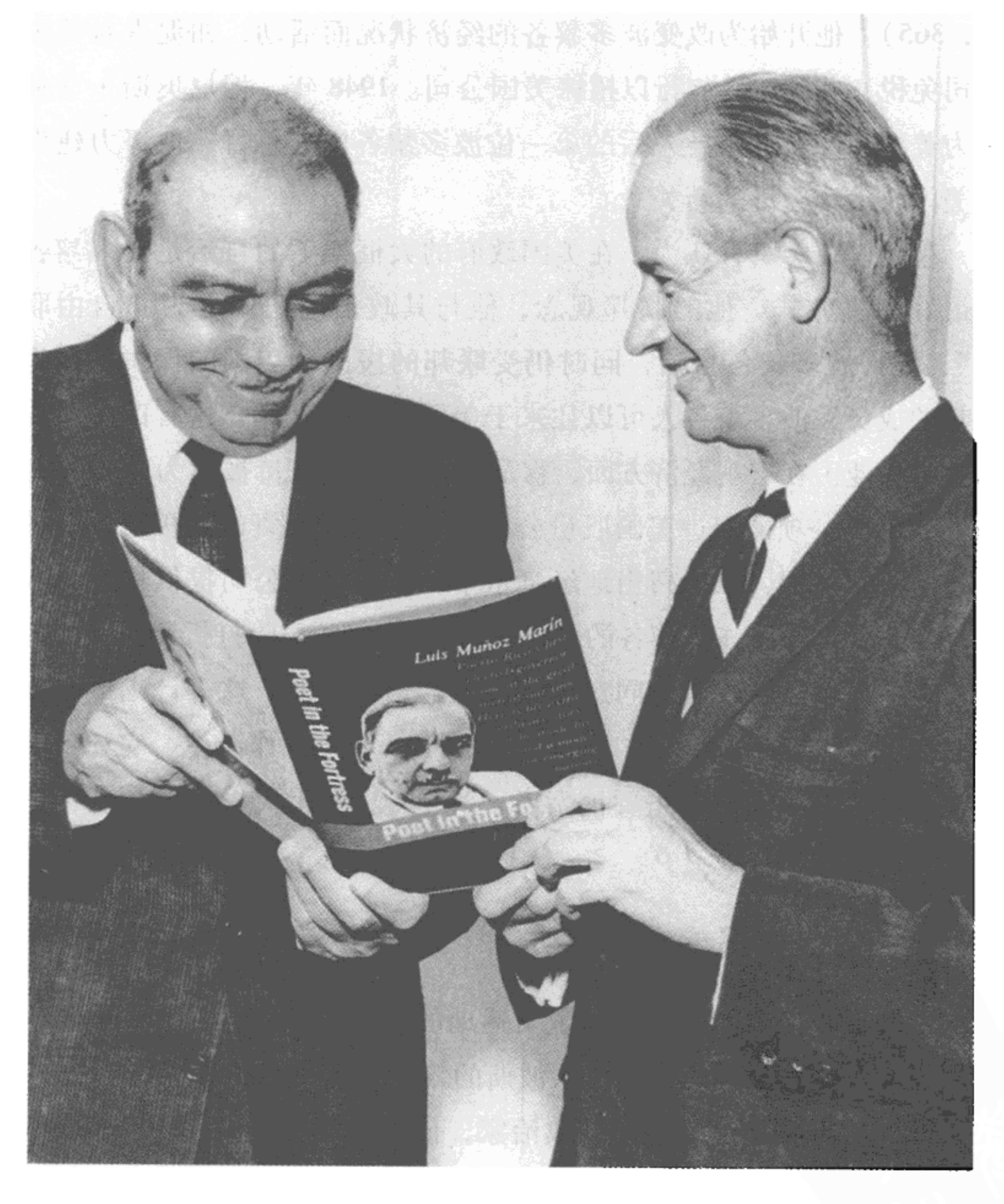
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国籍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母语和文化都是外国国家的公民。美国的习惯和传统基于新教的价值观，而波多黎各遵循天主教的发源地西班牙的传统。而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知是将波多黎各人看作是美国人还是拉丁美洲人。

在 20 世纪剩下时间里，波多黎各人对定义自己地位的三个政治选项进行争论：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独立自主或独立于华盛顿的自治联邦。很显然，波多黎各人对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并不感兴趣。在美波这种关系的早期，许多波多黎各人都支持的一项政策有助于形成独立自主运动。两位领导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1891—1965）和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1898—1980）。这两个人支配着波多黎各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政治生活。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与其父亲路易斯·穆尼奥斯·里维拉一样，有写诗的天赋，1917 年游历了波多黎各岛。他看到了农民如何被甘蔗种植园主和咖啡园主虐待。那时，他是社会党成员，当接见农民时，他很清楚波多黎各上层正为波多黎各的政治定位与身份而斗争，而辛劳的穷苦人却在为每天在温饱而奋斗。乡村穷人的经济条件特别艰苦，78% 的人从事农业，100 多万英亩的土地属于外国股份公司，而

且近60%的农业为甘蔗种植。甘蔗的种植不能提供整年的工作，因为收割甘蔗的季节仅为秋季很短的时间。蔗糖的价格由国际市场而非波多黎各来决定，劳力每天12个小时的劳作只能获得约50美分的报酬。除了农业，波多黎各几乎没有工业，对这里的几乎所有人来说，这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总督穆尼奥斯·马林，第一位波多黎各人选举出来的总督。他支持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自由联邦。(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os)

187 1931年，穆尼奥斯·马林脱离社会党，加入了自由党。自由党的纲领主张限制政府卷人工业和为创造就业而进行的公共工程。此后不久，他被选为波多黎各参议员。1938年，他创建人民民主党，主张减少劳动时间。至此时，穆尼奥斯·马林认定生活成本高于美国的波多黎各的重要问题不是独立与殖民主义的政治冲突，而是经济（Cardona，365）。他开始为改变波多黎各的经济状况而活动，如促进对美国公司免税，并到纽约旅行以招徕美国公司。1948年，穆尼奥斯·马林成为美国允许自选领导人后的第一位波多黎各民选总督，他努力建设与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关系。

穆尼奥斯·马林认为，在美国政府的大框架下的自治是波多黎各的最好解决方式。他的联邦观念，他与其政治同盟称之为“自由联邦”，允许波多黎各自治，同时仍受联邦的援助和美国的保护。作为联邦的成员，波多黎各人可以往来于美国并寻找工作，这有助于减少当地的失业。在宏观经济方面，穆尼奥斯·马林支持被称为“经济开发计划”的一项能促进美国股份公司在波多黎各投资的积极活动。他推进工业化进程，以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并对美国公司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愿意投资波多黎各的公司将享受10年的税收打折和政府的低息贷款。波多黎各政府还同意提供工人的培训费用。这一计划成功吸引了2 000家新工厂，为波多黎各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它还使波多黎各成为美国产品的主要消费者，20世纪50年代每年的消费额达3.3亿美元。

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运动

联邦的建议不断遭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对。在一位律师、哈佛大 188 学毕业生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者要求独立。穆尼奥斯·马林是一位传统的政治家，他在既有的体系内工作——积极利用家庭的影响、姓名的识别和与波多黎各上层社会的关系；阿尔维苏·坎波斯是一个激进人物，主张完全与美国分道扬镳。

阿尔维苏·坎波斯是一位老兵，曾在美国陆军中做过军官。他被

分派在一支黑人部队，在军队中，在他所到过的美国南部的城镇中，阿尔维苏·坎波斯都遭受过种族歧视。1930年，他被选为国家主义党主席，游历波多黎各，并告诉听众，波多黎各是一个殖民地，是美国的战利品。他主张波多黎各人不要到殖民政府中任职，要把精力放在波多黎各的独立上。大学生们对阿尔维苏·坎波斯的演讲及报告给予了善意的回应；阿尔维苏·坎波斯还在波多黎各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中取得了支持。



阿尔维苏·坎波斯是20世纪波多黎各独立的最热心支持者（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s）

1935年，因阿尔维苏·坎波斯支持独立的演说和相关宣传，在波多黎各大学里约彼得拉斯校区暴发了警察与抗议者的对抗，导致四名民族主义者死亡。这是独立运动暴力阶段的开始，并从圣胡安传播到了华盛顿。1936年2月，为给在里约彼得拉斯校区死去的同志报仇，两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杀死了在波多黎各警察部队中服役的美国陆军上校弗朗西斯·E. 里格斯（？—1936）。凶手埃利亚斯·伯查和伊拉姆·罗萨多被逮捕并在疑点重重的情况被警察杀死。一个月之后，发生了蓬塞大屠杀，波多黎各警察向抗议者射击，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他们觉察到了抗议运动的缔造者是谁之后，阿尔维苏·坎波斯被逮捕，并被判入狱，在美国的佐治亚服刑。随着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被关押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20世纪40年代初达成了停战协议。

1947年12月，阿尔维苏·坎波斯被释放。在对记者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他发誓将继续进行他的独立斗争。当1948年的波多黎各总督的首次选举日渐临近时，这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呼吁他的同胞不要

189

将选票投给穆尼奥斯·马林。即使这样，穆尼奥斯·马林还是当选了。

整个5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仍然存在，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名声开始受到损害。富有代表性的反叛行动，诸如爬上波多黎各政府的房顶拔下美国国旗，代之以波多黎各旗等，让美国公众认为这是政府向恐怖行为让步。

1950年10月，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哈尤亚镇（Jayuya），导致一名警官死亡，数名警察受伤。在剪断电话线并烧毁了镇上的邮局后，民族主义者宣布波多黎各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美国公布了军管法，波多黎各民国卫队包围了该镇。空袭和大炮轰击之后，国民卫队击败了反叛者。同一时期，一项刺杀穆尼奥斯·马林的计划也被揭露。1954年，4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美国众议院。在淑女画廊（Ladies' Gallery）的室内，约30人被杀，5名国会议员受伤。

1950年11月1日，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奥斯卡·科利亚索和杰斯里奥·托雷索拉袭击了布莱尔大厦——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及其家人的临时住所——当时白宫正准备翻修。袭击发生时杜鲁门及其家人正巧不在家。在袭击中，一名警官死亡，数名警察受伤。托雷索拉被击毙，科利亚索受伤被逮捕。

波多黎各联邦

由于卷入了其中的一些事件，1951年阿尔维苏·坎波斯再次被捕，并被发现阴谋对抗美国政府。当阿尔维苏·坎波斯开始15年的刑期时，穆尼奥斯·马林正在和美国的劳工部谈判，希望美国在7月至11月蔗糖工业的淡季临时雇佣波多黎各农民到美国从事农业劳动。这将确保这些劳工的常年工作，实现总督的目标。一年后，80%的投票支持波多黎各联邦地位，这次投票使穆尼奥斯·马林感到满意，可以看作对阿尔维苏·坎波斯及其独立运动的拒绝。

190

从1948年到1964年，总督改选过几次。他始终坚持联邦是波多黎各的最佳选择——这一主张经常被讨论，约有一半的人口支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另一半则选择联邦形式。自1967年以来，举行过多

次公民投票，而且这些投票总是平分秋色。最近的一次公民投票举行于1998年，波多黎各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仍存在分歧。在那次投票中，当被问及在联邦、独立或自由联盟三者之中选择哪一种时，超过50%的人选择“以上任何一个都不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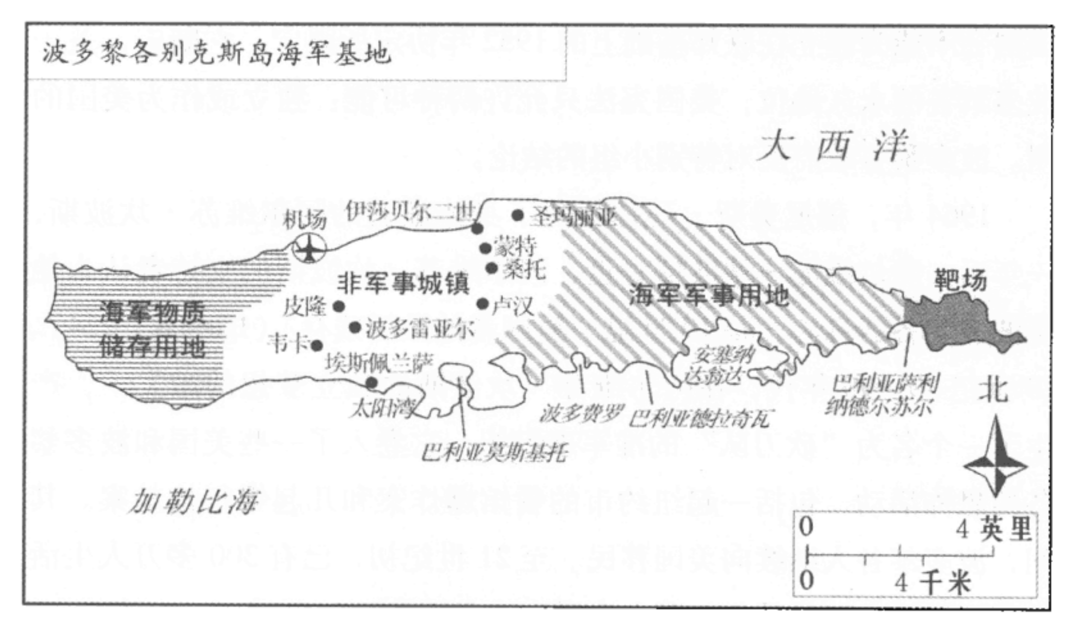
负责波多黎各地位相关事务的总统特别小组于2005年12月在报告中公布了一个关于这种矛盾关系的最新构想。报告最后总结说，美国国会不能为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1952年协定所限定。它断定，关于波多黎各的永久地位，美国宪法只允许两种可能：独立或作为美国的州。波多黎各政府反对特别小组的结论。

1964年，穆尼奥斯·马林赦免了身体虚弱的阿尔维苏·坎波斯，一年后，阿尔维苏·坎波斯去世。阿尔维苏·坎波斯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波多黎各的良心，是19世纪“爱国者的最后残存”（Iglesias，224）。20世纪80—90年代，在阿尔维苏·坎波斯的独立梦想的激发下，产生了一个名为“砍刀队”的准军事组织，它卷入了一些美国和波多黎各的恐怖活动，包括一起纽约市的餐馆爆炸案和几起银行抢劫案。其间，波多黎各人继续向美国移民。至21世纪初，已有300多万人生活在美国大陆，而另外400万人生活在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为别克斯岛而斗争

别克斯岛位于波多黎各外海，它是90年代波多黎各主权与美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象征，尽管它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其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此建立海军基地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别克斯岛提供了一块地方，供美国监视加勒比海地区的德国潜艇。别克斯基地是美国在加勒比地区一系列防御工事的一部分，用以防止对巴拿马运河可能的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岛成了美国海军的练习之地。在美国获得25 000英亩土地之前，该地经济落后，其经济支柱是蔗糖业。由到受到古巴和牙买加加入竞争以及国际糖价下跌的影响，蔗糖业已无利可图。4个糖厂中的3个被迫关闭，1935—1945年间，大量的甘蔗仅收割了一半。结果，别克斯岛的许多居

民——约 26%——到圣托马斯岛和圣克罗伊岛定居，在企业工作或从事农业。这些被美国获得的土地包括几处海滩，它起初属于一些不在地的地主。一个波多黎各家庭拥有这些被美国取得土地的 88%，其余土地属于 200 个小地主。那些以收割甘蔗为生的劳工居住在这些小块土地上，一旦美国接手了这些土地，他们将从这些用来耕作糊口的土地上迁走。



1947 年，美国计划将海军基地内的剩余平民安置到圣克罗伊岛。但遭到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和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的反对。阿尔维苏·坎波斯表示担心，美国在这个小岛上的存在将会给这些居民和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酗酒和卖淫也将影响该岛。美国军事人员的存在将使居民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且会经常引发当地居民与海员的争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态和健康的威胁与污染使波多黎各人动员起来。公众意识到：“铅和其他污染物可能会渗入到别克斯岛的地下水中。而且，爆炸地点的污染物可能会随雨水从海滩流入海洋。近一半的别克斯岛居民每周吃一次或两次鱼，鱼类和贝类的污染会导致整个岛屿的公共健康危机。”（Goldberg，7）90 年代，一种被称为“吸血兽”的神秘动物出现在波多黎各，据传闻，它攻击小动物并吸取其

血液。许多人推断，这种像吸血鬼一样的动物是美军在别克斯岛大搞生物实验的产物，并且已被发现或拍到照片。

60 年代，有组织地对抗基地事件开始增加。在独立或联邦地位这一问题上有分歧的政治家们发现，他们在从美国海军手中收回别克斯岛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至 70 年代，激进分子经常用身体堵住该岛基地的出口，还在靶场附近手拉手组成人墙。至 80—90 年代，经常有数百名居民组织起来抗议并阻断岛上的道路。抗议者来自波多黎各，还有一些社会名人，如纽约的年青歌唱家里基·马丁和约翰·F. 肯尼迪、国会议员何塞·塞拉诺等，为美国撤出别克斯岛而进行游说。

波多黎各最终取得了胜利。2003 年，总统乔治·W. 布什同意在二战结束后的 58 年终止对别克斯岛的使用。美国开始缩减军事基地的规模，这表明别克斯基地终将关闭。这是波多黎各人团结获胜的时刻。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波多黎各仍独立于美国之外。海军基地雇佣了 5 000—10 000 人，有助于减少法哈多镇等地的失业率，这些工人从法哈多到别克斯工作。随着军队的撤离，别克斯岛和法哈多餐馆的老板为其空荡荡的店面而叹息。据估计，别克斯岛法哈多沿岸一带的一半商铺已关门歇业。

波多黎各政府目前正与美国环保署清除由美国造成的污染。他们正努力将该岛发展成为观光和休闲之地。

一些人推测，华盛顿只能放弃别克斯海军基地，因为现代战争技术和监听装置的发展，使得别克斯岛在海军火力之内已显得无关紧要。虽然如此，2003 年 5 月美国海军的离开仍使波多黎各为之欢欣鼓舞，他们为此已斗争了 20 多年。他们证明了大卫能够战胜歌利亚①。

① 大卫与歌利亚均为《圣经》中记载的人物。《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他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译者注

193

维尔京群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了维尔京群岛，它担心德国在此地建立潜艇基地。1917 年，美国以 2 500 万美元的价格从丹麦手中购得了维尔京群岛。10 年后，美国国会给予了维尔京群岛居民美国公民身份。

在政治架构上与波多黎各类似，维尔京群岛成为由总督统治的一块领地，对地方的治理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维尔京群岛的居民无权投票选举美国总统，这一点为岛上政治人物所不满，他们主张以投票方式来明确维尔京群岛的政治地位。这些努力已得到了美国广泛的支持或关注，但维尔京群岛的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纳入国会解决的议程。

马提尼克岛

在法国和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不会更多地记起马提尼克岛。一个著名的突发事件发生在 1902 年，培雷火山喷发，摧毁了其首府，导致了近 3 000名马提尼克人死亡。如此多的人员死亡是官僚机构反应迟缓造成的，行政管理者没能使当地居民及时撤离。殖民当局的态度表明他们与马提尼克的日常事务没有多少联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居住此地的、被称为“博克”的少数白人贵族，他们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当遇到表现出色和有前途的马提尼克人，法国人倾向于通过把他或她送到法国而将其与其他马提尼克人分开。目的是将这个马提尼克人塑造成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男黑人或法国女黑人。正是因为这样，艾梅·塞泽尔挑战了法国及法国与马提尼克的关系。

艾梅·沙塞尔

艾梅·塞泽尔（1913—　）生于圣皮埃尔（St. Pierre），其成长

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正好经历了有组织地反对“博克”的政治骚动。为缓和紧张局势，降低叛乱的潜在可能性，当地官员希望与法国政府一体化。自19世纪开始，他们对这一构想进行了间歇性的尝试。

政治实践与文化上的同化是有意为岛上居民顺利在法国政治体系内工作以及使他们融入法国文化铺设的道路。作为同化哲学的一部分，法国当局给聪明的学生以奖学金，让他们去名校或公立中学读书，然后给予大学奖学金去法国读大学，其中的一些科目是专门为殖民地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学生或成为教师，或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毕业后，他们被送回家乡，或分派在别的殖民地工作。作为一个来自穷苦家庭的有才气的学生，塞泽尔小时候即掌握了法语、英语和拉丁语，对他来说，上述的道路是预先为其铺好的。 194

1931年，塞泽尔进入路勒格朗公立中学——它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学校。到1935年，他已获得了教师资格。在巴黎，塞泽尔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流行的非洲艺术和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影响；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创造性的工作和思想呈现给了有鉴赏力的白人爱好者。塞泽尔交往的两个人改变了他的生活：利奥波德·赛达尔·桑戈尔（1906—2001）、莱昂—贡特朗·达马斯（1912—1978）；前者来自塞内加尔，后者来自法属圭亚那。这两位青年知识分子向塞泽尔介绍了非洲的传统与文化。由此他对以前自己否定的文化有了一种新认识。尽管法国的态度是慷慨的，但无论如何，黑人总被认为是低等的。这一点在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的流行著作《人类进化的心理法则》（1894）中表达得很清楚。勒庞认为有色人种天生就比白人低一等。已经习惯于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塞泽尔被丰富的非洲文明与文化所唤醒。他们的友谊导致了短期存在的《黑人学生报》的创立。从撰稿到编辑，塞泽尔自始至终地参与报纸的工作，而且他开始申明他的非洲根源，并发展了黑人意识。1939年，受这种新意识的启发，他用法语创作了他的最著名的诗集《返乡之路》，在其诗作中他创造了一个词汇：黑人意识。

1939年，塞泽尔返回马提尼克，在法兰西堡的舍尔歇公立中学执

教。他与妻子苏珊·鲁西·塞泽尔（1913—1950）及另一名教师勒内·梅尼（1907—2004）一起创立了《回归线》杂志，促进人们拒绝欧洲的价值观，并批评加勒比人只是法国文化的模仿者，而不是自己文化的创造者。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并倡导反殖民主义。

195 1945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塞泽尔被选为法兰西堡的市长，并在这一职位上干了50年。他还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1946年，他支持改变马提尼克的政治地位——由殖民地变为法国海外省，而不是促进马提尼克的独立。

塞泽尔寻求使法国制度适应马提尼克的文化与传统，而不是盲目地吸收法国文化。他希望马提尼克人为自己的目的适当运用法国制度，而不是模仿法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他把部门化看作实现与法国平等的一个途径。马提尼克人为这一运动而欢呼，但许多非马提尼克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分子将其看作是另一种殖民主义。对塞泽尔来说，这一决定朝着“实际的政治和社会进步”迈近了一步，“在法国内部整合是对殖民主义的胜利”。(Pèrina，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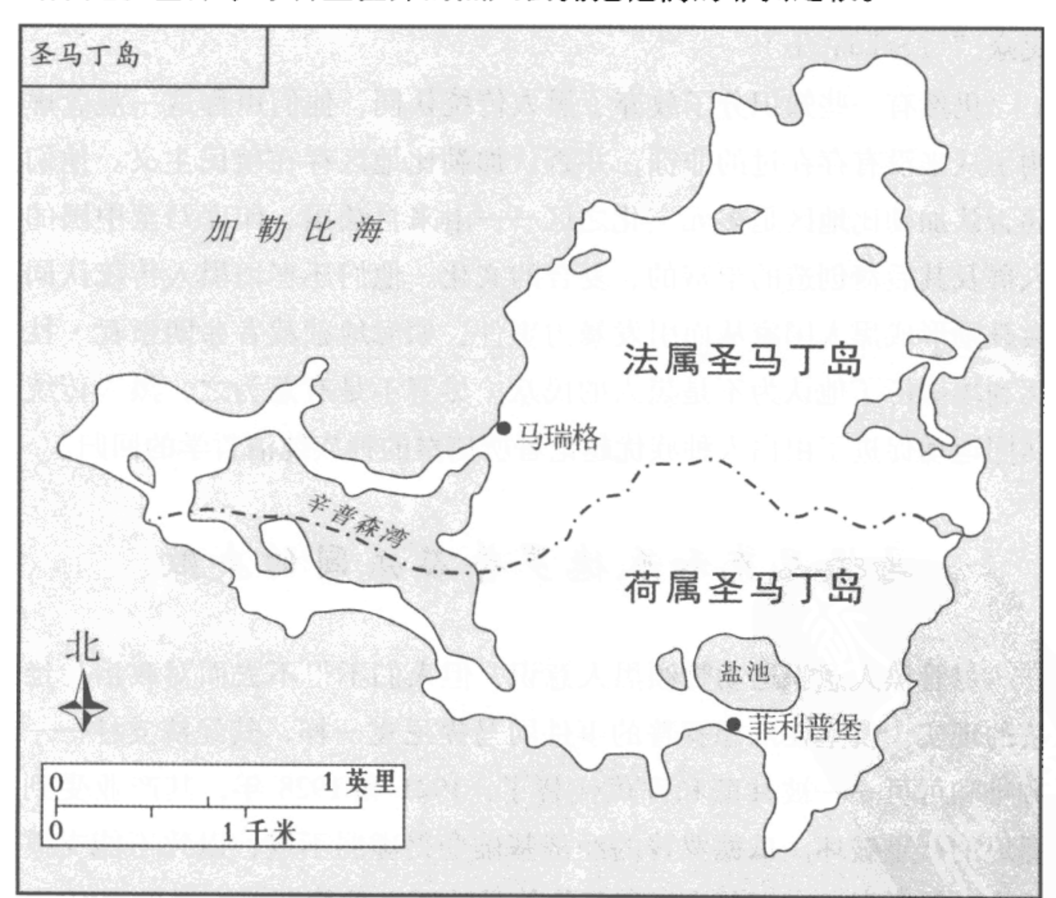
1956年，塞泽尔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发表了一封信《致莫里斯·多列士》(*Lettre à Maurice Thorez*)，在信中，他陈述了退出法国共产党的原因。他认为该党在利用黑人达到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政治目的，而非帮助黑人反对压迫。随后他创立了自己的政党——马提尼克进步党。

20世纪50—60年代，塞泽尔的政治哲学受到了新一代马提尼克激进主义分子的质疑。这些激进主义分子包括作家弗朗茨·法农(1925—1961)，他觉得塞泽尔背叛了独立运动。但是，塞泽尔注意到了加勒比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他看到在独立国家独裁政权的兴起，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特鲁希略死后陷下政治混乱之中，还有古巴卡斯特罗的强制性政权。对他来说，这些迹象都显示，独立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与个人的自由。塞泽尔觉得，经济与政治的稳定比独立更令人期盼。

黑人意识运动

黑人意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海地。对黑人意识的认识首先在19世纪的海地得到了发展，它是海地革命的结果，并在海地知识分子让·普里斯—马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再确认。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塞泽尔受到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的影响。其中的艺术家，如出生于牙买加的克劳德·麦凯（1889—1948），认为黑人社区内部的分裂起因于肤色差异和白人压迫。196

塞泽尔开始从总体上批评欧洲，尤其是法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残酷的殖民开拓。他谴责欧洲人促进了白人优越于其他人种的信念，摒弃那些非洲是原始的、没有文化的观点。相反，他以这种非洲人与自然的神秘结合为荣耀，并赞颂非洲人的体格、精神、家庭关系和祖先的荣光。塞泽尔号召全世界的黑人去拥抱他们的非洲之根。



黑人意识运动被用来表达泛非洲人运动，以寻求使黑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它强调黑人国家要相互信赖，知识分子要创造非欧洲的政治制度，以寻求黑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尤其 197 是在非洲。这一观念影响了美国黑豹运动的进程。它还影响了弗朗茨·法农早期的政治激进主义，弗朗茨·法农参与了阿尔及利亚人反对法国的斗争（1954—1962），他相信，必须通过打破欧洲白人的政治权力来实现黑人和有色人的政治自由。像在圣马丁这些地方，文化领导人如拉萨纳·M. 塞古（1959—　），在20世纪80年代欣然接受了黑人传统认同运动，他断定圣马丁人能够在没有欧洲国家介入的情况决定他们的政治未来。塞古反对对圣马丁岛的殖民分隔——为什么要一边属法国而另一边却属荷兰呢：“一群人被错误地分成南北两部分，并冠以‘法属’和‘荷属’……这是殖民地的符号，或者圣马丁是法兰西共和国和荷兰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考虑岛屿上的民众。”（Sekou，ix）

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黑人传统认同，他们声称这一观念虚构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非洲，并否认加勒比地区存在殖民主义。他们还否认加勒比地区是多元文化之区——由来自法国、印度乃至中国的人群及其后裔创造的丰富的、复合的文化。他们还害怕黑人传统认同会鼓励形成黑人国家从而引发暴力事件，如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镇压了他认为不是黑人的民众。尽管不是有意为之，黑人传统认同运动促进了由白人种族优越论者所信奉的种族纯洁哲学的回归。

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在法国的失败

尽管黑人意识运动赞颂黑人意识，但人们不得不去面对政治与经济的现实。发生在瓜德罗普的事件同马提尼克一样，其经济支柱——咖啡和可可——被甘蔗和香蕉代替了，1921和1928年，其产业受到飓风的严重破坏。瓜德罗普的经济基础变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支撑其人口的需要。由于其主要贸易伙伴是法国，瓜德罗普产品的60%由

法国购买，像马提尼克一样，逐渐成为法国的一个生产部门。1946年，瓜德罗普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

作为法国的一部分，或如被称呼的法国联盟，至1958年，瓜德罗普的居民被授予了法国公民权，强迫劳动的殖民地传统被废除，该岛的预算成为法国国民预算的一部分。岛上的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福利。政府设置医疗服务，供给饮用水，帮助民众同疾病作斗争，并且为婴儿提供医疗护理。瓜德罗普二岛在法国国民议会、共和国议会和法国联邦议会中拥有席位。有权在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 198

20世纪60—70年代，部分地方开始反对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尽管塞泽尔1993年从政治职位上退休，但他坚持认为，对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来说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然而，年轻的一代感觉到他们是“法国和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加勒比的一部分”，他们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未来的决定……将显露出来……可能双重身份是一条经过深思的、去殖民地化的道路，或者完全相反，一种新形式的殖民地。”（Pèrina，138）

荷属加勒比的自治

1937年，荷兰允许其殖民地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萨巴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圣马丁岛创立一个带有立法实体的议会，其成员来自上述各岛屿，他们的职位根据其经济与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的水平来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多为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议会给予这些岛屿以少量的自治权。1942—1954年间，上述各岛被允许在荷兰政府内部创立一个联盟，并分几个步骤来实施；总督由荷兰女王任命，其立法机构的22名成员来自各个岛屿。每个岛屿创立自己的法律和管理机构，荷兰政府为其提供保护并管理其外交事务。

1970年阿鲁巴的议员游说阿鲁巴放弃联盟关系，阿鲁巴于1986年成功地这样做了。90年代，一些激进分子为绝对独立而施加压力，但这一目标为岛上的大多数人所拒绝。在同一时期，库拉索岛成为这

些荷属岛屿的政治中心，起着联盟政府的中枢作用。

圣马丁有着成功的旅游业，每年游客数量达 130 万，80 年代晚期打算独立。至 2000 年，激进分子如拉萨纳 · M. 塞古主张逐渐与联盟脱离关系，并着手从联盟中退出。下一步是建立自治并最终独立。1999—2000 年的公民投票表示支持这种逐步退出的方式，60% 的投票人支持自治并最终实现独立。由于圣马丁岛一半属于荷兰，而另一半则属法国，反对独立者担心这种文化将浮现出来并占据主导地位。号召与殖民传统彻底决裂使一些人怀疑独立是否能真的达成自立，或者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选择。

第十一章　牙买加、特立尼达和格兰纳达：不确定的光荣（1900—2000）

20世纪中叶，当英国的殖民主义接近尾声之际，牙买加和特立尼达成为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中令人注目的中心。牙买加是聪明且富有领导魅力的政治家庭——曼利家族的故乡。这个家庭——埃德娜·曼利、她的丈夫诺曼和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对牙买加现代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促进了后殖民地时期牙买加自治的最初政治议程。埃德娜·曼利是一位有造诣的雕刻家，编辑过杂志《焦点》；该杂志将致力于在牙买加进行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一代作家的著作带给了这个说英语的世界；其中的一些作家，如约翰·赫恩（1926—1995），受到了国际的褒扬。 199

特立尼达是学问精深的重要人士埃里克·威廉斯的家乡，其作品获过奖。他以一个当地作家的眼光将这个说英语的世界写进了加勒比历史。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埃里克·威廉斯促进了根源于非洲传统的加勒比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在特立尼达组织寻求独立的政治运动。

忠于英国的早期牙买加

随着历史进入 19 世纪，牙买加的人们逐渐将自己看作是牙买加人，而非英国人。这种倾向的最初征兆是文学领域的诗人在他们的诗赋中赞颂其对牙买加的热爱：

我为我热爱的海岛歌唱，
牙买加，生我的地方
夏日的阳光在天空照耀，
地球上最美妙的海岛
哦，这片我亲爱的土地，
你的些微枝末都是我的歌，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对你爱不变且热烈。

200

这首诗的作者汤姆·雷德卡姆（1870—1933）被认为是牙买加的第一位诗人，而他自认是忠于英国的牙买加子弟。在赞颂大地的自然之美方面，牙买加人像雷德卡姆和其他西印度作家一样在寻求与英国不同的特征。美的存在不再局限于英国的风景。国民的自豪感不再停留在与大不列颠的认同方面。

他们进一步肯定自己是牙买加人和黑人，而不是英国人和白人，这一情况出现在 20 世纪早期的著名人物马库斯·加维（1887—1940）身上，他于 1914 年创立了世界黑人发展协会（UNIA）。1916 年，他到美国旅行，并在哈林区建立了世界黑人发展协会的总部。三年后，他建立了一条黑人之星航线。其目的是将黑人转运回被他视为黑人故乡的非洲，并开展美国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之间的黑人商务。加维不善管理，加之不诚实的商务伙伴，这项试验失败了。由于对财务处置失当，加维在美国被关押，1927 年初被驱逐到牙买加。八年后，

加维移居英格兰，1940 年去世。

加维鼓吹所有黑人都要返回故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重返非洲”运动。世界黑人发展协会的成员一度达 200 万人，分布在数个国家，包括牙买加和美国。自始至终，他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演说和出席公众场合，帮助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将眼光投向他们的来源地非洲。他以自己是一个黑人、非洲人和牙买加人而自豪，他的自豪感极富感染力。

迈向独立的第一步

20 世纪 30 年代，牙买加工人开始主张他们自己的权利，并反对不公正；在牙买加，几乎全部为白人的 900 个家庭拥有 2/3 的土地，而 100 万牙买加人生活在穷困之中。只有极少数的黑人拥有自己的土地，通常约一英亩，根本无法为其家庭提供足够的口粮。牙买加的城市生活条件很差：“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工资低，失业率高，大量的人口从乡村迁往主要城市……造成了城市的紧张。”（West - Durán，118）1938 年，牙买加全岛发生了数起抗议与叛乱，这使英国人很吃惊，他们错误地认为牙买加人易于满足，而且自 1865 年莫兰特贝叛乱之后，牙买加也经常被描述为殖民地的典范。始于 1938 年 5 月的西印度糖业公司甘蔗种植园的劳动争端，导致了 8 人死亡 1 171人受伤，近 700 名罢工工人被捕。在这次争端中，两位领导人——诺曼·曼利（1893—1969）和亚利山大·巴斯塔曼特（1884—1977）的作用十分突出。

201

为解决牙买加恶劣的工作条件——工资不经集体协商而由公司任意制定，工人可以无任何理由地被解雇，延长工作时间而没有额外报酬，诺曼·曼利，一位富有的律师，于 1938 年创立了人民民族党。该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日程，包括所有牙买加人都享有受中等教育的权利和医疗保障。1939 年，曼利的堂兄亚历山·巴斯塔曼特统一了分别代表农业和工业工人的工会，成立了巴斯塔曼特产业工会（BITU），起初，工会成员有 2 000 名港口工人和 4 000 名农业工人（Hurwitz，

198)。牙买加的经济情况不稳定，巴斯塔曼特指控总督没有将可怕的现状报告宗主国。他主张对抗当地政府，尽管他发誓忠于英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牙买加总督逮捕了巴斯塔曼特，并控告他策划颠覆政府。

诺曼·曼利接管了巴斯塔曼特产业工会，并在牙买加全岛游说以增加会员人数。至1942年，巴斯塔曼特产业工会拥有20 000名会员。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国作战进行准备，同意建立集体协议，将工资与生活费用挂钩，并通过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以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一从监狱出来，巴斯塔曼特即掌管了他的政党——牙买加劳动党。而两个政党——人民民族党和牙买加劳动党——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自治。

1944年，英国给予牙买加人普遍的投票权，而且一部牙买加宪法也被批准。巴斯塔曼特和曼利成为政治竞争者，因为他们两人都在为成为即将成立的牙买加政府的领导者而斗争。在牙买加的国会，巴斯塔曼特被选为交通部长，击败了他的堂弟曼利。交通部长一职在1953年转变成为总理职位。

202

1955年，曼利赢得了总理一职。1944—1945年，曼利改变策略，由原来的以社会主义者为基础转为获取牙买加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支持。由于商业部门被批评与左派极端主义过从太密，曼利开除了其政党中的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党员。他的稳健姿态使其为保守的投票者所接受。像他的政治对手巴斯塔曼特一样，曼利继续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独立。

西印度联盟

英国赞成创立西印度联盟，由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组成，而不是一群独立的岛国。加勒比地区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讨论过这一想法。他们赞成这一想法是因为，在像糖或香蕉等商品的国际价格剧烈下跌的事件发生之时，它能提供一种经济保护手段。联盟被看为是

保护单一作物不受经济风险威胁的方法。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断定单个的岛“没有足够的幅员、人口和财富来创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同岛屿的某个联盟将可能避免重复的办公与服务……将创立一个更加大且更统一的管理机构”（Hurwitz，209）。联盟的成员将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牙买加、蒙特塞拉特、圣克里斯托夫—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英国推进联盟作为使其迈向独立的第一步，据此精神，1958年1月3日西印度联盟成立。这是英国政策的正式转变，多年来，英国一直散布说各岛之间存在分歧，以阻止他们形成统一的战线来对抗英帝国。在经济方面，英国阻碍各岛屿之间的直接贸易，迫使它们通过宗主国进行交往。这些因素助长了各个岛屿的民族主义，注定了联盟的失败。

英属加勒比的最大岛屿牙买加和特立尼达都不愿加入联盟，这使得联盟一开始就注定要流产。牙买加的经济在铝土矿开采、私有企业和旅游业方面迅猛增长，特立尼达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与销售的工人数量达20 000人。由于这些岛国好像要担负起联盟的最大经济责任，巴斯塔曼特和曼利发起运动反对联盟。他们争辩说联盟将会给牙买加的经济带来有害的冲击（Hurwitz，213）。结果，牙买加最先从联盟中退出，接着是特立尼达。1962年，成立了仅仅4年的联盟解体了。 203

独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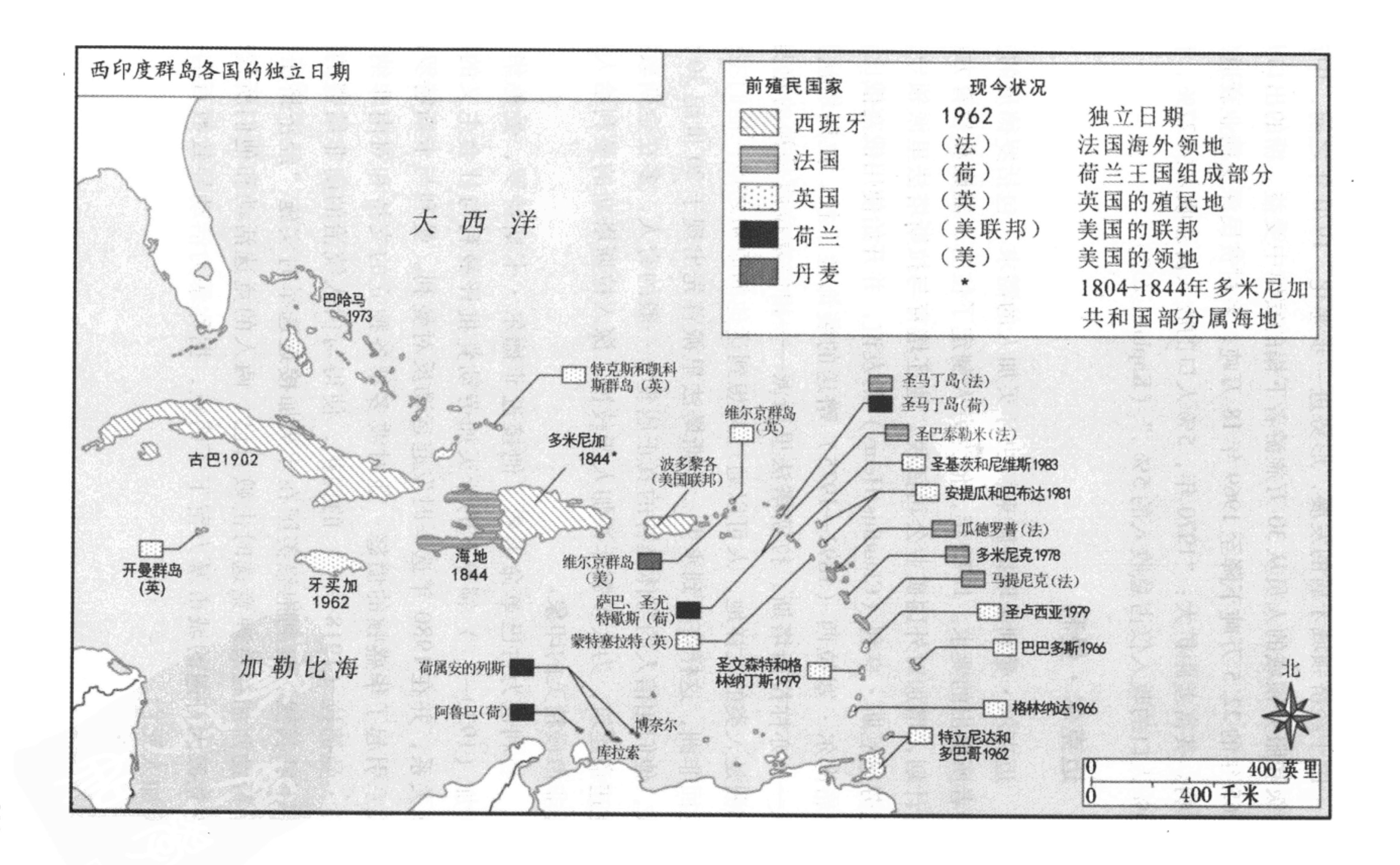
1962年，牙买加实现了完全的独立。巴斯塔曼特成为首任总理，并继续管理着牙买加和他创立的工会，直到1967年。曼利仍旧是反对派，同巴斯塔曼特竞争。他们这样做有助于巩固两党制的政治制度，防止了像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那样的独裁或政治寡头的形成。1972年，曼利的儿子迈克尔（1924—1997）当选为总理，并于1989

年再次当选。

迈克尔·曼利的当选表明，尽管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牙买加的政权自独立以来就被少数几个重要家族掌控着。诺曼·曼利和巴斯塔曼特是堂兄弟关系，牙买加独立的前期由他们控制。迈克尔·曼利是诺曼·曼利之子，他是70—80年代牙买加发号施令的人物。1972年，他击败了他的堂弟休·希勒（1923—2004）首次赢得了总理的选举。

牙买加的政治实质是不同等级的家庭事务，只适用于富有的家庭。这种在上层社会与广大的城市与乡村的贫困人口之间的分离有助于暴力政治文化的成长。这种暴力与巨额的毒品交易相联姻，培育了一种异化的政治，通常反映在抗议的、牙买加文化必需品的音乐之中。

从60年代晚期以来的事实可以清楚看出这种不均衡，牙买加的财富和权力控制在极少数人之手，精英集团要么是白人，要么是“近白人”——也即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后裔。因此，1960年，大学生开始支持教授兼作家沃尔特·罗德尼（1942—1980）的观点，他推动了一项运动，类似美国黑豹党的讲坛。该运动主张在黑人中平等分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牙买加的中产阶级拒绝了罗德尼的主张，并争辩说牙买加没有遭受19和20世纪美国那样的极端种族主义。罗德尼是位圭亚那人，在牙买加的西印度大学任讲师，由于不当的政治见解，1968年起牙买加不允其再进入；这一决定导致了学生和城市贫民在金斯敦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西印度群岛各国的独立日期
前殖民国家
西班牙
法国
英国
荷兰
丹麦
现今状况
1962　独立日期
（法）　法国海外领地
（荷）　荷兰王国组成部分
（英）　英国的殖民地
（美联邦）　美国的联邦
（美）　美国的领地
*　1804—184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部分属海地
大西洋
巴哈马1973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
古巴1902
多米尼加1844*
维尔京群岛（英）
波多黎各（美国联邦）
开曼群岛（英）
牙买加1962
海地1844
维尔京群岛（美）
萨巴、圣尤特歇斯（荷）
蒙特塞拉特（英）
加勒比海
荷属安的列斯
阿鲁巴（荷）
博奈尔
库拉索
圣马丁岛（法）
圣马丁岛（荷）
圣巴泰勒米（法）
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
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
瓜德罗普（法）
多米尼克1978
马提尼克（法）
圣卢西亚1979
巴巴多斯196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
格林纳达196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
北
0　400英里
0　400千米

由于经济领域矛盾的发展，形势进一步恶化。1970年之前，中产阶级和服务领域的人员从30万旅游者下榻的宾馆中受益。糖的出口从1965年的22.5万吨下降至1969年18万吨，乡村贫民深受糖业衰退的影响。贫富差距扩大："1970年，5%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7%，而20%人口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5%。"（Kaplan，232）

迈克尔·曼利

迈克尔·曼利采取措施来解决牙买加人的需求，包括罗德尼的支持者所提出的要求。1972年，他为穷人制定了住房、健康和教育方面的计划，增加对外国矿业公司征税。他还培育与拉斯塔法里派领导人克劳迪厄斯·亨利（Claudius Henry）的友谊，并开始使用俄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1892—1975）赠送的装饰性手杖。拉斯塔法里派——亦称拉斯塔斯、拉斯塔法里斯派——相信塞拉西是神的化身，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人可以通过冥想到达他的原初之地；他们主张返回非洲，这样将得到永生。拉斯塔法里派首先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他们相信人的身体是神的真正庙堂。一般的穷人，多在金斯敦搭建违章建筑，为大多数牙买加人所歧视。深入拉斯塔斯的曼利给人以并非傲慢精英的印象。

曼利也为古巴革命喝彩。他接近菲德尔·卡斯特罗，爱德华·西加（1930— ）领导下的牙买加劳动党批评曼利与社会主义的暧昧关系，并在1980年选举时发起运动反对曼利。曼利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引起了华盛顿的愤怒。他对波多黎各独立的支持和对南非纳尔逊·曼德拉（1918— ）的拥护，使得与白人统治的南非结盟的美国不胜其扰。曼利抱怨美国在牙买加接近选举时实施"经济挤压"，并帮助西加在总理竞选时击败自己。两人的竞选活动和他们所代表的党派因普遍的城市暴力留下了污点，据称暴力活动导致数百名牙买加人死亡。

206

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派

作为一种新近的宗教，拉斯塔法里教经常被外界误解。原因之一是拉斯塔法里派拒绝传统的西方宗教，并遵循一套批评家认为更多的是即兴的而非宗教的信念。作家莱斯利·德斯芒格勒斯解释了一些经常被人误解的行为：

拉斯塔法里成员提到了他们不剪发并保持其自然的原因。一些人还引证《圣经》的篇章，其中说到，一个人发了神圣的“誓愿要离俗（离开白人），不可用剃头刀剃头”，但是必须“要由发绺长长了”[1]。拉斯塔法里成员相信，没有比为了人的消费而杀牲更能促进了人的死亡的了。相反，花朵与枝干分离后仍可能继续开放，果实从树上摘下来，仍可以继续成熟……拉斯塔法里成员遵循素食的规定，具体表现在其日常食用乳酪产品。他们认为素食是神圣的……根据其成员的说法，食用大麻的最通常的原因与《圣经》的记载有关，在创世纪的第六天，神宣布将草与所有蔬菜供人类使用[2]……食用大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它使人的身体充满活力，因为它取自于自然。它使人打开思路……而且使人能够体验上帝的不可思议的、意外的启示。[3]

20世纪80年代，骚乱继续困扰着牙买加，近25%的人失业，高犯罪率，社会不公，以及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一个新的政党——国家民主运动党，挑战两个既有政党。武装团体、三个政党的代表在街头展开战斗。90年代后期，这三个政党放弃了政治，与毒品贩子密切联系。

207

① 语出《圣经·旧约》民数记6—5。——译者注

② 此与《圣经》原文所述略有不同；创世纪1—29：“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译者注

③ Desmangles, Leslie G. , et al. “Religion in the Caribbean.”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Caribbean*, edited by Richard S. Hillman and Thomas J. D’Agostino. Boulder, Colo. ,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牙买加的匪帮

1980年之后，犯罪活动支配了牙买加的政治。匪帮是国家分裂政治文化的政治化身。对大多数地区来说，上层社会在和平地开展政治争论，但与主要政党相关联的匪帮一到街上就开始战斗。通过犯罪活动，牙买加的匪帮统治着金斯敦的特定街区。他们的权威使得他们可以施以政治恩惠和保护，而且对政治家来说，向匪帮求助也很平常。这种对匪帮的认可提高了匪帮的声誉，他们成了远离金斯敦富人区的许多地区唯一支配者。这导致了一个怪圈：一个匪帮越有犯罪能力，在其地盘上就越有影响力；一个匪帮得到的认可越多，其犯罪的影响力就越增加。

贫穷是匪帮产生的原因。1991年，牙买加的人均收入每周约30美元，旅游业在衰退。令人绝望的经济使得快钱对人们的诱惑倍增，而且牙买加位于哥伦比亚和纽约中间，使其成为往美国偷运可卡因的理想中转站。1998年，在美国机场被逮捕的“骡子”——在身体里藏毒的人——近40%来自牙买加。1999年，约有4 000名牙买加人因非法的毒品交易而被捕。

匪帮被牙买加穷人所羡慕的事实也反映出政治的失败。90年代后期，政府试图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于是停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匪帮正好进入，填补了空缺：“当地的匪帮维持着自己的法律与规则制度，完全控制着老旧鸡笼式的支部和街角法庭。它向当地的各行业征税，并提供保护，以攻击财产和人员的方式惩罚那些拒绝缴纳的人。它通过接济当地人的学费、午餐费和提供工作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初步的福利安全网络——这种功能以前是由牙买加政府来完成的。”（Rapley, 95）

208

90年代晚期，政府将军队派遣到犯罪率高的街区。然而，牙买加当局并未准备进行长期的、持久的努力，短时间不见成效后立即将重点转向保护富人居住区和旅客经常光顾之处。

牙买加匪帮的增加也表明了其民主进程的脆弱性。同时，政府不

愿进行专制统治也显示了对民主的承诺。然而，这种对民主的承诺被腐败的政治家所玷污，他们与匪帮领导人结盟，因为匪帮可以帮助政党赢得选票。这种对匪帮默默的接受在1992最为突出，总理爱德华·西加出席了一个深得众望的匪帮领导人的葬礼。

学者阿兰·韦斯特—杜兰用以下表述描绘了牙买加民主的并不完美的本性："2002年，牙买加庆祝了独立四十周年，但它被同样困扰着许多贫穷国家的痼疾困扰着。除了……暴力、黑帮保护和高压政治的成分，政治制度以适应性和民主协商为特征；姑且不论社会动乱，它已清楚地阻止了突然的政变、军事独裁，或者血腥的革命。"（West-Durán，124）

特立尼达

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斗争，特立尼达形成了劳动工会和政党，最出名的是大英帝国公民工会和工人之家统治党。工会由提尤博·尤赖亚·"巴斯"——T. U. B. 巴特勒创立，他是一位牧师兼劳动工会主义者；政治进步团体由阿尔伯特·戈梅斯创立，而他则是一位富有的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T. U. B 巴特勒组织了一系列的劳工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在劳动管理中结束种族歧视——因为白人或肤色较浅的劳工占据了管理岗位。戈梅斯是最早认识到非洲裔和东印度裔特立尼达人是政治斗争中潜在力量的人之一，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由于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阿尔伯特·戈梅斯将自己与特立尼达的穷人与社会边缘人视为一体。其最早的贡献之一即为促进钢鼓音乐和加力骚[①]，他认为这是真正的艺术形式，可惜却被英国人看作是粗俗的、低级的。作为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市的市长和立法议会的议员，戈梅斯给予工人以较高的工资。他还认为特立尼达需要一个联盟，209 并于1958年当选为联盟的国会议员。因为他比较富有——他拥有一个父亲留下来的药房，白人及一些特立尼达人怀疑戈梅斯更倾向于与特

① 在特立尼达土著中兴起的一种爵士调即兴歌曲，具有民谣的风格。——译者注

立尼达的上层社会结成联盟，而不是与穷人结盟。至50年代晚期，戈梅斯的朋友埃里克·威廉斯夺去了他的光彩。

埃里克·威廉斯的升起

从1956年至1971年，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通过政治策略、智慧、学问以及操控与美国和英国关系的能力，控制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政治。同时，他受到了特立尼达人的普遍喜爱，人们钦佩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要重视被人忽视的加勒比地区黑人的历史数据，而不是只收白人的历史数据作为标准。在其政治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威廉斯没有像加勒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寻求劳动工会的支持。相反，威廉斯于1956年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人民民族运动（PNM），由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组成，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并提倡农业与工业。

1956年，威廉斯被选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他很快与美国开始了一场关于海军基地的争议，基地是第二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国允许美国设立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威廉斯清楚，由于特立尼达仍然是殖民地，他不能迫使英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关闭基地。然而，他指挥了一场积极反美的运动，一度领导6万多抗议者到美国领事馆前抗议。结果，美国同意偿付给特立尼达3 000万美元，分5年付清。尽管由于接受美国的付款而遭到批评，但威廉斯运用这些资金为圣奥古斯丁的西印度大学购置了医疗设备，铺设道路，改善铁路系统，改进西班牙港的港口设施（Palmer，131—132）。1967年，威廉斯要求美国搬迁基地，迫使美国放弃了该基地。

1962年，威廉斯与英国谈判独立的补偿金。他指出，殖民国家应该为其使用和滥用殖民的自然资源做出赔偿，这引起了殖民国家的关注。他与反对党民主劳动党（DLP）合作，代表了东印度社会的利益，并将其整合进政治进程之中。他们采取的步骤之一是，明确职权以在邻近的东印度社区和原先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乡村地区划定选区。他们努力工作，以确保大规模选民的登记，并促进选举的进行，在新

210

政府中反对党的鼓励下，人们大量参与到选举中来，尤其东印度人，他们觉得被威廉斯拒绝了。

在6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威廉斯赞同资本主义，邀请外国到特立尼达投资。然而，45 000名特立尼达人的失业和罢工次数的不断增加——从1969年的9次增加1970年的60多次——显示出人们尤其年轻人对其领导的不满。

人们称黑人精英包括威廉斯脱离群众，1970年，黑人权力运动领导了多次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作为黑人权力革命而广为人知。1970年3月4日的一次大型集会引吸了10 000多名抗议者。4月6日，一名警官射杀了一个年轻的抗议者；随后65 000名哀悼者参加了其葬礼。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立尼达当局逮捕了70多名激进分子。威廉斯试图通过一项立法来限制抗议活动，但百姓和政客都不支持这一提案。

70年代，威廉斯开始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控制本地的物价上涨，为贫穷地区提供食品补贴，增加老年人的津贴，修建大量新学校。这些改变得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财政收入。石油的收益由1972年的0.33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5.8亿美元（McDonald，195，196）。

随着特立尼达经济的繁荣，东印度社区和多民族团体，包括华裔特立尼达人，表达了对威廉斯和人民民族运动的不满。他们将人民民族运动视为非洲裔特立尼达人利益的代表。威廉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声望在民众和其政党中的下降，但是健康状态不佳使其不能完全解决挑战。在其1981年去世后，民族复兴联盟击败了人民民族运动。亚瑟·拿破仑·雷蒙德—A. N. R.—鲁宾逊（1926—　），一位前人民民主运动成员，当选为总理。

变动中的社会

211

20世纪80年代，失业率徘徊在17%—20%，20%—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1990年，一个以回教布道兄弟会而著称的黑人穆斯林组织突袭了国会和国家电视台，绑架了总理A. N. R. 鲁宾逊。绑架

者与警察对峙，最终导致了3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人质被释放，为维持和平，穆斯林激进分子被特赦。1995年，巴斯德奥·潘戴（1933— ）当选为总理，其内阁主要由东印度人组成，这也反映了印裔特立尼达人政治势力的增长。

这种变化是特立尼达社会的反映："直到20世纪60年代，特立尼达多根据人种标准来分配工作：绝大多数印裔特立尼达人生活在农村，种植甘蔗，或者做农民；绝大多数非洲裔特立尼达人在城市的服务、法律、教学、医疗、警察部门和军队中工作……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抗议和社会变化给印裔特立尼达人的社会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更大流动性。"（West-Durán，196）

或许，印裔特立尼达人社会最出名的成员是V. S. 奈保尔，他的关于殖民主义的旅行随笔和小说作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最优美的一些著作而得到认可。2001年，奈保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现住在英国，因其描写殖民人物的冷漠无情而不时受到批评。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在成为1958至1962年西印度联盟的一部分之后的1979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从英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80年代出现了劳动力不稳定的情况，这是因为1979年苏弗里耶尔火山喷发而导致居民迁移和1982年飓风对香蕉产业造成的损害。至20世纪末，总人口11.7万人中有6.7万人在旅游和香蕉产业中就业（据后来统计，其香蕉出口值为1 800万美元）。英国女王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象征性君主，但真正的权力在民主选举的总督和议会手中。

212

格林纳达：莫里斯·毕晓普和人民革命政府

由于羡慕20世纪50年代古巴的革命策略，英属加勒比地区爆发了仅有的一次成功的武装革命。1972年，一位名为莫里斯·毕晓

普（1944—1983）的律师领导了对格林纳达政府机关的突然袭击，以反对一度受人爱戴但已变得腐败专制的政治人物埃里克·盖里（1920—1997）总理。盖里通过开设饭店、娱乐场所和夜总会来聚敛财富。70年代，格林纳达人平均每月可挣50美元，但是作为总理的盖里每月免税的数额即达2 000美元（Cotman，10）。失业率达50%，教育和健康被忽视，仅有36%的健康工作者接受过少许的专业训练。格林纳达的综合医院缺乏设备和供给，牙科诊所和乡村健康中心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如同海地的杜瓦利埃，盖里声称自己是巫毒教牧师，能够与在场的国外贵宾进行精神交流，并养成了对超自然物的嗜好。他请求美国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美国的飞碟现象。

在50年代，盖里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他为农村的穷人和农业工作人员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劳动工会，并创建了一个政党——格林纳达统一工党；当1951年英国允许格林纳达真正自治之时，它控制了格林纳达的统治机器。1974年，盖里指导格林纳达转向政治独立。但是，盖里已习惯于用强力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和私人目的，不允许人们对他的管理进行批评。他经常拒绝反对者在城市服务中就业，并经常借助一个被称为"獴帮"的私人匪帮施加暴力。1979年，据信盖里批准以暴力，甚至以暗杀手段来对付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莫里斯·毕晓普。正是这种传言促使毕晓普推翻了盖里的统治。

毕晓普的政治运动称为新宝石运动（NJM）。1979年，在毕晓普实施突然袭击之后的数小时，他对格林纳达人民发表演说，宣布了他的简单的计划："革命是为了工作，为了食物，为了舒适的住处和健康服务，为了给我们的子孙一个美好的未来。"（Bishop，78）新宝石运动形成于70年代，其主要目标是反对盖里。在毕晓普和一位名为伯纳德·科尔德（1944—　）的年轻知识分子领导下，运动采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

213

在掌握权力的前两年里，自称为人民革命政府（PRG）的新政府

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包括所有公民免费受教育，培训教师，免费医疗以及给孕妇免费分发牛奶、黄油和大米。人民革命政府试验性地创办加工厂，生产由本地产品制作的果酱和果冻；创办国家手工艺协会，征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队伍。人民革命政府于1981年建造了32处住房，1982年建造了289处住房，给低收入者提供了130万美元的补助或贷款（Steele，388）。

革命引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领导人的关注。卡斯特罗派遣医生、教师和建筑工人到圣文森特。委内瑞拉向他们捐赠石油产品。

军事组织、政治镇压和对格林纳达的入侵

在80年代早期，还有一种军事组织，活动经常被毕晓普的支持者和人民革命政府所拒绝。至80年代末，格林纳达已接受数千支苏联来福枪、数百挺机关枪、手枪和重型火炮。同时，古巴还允诺为其训练新的格林纳达军队，并计划把士兵从600名增加到10 000名。潜在的军事力量和毕晓普与卡斯特罗及尼加拉瓜共产主义政权友谊的增长使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11—2004）感到忧虑。当格林纳达人开始在古巴志愿者帮助修建的新国际机场上工作时，里根越来越担忧。

人民革命政府渴望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拒绝举行自由选举，并通过了一系列打算控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人民法》第17条和第23条，它允许政府不经审判即可逮捕被怀疑为计划颠覆活动的任何人。拉斯塔法里派成员支持毕晓普后，人民革命政府即对其实施再教育。现在他们被迫剪去头发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来，并被政府表扬为“志愿者”。人民革命政府还审查出版，指控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出版者。伯纳德·科尔德赞同快速转变成共产主义政府，而毕晓普更喜欢较慢的再教育过程，以便使其同胞接受革命理想并转变，随之人民革命政府内部出现了裂隙。两者之间的政治分歧不可能弥合，科尔德对格林纳达人支持革命不是出于献身于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忠于毕晓普表示担忧。

214

古巴人真的对格林纳达进行了非军事或军事的援助吗?

随着美国坚称古巴卷入了格林纳达的事件是一军事事实，而古巴政府则说仅是军事上的最低限度的技术支援，问题就出现了。作者罗伯特·米利特支持第一种说法。

“古巴提供了军事专家，9名永久驻（人民革命政府的）总参谋部，20名分驻格林纳达各领域。另外，更多的古巴军事人员被临时派到格林纳达，6人到了总参谋部，6~7人在别处。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格林纳达的军事人员解决军事训练问题……并训练谍报人员帮助防御他们的国家……古巴的建筑工人、另外的准军事人员和正规的民兵部队……在数量上要超过格林纳达的现役力量……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当然，作为工人，像所有古巴的工人一样，他们要接受军事训练。’”①

1983年12月19日，科尔德的支持者逮捕并处死了毕晓普，他被指控为背叛革命、只顾培养个人声望；另外，还有一打他的追随者和200多名因毕晓普的邀请而进入政府工作的普通格林纳达人也被逮捕并处决。据报道，在毕晓普临刑前对行刑人员说：“我想看看对我行刑人员的眼睛。”（Steele, 409）在毕晓普被处决不久，邻近的多米尼克总理尤金妮娅·查尔斯应美国的要求，代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介入。12月25日，里根总统以保护格林纳达的500名美国医科学生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要求结束格林纳达的无政府状态并恢复秩序为名，批准了紧急行动。 215

加勒比地区的铁娘子尤金妮娅

多米尼克总理尤金妮娅·查尔斯（1919—2005）批评莫里斯·毕晓普没有举行选举，支持镇压，以及羡慕古巴革命和共产主义。

① Millette, Robert E. *The Grenada Revolution: Why It Failed.* New York: Africana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5, pp. 63, 65—66.

但当科尔德处决了毕晓普和他的200多名支持者并宣布戒严以防止死者家属收尸时，查尔斯讨论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应何去何从。由于东加勒比国家没有军事力量介入格林纳达，他们建议她向里根总统表达担忧。

查尔斯1980年当选为总理，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位掌有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计划促进资本主义和商业作为发展多米尼克经济的最佳途径。她拒绝别的加勒比国家实施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做法，如古巴。1982年，她成为牙买加总理爱德华·西加（1930— ）和巴巴多斯总理汤姆·亚当斯（1931— ）组织的《加勒比地区倡议》的成员。她建议美国允许加勒比地区的产品免税进入，而加勒比地区则给予进入本地区的北美公司以10%优惠税率。在格林纳达革命失败之前，最初要求的3 500万美元没有兑现。

革命的失败使查尔斯登上了世界舞台，世界的目光投向了多米尼克。她因支持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而受到批评，她却将美国的行动描绘为救援而非入侵。批评家评论说，查尔斯允许里根为其实现入侵格林纳达的军事计划利用了她。但是，查尔斯与里根友谊的发展带给了多米尼克1亿美元的赠予。

格林纳达的斗争，查尔斯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毕晓普阐明的竞争性的观念使整个加勒比在这一时期卷入混乱。像查尔斯这样的政治人物接受了资本主义，并从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中受益；而像毕晓普那样的革命者，寻求打破美国自由经济的统治，并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作达到其目的的工具。假设要在个人经济利益与革命的自我牺牲之间作出选择，格林纳达人会选择前者。至少，几乎所有格林纳达人——超过了10万——对美国海军到来的夹道欢迎可以显示出这一点。

216

尤金妮娅·查尔斯死于2005年，诺曼·曼利死于1969年，迈克尔·曼利死于1997年，埃里克·威廉斯死于1981年，他们的死标志着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强人时代的终结，他们推动了自治运动，并管理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新国家。作为领导人，他们展示出了独裁主义的特征，有时他们被反对派描绘成独裁者，但他们避免了独裁的产生，

他们往往因当选而掌权，或因落败而下台。在以前的英属西印度群岛，这些名人的政治生涯说明，人们宁愿一个不完美的政治过程，也不喜欢军事政权的长期存在，或者领导人像海地的杜瓦利埃、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那样身着军装进行统治。

第十二章　21世纪：外来移民和不确定性

217　在19世纪早期，到西属加勒比之外旅行，即是去宗主国西班牙。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目的地，因为这些岛屿是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延伸，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宗教使得加勒比人在西班牙的生活相对容易。对富有的父母来说，送他们的孩子到西班牙学习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波多黎各圣诞礼物》（1843）一书是由在巴塞罗那的思念家乡的波多黎各学生创作的，它开创了波多黎各文学。但一个例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它在与海地人侵者战斗，并陷入了一系列导致政治混乱的内战。

19世纪晚期，当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开始仔细考虑与西班牙进行政治脱离时，加勒比人寻求其他的教育之地。整个南美洲的大学，尤其是在1820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战争之后，成为合理的选择。而美国，尤其是纽约，也成为波多黎各和古巴年轻人的目的地。19世纪30年代，古巴人费利克斯·巴雷拉定居纽约之前生活在费城。在19世纪30年代霍乱流行期间，巴雷拉神父以“爱尔兰牧师”闻名，当时，3 000名纽约人感染了霍乱，巴雷拉护理病人，在出名的五点区的爱尔兰人贫民居住区搭建临时医院。同时，一群古巴作家和知识分子，像流亡西班牙的波多黎各人一样，出版诗文集《流放颂歌》（1858），为离开古巴而惋惜。

218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西属加勒比人的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9 年，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发生了第一次变化。第二次变化则是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被刺身亡导致的。


圣奥古斯丁的费利克斯·巴雷拉神父像，曾生活在费城、纽约和圣奥古斯丁，因其对穷人所做的工作而受人爱戴。（Yvonne Massip 拍摄）

古巴人在美国

古巴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美国是十年战争（1868—1878）期间，当时流亡到佛罗里达和纽约的古巴人超过了 5 000 人。其中一位最富有抱负的移民是比森特·马丁内斯·易博（1818—1896），他在距离古巴海岸仅 90 英里的基韦斯特创办了一家烟草工厂（Appel，43）。19 世纪 80 年代晚期，马丁内斯·易博迁移至坦帕，并在一处遍布沼泽的地方建起了一个工业城镇，后来命名为易博市。这个流亡古巴人的社区成了古巴独立战士的主要资金来源，何塞·马蒂为独立运动筹集资金时曾到此访问。

马蒂由纽约旅行至坦帕，他居住在此处，为包括《纽约太阳报》在内的几家报纸撰写文章。在曼哈顿，古巴革命党的创立人马蒂与被流放的波多黎各爱国者交往，如有才气的作家和哲学家欧赫尼奥·玛丽亚·奥斯托斯（1839—1903）、诗人帕钦·马林（1863—1897）等。这一时期，居住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超过了 2 000 人。社区中心在第十四街区一带，对拉丁美洲人和加勒比人来说，它是一个很

219 响亮的地方。社区的中心之一是拉丁旅馆，讲西班牙语的旅行者经常在此居住，那些寻找拉丁风味食品的人也经常在这里就餐。这些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将自己当成准备回家的流亡者，事实上，在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结束和1898年西班牙从加勒比地区撤出之后，他们就这么做了。

然而，坦帕的许多古巴人并没有返回古巴，因为他们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古巴人在烟草制造业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同样得到了来自出名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移民社区的捐赠，这一切使易博市变成了繁华的社区。他们的后代成了闻名的“坦帕先生”，并将易博市建成富有活力和生气的文化城市。坦帕市的移民社区分成几个文化中心，成为来自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巡回演出的专业剧院公司的家园；他们还相互提供帮助，如医疗保险、为家庭采购和修理提供延期的贷款，甚至发起各种族的娱乐活动。富有活力的环境激发许多人去创作，产生了数十部故事和小说，既有虚构故事也有回忆录，但都是关于易博市的生活。这些作品是他们在易博市生活经验的表达，这些作者包括何塞·伊格莱西亚斯、费尔迪·帕切科、弗朗科·乌尔索和威廉·德宾。

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移民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古巴移民数量较少，约1万人在纽约，数百人在新泽西，还有数千人在迈阿密和坦帕。这些新古巴移民从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下逃离寻求避难，也在寻找经济机会。他们在宾馆和饭店、工厂以及刺绣行业工作。在迈阿密，流亡社区充满了反巴蒂斯塔的情绪，许多人在为古巴的武装冲突做着准备。戴德县的大多数古巴人与政治组织结合，准备将巴蒂斯塔赶下台。

然而，1959年1月1日之前，这些在美国的具有古巴经历的流亡人员已经变得很镇静。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军队接近哈瓦那时，巴蒂斯塔的数百名盟友将他们的钱和行李经过佛罗里达海峡运抵迈阿密。一周之内，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将古巴流亡人员运到了美国。

开始是涓涓细流，后来变成汹涌的移民大潮，到80年代后期，共有150万古巴人在美国，另外50万古巴人在墨西哥、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在来自古巴的稳定的移民潮中，最富戏剧性的插曲是1960年代的彼得·潘行动、1980年的马里埃尔事件和1994年的偷渡者危机。 220

彼得·潘行动

彼得·潘行动是古巴一次大规模的无陪伴儿童的政治出走。在这次秘密的运动中，父母因担心共产主义的教化而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古巴。一则谣言说古巴政府准备取代父母的职责并将孩子从家中带走，由此引发了这次运动，并从1960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超过14 000名儿童离开古巴和他们的父母。美国的天主教，还有新教和犹太教组织卷入了这次运动。孩子的父母或因为成为古巴政府逮捕的目标，或者由于反卡斯特罗活动，他们借口孩子需要出国学习或由于健康原因将孩子送出国门。在美国，这些孩子被安置在养育他们的家庭，直到他们能够与其父母团聚。分离从几周到数年不等，但大多家庭最终重新团聚。

马里埃尔运输船

马里埃尔运输船事件发生在1980年4月21日至9月26日。在此期间，超过125 000古巴难民离开了古巴。这次出走由几名古巴人到秘鲁大使馆避难事件所致。大使馆针锋相对，拒绝将自称是流亡者的人交给古巴秘密机构。愤怒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任何想到大使馆寻求避难的人都不受任何限制；不到24个小时，10 800名古巴人涌入外国使馆的大院。反面的宣传说，卡斯特罗收到了来自大使馆的、全世界都看到的、愤怒的古巴人高呼“打倒卡斯特罗”的照片，提醒独裁者他们要邀请古巴人到迈阿密寻找其亲属。数百只渔船和小帆船从基韦斯特驶向古巴的马里埃尔港口，这就是出名的所谓自由小舰队。船只超载，许多古巴人在航行中饱受晕船之苦。到达基韦斯特之后，

这些新来者被安置在临时营地——迈阿密的橘子杯体育场，等待亲属的认领，以获得资金支持和住处。

221

为了使流亡者和美国的古巴社区失去信誉，古巴政府迫使他们的亲属找出了近10 000名始终无法就业的罪犯和精神有问题者。媒体报道的最后一波古巴难民以暴徒和吸毒者的形象出现，这一点在1983年热播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得到了展现。已建成的古巴难民社区并未张开双臂欢迎新移民的到来，因为他们比先前的移民贫困，而且皮肤较黑。他们也不是那么坚定地反对卡斯特罗，他们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移民。大多数人口统计学研究表明，这些移民团体与先前的古巴社区的移民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尽管他们被列入更大尺度上的种族歧视的老套。

马里埃尔事件已过去20多年，他们已融入古巴人的社区和美国社会。对难民的负面报道迫使美国的古巴难民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并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形成了一个院外活动团。最出名的组织古巴人国家基金会产生了，它成功地在美国之音电台网络中创办反卡斯特罗电台——马蒂电台。马蒂电台向古巴播放未经审查的新闻，提倡不同的观点并要求结束卡斯特罗的统治。

偷渡者

1994年的8月和9月，36 000名古巴人乘自制的木筏离开古巴。美国和古巴同意控制这次出走的危机，而且古巴政府允许每年20 000名古巴移民出去的政策已有十年之久。移民通过哈瓦那的美国外交办事处抽签系统抽到的字母来选择。

这场危机迫使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政府对古巴的移民政策重新检讨。对古巴人的优惠待遇成为海地人团体等组织批评的话题，他们声称因种族原因而遭到区别对待。美国给予古巴政治避难的政策可以上溯至冷战时期，它试图动摇古巴的革命政府。总统克林顿(1946—　)改变了这一政策，下令将在海上抓获的古巴偷渡者遣返回古巴，而对那些已进入美国海岸者将给予政治避难的许可。

222

马里埃尔人——不受欢迎的古巴人

马里埃尔人成为不愿工作、渴望亲朋的财政支援的代名词，而且他们批评美国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人和古巴裔美国人的物质主义。第一代古巴裔美国人觉得马里埃尔人没有宗族精神，事实上那只是个别情况，因为后来者在极权主义政权下长大，只能接受政府给他们提供工作而且别无选择。

马里埃尔人发现改变自身的标签十分困难，而且很多人受到歧视。一位古巴出生的社会工作者——迈阿密城的经纪人头目，在他们达到 3 年之后，被引证说 1/3 的马里埃尔人是“败类”。戴德县一所名列前茅的学校官员——古巴裔美国人——抱怨说，马里埃尔的孩子“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权威没有什么要尊敬的，只有羡慕而非畏惧”。（他们）……陷入卡斯特罗政府和流亡社区两大政治权力之间。①

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已经稳定侵入了美国的政府系统。如 2007 年，佛罗里达的梅尔·马丁内斯和新泽西的罗伯特·梅嫩德斯两位古巴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参议员。有 4 名古巴裔美国人成为众议院议员，他们都来自佛罗里达或新泽西。

波多黎各人在美国

20 世纪的前 40 年，在美国东海岸一带讲西班牙语人口的增长中，波多黎各人居于支配地位，部分是由 1917 年的《琼斯法案》所导致，它使得美国的波多黎各人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波多黎各和美国，而不受移民政策的限制。交通十分方便，因为波多黎各轮船公司每周从纽约

223

① Levine, Robert M., and Moisés Asís. *Cuban Miami*.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1—52.

到圣胡安开行4班，往返票价一等舱50美元，二等舱25美元。一位市场代理人将波多黎各人送往美国，是为满足像新泽西的瓦恩兰这样小城镇的农业劳力需求，承包商在种植和收获季节安排大批的工人赴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开始使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力的需求大增。结果，波多黎各人来到新泽西的卡姆登、纽瓦克和费城。然而，最具吸引力的是纽约，至40年代末，35万波多黎各人来到了这里。

50年代，许多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感觉自己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居住在贫穷的地方和被弃置的房屋里。他们的生活因与歧视行为的日常斗争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多，培训体系对新移民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仅有1 000名教师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在遭受了挫折之后，许多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加入匪帮。帮派冲突是纽约都市生活的家常便饭，波多黎各人匪帮与其他种族的匪帮进行争斗，有时波多黎各人匪帮也相互斗争。这种匪帮的争斗通过《西区故事》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甚至作为戏剧在百老汇演出，后来拍成了动作电影。

拥有最多波多黎各人的社区是纽约的哈林区、上西区和东哈林区，后者是著名的西班牙哈林区。为了控制匪帮，这里的社区领导人发展了互助组织，使波多黎各年轻人离开匪帮生活，并给他们提供职业训练和教育机会。这些领导人的工作使自己与城市的政治人物接触。20世纪50年代早期，纽约市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和监视曼哈顿的波多黎各人事件。至50年代中期，波多黎各人正在成为纽约主要的文化与民族的景观，如人们所喜爱的音乐家蒂托·普恩特（1923—2000）因其演奏手鼓的高超技艺而获得广泛认可，并于1958年自豪地确立了波多黎各人日。新波多黎各人文学因波多黎各人身份的文化表达而得到了发展。“新波多黎各人”一词是纽约与波多黎各人两个词的混合，它是对一种新的种族身份的概括。学校里的诗歌和散文写作训练以及讲故事经常使用英语与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新波多黎各人的诗人和作家在纽约的各种酒吧中的听众面前朗诵他们的作品。新波多黎各人作家仍然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创作，如

埃斯梅拉达·圣地亚哥，他在寻求他们自己的种族身份。

新波多黎各人

类型的转变发生在纽约波多黎各人社区内部，随之于 1969 年出现了著名的洛德党。洛德党起初由匪帮成员组成。由黑豹党运动和像革命领袖切·格瓦拉这样人物的激发，他们运用策略来改进贫穷的波多黎各人和其他波多黎各人社区的生活。洛德党为儿童建立了早餐中心以便他们不再饿着肚子去上学，还负责清扫街道和提供廉租房公寓，并一度征用一个移动诊疗部为糖尿病和其他病人免费诊疗。他们支持波多黎各的独立，反对 60 年代后期的越南战争。或许最重大的和长期持续的贡献是在波多黎各人中发扬的自我认可的观念。贫穷不应简单地归结于个人行为，而是应通过社会行动和组织与之作斗争，以克服种族歧视和制度上的不适应。洛德党的信条有助于在波多黎各人社区灌输荣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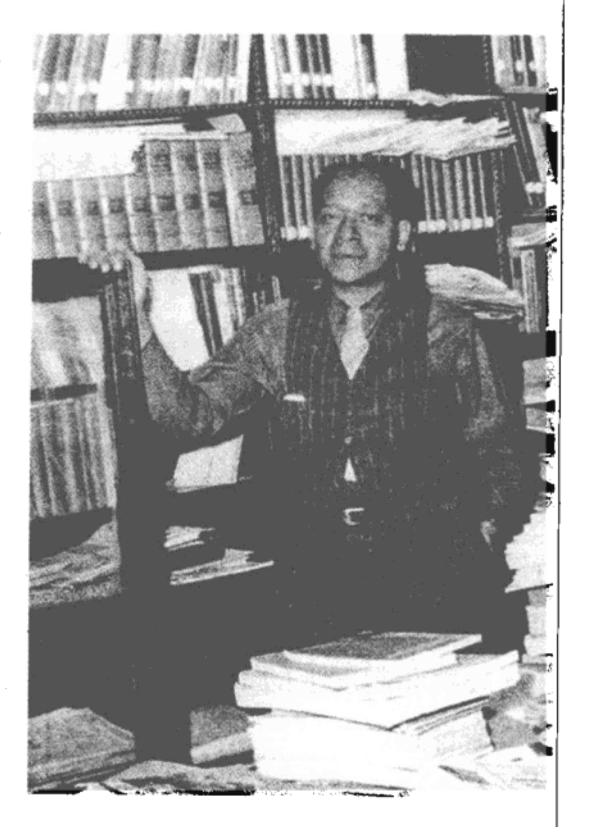
随着波多黎各人开始对纽约政治而非波多黎各的政治发展表现出更多的关注，新波多黎各人的角色开始出现。这种转变在融入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后代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他们仍深为其传统而自豪，而现今他们更多的关注则是美国大陆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新的一代不再像其父辈那样经常到波多黎各去旅行。他们的西班牙语已说得不那么流畅，常用西—英语（Spanglish）——一种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当他们说一种语言时，通常是英语，中间夹杂着西班牙语词汇和短语。

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埃尔曼·巴迪略（1929—　），开始与民主党的权力经纪人交往，主张对波多黎各人进行经济与教育的改革，他将美国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为一个整体，与波多黎各岛上的波多黎各人区分开来。1970 年，巴迪略当选为纽约南布朗克斯区的美国国会代表。目前，有三名波多黎各人是国会议员——纽约的何塞·塞拉诺和尼迪亚·贝拉苏埃斯以及芝加哥的路易斯·古铁雷斯。

225

赫苏斯·科隆（1901—1974）——新波多黎各人的编年史学家

至20世纪40年代，生气勃勃的波多黎各人社区注意到波多黎各行动主义者和作家的工作，人们走向一条群体政治之路并产生了新的一代。作品被广泛阅读、受人喜爱的作家是赫苏斯·科隆。新波多黎各人文学是主要由生活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创作的，主要表达了和波多黎各人相关的社会主题，而赫苏斯·科隆被认为是新波多黎各人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赫苏斯·科隆是一名社会时事评论者，他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的纽约波多黎各人的历史。(Centro de Estudios Puertorriqueños)

赫苏斯·科隆是一名出色的波多黎各人记者和政治活动家。20年代，他开始用西班牙语为纽约的西班牙语期刊撰写文章……当他着手发展自己的文学和记者事业时，他遭遇了种族偏见，主要是因为他的肤色较暗……用西班牙语写作了数年后，40年代后期，科隆成为《日酬工人报》——共产党机关报的英文专栏作家……其主要话题是：（1）政治意识的创造与发展；（2）波多黎各民族主义的发展；（3）支持贫穷的工人阶级；（4）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其中种族与阶级歧视经常发生，个人价值似乎不存在。①

① Kanellos, Nicolás. *Hispa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pp. 88—89.

多米尼加移民

226

1961 年之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非常少。20 世纪早期，在曼哈顿仅有数量很少的多米尼加人，其实他们只是一些富裕的学生。其中两位是弟兄俩，成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马克斯（1885—1968）和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20 世纪中叶，多米尼加人到纽约寻找经济与教育的机会，并在此找到了挣钱的门路。在此期间，特鲁希略害怕会将不利的宣传带给多米尼加共和国而不许其同胞出国。

1961 年，特鲁希略被刺杀后，约 1 000 名多米尼加人离开了祖国；之后一年，约 4 000 人离开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于害怕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的不稳定，美国派遣约翰·巴特洛·马丁（1915—1987）出任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以寻求缓和 1963 年胡安·博什当选总统之后的紧张局势。由于相信日益增加的、迁移到美国的多米尼加人会令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而因此减少政治与经济的不和，马丁放宽了对多米尼加人的签证。一年后，10 000 名多米尼加人得到了签证。尽管人们对多米尼加人的印象流于老套：移民贫困潦倒，没有受过教育；但现今的移民来自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或拥有高超的手艺或贸易经验。至 1970 年，差不多有 15 万多米尼加人定居在美国，其中 56% 在纽约；至 2000 年，在美国的多米尼加人超过了 70 万。

多米尼加人在纽约

大量的多米尼加人定居在靠近乔治·华盛顿桥的华盛顿高地。至 90 年代末，多米尼加人在纽约开设了约 200 处杂货店和数十家饭店。许多移民拥有两份工作，社区研究者对这一阶段纽约的多米尼加人和迈阿密的古巴人作了比较。像古巴裔美国人一样，多米尼加人努力参与到美国的政治进程中去。整个 90 年代直至 21 世纪，在美国的东北

部，多米尼加人通过选举占据了一些市政的管理职位，尤其是在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和罗德岛。2004年，多米尼加人被允许拥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双重公民身份，参加两国的总统选举投票。多米尼加政府在纽约、波士顿、普罗维登斯和罗德岛进行民意测验，以促进投票。一些组织，如多米尼加—美国人全国圆桌会议，鼓励移民的政治参与。

227

1994年，纽约的大学城设立研究中心，致力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美国的多米尼加人研究。2001年10月，美国航空的飞机在纽约皇后区的街区坠毁，导致260名多米尼加人死亡，纽约人为此举行悼念活动。5年后，纽约市为死者树立纪念碑。

海地人在美国

50年代，约40 000名海地人迁移到巴哈马，175 000人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数千人到了古巴，数量不明的人口去了扎伊尔，38 000人进入美国。海地人移民美国可上溯至20世纪初，当时约500个上层家庭定居在美国，以避免被军队狂暴地占有（Laguerre，23）。他们开创了哈林区的时代，这些家庭担负起与想逃避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下一波移民的联络任务。

海地人移民美国分几个阶段。那些为逃避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海地人在50年代末离开了海地；这些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独裁政权的政治对手。第二阶段始于1971年，即权力由杜瓦利埃·弗朗索瓦转移至杜瓦利埃·让—克洛德手中——从“杜爸爸”到“杜小子”。这次移民潮也是由海地的持不同政见者引发，而且还包括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到佛罗里达和纽约等地以寻求更好的工作。至80年代初，美国共有80万海地人。

近30万乘小船而来的海地移民是这次移民潮的显著特征，它始于1986年，从杜瓦利埃·让—克洛德的统治下迁移到美国。至21世纪初，海地的失业率达60%，10个海地人中有3个在寻求离开这个

国家。

纵观整个海地人外迁的历史，进入美国的人口是佛罗里达和纽约，近 50% 的移民定居在大苹果[①]的都市区。在迈阿密和纽约，海地人社区备受歧视，他们不仅与白人，还经常与城里的非洲裔美国人产生冲突，他们压低了海地人的工资。在海地人社区内部，年轻人为身份问题而斗争。久而久之，就像波多黎各社区的早期几代一样，年轻的海地人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 228

在别处的西印度群岛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60 年，据估计有 17 万多来自巴巴多斯、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的西印度群岛人到英国定居，以寻求工作，接受教育。因为共同的语言，加之熟悉英国的习惯，使他们乐意移民英国。新来的移民很快被隔离在伦敦之外，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视为二等公民。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许多西印度群岛人选择迁移到加拿大，至 1985 年，约有 44.5 万加勒比人后裔生活在加拿大。最初的移民多为妇女，她们凭着一份契约来到加拿大，通常作为女仆或照料儿童。

西印度群岛人在英国

英国首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大规模移民始于 50 年代中期。1950 年之前，一些西印度群岛人来到英国，但很少有人寻求长久居住。这些移民先锋中最著名的是诗人和男女平等主义者尤娜·马森（1905—1965），她在 BBC 电台工作，这份工作进而导致了她创办加勒比之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使西印度群岛保持在帝国阵营之内作出的努力，40 年代后期，它还帮助解决西印度群岛的劳动条件问题。在电台节目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作者朗诵他们的作品，以促进帝国

① 大苹果，纽约的别称。——译者注

内部种族和公民的和谐。这是英国第一次承认与大不列颠不同的加勒比文化的存在。马森1932年去了英国，1946年返回牙买加。因电台节目她在牙买加名声大噪，这鼓舞了知识分子和未来的作家到大西洋的对岸去。受到鼓舞以寻求更好经济机会的来自巴巴多斯、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的人们开始准备移民。

1948年，《英国国籍法案》给予说英语的加勒比人所要求的联合王国的公民权，确保他们不受限制地进入英国。1955年，27 550名西印度群岛人达到英国。他们大多来自牙买加，因为失去了农业方面的机会而移民。在此期间，1%的农场占有50%的土地，这表明大农场仍然是通常的农业模式。这种模式使许多人失去土地或无法获得土地。

西印度群岛人平均每年移民英国15 000人，一直到1961年。当时，英国人对洪水一样涌入的黑人感到担忧，并促使国会立法，限制非本地居民获得工作。然而，由于家庭可以重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潮一直延续到1971年，此后，加拿大和美国成为移民的理想之地。1973年，西印度群岛人不再去英国，近3 000人返回加勒比或到美国定居。虽然如此，至1981年，仍有51.9万人生活在不列颠群岛。其中近25%在15岁以下，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英国。

英国白人与他们以前属地黑人的紧张关系表面化。60年代中期，在伦敦和诺丁汉等城市发生了几次暴乱。60年代末，成立了种族关系委员会、社区关系会、社区关系委员会三个国民委员会，以解决种族冲突。1976年通过的《种族关系法案》规定，雇佣和法定的程序执行时不得有歧视行为。然而，紧张仍在继续，尤其是黑人青年成为警察目标。对一位官员来说，制止或逮捕一位在诺丁汉犹太人区的黑人无需任何其犯罪的证据；这种做法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种族定性”。

西印度群岛人在加拿大

至80年代，加拿大成为近50万西印度群岛人的家园，其中近2/5是牙买加人。移民们喜欢的地方是多伦多及其郊区。移民在60年代开始迁入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政府制定计划从牙买加吸引家庭工人。第

一波移民主要是妇女，然后是她们的未婚夫、丈夫，还有孩子。尽管许多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专业职位对他们仍设有限制，他们不得不开出租车或在服务行业中谋个差事。他们偶尔还会成为种族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针对有色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隔离的区域，如火车站和汽车站，通常发生在晚上较晚的时间。1980 年，政府作出反应，成立了几个委员会研究种族暴力。1983 年，政府出版了报告《平等的今天》，它建议在教育、就业、法律制度和媒体方面结束制度上的种族主义。1984 年，政府设立了 500 万美元的信托资金同种族主义作斗争，尽管没有宣布用来指导完成为这一责任的指导方针。 230

至 2001 年，近 5 万加拿大人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的后代，这是 19 世纪末即已开始的移民的结果。要拿出一个精确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在这一时段并不区别其来自的国家，而是将所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列为一个总的类别。据估计，从 1899 年到 1924 年有 10 万西印度群岛人移民到加拿大。

特立尼达和巴多哥人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矿山、船厂寻找工作，或作为佣人。同时，加拿大限制永久的白人移民，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白人。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只给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有限的工作许可，而且希望他们返回家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入伍的移民才被许可留在加拿大。1967 年，移民种族配额制度结束，迁入加拿大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大量增加，1967 年至 1991 年，迁入了约 4 万人。多伦多成为加拿大移民的中心。这个城市在加拿大与众不同，其人口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当然还有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

海地人在法国和加拿大

1945 年，法国深受第二世界大战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的困扰。鉴于此种原因，国家移民署签署命令，调整了工人移民进入的数量。政府报告说，1946 年有 30 171 名工人进入法国。1956 年，达到了 65 428 人。1963 年，海外部升格为移民局，以吸引来自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

的工人。由于这些工人是法国公民，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移民。移民局设立后的10年，法国来自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移民共达115 465人。这些工人包括家庭佣人、市政工人和医院护理。

231 不像来自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移民，海地人并不是法国移民迁移的对象。“尽管法国有宽大的避难政策，并因海地人的法国文化而对其高度关注，但相较而言，很少有海地人移民法国，而且海地向外移民的35万人中，大部分是专业人才……他们在1950—1970年这段时期离开海地，只有约4 000人移民到了法国。”（Miller, 51）

逃离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近25 000海地人选择移民加拿大。由于所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中的许多海地人在魁北克的一些专业领域就业。然而，约2 000名海地人在服务行业工作，并经常成为歧视的对象。例如，1983年，一群海地人出租车司机抗议工资过低，并提起诉讼，而且他们打赢了官司。

21世纪：不确定的未来

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了一项关于21世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题目是《2020年的拉丁美洲：长期方案的讨论》，它推断在新世纪的全球事务中，这一地区将变得不如先前那样重要，对世界也将没有多少影响（Oppenheimer, 9）。英法殖民者拥有很大权力的游说议员，他们自我陶醉，然而这一切已成历史。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语言和起义者的热情点燃的火光划过了几个大洲，虽然这种由其主导的历史场景将很快过去。在新千年里，加勒比地区将会如何?

如果历史会告诉我们一切，那么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以其幅员来度量。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这一地区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海地革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现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它向人们传达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息：奴隶制度不可能持续下去。它从根本上挑战了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而且它有利于在正进行的种族争论和

学者所定义的“其他”所有社会所共有的现象。

20 世纪，古巴革命在基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向美国提出挑战，它还暗示革命将席卷全世界。甚至在今天，尽管革命成果在很大程度受到怀疑，但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权在向左转被认为是受了它的影响。卡斯特罗仍然是拉丁美洲十分令人钦佩的人物，不是因为拉丁美洲人希望采用古巴政府的模式，而是因为 50 年来他仍然站在美国的面前。从这方面考虑，他是拉丁美洲为政治和经济主权而斗争的象征。

232

简短的概括甚至不能对加勒比地区对世界所做的巨大文化贡献作出判断。瑞格乐、加力骚、伦巴舞曲、萨尔萨音乐、梅朗格舞、非洲裔古巴人的爵士乐仅是该地区对世界音乐贡献的表面部分。V. S. 奈保尔、何塞·马蒂、埃里克·威廉斯、米格尔·巴尔内特、阿莱霍·卡彭铁尔、卡马乌·布雷斯韦特以及加勒比地区类似的犹太人朱诺·迪亚兹、克里斯蒂娜·加西娅、奥斯卡·黑杰罗斯和新波多黎各人诗歌与文学的创作者，是世界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勒比有自己的方法让世界惊异。这在 21 世纪不大可能发生改变。部分令人惊异的能力在于这一地区的狂暴历史。现代加勒比人诞生于冲突——征服的冲突——之中，而且被培养得不再冲突：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革命都起了作用。加勒比地区是一个不同文化、肤色和世界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为在这一相对较小的地方共存而斗争。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必须以既令人烦燥而又完美的、既富有挑战性而又让人受益的方式与其他文化接触。在 21 世纪的开始，加勒比人还有许多东西向世界展示。

政治的变化

政治的变化似乎即将来临，尤其是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圣马丁。在牙买加，高发的暴力犯罪和目无法纪向政治体制结构提出了根本挑战，值得深入考查。

古巴

在古巴，2007年初的局势十分平淡。2006年8月，卡斯特罗因病不能掌权。有人推测他患有癌症并已濒临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实情，因为他的健康是国家秘密。这使得迈阿密举行了庆祝活动，尤其是在第八大街（小哈瓦那的中心），古巴流亡人员挥舞着旗帜高喊“古巴自由万岁”。他们欢欣鼓舞，因为46年来，卡斯特罗第一次将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而不完全控制古巴。

233

在过去，关于卡斯特罗死亡的谣言有过很多次，但都是言过其实，尽管那些预测很不正确，但这次似乎预示着卡斯特罗将不久于人世。当古巴为卡斯特罗80大寿举行庆祝之时，那些反对卡斯特罗的人梦想着一个没有卡斯特罗的古巴。2006年12月在哈瓦那举行了庆祝，卡斯特罗没有出席在剧场为其举行的典礼，也没有坐在他的席位上观看于哈瓦那举行的阅兵式。士兵们在卡斯特罗面前列队行进，令人想起了斯大林时代。卡斯特罗还缺席了2007年7月举行的纪念攻击蒙卡达兵营54周年活动和2007年8月13日举行的81岁寿辰庆祝活动。

在古巴，暴力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卡斯特罗的号令下团结在一起的古巴革命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会分崩离析并开始相互争斗吗？面对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国会打算寻求武装古巴国内的不同政见者以努力在世界的别处取得胜利吗？流亡社区在未来的古巴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1933年，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倒台，古巴爆发了复仇的大屠杀，这次古巴还会重演这段历史吗？

关于古巴未来的很多方案正在讨论。有一种可能既不被美国政治评论家认同，亦不受古巴流亡者支持，就是古巴维持现状，即由另一位卡斯特罗统治，继续进行政治控制，古巴继续和美国对峙。另一种可能是，劳尔·卡斯特罗将学习中国，逐渐接受资本主义而加强统治。还有一种方案推测劳尔·卡斯特罗将像他哥哥一样进行独裁统治，可

能在没有外界援助的情况下，古巴人自行发起一场血腥的内战之后将其推翻。

波多黎各

与此同时，在波多黎各，人们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的一个州或是与美国组成联邦一直在争论。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使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相信独立是可能的：如果古巴能够挑战美国，那么波多黎各也可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牙买加的迈克尔·曼利和格林纳达的莫里斯·毕晓普表示支持这种运动，使得这种信念在70、80年代一直存在。在此期间，几位支持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波多黎各人当选为总督。然而，无论何时，这一事情一旦付诸投票，波多黎各人就会发生分歧。这种举棋不定维持了其现今的联邦地位，这在1967年、1993年和1998年举行的全民投票表决中得到了证明。 234

在21世纪，反对成为美国一个州的人士坚持认为，这种政治改变将削弱波多黎各提供"特别税率刺激以吸引工业和投资，而且，实施联邦的税制将会弱化地方政府，并因此导致高失业率"（Acevedo - Vilá，77）。至2000年，仅有5%的人口支持独立。困难之处在于波多黎各人现在享受着成为美国公民带来的好处，而又不愿让这种好处继续下去。第三种选择是通过允许波多黎各规划自己的外交关系来提高波多黎各的联邦地位，包括制定本地的安全法律，制定自己的移民政策。当波多黎各和美国继续冲撞并重新定义这种政治关系的矛盾属性之时，争论还将继续进行。联邦契约的改变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而非一个最终的联邦或从美国独立出来。

圣马丁

在圣马丁，政治改革家拒绝用荷兰语拼写该岛屿的名称，而是代之以英语。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是通过三个步骤取得独立。第一步是不再作为一个更大岛屿的县或区域。这意味着法属圣马丁将不必再

向瓜德罗普报告（这在2007年已经实现），荷属圣马丁也不必再向库拉索报告。第二步是圣马丁成为其欧洲殖民宗主国法国和荷兰管辖下的部门或省。第三步是成为一个自治机构。最终，它期望从自治走向独立，就像英属西印度群岛那样。

一个障碍是独立之后哪一边居主导地位：荷属的一边还是法属的一边？自治并最终实现独立的支持者经常争辩说那些称号反映了殖民者的精神，因为只有一个圣马丁，也只有一种圣马丁人。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种清晰的意识支配着圣马丁：政治上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可阻止的。

235

将人们对圣马丁的感觉从一个邮轮目的地转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这种策略在21世纪初开始形成。出于这种目的，圣马丁商会和当地的公司举办一年一度的图书博览会，非洲人和加勒比犹太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此访问，以促进加勒比文学。反过来，他们将圣马丁文化发展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

牙买加

在牙买加，观察家认为，日益增加的匪帮暴力将从根本上参与政治。2005年和2006年，匪帮暴力瞄准商业社区和警察，这些领域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牙买加占支配地位社会的代表。2005年，在西班牙镇和曼德维尔两地，强盗公开挑战地方当局。令政府官员更烦心的是当地居民对匪帮的暴力活动鼓掌欢迎。在西班牙镇，匪帮成员攻击为保护其商店而对抗匪帮的商店主人。在曼德维尔，匪帮成员和其他居民抗议警察，在一条主要道路上烧毁汽车，并摧毁了法院。

暴力及对暴力的支持使一些政治家担心：“快速的民众动员……在（曼德维尔）和西班牙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们有限的容忍度和隔阂的深度……牙买加的政府和社会团体都围着它转，并借此维持权力，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的控制力正逐渐变弱。”（Meeks，3）绝大多数帮派的总部都挂着切·格瓦拉和纳尔逊·曼德拉像，这一点也不意外。这些帮派的头目希望牙买加人了解帮派的活动

不是只为毒品交易和暴力，而且他们还希望介入政治领域。

旅游业

无论政治如何变幻，所有的加勒比国家都需要收入的来源。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很多岛屿的收入来源于蔗糖。在21世纪，旅游业是新的蔗糖业。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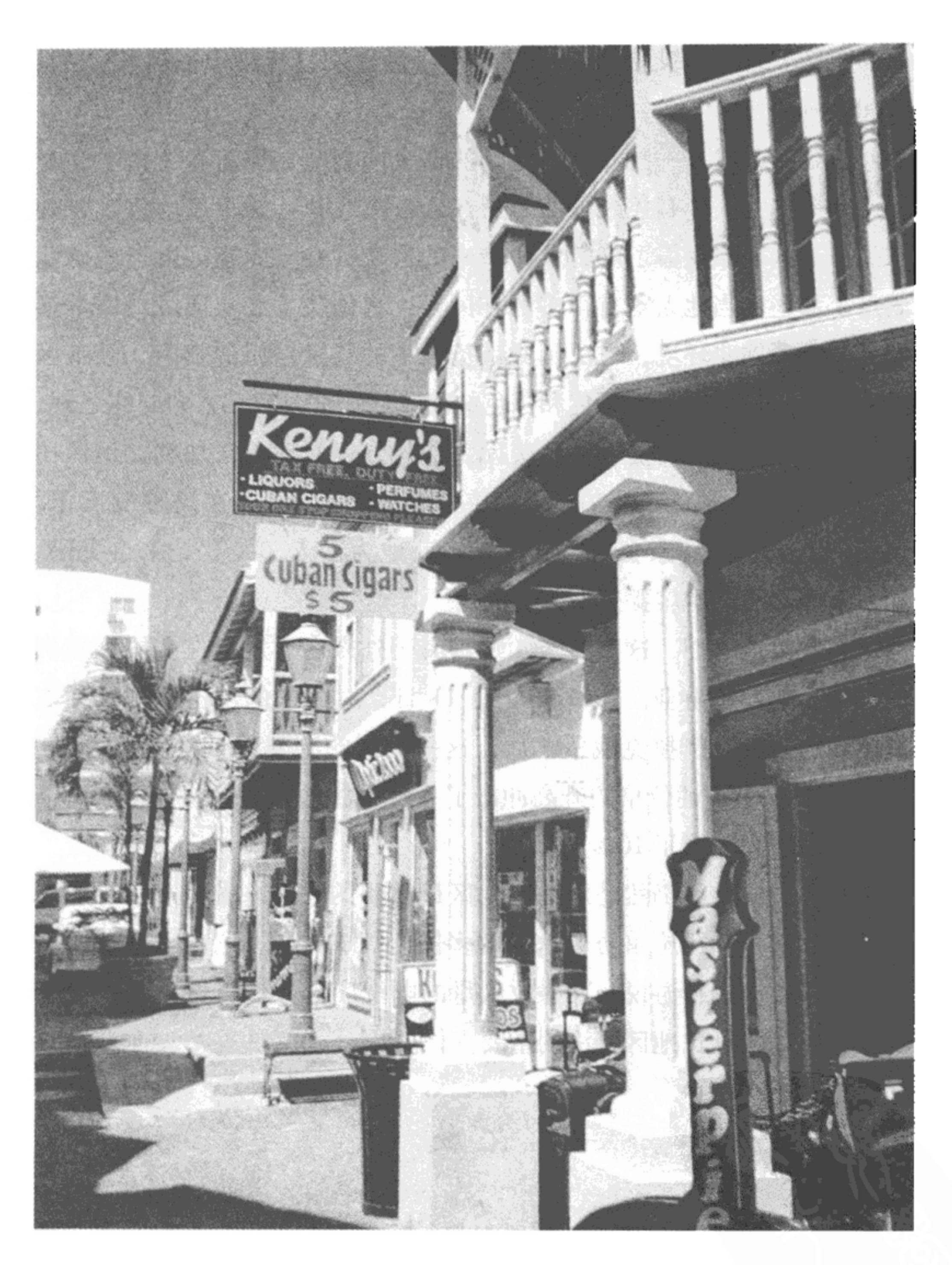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20年里，也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5年，到加勒比地区的游客总数从初期的900万人增加到20亿人；1986年，仅巴哈马群岛一地，就有200万游客到此地观光，而2005年游客的数量接近500万人。对大多数岛屿来说，旅游业给服务业带来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在一些小的岛屿，旅游业创造了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237

旅游业已影响到了许多岛屿的生态，因为为了让游客满意而建立了机场、旅馆和一些大楼。一般情况下，北美的家庭来此旅游，停留一周，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约3 000美元。如圣马丁和圣托马斯的商业区每年可满足邮轮带来的10万游客的购物需求。

旅游业就像19世纪的种植园，它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为满足游客一时的兴致，旅游业使一些地下行业合法化，如毒品、卖淫。前者一般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外。后者被描述为“性工作”，经常包括在一些旅游业部门的安排之中。例如，在一些岛屿，性工作者被允许登上邮轮与顾客约会。性工作者通常在酒吧、旅馆或海滩游乐地出现。但也存在有组织的色情观光旅游（Kempadoo，54）和以性为目的的非同性恋的和男同性恋者的旅游者。结果导致一些岛屿有多达4万名妓女（Facio，138）；据估计，在一些岛屿，多达38%的旅游业的男性服务人员以做男妓来增加收入。更加肮脏的是儿童的色情交易激增，这一倾向在加勒比和部分亚洲地区日益明显。据估计，在加勒比地区有超过50万5—17岁的雏妓从事性交易。



圣马丁的一位妇女在售番石榴酿制的朗姆酒。对那些小的岛国来说，旅游业每年的收入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D. H. Figueredo 拍摄)



游客返回邮轮后的安静的圣马丁街道。（D. H. Figueredo 拍摄）

性产业使艾滋病在加勒比地区流行。据报告，2002年有50万人被诊断染上致命的艾滋病，许多人是通过性交易感染上这种疾病的。238 (Wilkinson，1)

旅游业激发了一些对这些岛屿的俗套的描写，如海滩、树木和身着比基尼的女人，有色人种的居民在人行道或独特的小屋内售卖各种制品。这些表象掩盖了旅游业所带来的迫切的社会问题。由于旅游业 239 满足了那些比当地人富有得多的外国人，它创造了岛上居民消费不起的商业、餐饮业环境，在法国城市圣马丁的马里格特的夜晚、闹市区的高级餐馆里很少看到黑色和棕色的面孔。在这个观光客的向往之地，他们付不起一顿饭所需的200美元。这种分裂的现象在加勒比地区司空见惯，也即大家所熟知的“旅游种族隔离政策”，在这种制度下，岛民们不能享受其家乡的财富，它不断地为富人，尤其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游客提供着服务。

在殖民地时期，这些岛屿的财富属于外来者。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事件影响着旅游业。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事件和随之发生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之后，这一地区的游客数量减少了约100万人。2006年石油价格的升高冲击了一些小岛的旅游业，如博奈尔岛的旅游业收入下降了10%。

然而，旅游业仍然是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加勒比旅游组织和加勒比旅馆协会这样的多国组织成立了，它代表这些岛屿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游说，并播放大量的电视广告。很明显，21世纪旅游业仍然是加勒比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汇款

另外一项惠及加勒比人的外部收入是汇款——生活在加拿大、欧洲和美国的移民、流亡者和被驱逐者汇回家乡的钱。美国的加勒比移民的汇款占1/3。200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米尼加共和国近30%的家庭有来自国外的汇款，总额达18亿美元（Sana and Massey，517）。

2003 年，近 40 亿美元汇至古巴、海地和牙买加（Lapointe，1）。流亡人员、被驱逐人员和移民的汇款也使得他们卷入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允许拥有美国和多米尼加双重国籍，并允许生活在美国的多米尼加人参与国内选举的投票。在国外的、卷入政治的社区使得汇款继续的可能在增加。

240

加勒比地区接受汇款的国家举例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古巴	930	1 265	1 194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807	2 206	2 217
海地	810	931	977
牙买加	967	1 288	1 42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59	88

资料来源：Lapointe，Michelle. “Diasporas in Caribbean Development：Rapporteur's Report.” Report of the Inter – American Dialogue and World Bank，August 2004.

那些生活在国外的人通常是大笔政治资金的筹措人，他们是不甘于失去权力的加勒比政治人物。在过去，波多黎各的政治人物乘飞机到纽约或波多黎各人稠密地区，如新泽西的珀斯安博伊支持当地的候选人。当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定期搞竞选活动。跨国网络成为逐渐成长的研究科目；这种改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种族社区的影响值得认真关注。

汇款的冲击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汇款帮助那些仍留在加勒比的家人增加存款，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医疗和健康条件，还有子女可以到私立学校读书。汇款也有助于一些家庭的经济稳定，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平。然而，一些观察家认为，对接受国来说，汇款对改善社会条件没起多少作用。这种争论还将继续，但趋势已经明朗：在已经到来的 21 世纪，汇款仍将是加勒比地区一个主要的和日益增加的收入来源。

未来

很明显，独立并没有给加勒比地区的岛屿带来自给自足，他们仍旧不同程度地依赖他们的宗主国。考虑到资源匮乏、面积狭小以及政治上的分裂，没有迹象显示加勒比地区能够在21世纪早期完全自立。这就引出一个关于其未来的基本问题，难道这里命中注定要将其国民隔离而作为那些富人休闲度假的伊甸园吗？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加勒比地区就像殖民地时代，仍旧是城堡的一个链条。在这种情形下，它们是城堡，外国人在其中进行日光浴、吃喝，而本地居民则为他们服务。或许，过去的委托监护制已经又被重新发明并进行包装以适应于21世纪。

241



附录1　表格

2005年加勒比地区各岛屿的面积与人口数量

岛屿名称	面积（平方千米）	人口数量
安圭拉	102	13 677
安提瓜	280	68 772
阿鲁巴	193	71 566
巴哈马	13 940	301 190
巴巴多斯	431	279 250
巴布达	161	2 000
英属维尔京群岛	153	22 643
开曼群岛	262	44 270
古巴	110 860	11 346 670
多米尼加共和国	48 730	8 950 034
格林纳达	344	89 502
瓜德罗普	1 780	448 713
海地	27 750	8 121 622
牙买加	10 991	2 731 832
马提尼克	1 100	432 900
蒙特塞拉特	102	9 341
波多黎各	9 104	3 916 632

圣基茨和尼维斯	261	38 958
圣卢西亚	616	166 31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89	117 53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 128	1 088 644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430	20 556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克罗伊、圣托马斯、圣约翰）	352	108 708

资料来源：Theodora Web sit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theodora. com/wfb/abc_ world_ fact_ book. html. Accessed on May 30, 2006.

1750 年西属加勒比的人口数量

岛屿名称	人口数量（包括奴隶）
古巴	75 000
伊斯帕尼奥拉	35 000
牙买加	1 300
波多黎各	3 039

1670—1680 年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数量

岛屿名称	年份	人口数量（包括奴隶）
安提瓜	1678	4 480
巴巴多斯	1684	68 743
牙买加	1673	17 272
蒙特塞拉特	1684	3 674
尼维斯	1684	7 370
圣基茨	1684	3 333

1660—1680 年法属加勒比的人口数量

岛屿名称	年份	人口数量（包括奴隶）
瓜德罗普	1670	8 696
马提尼克	1664	15 401
圣多明各	1681	6 648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Rogozin? ski，J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From the Arawak and the Carib to the Present.* New York：A Meridian Book，Penguin，1992，pp. 45，69，75，76，87.

18 世纪西班牙经历的战争

年份	战争名称
1701—1715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18—1720	四国同盟战争
1727—1729	对抗英、法的战争
1733—1738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39—1741	詹金斯耳朵之战
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1763	七年战争
1779—1786	参与美国独立战争
1796—1800	对抗英国的战争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Prago，Alberto. *The Revolutions in Spanish America：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of* 1808—1825. New York：MacMillan，1970，pp. 235—236.

19 世纪海地的统治者

名称	头衔	在位时间
让—雅克·德萨林	总督—将军	1804. 1. 1—1804. 9. 22
雅克一世（德萨林）	皇帝	1804. 9. 22—1806. 10. 17
享利·克利斯托夫	总统	1807. 2. 17—1811. 3. 26
享利一世	国王	1811. 3. 26—1820. 10. 8
亚历山大·佩蒂翁	总统	1807. 3. 9—1818. 3. 29
让-皮埃尔·布瓦耶	总统	1818. 3. 30—1843. 3. 13
国务会议	临时政府	1843. 3. 14—1843. 12. 31
里维耶尔·埃拉尔	总统	1843. 12. 31—1844. 5. 3

菲利普·格里埃	总统	1844.5.3—1845.4.15
让—路易·皮埃罗	总统	1845.4.16—1846.3.1
让—巴蒂斯特·里切	总统	1846.3.1—1847.2.27
福斯坦·苏鲁克	总统	1847.3.1—1849.8.25
福斯坦一世（苏鲁克）	皇帝	1847.3.1—1859.1.13
法布尔·热弗拉尔	总统	1859.1.13—1867.3.13
西尔维昂·萨尔纳夫	总统	1867.6.14—1869.12.19
国务会议	临时政府	1869.12.27—1870.3.19
尼萨热—萨热（让—尼古拉·尼萨热—萨热）	总统	1870.3.19—1874.5.12
米歇尔·多明戈	总统	1874.5.11—1876.4.15
皮埃尔·狄奥马·博瓦隆—卡纳尔	总统	1876.7.17—1879.7.17
利西于—费利西泰·萨洛蒙	总统	1879.10.23—1888.8.10
国务会议	临时政府	1888.8.18—1888.12.15
弗朗索瓦·但尼·莱吉提默	总统	1888.12.16—1889.8.22
国务会议	临时政府	1889.8.27—1889.12.9
弗洛维尔·伊波利特	总统	1889.10.9—1896.3.24
提雷济阿·西蒙·桑	总统	1896.3.31—1902.5.12

资料来源：Schutt – Ainé, Patricia, and the staff of Librair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Haiti: A Basic Reference Book; General Information on Haiti.* Miami and Port – au – Prince: Librairi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1994, pp. 70—71.

1844—1861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历任总统

名称	在位时间
佩德罗・桑塔纳	1844. 11. 13—1848. 8. 4
政府部长会议	1848. 8. 4—1848. 9. 8
曼努埃尔・希门尼斯	1848. 9. 8—1849. 5. 29
佩德罗・桑塔纳	1849. 5. 30—1849. 9. 23
布埃纳文图拉・巴埃斯	1849. 9. 24—1853. 2. 15
佩德罗・桑塔纳	1853. 2. 15—1856. 5. 26
曼努埃尔・德・雷格拉・莫塔	1856. 5. 26—1856. 10. 8
布埃纳文图拉・巴埃斯	1856. 10. 8—1858. 6. 13
何塞・德西德里奥・巴尔维尔德	1858. 6. 13—1858. 7. 28
佩德罗・桑塔纳	1858. 7. 28—1861. 3. 18

1861—1865 年圣多明各历任西班牙总督—将军

名称	在任时间
佩德罗・桑塔纳	1861. 3. 18—1862. 7. 20
费利佩・里贝罗	1862. 7. 20—1863. 10. 22
卡洛斯・德・巴尔加斯	1863. 10. 22—1864. 3. 30
何塞・德・拉・甘达拉	1863. 10. 22—1864. 3. 30

1863—186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历任元首

名称	在位时间
何塞・安东尼奥・萨尔卡多	1863. 9. 14—1864. 10. 10
加斯帕尔・波朗科	1864. 10. 10—1865. 1. 23
贝尼尼奥・菲洛梅诺・德・罗哈斯	1865. 1. 24—1865. 3. 24

资料来源："List of Presidents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vailable online：http：//www.answers.com/topic/list－of－presidents－of－the－dominican－republic. Accessed on July 5，2006.

美国占领之前及期间的海地历任总统

总统	在位时间	结局
提雷济阿·西蒙·桑	1896.3.31—1902.5.12	辞职
国务会议	1902.5.13—19.2.12.21	被解散
诺尔·亚历克西	1902.12.21—1908.12.2	被驱逐
安托万·西蒙	1908.12.17—1911.8.2	被驱逐
森西纳蒂斯·勒孔特	1911.8.14—1912.8.8	被谋杀
唐克德雷·奥古斯特	1912.8.12—1913.5.2	死于办公室
米歇尔·奥勒斯特	1913.5.4—1914.1.27	被驱逐
奥雷斯特·扎莫尔	1914.2.8—1914.10.29	被驱逐
达维尔马·泰奥多尔	1914.11.7—1915.2.22	被驱逐
维尔布伦·吉尧姆·桑	1915.3.4—1915.7.27	被谋杀
絮德雷·达蒂格纳夫	1915.8.12—1922.5.15	任满
路易·博尔诺	1922.5.15—1930.5.15	任满
路易·欧仁·罗伊	1930.5.15—1930.11.18	任满
斯泰尼奥·樊尚	1930.11.18—1941.5.15	辞职

资料来源：Schutt－Ainé, Patricia, et al. *Haiti: A Basic Reference Book.* Miami: Librairi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1994, pp. 71—72.

牙买加首席部长

名称	在位时间
威廉·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	1953.5.5—1955.2.2
诺曼·华盛顿·曼利	1959.2.2—1959.7.4

牙买加总理

名称	在位时间
威廉·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	1962. 4. 29—1967. 2. 23
唐纳德·彭斯·桑斯特	1967. 2. 23—1967. 4. 11
休·希勒	1967. 4. 11—1972. 3. 2
米歇尔·曼利	1972. 3. 2—1980. 11. 1
爱德华·西加	1980. 11. 1—1989. 2. 10
米歇尔·曼利	1989. 2. 10—1992. 3. 30
P. J. 派特森	1992. 3. 30—2006. 3. 30
波西娅·辛普森—米勒	2006. 3. 30—2007. 9. 11
布鲁斯·戈尔丁	2007. 9. 11—

Adap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including: "Jamaica."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worldstatesmen.org/Jamaica.htm. Accessed on December 1st, 2006.

特鲁希略之后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历任总统

名称	在位时间
华金·巴拉格尔	1960. 8. 3—1962. 1. 16
拉斐尔·菲利韦托·邦内利	1962. 1. 18—1963. 2. 27
胡安·博什	1963. 2. 27—1963. 9. 25
三人执政团	1963. 9. 26—1965. 4. 25
安东尼奥·因伯特·巴雷拉	1965. 5. 7—1965. 8. 30
埃克托·加西亚·戈多伊	1965. 9. 3—1966. 7. 1
华金·巴拉格尔	1966. 7. 1—1978. 8. 16
安东尼奥·古斯曼·费尔南德斯	1978. 8. 16—1982. 7. 4
哈科沃·马赫卢塔·阿萨尔	1982. 7. 4—1982. 8. 16
萨尔瓦多·豪尔赫·布兰科	1982. 8. 16—1986. 8. 16
华金·巴拉格尔	1986. 8. 16—1996. 8. 16
莱奥内尔·费尔南德斯	1996. 8. 16—2000. 8. 16
伊波利托·梅希亚	2000. 8. 16—2004. 8. 16
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	2004. 8. 16—

资料来源：Ruíz Burgos, Victor Eddy. *Los gobiernos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Santo Domingo: Biblioteca Nacional, 1993.

1949—2009 年波多黎各历任总督

总督名称	在位时间	所属政党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	1949. 1. 2—1965. 1. 2	人民民主党
罗贝托·桑切斯·比莱利亚	1965. 1. 2—1969. 1. 2	人民民主党
路易斯·A. 费雷	1969. 1. 2—1973. 1. 2	新进步党
拉斐尔·埃尔南德斯·科隆	1973. 1. 2—1977. 1. 2	人民民主党
卡洛斯·罗梅罗·巴尔塞洛	1977. 1. 2—1985. 1. 2	新进步党
拉斐尔·埃尔南德斯·科隆	1985. 1. 2—1993. 1. 2	人民民主党
佩德罗·罗塞约·冈萨雷斯	1993. 1. 2—2001. 1. 2	新进步党
西拉·M. 卡尔德隆	2001. 1. 2—2005. 1. 2	人民民主党人
阿尼瓦尔·阿塞维多·比拉	2005. 1. 2—2009. 1. 2	人民民主党人

1902 年至今古巴历任总统

总统名称	在位时间	所属政党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	1902. 5. 20—1906. 9. 28	中间党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06. 9. 29—1906. 10. 2	临时美国总督
查尔斯·E. 马贡	1906. 10. 2—1909. 1. 28	临时美国总督
何塞·米盖尔·戈麦斯	1909. 1. 28—1913. 5. 20	自由党
马里奥·加西亚·梅诺卡尔	1913. 5. 20—1921. 5. 20	保守党
阿尔弗雷多·萨亚斯—阿方索	1921. 5. 20—1925. 5. 20	人民党

赫拉尔多·马查多 莫拉莱斯	1925.5.20—1933.8.12	自由党
阿尔韦托·埃雷拉	1933.8.12	马查多临时军事代表
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克萨达	1933.8.12—1933.9.4	革命协会
五人执政团（拉蒙·格劳·桑·圣马丁、塞尔希奥·卡尔沃莫雷拉、波菲里澳·弗兰卡、何塞·米盖尔·伊里萨里、吉列尔莫·波特拉）	1933.9.4—1933.9·10	真正革命党
拉蒙·格劳·桑·圣马丁	1933.9.10—1934.1.15	古巴革命党
卡洛斯·埃维亚	1934.1.15—1934.1.18	古巴革命党
曼努尔·马克斯·斯特林	1934.1.18	无宣誓、临时的
卡洛斯·门迭塔·蒙特富尔	1934.1.18—1935.12.11	国民联盟
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内特—比纳格雷斯	1935.12.11—1936.5.20	国民联盟
米盖尔·马里亚诺·戈麦斯	1936.5.20—1936.12.24	
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	1936.5.24—1940.10.10	国民联盟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1940.10.10—1944.10.10	进步行动党（没有专门说明）
拉蒙·格劳·桑·圣马丁	1944.10.10—1948.10.10	古巴革命党
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	1948.10.10—1952.3.10	古巴革命党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1952.3.10—1954.4.6	军事性质
安德烈斯·多明戈—莫拉莱斯	1954.4.6—1955.2.24	巴蒂斯塔的代表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1955. 2. 24—1959. 1. 1	军事性质
安塞尔莫·阿里格罗	1959. 1. 1	临时性质
卡洛斯·曼努埃尔·彼德拉	1959. 1. 1—1959. 1. 2	临时性质
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	1959. 1. 1—1959. 7. 16	革命政府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	1959. 7. 16—1976. 2. 14	古巴共产党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76. 7. 14—	古巴共产党
劳尔·卡斯特罗		古巴共产党

1941年至今海地历任总统

总统名称	在位时间
埃利·莱斯科	1941—1946
弗朗克·洛奥（军事执委会主席）	1946
迪马瑟·埃斯蒂梅	1946—1950
弗朗克·洛奥（军政府主席）	1950
保罗-欧仁·马格卢瓦尔	1950—1956
约瑟夫·内穆尔·皮埃尔—路易※	1956—1957
弗朗克·西尔万※	1957
国务会议※	1957
安托万·特拉西布尔·凯布罗（军事委员会主席）	1957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	1957—1971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	1971—1986
亨利·南菲（全国执政委员会主席）	1986—1988

莱斯利—弗朗索瓦·马尼加	1988
亨利·南菲（军人执政委员会主席）	1989—1989
普罗佩·阿夫里尔	1989—1990
埃尔塔·帕斯卡尔－特鲁约※	1990—1991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991
约瑟夫·内雷特※	1991—1992
马克·巴赞（代理总理）	1992—1993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993—1994
埃米尔·若纳桑※	1994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994—1996
勒内·加西亚·普雷瓦尔	1996—2000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2000—2004
博尼费斯·亚历山大※	2004—2006
勒内·加西亚·普雷瓦尔	2006—

说明：加※者为临时总统。

1960—1980 年加勒比向美国的移民

国家	1960—1970	1970—1980
安提瓜	—	36 501
巴巴多斯	9 689	20 948
古巴	265 052	402 023
多米尼加共和国	94 872	148 016
多米尼克	—	6 100
海地	38 468	89 916
格林纳达	—	7 765
牙买加	73 351	141 995
特立尼达	24 965	61 726

资料来源：Pator, Robert, e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ribbean: The Unexplored Connection.* Boulder, Colo.,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 8.

附录2　官方名称

加勒比地区的基本数据

加勒比地区以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闻名。它由三个亚群岛构成：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巴哈马群岛。

大安的列斯群岛

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构成了大安的列斯群岛。

小安的列斯群岛

小安的列斯群岛由三个亚群岛构成：背风群岛、向风群岛和背风安的列斯群岛。

背风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包括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和圣克罗伊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包括托土拉岛、维尔京戈尔达岛、阿内加达岛、约斯特范达克岛）、安圭拉岛、安提瓜岛、巴布达岛、多米尼克、瓜德罗普（巴斯特尔岛、格朗德特尔岛、德西拉德岛、勒桑特

斯岛、玛丽—格兰特岛、圣马丁岛[①])、蒙特塞拉特岛、尼维斯岛、罗德岛、沙巴岛、圣巴泰勒米岛、圣基茨岛和圣尤斯特歇斯岛。

向风群岛：巴巴多斯岛、格林纳达岛、格林纳丁斯岛、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岛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背风安的列斯群岛：阿鲁巴岛、库拉索岛和博奈尔岛。

地理

面积

	面积（平方千米）	最高点
加勒比海	229 173	杜阿尔特峰，3 175 米（1 058）（多米尼加共和国）
安圭拉	102	克洛卡斯山，65 米（21）
安提瓜和巴布达	443	博吉峰，402 米（132）
巴哈马	10 070	艾尔弗尼亚山，63 米（21）
巴巴多斯	431	希拉比山，336 米（112）
英属维尔京群岛（包括托土拉岛、维尔京戈尔达岛、阿内加达岛、约斯特范达克岛）	153	萨格山，521 米（173）
古巴	110 860	图尔基诺峰 2 005 米（668）

① 注意：自2007年2月起，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与瓜德罗普分离，为直辖于巴黎中央政府的海外行政区。

多米尼克	754	迪亚布洛廷火山，1 447米（486）
多米尼加共和国	48 380	杜阿尔特峰，3 175 米（1 058）
格林纳达	344	圣凯瑟琳山，840 米（280）
瓜德罗普（巴斯特尔岛、格朗德特尔岛、德西拉德岛、勒桑特斯岛、玛丽 格兰特岛、圣马丁岛）	1 628	苏弗时耶尔火山，1 484 米（494）
海地	27 560	塞勒峰，2 680 米（873）
牙买加	10 831	蓝山峰，2 256 米（752）
马提尼克	1 060	培雷火山，1 397 米（465）
蒙特塞拉特	102	英国人的卡特山，930 米（310）
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圣马丁、萨巴岛和圣尤斯特歇斯岛）	960	希那瑞山，862 米（281）
波多黎各	8 870	蓬塔山，1 339 米（446）
圣基茨和尼维斯	261	利亚穆伊加山，1 156 米（385）
圣卢西亚	606	吉米山，850 米（31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89	苏弗里耶尔火山，1 234米（41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 128	阿里波山，940 米（313）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和圣克罗伊岛）	346	克鲁恩山，475 米（158）

范围

加勒比地区北临美国，西接墨西哥湾、墨西哥和中美洲，南濒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东面是大西洋。

地形

加勒比地区共由700多个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东西绵延2 500海里；不同的岛屿和不同的群岛地形各不相同，如巴巴多斯和安提瓜比较平坦，而多米尼克和格林纳达则多陡崖。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绵长的山脉和谷地，景色壮观。这些岛屿相距很近，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都很容易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除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加勒比地区较大的岛屿外，其他岛屿都是较小的岛屿，例如圣马丁岛一天之内就可以环绕全岛一圈。所有的岛屿都由沙质海滩环绕，海滩上点缀着多种独特的美丽的棕榈树。

该地的土壤适于种植甘蔗、棉花、烟草、香蕉和可可，5—11月份雨量丰沛，雨量从30—200英寸不等，可以保证有良好的收成。气温从70—90华氏度，在信风的吹拂下，即使在7、8月份最热的夏季也感觉比较凉爽。然而这些伊甸园般的地方经常受到飓风的威胁，从加勒海地区有记录以来，平均一年经受18次飓风。

政府

	独立日期	政治体系	立宪时间	首都
安圭拉		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地	1982	瓦利
安提瓜和巴布达	1981. 11. 1	立宪议会民主制	1981. 11. 1	圣约翰
巴哈马	1973. 7. 10	立宪议会民主制	1973. 7. 10	拿骚

巴巴多斯	1966.11.30	议会民主制	1966.11.30	布里奇敦
英属维尔京群岛		联合王国海外领地	1977.7.1，2000年修订	罗德城
古巴	1902.5.20	社会主义国家	1976.2.24，1992.7和2000.7两次修订	哈瓦那
多米尼克	1978.11.3	议会民主制	1978.11.3	罗索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44.2.27	代议制	1966.11.28，2002.7.25修订	圣多明各
格林纳达	1974.2.7	议会民主制	1973.12.19	圣乔治
瓜德罗普（巴斯特尔岛、格朗德特尔岛、德西拉德岛、勒桑特斯岛、玛丽—格兰特岛、圣马丁岛）		法国的海外部分	1958.10.4（法国宪法）	巴斯特尔
海地	1804.1.1	选举政府	制定过几部宪法，最近修订的宪法于1987年3月实施	太子港
牙买加	1962.8.6	立宪议会民主制	1962.8.6	金斯敦
马提尼克	法国海外部分	1958.10.4（法国宪法）	法兰西堡	
蒙特塞拉特		联合王国海外领地	1989.12.19	普利茅斯

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圣马丁岛、萨巴岛和圣尤斯特歇斯岛）		荷兰王国的自治领地	1954. 12. 29	威廉斯塔德，库拉索
波多黎各		美国的联邦	1952. 3. 3 日批准，1952. 7. 3 美国国会承认，1952. 7. 25 生效	圣胡安
圣基茨和尼维斯	1983. 9. 19	议会民主制	1983. 9. 19	巴斯特尔
圣卢西亚	1979. 2. 22	议会民主制	1979. 2. 22	卡斯特里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79. 10. 27	议会民主制	1979. 10. 27	金斯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62. 8. 31	议会民主制	1976. 8. 1	西班牙港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圣克罗伊岛）		美国未并入的领地	1954. 7. 22 修订的组织法	夏洛特阿马利亚

政治

加勒比地区有为数众多的政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古巴的共产党、牙买加的劳动党、马提尼克的进步党、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多米尼加革命党和特立尼达的人民民族运动党。

人口

	人口（2006年数据）	官方语言	主要宗教 *
古巴	11 346 670	西班牙语	罗马天主教占75%（1959年）
多米尼克	69 029	英语	罗马天主教占77%；新教占15%
多米尼加共和国	8 950 034	西班牙语	罗马天主教占95%
格林纳达	89 502	英语	罗马天主教占53%，圣公会占13%，新教占33%
瓜德罗普（巴斯特尔岛、格朗德特尔岛、德西拉德岛、勒桑特斯岛、玛丽—格兰特岛、圣马丁岛）	448 713	法语	罗马天主教占95%，印度教和各种非洲信仰占4%，新教占1%
海地	8 121 622	法语，克里奥尔语	罗马天主教占80%，新教占16%，巫毒教占5%（包括天主教信仰者）

牙买加	2 731 832	英语	新教占61%，罗马天主教占4%，其他宗教实践（拉斯塔法里教、波克曼尼亚教）占34%
马提尼克	432 900	英语	罗马天主教占85%，新教占10%
蒙特塞拉特	9 341	英语	圣公会，新教
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圣马丁岛、萨巴岛和圣尤斯特歇特岛）	291 000	荷兰语	罗马天主教占72%，新教占14%
波多黎各	3 912 055	西班牙语	罗马天主教占85%，新教占15%
圣基茨和尼维斯	38 858	英语	罗马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没有估计
圣卢西亚	166 312	英语	罗马天主教占67%，新教占2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77 534	英语	圣公会占47%，新教占20%，罗马天主教占1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088 644	英语	罗马天主教占26%，印度教占22%，新教占29%，伊斯兰教占6%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圣克罗伊岛）	108 708	英语	新教占60%，罗马天主教占34%

说明：* 除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整个加勒比地区还有几种源自非洲的宗教，尽管当地政府没有报告具体数字。它们是波克曼尼亚教和拉斯塔法里教、古巴的萨泰里阿教、海地的巫毒教。

种族

高度融合的、占多数的种族是非洲人、华人、欧洲人、东印度人、加勒比人和泰诺人后裔，他们相互通婚是普遍现象。因此，这里的加勒比人有非洲人和华人的后代，有欧洲人、非洲人和华人的后代。约75%的加勒比人口来自不同种族组成的家庭：非洲人与欧洲人、华人或加勒比人组成的家庭。据估计，22%的加勒比人是白人，其余80%则有华人和东印度人的血统。白人主要居住在原西属加勒比，古巴占50%的人口有欧洲血统。

种族的不同也使得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汉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印地语、克里奥尔语、帕皮阿门托语[①]和西班牙语。

① 帕皮阿门托语（Papiamento，或者 Papiamentu），是流行于荷属安的列斯的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和库拉索岛三岛中的一种克里奥尔语，也是这三岛的官方语言之一。其词汇受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影响最深，约60%的词汇来自该两种语言，另外约25%的词汇来自荷兰语，剩下的词汇受非洲语言和阿拉瓦克语影响。——译者注

经济

	GDP（百万美元）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通用货币
加勒比地区	超过 26 500（2004—2006 年，估计值）	香蕉、豆类、柑橘、可可、咖啡、芒果、大蕉、水稻、甘蔗、烟草、鱼类、家禽	蔗糖、朗姆酒、石油加工	旅游、药物、轻工业	多种货币
安圭拉	108.9（2004 年，估计）	烟草		旅游	东加勒比元
安提瓜和巴布达	750（2002 年，估计）	棉花、香蕉、椰子、胡瓜、芒果、甘蔗、蔬菜		旅游	东加勒比元
巴哈马	6 476（2006 年，估计）	柑橘、蔬菜、家禽	水泥、盐业、朗姆酒、文石	旅游、银行业、药物、石油中转	巴哈马元

巴巴多斯	5 108（2006年，估计）	甘蔗、蔬菜、棉花	蔗糖	旅游、轻工业	巴贝多元
英属维尔京群岛（包括托土拉岛、维尔京戈尔达岛、阿内加达岛、约斯特范达克岛）	853.4（2004年，估计）	水果、蔬菜、家畜、鱼类		旅游、轻工业、建筑	美元
古巴	44 540（2006年，估计）	甘蔗、烟草、柑橘、咖啡、水稻、土豆、豆类、家畜	制糖、石油、烟草	药物、旅游	古巴比索和可兑换的比索
多米尼克	384（2003年，估计）	香蕉、柑橘、芒果、根菜类、椰子、可可	肥皂、椰子油、椰子干、家具、水泥砖、鞋子	旅游	东加勒比元

多米尼加共和国	73 740 (2006年，估计)	甘蔗、咖啡、棉花、可可、烟草、水稻、豆类、土豆、玉米、香蕉、牛、猪、日用品、牛肉、鸡蛋	制糖、卷烟	旅游	多米尼加比索
格林纳达	440 (2002年，估计)	香蕉、可可、肉豆蔻、豆蔻香料、柑橘、酪梨、根菜类、甘蔗、玉米、蔬菜	食品、饮料、纺织、建筑	旅游、轻工业	东加勒比元
瓜德罗普(巴斯特尔岛、格朗德特尔岛、德西拉德岛、勒桑特斯岛、玛丽—格兰特岛、圣马丁岛)	3 513 (2003年，估计)	香蕉、甘蔗、热带水果和蔬菜、家畜	建筑、水泥、朗姆酒、蔗糖	旅游	欧元

海地	14 560（2006年，估计）	咖啡、芒果、甘蔗、水稻、玉米、高粱、木材	制糖、面粉加工	基于进口部分的轻工装配	古德
牙买加	12 710（2006年，估计）	甘蔗、香蕉、咖啡、柑橘、山药、阿开木果、蔬菜、家禽、山羊、牛奶、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	铝土矿、朗姆酒	旅游、电讯	牙买加元
马提尼克	6 117（2003年，估计）	菠萝、酪梨、香蕉、水果、花卉、蔬菜、甘蔗	朗姆酒、建筑、水泥、炼油、制糖、旅游	旅游	欧元
蒙特塞拉特	29（2002年，估计）	卷心菜、胡萝卜、胡瓜、西红柿、洋葱、胡椒、畜产品	朗姆酒	旅游、电子设备	东加勒比元

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圣马丁岛、萨巴岛和圣尤斯特歇特岛）	2 800（2004年，估计）	芦荟、高粱、花生、蔬菜、热带水果	炼油、轻工生产	旅游、石油中转设备	荷属安的列斯荷兰盾
波多黎各	74 890（2006年，估计）	甘蔗、咖啡、波萝、大蕉、香蕉、畜产品、鸡肉	电子、服装、食品加工	旅游、药物	美元
圣基茨和尼维斯	339（2002年，估计）	甘蔗、水稻、山药、蔬菜、香蕉、鱼类	制糖、棉花、盐业、椰子干	旅游	东加勒比元
圣卢西亚	866（2002年，估计）	香蕉、椰子、蔬菜、柑橘、根菜类、可可	服装、饮料、带纹路的纸板箱、石灰生产、椰子加工	旅游、电子零件	东加勒比元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42（2002年，估计）	香蕉、椰子、甜马铃薯、香料、牛、绵羊、猪、山羊、鱼类	食品加工、水泥、家具		东加勒比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0 990（2006年，估计）	可可、水稻、柑橘、咖啡、蔬菜、家禽	食品加工、水泥、饮料、棉纺织、石油、化工	旅游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岛、圣约翰岛、圣克罗伊岛）	1 577（2004年，估计）	水果、蔬菜、高粱、塞内波尔牛	炼油、朗姆酒、建筑	旅游、医药	美元

附录3　大事年表

哥伦布之前的居民

约公元前500年　泰诺人来到加勒比地区

约公元100年　加勒比人来到加勒比地区

两个世界的碰撞：西班牙的征服

1451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

1453年　奥斯曼帝国阻断了通往亚洲的路线，迫使欧洲人去寻找新的路线

1469年　卡斯提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德联姻，开始了西班牙的统一进程

1492年　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同意支持哥伦布向西航行寻找亚洲的计划，哥伦布于10月12日到达加勒比地区

1493年　哥伦布第二次航行

1494年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沿西经46°37′画了一条想像中的线，并指定此线以西的新发现土地归西班牙所有，以东的新发现土地归葡萄牙所有

1498 年	哥伦布第三次航行
1499 年	委托监护制度引进到加勒比地区：土著人被迫为殖民开拓者劳动
1500 年	哥伦布被押解回西班牙
1501 年	美洲建立了一个具有欧洲风格的城市——圣多明各；尼古拉斯·德·奥万多——第一任加勒比总督到达伊斯帕尼奥拉
1502—1504 年	哥伦布第四次航行
1502 年	殖民伊斯帕尼奥拉
1503 年	设立贸易署，监督新世界的商业贸易
1505 年	第一艘运奴船到达加勒比地区
1506 年	哥伦布死于西班牙
1508 年	殖民波多黎各
1509 年	殖民牙买加
1511 年	殖民古巴
1511—1512 年	酋长哈图伊被以火刑处死
1515 年	西班牙国王称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为“印第安的保护者”
1518 年	奴隶直接由非洲运往加勒比地区
1520—1530 年	波多黎各开始种植和收割甘蔗
1533 年	卡洛斯五世皇帝（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赦免泰诺酋长恩里基洛
1535 年	设立总督一职，以管辖西班牙的美洲领地
1534 年	委托监护制被废除
1552 年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出版《西印度毁灭述略》

殖民与反抗

1560 年代	让·尼科将烟草介绍给巴黎社交界，并给烟叶

	取名为“Nicotiana Tabacum”
1564年	西班牙海军上将在今圣奥古斯丁屠杀了200名法国人
1580年	西班牙设立奴隶进口许可证
1585—1586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洗劫圣多明各
1585—1598年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殖民地总督修建城堡，以保卫加勒比地区的城池；一些城堡存在了一个半世纪
1600年代	烟草种植扩展到古巴
1624年	英国殖民百慕大
1627—1635年	法国人定居圣基茨岛，占领瓜德罗普
1631年	荷兰接管圣马丁岛南部
1640年代	甘蔗种植成为殖民者收入的重要来源
1648年	西班牙人将圣马丁岛留给了荷兰人
1655年	英国人侵入牙买加；法国人取得了圣克罗伊岛
1660年代	巴巴多斯每年约出口2 800万磅的糖
1675年	巴巴多斯发生起义
1685年	法国制定《黑奴法典》
1692年	巴巴多斯奴隶进行反抗
1697年	圣多明各成为伊斯帕尼奥拉的法国部分
1717年	皇家烟草商行设立，收购古巴生产的所有烟草
1723年	古巴的烟草种植者反对西班牙对烟草产业的垄断；许多烟草种植者移居大阿瓦奥地区（即现在的比那尔德里奥）
1739年	牙买加总督与马隆人签订休战协议；詹金斯耳朵之战
1740年	佐治亚总督詹姆士·欧格绍普袭击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
1742年	西班牙士兵袭击佐治亚总督詹姆士·欧格绍

	普，但被打败
1743 年	杜桑卢韦杜尔出生
1750 年代	圣多明各每年生产 61 000 吨糖
1758 年	马隆人的领导者麦坎达被抓获，在海地被火刑处死
1759 年	英国夺取瓜德罗普
1762 年	英国夺取马提尼克，侵占哈瓦那
1763 年	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格林纳达，英国与法国签订《巴黎条约》，占领古巴
1776 年	美国独立
1779 年	西班牙路易斯安那总督贝尔纳多·德·加尔韦斯率领远征军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和佛罗里达抵抗英国
1779—1780 年	英法在加勒比地区展开战斗
1782 年	在圣徒之战中，英国击败法国，并将其驱离多米尼克岛
	西班牙和法国放弃人侵牙买加的计划
1783 年	北美脱离殖民主义独立为加勒比商品开辟了新的市场
1787 年	欧劳达·埃齐亚诺的自传《欧劳达·埃齐亚诺生平传奇》出版
	以废除奴隶贸易为目标的协会在英格兰成立
1788 年	黑人之友协会在巴黎成立
1789 年	法国大革命在巴黎爆发
	盐成为圣马丁的主要产业
1790 年	海地爆发了樊尚·奥热领导的起义；奥热被法国种植园主抓住后处死
1791 年	巴黎的法国国王被赶下台
	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宣布支持君主制

	海地革命爆发
	瓜德罗普的奴隶发动叛乱
	杜桑·卢韦杜尔打败法国、西班牙和英国
1792 年	法国国王和王后被处决
1793 年	英国与牙买加的马隆人爆发第二次战争
1794 年	巴黎的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奴隶制
	英国军队侵入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
	法国指挥官维克多·于格迫使英国人撤出瓜德罗普
1795 年	根据《巴塞尔条约》，西班牙将伊斯帕尼奥拉岛让给法国
	格林纳达发生费东起义
	圣马丁的奴隶制被废除
1801 年	杜桑·卢韦杜尔侵入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一边，并废除全岛的奴隶制
1802 年	法国重建奴隶制
	拿破仑·波拿巴派军队解除了卢韦杜尔的权力，并重建了奴隶制
	卢韦杜尔被逮捕并被送到欧洲
1803 年	让—雅克·德萨林打败法国，并宣布圣多明各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这个新国家命名为海地
	杜桑·卢韦杜尔在法国死于狱中
1804 年	海地宣布独立
	让—雅克·德萨林宣布自己为海地皇帝雅克一世美国禁止与海地进行贸易
1806 年	让—雅克·德萨林在海地被刺杀
	海地共和国分裂；亨利·克里斯托夫宣布自己为北部海地的皇帝（自 1811 年），亚历山大·佩蒂翁统治南部海地（自 1806 年）

1807 年	英国制定法律，结束奴隶贸易
1808 年	拿破仑·波拿巴侵入西班牙
1810—1811 年	古巴奴隶起义
1811 年	委内瑞拉宣布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1813 年	西班牙击败法国入侵者；第一部西班牙宪法产生
1816 年	巴巴多斯爆发复活节起义
1818 年	亚历山大·佩蒂翁去世 让—皮埃尔·布瓦耶成为南部海地的第一任总统
1819 年	哥伦比亚宣布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1820 年	让—皮埃尔·布瓦耶统一海地，并占领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一边
1821 年	秘鲁宣布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宣布独立，并于 1822 年建立中美联合省
1822 年	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宣布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多米尼加共和国废除奴隶制
1822—1844 年	海地占领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一边
1823 年	反奴隶制协会在英国创立
1824 年	西蒙·波利瓦尔在南美洲打败西班牙军队
1825 年	巴巴多斯通过了《巩固法》以增加奴隶的权利
1826 年	第一部在美国出版的拉丁美洲小说《希科坦卡尔》写作完成
1831 年	牙买加爆发奴隶暴动；300 名暴动者被绞死
1832 年	《解放法案》终结了所有英国领地的奴隶制
1833 年	玛丽·普琳斯的回忆录《玛丽·普琳斯的经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她自己的讲述》出版

1838 年	支持独立的团体紫罗兰在圣多明各成立
1839 年	“友谊号”运奴船事件 安塞尔莫·苏雷亚斯—罗梅罗反奴隶制小说《弗朗西斯科：甘蔗种植园》在古巴出版
1844 年	伊斯帕尼奥拉东部举行游行，宣布从海地统治下独立，并命名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1845 年	第一批东印度劳工到达特立尼达
1848 年	圣马丁的奴隶制废除
1860 年	西班牙废奴主义者协会在西班牙创立
1961 年	多米尼加总统请求西班牙吞并共和国；吞并活动使多米尼加共和国陷入内战
1862 年	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承认海地为独立主权国家
1865 年	牙买加爆发莫兰特贝起义 西班牙撤出多米尼加共和国
1867 年	亚历杭德罗·塔皮亚—里韦拉的反奴隶制戏剧《四分之一白人》在波多黎各搬上舞台；反奴隶制宣言《废除波多黎各奴隶制的方案》出版
1873 年	波多黎各废除奴隶制
1886 年	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禁奴隶制

波多黎各、古巴与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

1848 年	殖民者在波多黎各设立记事本制度
1851 年	纳西索·洛佩斯将军第二次企图攻占古巴失败，被抓住后处决
1868 年	波多黎各发生暴动，也即著名的拉雷斯呼声 古巴发生暴动，也即著名的亚拉呼声
1873 年	波多黎各废除奴隶制
1877 年	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被派往古巴；马丁内斯·坎波斯抓获了武装护卫的古巴

	共和国总统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开始停战谈判
1878年	西班牙军队与古巴反叛者签订停战协定
	波多黎各被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
1881年	古巴医生卡洛斯·J. 芬莱发现黄热病由蚊子传播
1886年	西班牙政府禁止古巴的奴隶制
1891年	何塞·马蒂在佛罗里达的烟草工人中筹集资金
1892年	古巴革命党创立
1895年	何塞·马蒂领导古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5月19日，马蒂被杀害
1897年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公布古巴爱国者埃瓦赫利娜·西斯内罗斯被监禁的案件
	西班牙允许波多黎各自治
1898年	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巴黎条约》规定美国控制古巴、菲律宾和波多黎各
1901年	古巴宪法被批准；《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当美国人认为必要时可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建立军事基地
1902年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当选为古巴第一任总统；美国占领结束

20世纪

1900年	《福勒克法案》创立了美国管理的波多黎各政府
	美国医生沃尔特·里德证实黄热病由蚊子传播
1905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意由美国人管理其海关
1912年	古巴爆发“种族战争”；在古巴的白人官员的

	命令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古巴士兵射击，近3 000人死亡，绝大多数是非洲裔古巴人
1914年	世界黑人发展协会在牙买加创立
1915年	海地总统维布伦·纪尧姆·桑被暗杀；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地
1916年	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
1917年	《琼斯法案》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身份
1918年	海地爆发“懦弱者战争”
1919年	马库斯·加维创立黑人之星航线
	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达成美国军队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出的方案
1924年	奥拉西奥·巴斯克斯当选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美国军队撤出，结束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
1930年	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当选为波多黎各国家主义党主席
	拉斐尔·特鲁希略当选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
1931年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当选波多黎各参议员
1933年	古巴爆发反对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的都市战争运动；马查多被迫去职；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克萨达成为古巴总统
	卡洛斯·曼努尔·德·塞斯佩德斯—克萨达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推翻
1935年	警察与抗议者在波多黎各大学的里约彼得拉斯校区对峙，导致4名民族主义者死亡
1936年	2月，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在波多黎各杀死4名陆军上校
	3月，波多黎各蓬塞大屠杀导致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建筑师佩德罗·阿尔维苏·坎

	波斯的抗议与行动被察觉，然后其被逮捕并被判入狱
1937 年	荷兰允许阿鲁巴、博奈尔、库拉索、萨巴、圣尤斯特歇斯和圣马丁创立议会
	10 月，拉斐尔·特鲁希略下令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屠杀数千海地人
1938 年	牙买加劳动争议导致暴动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在波多黎各创立人民民主党
	5 月，牙买加的劳动争议导致 8 人死亡，171 人受伤；近 700 名罢工者被捕
1939 年	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将牙买加工会统一为巴斯塔曼特产业工会（BITU）
	马提尼克人艾梅·塞泽尔在其诗集《返乡之路》中创造了“黑人意识”（négritude）这一词汇
1940 年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特鲁希略恢复了对海关的控制权
	古巴起草新宪法；以前的军官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当选为总统
1940 年代	牙买加领导人为自治而游说英国
	美国在靠近波多黎各海岸的别克斯岛建立海军基地
1944 年	古巴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任满下台
	牙买加人取得普遍的投票权；牙买加宪法通过；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当选为牙买加交通部长
1945 年	艾梅·塞泽尔当选为马提尼克的法兰西堡市长和法国国民会议的代表
1946 年	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

1947 年	波多黎各人被允许投票选举自己的总督，以取得由华盛顿的任命
1948 年	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当选为第一任波多黎各人自己选举的总督
1950 年	在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之后，美国宣布对波多黎各的军管法
	11 月 1 日，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试图对其行刺
1951 年	英国给予格林纳达以实质上的自治，允许它对自己的事情和当地政治进行管理
1952 年	3 月 10 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驱逐了民主选举的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
1953 年	7 月 26 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军营发动攻击；大部分参与者牺牲
1954 年	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发动袭击，致多人死伤
1955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获得赦免，然后去了墨西哥
	诺曼·曼利当选为牙买加总理
	埃里克·威廉斯当选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
1956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返回古巴
1957 年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当选为海地总统
1958 年	西印度联盟使加勒比操英国的岛屿联合起来（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蒙特塞拉特、多米尼克、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巴巴多斯）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建立通顿马库特——秘密

	警察，来镇压异议者
1959—1965 年	20 万古巴人到美国寻求避难
1960 年	拉斐尔·特鲁希略下令杀害米拉瓦尔三姐妹——米内尔瓦、帕特里亚和玛丽亚·特雷莎——她们的勇气与殉难富于传奇色彩
1961 年	拉斐尔·特鲁希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被刺杀；这个短暂的政权由独裁者的儿子拉姆菲斯·特鲁希略执掌；国民议鲁希略执掌；国民议会在华金·巴格尔的领导形成
	古巴发生猪湾事件
1962 年	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独立
	西印度联盟解散
	胡安·博什赢得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选举
	古巴发生十月危机
	古巴发生彼得·潘行动
1963 年	胡安·博什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人集团推翻
1964 年	波多黎各的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被赦免
1965 年	切·格瓦拉从古巴消失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内战；美国海军陆战队侵入
1967 年	切·格瓦拉被波利维亚军队抓获并处决
1968 年	沃尔特·罗德尼被拒绝进入牙买加
1970 年	特立尼达发生黑人权力革命
1971 年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去世；他的儿子让—克洛德掌控海地
1972 年	迈克尔·曼利当选牙买加总理
1974 年	格林纳达从英国统治下独立
1976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执掌古巴政府
1979 年	莫里斯·毕晓普在格林纳达推翻埃里克·盖里

1980 年	格林纳达推行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的新宝石运动
	马里埃尔事件使数千古巴人到达美国
1983 年	莫里斯·毕晓普在格林纳达被暗杀；美国政府下令入侵格林纳达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允许访问海地；媒体和其他各方面批评杜瓦利埃政权
	加拿大政府出版《平等的今天》，建议结束教育、就业、法律制度和媒体等方面的种族主义；一年后，一项500万美元的基金建立，旨在同西印度群岛地区的种族主义作斗争
	魁北克的一群海地人出租车司机怒告其雇主支付的工资过低，而且赢得了诉讼
1984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城市暴动
1986 年	美国要求海地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辞职；杜瓦利埃去法国寻求避难
1990 年	神父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当选为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被驱逐，到美国寻求避难。回教布道兄弟会成员绑架了特立尼达总理 A. N. R. 鲁宾逊
1991 年	苏联集团跨台使古巴陷入经济危机，也即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
1994 年	阿里斯蒂德再次当选海地总统
	哈瓦那发生青年暴动
	古巴人乘自制的木筏离开古巴
1995 年	巴斯德奥·潘戴当选为特立尼达总理
1996 年	华金·巴格尔御任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
1998 年	波多黎各举行全民投票，46.4% 的人反对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 50.2% 的人拒绝所有的选

	项：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独立和成为美国的联邦

21 世纪：移民与不确定性

2000 年	让 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在欺骗的反对声中当选为海地总统
2000 年代	到加勒比地区的旅游者总数由 1980 年代的 900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20 多亿人
2002 年	古巴政府拒绝了巴雷拉计划的改革要求
2003 年	美国海军从靠近波多黎各海岸的别克斯岛基地撤离
2004 年	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辞去海地总统，并流亡非洲
2006—2007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生病导致了古巴的不稳定
2007 年	圣马丁和圣马泰勒米与瓜德罗普脱离，成为由法国直接管辖的海外行政区
	飓风迪安导致加勒比地区 12 人死亡，还将多米尼克、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香蕉毁坏殆尽，马提尼克 70% 的甘蔗农场遭到破坏；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受灾严重

附录4　参考文献

Acevedo, Ramón Luis. *Pachín Marín: poeta en libertad.* San Juan: Instituto de Cultura Puertorriqueña, Cuadernos de Cultura, No. 4, 2001.

Acevedo – Vila, Aníbal.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the U. S. – Puerto Rico Relationship: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In *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on Latin American Issues.* Dubuque, Iowa: McGraw Hill, 2007.

Acosta, Ivonne. *El grito de Vieques y otros ensayos históricos* (1990—1999). San Juan, P. R.: Editorial Cultural, 2002.

Albizu Campos, Pedro. *Pedro Albizu Campos: obras escogidas.* Edited by J. Benjamin Torres. San Juan, P. R.: Editorial Jelofe, distribuido por Ediciones Puerto Rico, 1975, 1981.

Algarín, Miguel, and Holman, Bob. *Aloud: Voices from the Nuyorican Poets Café.* New York: H. Holt, 1994.

Appel, John C. "The Unionization of Florida Cigarmaker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with Spai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 1956: 36—49.

Appiah, Kwame Anthony, and Gates, Henry Louis, Jr., eds. *Afri-*

cana: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Basic Civitas Books, 1999.

Argote – Freyre, Frank. *Fulgencio Batista*: *From Revolutionary to Strongman*.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Arpini, Adriana. *Eugenio María de Hostos*, *un hacedor de la libertad*. Mendoza, Argentina: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2002.

Báez, Víctor, ed. *La Gran Enciclopedia de Puerto Rico*. San Juan: Puerto Rico en la Mano and La Gran Enciclopedia de Puerto Rico, 1981.

Banks, Kenneth J. *Chasing Empire across the Sea*: *Communications and the State in the French Atlantic*. 1713—1763. Montreal and Ithaca, N. Y.: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rnes, Albert. *An Inquiry into the Scriptural Views of Slavery*.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1857, 1969.

Bellegarde – Smith, Patrick. *Haiti*: *The Breached Citade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Berrian, Albert H., and Long, Richard A., eds. *Négritude*: *Essays and Studies*. Hampton, Va.: Hampton Institute Press, 1967.

Bishop, Maurice. *Forward Ever*! *Three Years of the Grenadian Revolution*: *Speeches of Maurice Bishop*. Sydney and New York: Pathfi nder Press, 1982.

Boodhoo, Ken I. *The Elusive Eric Williams*. Kingston, Jamaica: I. Randle, 2001.

Burton, David H. *Theodore Roosevelt*: *Confi dent Imperiali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1968.

Bush, Barbara. *Slave Women in Caribbean Society*, 1650—1838. Kingston, Jamaica and Bloomington, Ind.: Heinemman Publishers a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Butts, Ellen, and Schwartz, Joyce R. *Fidel Castro.* Minneapolis: LernerPublications Co., 2005.

Cabeza de Vaca, Álvar Núñez. *The Account: Álvar Núñez Cabeza deVaca's Relación.* Houston, Tex.: Arte Público Press, 1993.

Cabezas, Amelia. "Between Love and Money: Sex Tourism and Citizenship in Cub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9, no. 4 (Summer 2004).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caribbeannetnews. com/cgi - script/csArticles/articles/000045/004588. 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9, 2006.

Cancel, Mario R. *Segundo Ruíz Belvis: el procer y el ser humano (unaaproximación crítica a su vida).* Bayamón,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América; San Juan: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de Puerto Rico yel Caribe; Hormigueros, Municipio de Hormigueros, 1994.

Cardona, Luis Antonio. *A History of the Puerto Ricans in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Bethesda, Md.: Carreta Press, 1995.

Carpentier, Alejo. *El reino de este mundo.* Mexico City: Edíción y Distribución Ibero Americana de Publicaciones, 1949.

——. *El siglo de las luces.* Barcelona: Bruguera, 1979.

Casablanca, Marie - Jean. *L'émigration corse á Porto Rico.* Paris: Le Signet, 1993.

Césaire, Aimé. *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51.

Césaire, Aimé. *Notebook of a Return to My Native Land/Cahier d'un retourau pays natal.* Translated by Mireille Rosello with Annie Pritchard.

Newcastle upon Tyne: Bloodaxe Books, 1995.

Céspedes, Carlos Manuel de. *Pasión por Cuba y por la iglesia: aproximaciónbiográfi ca al P. Félix Varela.*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98.

Chasteen, John Charles. *Born in Blood and Fi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8—1799. London: Chronicle Publication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9.

Coleman, Loren, and Clark, Jerome. *Cryptozoology A to Z.* New York: Fireside, 1999.

Collier, Simon. *From Cortes to Castr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1492—1973.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74.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La crisis urbana en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Refl exiones sobre alternativas de solución.* Santiago, Chile: Naciones Unidas, 1989.

Connolly, Sean. *Castro.*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2002.

Corretjer, Juan Antonio. "The Day Puerto Rico Became a Nation." In *The Puerto Ricans: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ited by Kal Wagenheim and Olga Wagenheim. Princeton, N. J.: Marcus Weiners, 1994, 2002.

Cortés, Eladio, and Barrea - Marlys, Mirta.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 Theater.*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3.

Cotman, John Walton. *The Gorrion Tree: Cuba and the Grenada Revolution.* New York: P. Lang, 1993.

Crasweller, Robert D.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Changing Societies and U. S. Policy.*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 *Trujillo: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aribbean Dictator.*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Cuevas Zequeira, Sergio. *Manuel de Zequeira y Arango y los albores de lacultura cubana.* Habana, Cuba: Tipografía Moderna de A.

Dombecker, 1923.

Cundall, Frank. *Historic Jamaica.*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Jamaica, 1915.

Dana, Richard. "Havana, 1859." In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Cuba*, edited by Alan Ryan, 1—26.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Co, 1997.

Dash, J. Michael. *Culture and Customs of Haiti.*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1.

Dayan, Joan. *Haiti, History, and the God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Dent, David W. *The Legac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A Reference Guide to U. S. Involve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9.

Diederich, Bernard. *Papa Doc: Haiti and Its Dictator.* New York: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Domínguez, Jaime de Jesús. *Historia dominicana.* Santo Domingo, República Dominicana: ABC Editorial, 2001.

Dominican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rnesto Sagas and Sintia Mol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Dubois, Laurent.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Chapel Hill, N. C.: published for the Omohundr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Williamsburg, Va.,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Dupuy, R. Ernest, et al.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Global War.*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77.

Enciclopedia Ilustrada de la Republica Dominicana. Santo Domingo, Republica Dominicana: Eduprogreso, S. A., 2003.

Equiano, Olaudah.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s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written by himself, 1789. London: Dawson of Pall Mall, 1969.

Ethnicities: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America. Edited by Ruben G. Rum baut and Alejandro Por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Facio, Alda. "Traffi 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for the Sex Trade: Refl ections from a Latin American Human Rights Feminist." *Canadian Woman Studies* 22, 3/4 (Spring/Summer 2003): 136.

Fagg, John Edwin. *Cuba, Haiti & the Dominican Republic.*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5.

Falola, Toyin. *Key Events in Af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2.

Fanon, Frantz. *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Haakon Chevali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9.

Fernandez, Ronald, et al., eds. *Puerto Rico: Past and Present; an Encycloped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8.

Fernández Méndez, Eugenio. *Luis Muñoz Rivera, hombre visible.* San Juan, P. R.: P. Biblioteca de Autores Puertorriqueños, 1982.

Ferrao, Luis Angel. *Pedro Albizu Campos y el nacionalismo puertorriqueño.* San Juan, P. R.: Editorial Cultural, 1990.

Ferrer Canales, José. *Martí y Hostos.* Río Piedras: Instituto de Estudios Hostosianos,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San Juan: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de Puerto Rico y el Caribe, 1990.

Foner, Nancy. *Jamaica Farewell: Jamaican Migrants in Lond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Foner, Philip S.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2.

Franklin, Jane.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New York: Ocean

Press/Center for Cuban Studies. 1992.

Fuente, Alejandro de la. *A Nation for All: Race, Inequality,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 – Century Cub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Fuentes, Carlos. *The Buried Mirror: Refl ections 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 in, 1992.

Galván, Manuel de Jesús. *Enriquillo: leyenda histórica dominicana,* 1503—1533. Santo Domingo: Ediciones de la Fundación Corripio, 1990.

Gerónimo, Joaquín. *En el nombre de Bosch.* Santo Domingo, República Dominicana: Editora Alfa Omega, 2001.

Goldberg, Mark. "Primeval Minefi eld." *The American Prospect* 15, 11 (Nov. 24, 2003).

González López, Emilio. *Historia de la civilización Española.* New York: Las Americas Publishing, 1970.

Grenier, Guillermo J. and Lisandro Perez. *The Legacy of Exile: Cub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3.

Hakluyt, Richard. In *Readings in Caribbean History and Economics*, edited by Roberta Marx Nelson.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81.

Harney, Stefano.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Imagination in a Caribbean Diaspora.* Kingston, Jamaica: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1996.

Hart, Stephen, and Young, Richard.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rnold, 2003.

Haviser, Jay B. *Amerindian Cultural Geography on Curaçao.* Leiden, Netherlands: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87.

——. *In Search of St. Martin's Ancient People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Philipsburg, St. Martin: House of Nehesi, 1995.

Hernández, Ramona, et al. *Dominican New Yorkers: A Socioeconomic Profi le.* New York: CUNY Dominican Studies Institute, Dominican Research Monograph Series, 1995.

Hernández González, Heriberto. *Félix Varela: retorno y presencia.* Habana, Cuba: Imagen Contemporánea, 1997.

Iglesias, César Andreu. "The Conscience of the People." In *The Puerto Ricans: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ited by Kal Wagenheim and Olga Jiménez de Wagenhei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James, C. R. L.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 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1989.

January, Brendan. *Fidel Castro: Cub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2003.

Jarrett – Macauley, Delia. *The Life of Una Marson:* 1905 *to* 65.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Kaplan, Irving, et al. *Area Handbook for Jamaic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 1975.

Kempadoo, Kamala. "Freelancers, Temporary Wives, and Beach – Boys: Researching Sex Work in the Caribbean." *Feminist Review* (London) 67, no. 1 (Spring 2001): 39—62.

King, Jo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Lati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Klein, Herbert S. *African Slaver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Knight, Franklin W. *The Caribbean, the Genesis of a Fragmented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Knight, Franklin W. *The Caribbean, the Genesis of a Fragmented Nationalism.*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Koslow, Philip. *Centuries of Greatness: The West African Kingdoms,*

1750—1900.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5.

Kullen, Allan S., comp.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A Timeline of EventsThat Helped Shape Our Nation.* Beltsville, Md.: Americans All, 1992.

Laguerre, Michel S. *American Odyssey: Haitians in New York City.* Ithaca, N. 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Lai, Walton.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 Migrations to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Caribbean Asians: Chinese, Indian, and Japanese Experiences in Trinidad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edited by Roger Sanjek. Flushing, N. Y.: Asian/American Center at Queens College, CUNY, 1990.

Lal, Deepak. *In Praise of Empires: Globalization and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Lapointe, Michelle. "Diasporas in Caribbean Development: Rapporteur's Report." Report of the Inter – American Dialogue and World Bank, August 2004.

Latinos: Remaking America. Edited by Marcelo M. Suarez – Orozco and Mariela M. Paez.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eaders: Whose Coup in Haiti? *The Economist* (London) 370, no. 8365 (March 6, 2004): 13.

Leonard, Thomas M. *Fidel Castro: A B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4.

Levi, Darrell E. *Michael Manley: The Making of a Leade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Lockwood, Lee. *Castro's Cuba: Cuba's Fidel——An American Journalist's Inside Look at Today's Cuba in Text and Pi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Lundberg, Ferdinand. *Imperial Hearst: A Social Biography.* New

York: Equinox Cooperative Press, 1936.

Manley, Edna. *Edna Manley: The Diaries.* Edited by Rachel Manley. London: A. Deutsch, 1989.

Martínez Fernández, Luis and D. H. Figueredo, eds. *Encyclopedia ofCub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Martin, Cheryl E., and Mark Wasserman. *Latin America and Its Peopl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4.

Masur, Gerhard. *Simón Bolívar.*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48.

McDonald, Scott B. *Trinidad and Tobago: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the Caribbean.* New York: Praeger, 1986.

Meeks, Brian. "The Jamaican Moment: New Paths for the Caribbean?"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New York) 39, 6 (May/June 2006).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proquest. com. Accessed on December5, 2006.

Melendez, Miguel. *We Took the Streets: Fighting for Latino Rights with theYoung Lor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3.

Mellersh, H. E., ed. *Chronology of World History.* 4 vols. Santa Barbara, Calif.: ABC CLIO, 2001.

Miller, Jake C. *The Plight of Haitian Refugees.* New York: Praeger, 1984.

Mills, Therese. *Norman Manley.* Trinidad, West Indies: Giuseppi, 1976.

Montejo, Esteb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Runaway Slave, EstebanMontejo.* Edited by Miguel Barne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

Montes – Huidobro, Matías. *El laud del desterrado.* Houston, Tex.: ArtePúblico Press, 1995.

Morison, Samuel Eliot,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

ments on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The HeritagePress, 1963.

Morris, Arthur.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Totowa, N. J.: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81.

Moss, Joyce, and Wilson, George. *Peoples of the World: Latin Americans.*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89.

Moss, Joyce, and Valestuck, Lorraine.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Times.*

Vol. I. Detroit and San Francisco: Gale Group, 1999.

Ojito, Mirta A. *Finding Mañana: A Memoir of a Cuban Exodu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Oppenheimer, Andrés. *Cuentos chinos. El engaño de Washington, la mentirapopulista y la esperanza de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Sudamericana, 2006.

Palmer, Colin A. *Eric William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aribbe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aquet, Sandra Pouchet. *Caribbean Autobiography: Cultural Identity andSelf Represent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Paton, William Agnew. *Down the Islands: A Voyage to the Caribbees.* New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887.

Patterson, Orlando.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èrina, Mickaëlla. "Martinique." In *African Caribbeans*, edited by AlanWest – Durá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2003.

Pina, Digenes. "Dominican Republic: President Militarizes Anti – CrimePatrol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York. August 29, 2006.

Plaza, Galo. *Latin America: Today and Tomorrow.* Washington, D. C.: Acropolis Books, 1971.

Postma, Johanne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Press, 2003.

Price - Mars, Jean. *So Spoke the Uncle.* Translated by Magdaline W. Shannon. Colorado Springs, Colo.: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94.

Rapley, John. "The New Middle Ages." *Foreign Affairs* 85, 3 (May/June2006): 95.

Reid, Vic. *New Da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Reissued by ChathamBookseller, Chatham, N. J., 1972.

Renda, Mary A. *Taking Haiti: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 S. Imperialism* 1915—1940.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Ribes Tovar, Federico. *Historia cronológica de Puerto Rico; desde el nacimientode la isla hasta el año* 197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7.

Rivero Muniz, José. *Tabaco, su historia en Cuba.* Habana, Cuba: Institutode Historia, Comisión Nacional de la Academia de Ciencias de laRepública de Cuba, 1964—65.

Rodriguez, Junius P. *Chronology of World Slavery.* Santa Barbara, Calif.: ABC - CLIO, 1999.

Rodriguez, Junius P., ed. *The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f World Slavery*, 2vols. Santa Barbara, Calif.: ABC - CLIO, 1997.

Rogozi'nski, J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From the Arawak andthe Carib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 Meridian Book, Penguin, 1992.

Ros, Martin. *Night of Fire: The Black Napoleon and the Battle for Haiti.* New York: Sarpedon, 1991, 1994.

Sana, Mariano and Douglas S. Massey. "Household Composition,

FamilyMigr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Migrant Remittances inFour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Austin) 86, 2 (June 2005).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proquest. umi. Accessed on November30, 2006.

Santovenia, Emeterio S., and Shelton, Raul M. *Cuba y su historia*, TomoI. Miami: Cuba Corporation, 1966.

Saunders, Nicholas J. *The Peoples of the Caribbean: An Encyclopedia ofArchaeolog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anta Barbara, Calif.: ABC - CLIO, 2005.

Security 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Caribbean. Edited byJorge Rodriguez Beruff and Humberto Garcia Muni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Sekou, Lasana M. *National Symbols of St. Martin.* Philipsburg, St. Martin: House of Hesehi Publishers, 1997.

Sellén, Francisco Hatuey. *Poema dramatico en cinco actos.* Nueva York: A. da Costa Gómez, 1891.

Silén, Juan Angel. *Nosotros solos: Pedro Albizu Campos y el nacionalismoirlandes.* Río Piedras, P. R.: Editorial Libreria Norberto González, 1996.

Steele, Beverly A. *Grenada: A History of Its People.* Oxford: MacmillanCaribbean, 2003.

Strong, L. A. G. *The Story of Suga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4.

Syrett, David. "The Navy Board and Transports for Cartagena, 1740."

War in History 9, 2 (April 2002): 127—141.

Thomas, Hugh.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71.

Torres - Saillant, Silvio, and Hernandez, Ramona. *The New Ameri-*

cans: *The Dominican Americans.*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GreenwoodPress, 1998.

Wagenheim, Kal, and Wagenheim, Olga Jimenez de, eds. *The PuertoRicans*: *Documentary History.* Princeton, N. J.: Marcus Wiener Publishers, 2002. Updated edition.

Walvin, James. *An African's Life*: *The Life and Times of Olaudah Equiano*, 1745—1797.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

West – Durán, Alan. *African – Caribbeans. A Reference Guide.* Wes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Wilkinson, Bert. "Health – Caribbean: Meeting Plans Region's Fightagainst HIV – AID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York) (April22, 2002): 1. Williams, Byron. *Puerto Rico*: *Commonwealth, State, or Nation*? NewYork: Parents' Magazine, 1972.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Williams, Eric.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1984.

Williams, Patrick, and Chrisman, Laura,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Post – 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Williams, Stephen. *Cuba*: *The Land, the History, the People, the Culture.*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1994.

Wilson, Andrew, ed.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Princeton, N. 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4.

Winn, Peter. *Americas*: *The Changing Fac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3rd ed.,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Wood, Bett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 *Freedom and Bondage inthe English Colon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7.

Wood, Peter, ed. *The Seafarers: The Spain Main.*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79.

Wyden, Peter. *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1979.

附录 5　建议阅读书目

第一章　哥伦布达到之前的居民

Coll y Toste, Cayetano. *Selección de leyendas puertorriquenas*. Boston and Washington, D. C.: Heath, 1932.

Theodora Web sit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 theodora. com/wfb/abc_ world_ fact_ book. html. Accessed on May 30, 2006.

Humboldt, Alexander vo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00.

Martinez-Cruzado, J. C.,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substantial Native America ancestry in Puerto Rico." *Human Biology* (Aug. 2001).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 //www. fi ndarticles. com/p/articles/mi_ qa3659/is_ 200108/ai_ n8981492. Accessed on April 24, 2006.

Silva Lee, Alfonso. *Coqui y sus amigos: los animales de Puerto Rico* (Coqui and his friends: the animals of Puerto Rico). St. Paul, Minn.: Pangaea, 2000.

第二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西班牙的征服（1492—1552）

Bedini, Silvio, ed. *The Christopher Columbus Encycloped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de Las Casas, Bartolomé. "The Horrors of the Conquest." In *The Borzoi Antholog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Emir Rodríguez Monegal. New York: Knopf, 1977.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Translated by A. P. Maudsla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56.

Information Please ® Database, 2006 Pearson Education, Inc. Avail - able online. URL: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875904.html. Accessed on May 16, 2006.

Johnson, Sherr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18th Century Cub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O'Callaghan, Joseph F. *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hila - 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Ortiz, Fernando.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Translated by Harriet de Oni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icó, Fernando. *History of Puerto Rico. A Panorama of Its People*. Princ - eton, N. 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6.

Richardson, Bonham C. *The Caribbean in the Wider World*, 1492 - 1992: *A Regional Ge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ienits, Rex, and Rienits, Thea. *The Voyages of Columbus*. New York: Crescent Books, Crown Publishers, 1970.

Rouse, Irving. *The Tainos: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annard, David. *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Wilford, John Noble.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Columbus: An Explora -tion of the Man, the Myth, the Legacy*.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1.

Williamson, Edwi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第三章 欧洲人对西班牙统治的挑战（1500—1850）

Esquemelin, John. *The Buccaneers of America*. Translated from Dutch by Alexis Brow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9.

UNESCO. *Fortifi caciones del Caribe*. 1997.

Geggus, David Patrick.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rin, Albert. *Terror of the Spanish Main: Sir Henry Morgan and His Buccaneers*. New York: Dutton' s Children Books, 1999.

Martin, Colin, and Ellis, Sian. "Gun Ships and Sea Dogs." *British Heri-tage* 23, 4 (June/July 2002): 34—42.

Salmoral, Manuel Lucena. *Piratas, bucaneros, fi libusteros y corsarios en América*. Madrid: Editorial MAPFRE, 1992.

Tennat, Anne W. "Architect of a King's Defense." *Americas* 5, 5 (Sept. /Oct. 2003): 6—14.

Williams, Eric.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第四章 工业与奴隶制（1500—1850）

Brathwaite, Edward Kamau.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 - 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 *Folk Cultures of the Slaves in Jamaica*. London and Port of Spain: New Beacon Books, 1981.

Burnside, Madeleine, and Robotham, Rosemarie. *Spirits of the Passage: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Curtin, Philip 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unn, Richard S.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 - 171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 2000.

Thornton, Joh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 - 1680*.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五章　美国、法国与海地革命（约1700—1850）

Dash, J. Michael. *Haiti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ereotype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Geggus, David Patric.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ffman, Leon - Francois. *Haitian Fiction Revisited*. Pueblo, Colo.: Passeggiate Press, 1999.

Ireland, Bernard. *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0.

Kiernan, James Patrick. "George Washington's Barbados Connection." *Americas* (Washington) 53, 3 (May/June 2001): 5.

Schutt - Ainé, Patricia, and the staff of Librair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Haiti: A Basic Reference Book; General Information on Haiti*. Miami and Port - au - Prince: Libraire au Service de la Culture, 1994.

Shepard, Odell. *Jenkins' Ear; a Narrative Attributed to Horace Walpole, Esq*.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第六章　奴隶反抗、反奴隶制运动和独立战争（约1700—1850）

Blassingame, John, ed. *Slave Testimony: Two Centuries of Letters,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List of Presidents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www.answers.com/topic/list-of-presidents-of-the-dominican-republic. Accessed on July 5, 2006.

Moya Pons, Frank.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 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 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8.

Prince, Mary. *The History of Mary Prince: A West Indian Slave*. London: F. Westly and A. H. Davis, 1831.

Reid, Vic. *New Day*. New York: Knopf, 1949.

Rodriguez, Junius P.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f World Slavery*. 2 vols. Santa Barbara, Denver, and Oxford: ABC-CLIO, 1997.

Tikasingh, Gerad. "Toward a Formulation of the Indian View of History: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ian Opinion in Trinidad, 1900 - 1921." In *East Indians in the Caribbean: Coloni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Kra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2.

Welcome to Puerto Rico. Available online. URL: www.welcome.topuertorico.org/reference/fl ag.shtml. Accessed on June 29, 2006.

第七章　波多黎各、古巴和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1850—1900）

Cisneros, Evangelina. *The Story of Evangelina Cisneros Told by Herself*. New York: Continental Publishing, 1897.

Fernández Cabrelli, Alfonso. *La francmasonería en la independencia de Hispanoamérica*. Montevideo, Uruguay: Ediciones America Una, 1988.

Freidel, Frank Burt. *The Splendid Little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58.

Helg, Aline. *Our Rightful Share: The Afro – Cuban Struggle for Equality, 1886—191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Lopez Nieves, Luis. *Seva: historia de la primera invasion norteamericana de la Isla de Puerto Rico, ocurrida en mayo de 1898*. San Juan, P. R.: Editorial Cordillera, 1984.

Lopez Sanchez, José. *Carlos J. Finlay: His Life and His Work*. Habana, Cuba: Editorial José Martí, 1999.

Martí, José. *Our America: Writings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Cuban Independence*. Edited by Philip S. Fon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Montaner, Carlos Alberto. *Trama*. Esplugues de Llobregat, Barcelona: Plaza & Janeés, 1987.

Musicant, Ivan. *Empire by Default: The Spanish – American War and the Dawn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8.

Perez, Louis A., Jr.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 *Cuba under the Platt Amendment, 1902—1934*. Pittsburgh: Uni – 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6.

Rickover, Hyman G. *How the Battleship Maine Was Destroyed*. Wash-ing – ton, D. C.: Dept. of the Navy, Naval History Division, 1976.

Scott, Rebecca J. *Slave Emancipation in Cuba: The Transition to Free Labor, 1860—189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0.

Swanberg, W. A. *Citizen Hearst: A Biography of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1.

第八章 古巴：独裁与革命（1900—2007）

Argote – Freyre, Frank. *Fulgencio Batista: From Revolutionary to*

Strong - man.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Mesa - Lago, Carmelo, ed. *Cuba after the Cold War*.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Mesa - Lago, Carmelo. *Cuba in the 1970s: Pragmatism and Institutionaliza - tion*. 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8.

DePalma, Anthony.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Castro, Cuba, and Herbert L. Matthew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Encyclopedia of Cuba: People, History, Culture. Edited by Luis Martínez - Fernández and D. H. Figueredo.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2003.

Latell, Brian. *After Fidel: The Inside Story of Castro' s Regime and Cuba' s Next L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Lewis, R. Anthony. "Language, Culture and Power: Haiti under the Duvaliers." *Caribbean Quarterly* 55, 4 (Dec. 2004): 42—53.

Machado y Morales, Gerardo. *Ocho anos de lucha*. Miami: Ediciones Historicas Cubanas, 1982.

Perez, Louis A., Jr.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erez - Stable, Marifeli.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ein, Stanley J., and Stein, Barbara H.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Essays on Economic Dependenc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Whitney, Robert.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Cuba: Mass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1920—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 - lina Press, 2001.

第九章　分裂与占领：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1900—2000）

Crassweller, Robert D. *Trujillo: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aribbean Dicta－tor*.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Derby, Lauren. "The Dictator' s Seduction: Gender and State Spectacle dur－ing the Trujillo Regime." *Callaloo* 23, 3 (Summer 2000): 1112—1146.

Dold, Gaylor. *Dominican Republic Handbook*. Chico, Calif.: Moon Pub－lications, 1997.

Renda, Mary A. *Taking Haiti: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 S. Imperialism, 1915—1940*. Chapel Hil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Roorda, Eric Paul. *The Dictator Next Door: Good Neighbour Policy and the Trujillo Regime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1930—1945*.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uíz Burgos, Victor Eddy. *Los gobiernos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Santo Domingo: Biblioteca Nacional, 1993.

Sagas, Ernesto. *Race and Politic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Schmidt, Hans.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Haiti, 1915—1934*.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1.

Stein, Stanley J., and Stein, Barbara.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Essays on Economic Dependenc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第十章　联邦、联盟与自治：波多黎各、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荷属加勒比（1900—2000）

Caban, Pedro A. *Constructing a Colonial People: Puerto R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32*.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9.

Bosque - Pérez, Ramón, and Morera, José Javier Colón, eds. *Puerto Rico Under Colonial Rule: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Righ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Dietz, James L. *Economic History of Puerto Ric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Duany, Jorge. *The Puerto Rican Nation on the Move: Identities on the Islan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Fernandez, Ronald. *The Disenchanted Island: Puerto R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6.

Meléndez, Edwin, and Meléndez, Edgardo. *Colonial Dilemm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3.

Report by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Puerto Rico's Status, December 2005.

第十一章　牙买加、特立尼达和格林纳达：不确定的光荣（1900—2000）

Black, Jan Knippers, et al. *Area Handbook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Washin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 1976.

Finkel, Steven E. "Can Democracy Be Tau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1, 4 (October 2003): 137—151.

Hurwitz, Samuel J., and Hurwitz, Edith. *Jamaica: A Historical Portrait.* New York: Praeger, 1971.

Lewis, Vaughan A. "The Small State Alone: Jamaican Foreign Policy, 1977—198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25, 2 (May 1983): 139—169.

Libby, Ronald 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maica: Playing the Ameri-

can Car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7, 1, Caribbean Crisi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Winter, 1990): 86—109.

Millette, Robert E. *The Grenada Revolution: Why It Failed.* New York: Africana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5.

Oxal, Ivar. *Black Intellectuals Come to Power: The Rise of Creole National - ism in Trinidad and Tobago.*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Sekou, Lasana M. *37 Poems.* Philipsburg: St. Martin: House of Nehesi Publishers, 2005.

Stephens, Evelyne Huber, and Stephens, John D. *Democratic Social - ism in Jamaica: Th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Dependent Capit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十二章 21世纪：移民和不确定性

Alvarez, Julia.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Chapel Hill, N. C.: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1991.

de Grave, Analisa, et al., eds. *Issues.* Dubuque, Iowa: Contemporary Learning Series/McGraw - Hill, 2007.

Durbin, William. *El Lector——The Reader.* New York: Wendy Lamb Books, 2006.

Duval, David Timothy. *Tourism in the Caribbean: Trends, Development,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Freeman, Gary P. "Caribbean Migration to Britain and France: From Assimilation to Selection." In *The Caribbean Exodus*, edited by Barry Levine.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87.

Kanellos, Nicolás. *Hispa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rehen - sive Referen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Levine, Barry B., ed. *The Caribbean Exodu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87.

Levine, Robert M., and Asís, Moisés. *Cuban Miami*.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Offi 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Remittances: Not Manna from Heav – ens."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web. worldbank. org. Accessed on December 1, 2006.

Ojito, Mirta. *Finding Manana: A Memoir of a Cuban Exodu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Pator, Robert, e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ribbean: The Unexplored Connection*. Boulder, Colo.,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Ryan, Chris, and Hall, C. Michael. *Sex Tourism: Marginal People and Liminal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Sagás, Ernesto, and Sintia E. Molina, eds. *Dominican Migration: Transna – tional Perspectiv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Santiago, Esmeralda. *When I Was Puerto Ric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Whalen, Carmen Teresa. *From Puerto Rico to* Philadelphia: Puerto Rican Workers and Postwar Econom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Yglesias, Jose. *A Wake in Ybor City*. Houston, Tex.: Arte Público Press, 1998.

索　引

说明：页码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斜体的表示插图页，数字后带字母 m 的表示地图页，带字母 t 的表示表格页，带字母 c 的表示大事记

A

B

C

E

G

H

I

J

K

L

M

O

P

Q

R

S

T

U

Y

Z

书名=加勒比海地区史
作者=D
页码=365
ISBN=
SS号=12810682
dxNumber=000008130761
出版时间=2011.05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